

斯诺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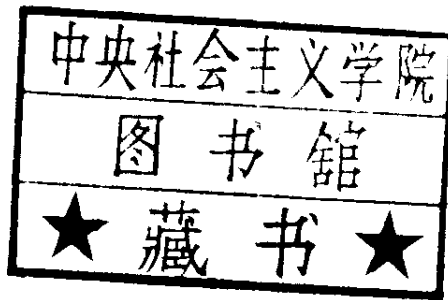
埃德加·斯诺

58731

为亚洲而战



200412767



新华出版社



斯诺和周恩来、邓颖超同志在武汉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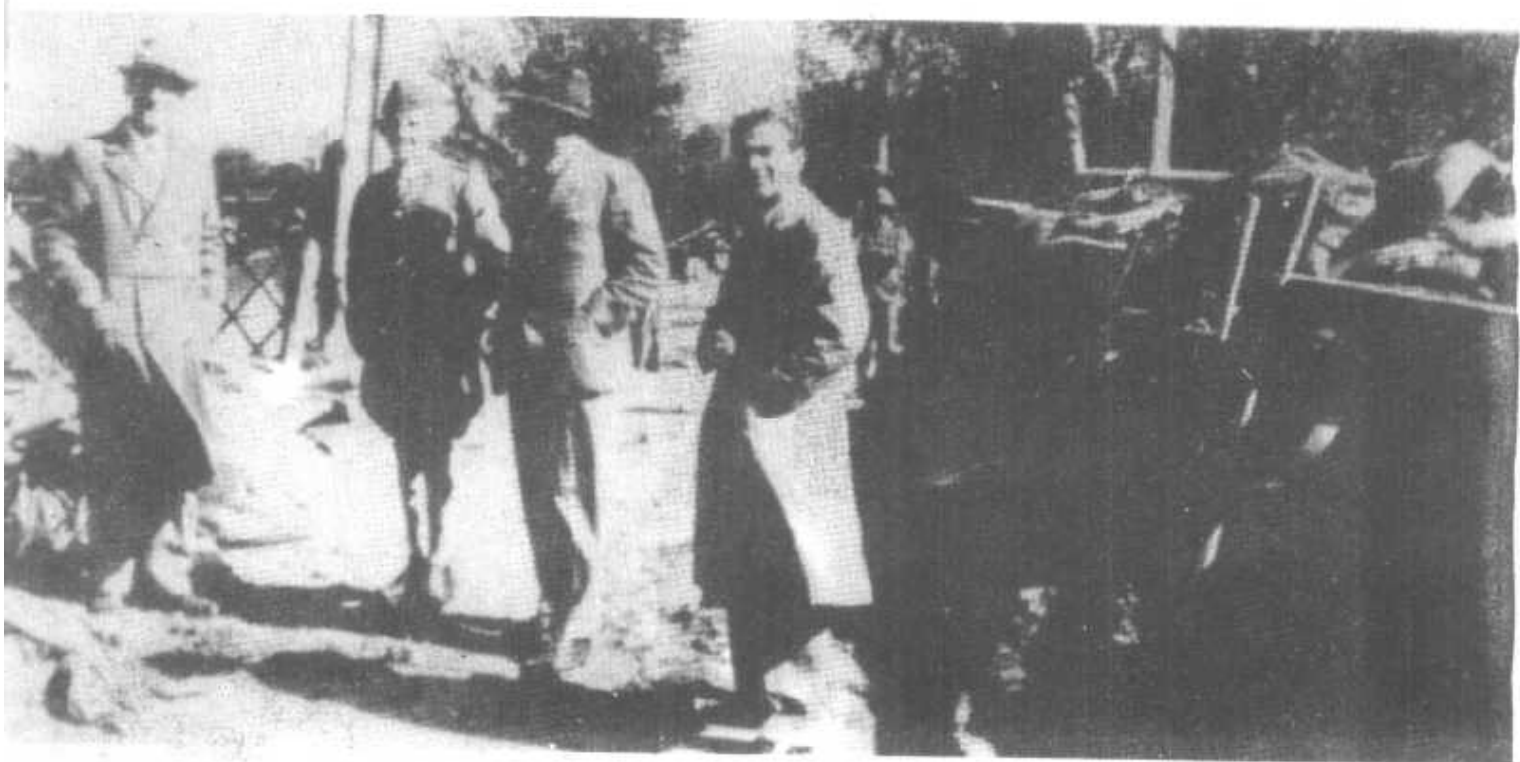
(1938年)

斯诺和叶挺
同志在武汉合影。
(1938年)



朱德同志向红军
战士讲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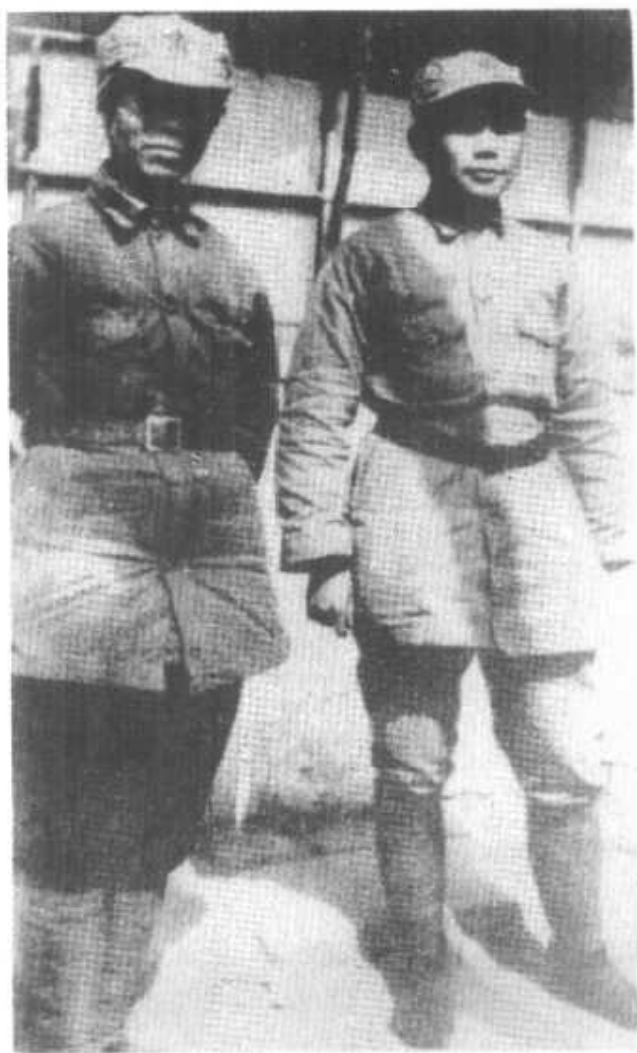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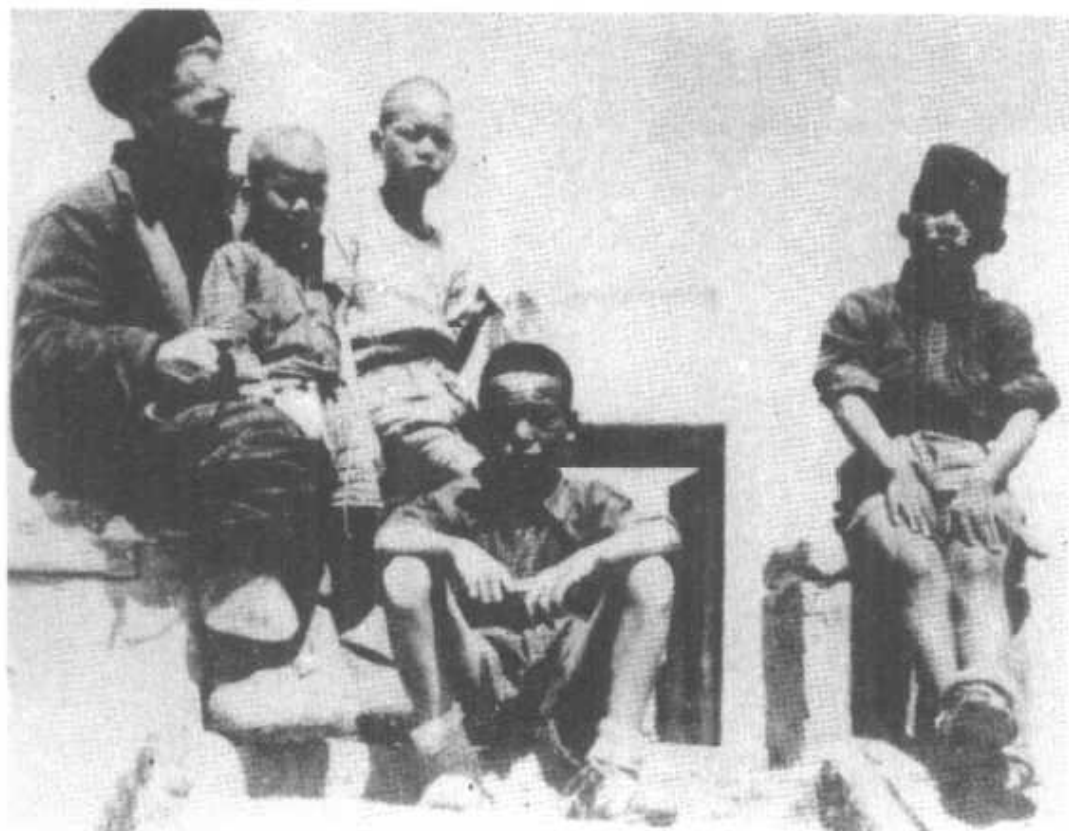
日军侵占上海时，斯诺（右）与美国海军陆战队上尉
卡尔逊（最后）合影。（1938年）



周恩来同志（后
排左）率领中共代表
团到达南京，与国民党
谈判停战。前排左为
叶剑英同志，右为朱
德同志。（1937年）



康克清同志（右）
和贺子珍同志合影。
（1938年）



路易·艾黎在山丹学校同战时孤儿在一起。

(1939年)



延安宝塔山下的红军骑兵。



陈毅同志（右）和叶挺同志
在新四军司令部前合影。

（1939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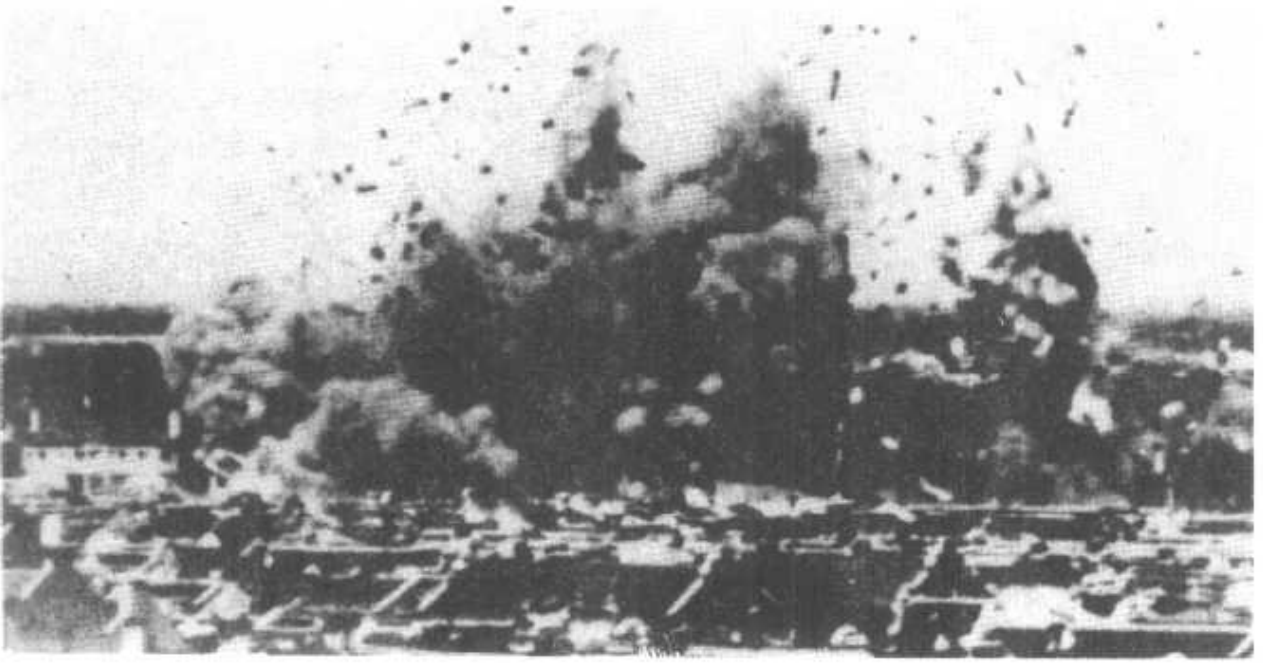
陕北抗日军政大学的女毕业生。

宋庆龄(右)、
宋蔼龄(中)和
宋美龄(左)参
观重庆一所伤兵
医院。

(1939年)



红军攻占山西祁
县县城。(1936年)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
日本侵略者轰炸上海。



日军占领娘子关后沿石太线
西进，正向平定方向进扰。

(1937年)

中国军人，被
侵华日军砍头。



新四军战士英勇阻击敌人。



平型关战斗中八路军的机枪阵地。



南京城郊失去战斗力之我国军民，被日军反绑双臂枪杀后掷入池中，仅此池中就有尸体三百余具。



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在延安。

威震华北的八路军骑兵部队。





八路军一二九师在狮脑山战斗中的重机枪阵地。



日军对晋察冀进行秋季扫荡时，民兵埋设地雷，打击敌人。

八路军围攻易县沙岭子日伪军的指挥所。



号称雁翎队的冀中白洋淀水上
游击队，从冀中文安洼登船向渤海
区进发。

出版前言

埃德加·斯诺是美国著名的作家和新闻记者，他一生写了大量著作，尤其是关于中国的报道，在世界上引起了巨大反响。他写的几部关于中国的名著，曾被连续再版，并被译成多种文字广泛发行，有力地促进了世界人民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了解，使中国人民为争取进步的斗争博得了广泛的同情和支持。

斯诺的记者生涯，是和中国紧密联系在一起，从一九二八年到一九四一年期间，斯诺绝大部分时间生活在中国。通过目睹中国的内忧外患，他对中国人民产生了同情，增强了正义感。一九三六年越过国民党的重重封锁，冒着生命危险进入陕北苏区采访，历时四个多月。他深入访问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副主席，访问了红军指挥员和战士，访问了解放区的群众。这些访问加深了他对中国革命斗争的了解，使他成了中国人民的好朋友。在《红星照耀中国》一书出版后，斯诺深情脉脉地写到：“在许多书页里，我仅仅把那些英勇的男女们告诉我的记录下来。同这些英勇的男女们生活在一起，并暂

D.K. Snow

时同他们等同起来，这是我的殊荣。”“现在他们每天正在用英勇的牺牲精神，在写着许多别的书，对于这些男女战士，我愿意和他们握手道贺。原来在这些老资格‘赤匪’之中，有许多位，是我在中国十年以来所未遇见过的最优秀的男女哩！”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当时的美国政府采取敌视中国的政策，迫害进步人士，斯诺在美国处境十分困难，后来移居瑞士。然而他拿着美国护照，得不到访华的签证，他和中国的关系被人为地割断十余年。一直到一九六〇年他才以美国作家的身份取得签证，访问新中国。此后一九六四年和一九七〇年又两度来访。每次访问，他都搜集了大量材料，通过报道，生动地向全世界介绍新中国的建设成就，讴歌人民中国在共产党领导下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斯诺是中国人民诚挚的朋友，数十年如一日，为促进中美两国伟大人民的了解和友谊倾注了自己的心血。他对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怀有坚定不移的信心。麦卡锡主义对他全家的迫害，国际上对新中国的歪曲和诬蔑，都没有损害他对中国人民的情谊，没有使他丧失对中美人民终将冲破重重障碍，开拓友好合作道路的信心。新中国是斯诺心爱的话题。他为读者著书，给青年讲课，对公众演说，给朋友写信，同客人说话，都离不开中国。在临终时，他用尽了生命的最后力量所讲的一句话是：“我热爱中国！”

中国人民沉痛悼念斯诺的逝世，毛泽东主席在给斯诺夫人的唁电中指出：“斯诺先生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他一生为增进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将永远活在中国人民心中。”

为了纪念中国人民这位诚挚的朋友，为了表彰新闻战线上这位出色的战士，我们决定出版《斯诺文集》。这套文集先出四卷，主要搜集了斯诺各个时期的代表作。其内容是：

第一卷《复始之旅》(《Journey to the beginning》)，一九五八年首由美国出版公司出版。这是斯诺记者生涯的自述。书名取意于庄子的话：“消息盈虚，终则有始。”他的一生大体分为三个阶段：结婚以前的游历记者的生活；在北京定居后对中国人民斗争的同情和支持；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大战后对中国、印度、苏联等地的访问情况。这本书穿插了一些回忆和思考，尤其详细记述了他同宋庆龄、甘地和罗斯福等人的交往。文笔精练，引人入胜。书中谈到，他已赢得了“报道一贯准确的名声”，甘地曾对他面誉道：“我们尊重你的诚实态度。”

第二卷《红星照耀中国》(《Red star over china》)，一九三七年十月由伦敦戈兰茨公司出版。这是访问陕北苏区后震动世界的名作。《红星照耀中国》一书，打破了国民党的十年封锁，生动而朴实地报道了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和中国工农的英雄的革命业绩。这本书问世后，仅在第一年就连续再版五次，被译成十多种文字，成了世界上最畅销的书籍之一。国内外许多青年读后，走上革命的道路，誓作旧世界的叛逆者。当年国统区的一些进步人士翻译出版时，为便于躲避反动派的检查，取名为《西行漫记》，如今我们重新出版时，恢复正名《红星照耀中国》。毛泽东同志曾经向干部推荐，这是“一本真实介绍我们情况的书。”斯诺也多次向友人谈到，他在红色苏区找到了真正的“东方魅力”！

第三卷《为亚洲而战》(《the battle for asia》)，一九四一

年由美国兰多姆出版公司出版。这本书描述了一九三七年芦沟桥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华的情况。热情地报道了中国共产党坚持进步、坚持抗战的政策，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消极抗战、反共反人民的丑态，并以中日战争为背景，论述了国际之间的关系。斯诺对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充满信心。他说：“在这场战争中，中国正输掉每一个战役，然而中国是处在得胜的一边。”书的后半部介绍了工业合作社运动的缘起和发展，然后是长篇报道作者在一九三九年重访解放区的见闻，重申了民主、自由的中国必胜的信心。此外，在本卷中我们还选了斯诺有关评蒋介石《中国的命运》和有关中国抗战前景的若干篇文章。

第四卷《大河彼岸》(《the other side of the river》)，一九六二年由美国出版公司出版。书前引用了十七世纪法国哲学家巴斯卡尔的话：“法律正义竟以河为界，多么可笑！……还有什么事情能比这更加可笑呢：一个人居然有权杀死我，仅仅因为他住在河的彼岸，……”这里“河”只是人为国界的代名词。斯诺引用这段话，是为了讽刺美国对华敌视的政策，主张撤掉中美人民之间的人为障碍，说明他写这本书的目的在于向美国人民介绍“河的彼岸”的真实情况。在书中，斯诺以极大的热情介绍了新中国。他记录了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谈话，描述了与他们重叙旧谊的欢快。毛主席对斯诺说：我们很长时间没见面了，这期间你没有变，我们也没有变。书末一章命题《前面的长征》，正表达了作者对中国的前途所寄予的深情厚望。

在这四卷之后，我们还将继续编辑出版斯诺的散文特写集和其他著述。

斯诺是世界上享有盛名的记者，他的作品文字优美，论理

透彻，引人入胜，堪称世界报告文学巨著。作为记者，他采访深入，作风严谨，高瞻远瞩，具有锐敏的洞察力。他在中国的采访活动，描摹出一幅幅时代的巨大画面，发出动人的异彩。他的著作不仅具有重要的文学价值，而且史料丰富，被誉为研究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典的百科全书”。因此，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斯诺不仅是一位优秀的记者，也是一位优秀的作家、史学家。

《斯诺文集》除了《红星照耀中国》曾以《西行漫记》的书名出版过外，均为首次在我国公开发行。出版这套文集不仅对新闻文化界是需要的，而且对全国人民来说，也是很有意义的。

对于斯诺在中国的老朋友，这些书是极好的纪念品。重温斯诺在中国的经历，使我们缅怀过去，展望未来，更加奋发前进。

对于中国的年轻一代来说，从斯诺身上可以学习那朴实无华，诚挚勤奋、信任人民、前进不息的品德。他笔下对旧中国和新中国的朴素而生动的描绘，很好地说明了中国人民几十年取得的进步以及社会主义事业伟大的光明前景，鼓舞我们为四个现代化的壮丽事业作出踏实的和坚韧的努力。

对于新闻文化界的同人来说，斯诺不仅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化财富，而且他的工作方法，实事求是地认真研究问题的态度，及其为了探索真理，勇于克服困难的精神，都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

为了更好地研究斯诺，我们在编辑过程中除删去了个别章节，和对某些明显的史实错误及人名、地名和书刊名称的拼写错误作了改正外，基本上保持了原作的风格和内容。我们相信，广

大读者是会用分析的态度和历史的目光来阅读这部文集的。

在出版本书过程中，得到有关部门的热情帮助和支持，对此我们谨致衷心的感谢。

新华出版社

一九八四年五月

目 录

第一篇 从北平到上海

亡命者·····	1
一个绅士和一个流氓·····	7
七·七·····	13
华北前线·····	19
中国的防御力·····	27
上海战事目睹记·····	32

第二篇 从上海到汉口

没有领袖的上海·····	43
战场凭吊·····	49
艾黎这个人·····	58
工业合作社的诞生·····	63

第三篇 南部前线

政治一瞥·····	70
蒋介石·····	81

争讼的遗产.....	86
“亡失”的红军.....	93
人民的军队.....	101
香港的插曲.....	113
第四篇 一条舐吮自己创伤的蛟龙	
月光和炸弹.....	119
自由中国的基础.....	128
生产的贫乏.....	134
中国的主力.....	141
第五篇 中国的“工合线”	
一个理想的史诗.....	151
国民党和官僚政治.....	159
成都和赴成都途中.....	169
中国艰苦的建设者.....	177
明日的希望.....	184
第六篇 回到西北	
中国的激流.....	195
边区政府.....	205
雨中之旅.....	213
延安的重聚.....	220
女英雄的大学.....	227
第七篇 红色的战略	
红色预言家.....	233
中国红军和苏维埃战略.....	242
一个县长的教训.....	249

民主政治的实验	254
第八篇 在敌后	
游击工业	261
八路军	269
游击队的作战效力	276
团结还是毁灭?	282
第九篇 帝国或民主	
自由中国的希望	290
日本的命运	299
上帝要毁灭谁?	311
可能发生的事情	322
第十篇 中国抗战的前景(附文)	
革命和反动	334
旧中国的上海和一二八抗战	347
一九三九年同毛泽东的谈话	384
一九四三年从重庆看中国之命运	392
(这四篇文章是从斯诺其他作品中选录的)	

第一篇 从北平到上海

亡 命 者

为要征服世界，我们应先征服中国。——田中奏摺

日军占领北平以后，离去太晚的人们遂有争先恐后之感了。过去误认为安全的这座古城，现在却成为一个笼子。劫数到了，人民仿佛是待决的囚犯。

日军交给改组了的伪警一张单子，上面列有国民党党员、过激分子和各色爱国者的名字，这都是他们所要逮捕的，于是警察暗中通知许多人逃走。但高重的城门为日军严密防守，并且已有两个多星期没有开往天津的火车。逃难者在白天改变住处，在夜间商议脱离这座“死城”的办法。报纸被禁，人民以谣言度日。

一位中国著名的大学教授，找到我的住处，问我可否请求英大使馆“保障反日知识分子的安全。”他觉

得这是可能的，因为听说英大使馆曾劝告宋哲元将军把北平城和平地交给日军。一个燕京大学的我旧日的学生跑来问我，是否美国水兵预备“按照九国公约”保卫北平。另一北大的学生慌张地跑来，因为他不能出城去参加游击队。他问我，英美当局能否用他们的军用汽车把反日的学生送去西山。许多大学教授抱有这样的乐观，美国和英国现在就要同日本绝交了，因为日本已经违反她应尽的国际条约义务。当我告诉他们，任何政府都不能给中国以有效的帮助，美国政府且将在战争中继续武装日本，他们都吃惊了。此后若干年将给无数万中国人以一种政治教育了。

我在北平已经安适地住过四个年头，在那里我一贯地受到和善的待遇，为要表示我对于那些朋友们的谢意，我总可以作一点事情。我与一个瑞典的经纪人同住在一个大院子里，院中有许多空地方，不久便为政治亡命者填满了。东北大学的校长住在靠大门一间房里，一个伪警每天来把日军最近活动的消息通知他。半打别的人散住院中各角落，一得到逃走的机会便离开了。我担心随时有被搜查的可能。

在日军到达以前，北平颇感住处缺乏，但现在各方面都愿把房子给我住，所要索取的租金少得可怜，有的完全不索租金。日本人正在占据最好的住宅，有外国人居住是唯一的保障。大家忽然都要舍弃他们的收音机了，因为日本人把收音机的主人当作共产党看待。而最可怜的是学生们，他们不忍毁掉他们的书籍，于是来要求我，把他们的书籍埋在我的院中，“以待北平的收复”。

一个星期后，有一些学生不来了。少数为日本人捉去，多

数由城墙上逃走。当他们爬城的时候，警察故意转过背来。照这样子，他们一小群一小群地经过颐和园到西山去了，他们开始在那里组织农民，从事游击战。在一九三七年八月，日军轰炸那些小山，想借此排除逐渐增加的危害。他们直到现在还在那里轰炸呢。

一天下午，在落着夏天的大雨的时候，一个姓吴的中国青年进了我的门，从他那剃光的头上滴着雨和汗。他拿有我的老朋友张玉声的名片。张玉声原是东北的官吏，现在城外率领一个游击队。他告诉我，几天以前，他们“占领”了西郊陆军监狱。他们缴了中国卫兵的械，取得所有的枪械和子弹，把几乎全体的犯人（大多数是政治犯）招入他们的新军队。这是一个计划周密的暴动。他们都逃脱了——连同那些卫兵！——在日本人到达当地之前。

但吴的心中有一个问题。他说，他的队伍——后来赵侗所指挥的军队的一部分——掘了妙峰山附近一个前清皇室的坟墓。他们预料，如果他们不掘，过不了几小时，日本人也要掘的。他们因此得到许多金珠宝石，假如他们能卖掉这些宝物，便可以用来武装和给养他们的队伍。吴想知道，美国政府肯否收买这些东西。当我郑重地表示困难时，他便十分失望了，于是问我有什么办法。

“护庇反日团体”（日本发言人惯用的一句话）是一件事，救济政治亡命者也是别国人所不能拒绝的一种工作。至于帮助卖出“抗日战利品”，即使把它看作合法的，也是完全另外一件事了。我很怕美国大使馆会不高兴这种事，至于我的报馆，虽然在这类事上是极端开通的，也会觉得照这样采取一件会由别人

写出来的新闻未免过当。

但我忽然想到一件事。几天以前，一个游击队的队伍从西山的修道院中捉去几个意大利的教士，并向北平的日军当局提出赎款的条件。他们的目的不仅使日本人在别国人眼中丢脸，他们也非常需要现金来为他们那挨饿的战士们购买食物。我疑心吴君知道这件事，我猜对了。他承认他的伙伴们把这几个意大利人拘留在妙峰山附近。

“这样作法是不能博得外国人对于中国的同情的，”我说。“假如你们不要被人看作土匪，你们最好即刻释放那些教士。”

“但教士们与日军勾结，”吴辩白道。“他们设宴款待日本军官。他们把我们的行动报告日军，后来日本人烧掉我们用作游击队根据地的村子。意大利人承认满洲国，又签订反共协约。他们不是日本的法西斯同盟者吗？”

我虽然是一个天主教徒，但因我在中国住得颇久，所以能了解中国人的这种见解，于是我用了一点钟的时间向吴解释，他们应当注意海外不利宣传的影响。最后他仿佛同意了。我告诉他，假如他们释放他们的俘虏，我可以为他们的宝物寻得一个市场。他带着这意见走了。

我很怀疑我的意见能否发生效果，但过了不久，这几个教士居然得到释放，并且安然地回来了。据我所知道的，此后游击队永不曾重犯这一类的错误。相反的，他们一旦得到政治领导权，他们便与全国各地的教士们建立友谊的关系。

几天以后，当我期待吴的回来时，一位教授夫人由电话中请我吃饭。我去了，在我们谈过半点钟以后，一个留有长剪发的中国妇人，带着一副深黑色的眼镜，走进房中来。她的神气

是稔熟的，但我一时认不出来。后来，她摘下眼镜，笑着向我招呼道：“斯诺同志，你不认识我！”这并不希奇，因为她是我要在北平会见的最后一个女人，也正是日本人所要捉拿的最先一个。她是邓颖超，前中国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周恩来的夫人，中国共产党妇女部的部长。颖超是我所遇见的中国妇女中具有最锐敏的政治头脑的一个。

“我以为你还在陕西呢！”

颖超对我说明，她于五个月前潜来西山疗养。她的样子比我一年前见她时好多了，她那时正患着长征时得的肺病，苍白、瘦削，躺在保安的阳光中。这一次住在一个荒远的庙中，得到好的饮食和休息，加以北方干爽春天，她显然痊愈了。直到日本人临近她所住的庙，她于发生的战事是一无所知的；她扮成一个农妇，穿过日本人的防线，逃来北平，几乎丧掉性命。^①

“你当然不要在这里长住下去了？”我问道。

“当然，我要尽快地去西北，”她说。“你能同我搭火车去天津吗？”

通海的火车道刚修复，每天通车一次，需时十二点钟，约当平时的两倍。日本人严密地搜查所有旅客，在天津的一端格外严厉，脸上稍带政治思想的意味的，便被扣留下来。有几十个学生已经被劫掠、逮捕、并且失去下落。所以这一旅程对于象邓颖超那样的人是有相当危险的。但日本人不曾扣留别国人（在天津脱衣戏弄还是后来的事），我告诉邓，我将同她一道走，

^① 参看《妇女知识丛书》第八辑“李知凡太太”一文。——译者。

她扮作我家中的女仆，或可安全地通过。

这对于我自己的计划也很适合；因为所有电信交通都操在日本人手中，不经过日本人的检查，便不能发出一个“当场”的新闻，作为一个新闻中心，北平是死的了。我已经接到《每日先驱报》一封迟到的电报，要我去已经开战的上海。我也要去寻觅在中国西北失踪的我的老婆。在四月间，尼姆^①亲去延安参观中国的“红党”，不肯从她的丈夫取得转手的新闻，几乎有三个月我不曾得到她的片纸只字。没有消息便是好消息这说法是不足恃的。我决定转道去陕西，要多走一千英里，去探问她是否永久抛弃她所忽视的饭票。

还有掘墓的吴的问题未解决。当他第二天来见我时，我告诉他，我就要走了，他应当加速行动。他同意在三天内把他的货物目录和若干“货样”带给我，我要把这些东西拿给一个可靠的美国商人，我知道这人是肯为这种罕见的东西冒生命的危险的。但因日军扫荡吴在妙峰山的朋友们，他的行程受了阻碍。过了五天以后，我不能再等下去了。我把这笔生意转托另一美国人，我相信他能使得各有关方面都满意的。

颖超来到前门车站，样子完全象女仆；她的剪发莫名其妙的不见了。我送她深入一辆车厢中，为后来的数不清的大腿、头颅、和臂肘遮蔽起来。我平凡地想道，一旦进入车中，在当夜达到天津以前，旅客们是不能够移动一下的。但他们仿佛并不在意。在北平的亡命者眼中，每天的火车乃是世间最后一列。在北平历史上，这是第一次，没有人肯拖延到明天了。

^① 斯诺夫人名——译者注。

我在最后一辆车的末一节上，找到一个立足点。我终于把制动机作了我的临时坐位，一整天，光头赤足，晒在冒火的太阳下，经过淹没的田地，向海口进行。我向北平的城墙告别，并不觉得难过；外国人所爱的北平已经不存在了。因为没有别的事可做，我利用这时间把过去有关的事件在心中草草地加以整理。

以下便是我认为重要的一些断片。

一个绅士和一个流氓

孺悲欲见孔子。孔子辞以疾。将命者出户，
取瑟而歌，使之闻之。——《论语》

北平必然要发生变故了。

北平是命运将尽的一种奇观，一种中世纪的残余，在这奇妙的城墙中，藏有若干世纪的宝物和掠夺品，在这中间住有一百多万人。（为要造成一件艺术品需要多少世代的盗窃呵！）在这城市中，有前朝的文武官吏，有学者和地主，有僧侣和匠商，有谈吐高雅的洋车夫；这城市的设计和建造都是高贵的，一个艺术的宝藏，这地方有良家子弟和堕落分子，有狂欢宴席上的外交阴谋，有失去品格的媚力，有过分横暴的恶行；这城市有活泼的温泉，有葱郁的秋景，有在霜雪的树和结冰的湖上闪耀的冬季阳光；这城市有永久的退让和轻易的欢笑，有闲暇和家庭爱，有贫乏和悲惨，有对于垢污的漠视；然而这地方也有出乎意外的壮举，革新的学生们为全民族制造斗争的标语，由戈壁沙漠吹来的大风，使得华美的庙宇和金黄的殿顶蒙有最古老

的生命的塵土。

在一九三四年，日本人占据热河以后，北平又已成为边疆了，我们长住在那里的人只奇怪这座没有防御的城市竟能维持这样久。经过连续的呐喊，我们醒来一看，北平的城楼依然由中国军队防守。也许连日本人对于北平也怀有多少爱惜，认识它的历史价值，在取得时不愿加以损坏。事实上，他们比所预期的遭遇到更多的抵抗，这城市最后的失陷不是没有多少光荣的。

北平最后的中国统治者宋哲元将军是具有这古老城市的恶德和善行的一个人。他是一个武士和爱国者，他的政治思想完全适合这封建城市的背景，他有他自己的策略，他以不变的客气和尊敬待遇日本人，但他的计谋总比日本人先一着。他不是进步的统治者(在那种状况下是不能存在的)，但他不是一个汉奸，也不是任何人的傀儡。虽然他只受过军事的训练，没有应付这最困难的外交地位的特殊才能，但在政治的折冲中，经过两年的时间，阴谋家虽然在事实上把他拥立，但竟不能如所预期地来操纵他，这不能不归功于他的善于应付了。

现在不妨略述往事。宋哲元的出名和得势始于一九三三年。当日本人占领热河(东部内蒙)向北平进展时，宋所统率的二十九军，在长城的喜峰口的遭遇战中，消灭了一个日本联队，遂由此驰名全国。宋的努力并没有结果。那时的南京政府不肯支持他的抵抗行动，不久便签订了《塘沽协定》，停止了华北的冲突。但这和平只是暂时的。日本不久便要求所有中央军从河北省撤退，废除当时名义上由北平统治华北的蒋系军分会。

作为一种让步，蒋介石同意成立冀察政委会，以宋哲元将

军为主席，宋的军队是冯玉祥的旧国民军的一部份，曾经参加若干次反蒋的战争，从不曾受中央军系统的同化。因为这缘故，因为土肥原将军(关东军特务机关的领袖，以“满洲的劳伦斯”著称)喜欢宋哲元，因为日本人知道宋哲元可以为他们统治这地域，相信他是于他们有利的野心政客，于是他们“认可”他作“半自治”的新冀察政委会的主席。

日本人把宋哲元估计低了。他并不愿作他们的傀儡。但他巧妙地使他们希望：他终于会脱离南京政府而独立，借了他们的支持，成为华北五省的统治者。假如他那样作时，日本便可以免除现在的战争而达到他们初步的目的了。

宋哲元就职后不久，土肥原便来施展他的手段了。他暗中向宋提议，由宋宣布华北为“自治国”。土肥原预备立即给宋一百万元，以维持他的政府，扩充他的军队。这对于宋显然是一种有力的诱惑。他不是个富人，在南京政府方面也是没有前途的。假如他拒绝了，便要受到日本的攻击，他不能断定他能得到支持，也许会借此把他的军队消灭，这是过去屡见不鲜的。

有许多天宋哲元犹疑不定。为要加强他的“条件”，土肥原在冀东发现了一些“土匪”(实际上，他们是由日本人雇用的)。介于平津和长城之间的这一地带，由《塘沽协定》规定，中日双方皆不得驻军。这时，土肥原竟不顾协定，派遣若干军队到冀东去“恢复秩序”。他向宋示意，他在山海关拥有几师人。如果他的提议被拒绝，便要出以行动。

南京的指示依然是含混的，并没有确定地担保：假如宋出以抵抗，可以得到如何的支持。但有两件事发生了。在一九三

五年十二月九日，土肥原的(后来发觉是他个人的)最后通牒满限的前一日，一种完全出乎意外的学生群众示威在北平街上出现了，坚决反对任何“华北自治运动”，日本的各通讯社到这时才知道有这一运动。虽然北平的警察，由那时还留平的宪兵第三团率领，镇压示威，并有若干示威者受伤和被捕，宋哲元却得到一个有利的借口。他请土肥原把他的计划延期，等待民气消沉时再实行。

另一件事是这位多谋的老宋突然“病”了。在这期间，宋的部下在天津听说，日本华北驻屯军不但不关心土肥原的计划，而且加以反对。一听到这，南京政府遂有勇气向东京质问。日政府虽然情愿接受由吓诈得来的任何利益，但还没有开战的准备。震惊于华北反日感情的高涨，又恐怕酿成全国的抵制，日政府罢免了土肥原。他的自治运动很快地垮台了。过了不久，土肥原亲自告诉我，这一切不过是一个报纸上的神话而已！

不过，为了保全面子，土肥原从满洲的关东军得到充分的支持，在“不驻军”的冀东建立了一个傀儡“政权”。这个机关定名为冀东反共自治政府，它的二十三县由一个名叫殷汝耕的半日本人统治。这地方对于日本除了军事上的价值，作为贩毒和走私的根据地，也是非常有用的。日本人在这里倾销了上千万元的免税货和上千万元的鸦片和海洛因。在日本军特务部的指导和保护下，这种私货由日本和高丽的运私者运向南方去。

由于日本人类似的行为，北平的军事地位减缩至可笑的程度，在军事上和政治上，它的窘态倘非目见是令人无法相信的。在冀东之外，日本人几乎控制了由山海关通旧皇城的北宁铁路。他们在全线各军事要点驻有七千军队，在华北最大城市的天津

和北平的使馆区，筑有永久的炮垒一般的营房。在名义上，这些驻屯军是由一九〇一年的《辛丑条约》规定的，依据这个条约，列强有权从北平到海口驻少数军队。但日本的军队比其他列强合计起来的驻军还多出好几倍，并且用来求达极端非法的目的。他们自由地在乡间移动。从事不断的“演习”，恫吓和攻打拦阻中国税务视察员和铁路查票员。

宋哲元将军无力防止这些非法行为，连他自己的军队也不断地忍受这一类的侮辱。他只有一个二十九军由他指挥，总数有六万人，只有一万多人可以留在冀北。他不能期待南京方面的任何帮助，从蒋介石以下，没有人信任他。无论如何，可以断言，在西安事变以前，南京政府断不会为了河北一省开战的。不论那里发生了什么事，宋必然成为替罪的羔羊。他知道他不过是一个临时的缓冲，他显然要保守秘密。正因为这一点，监视他的每一行动的日本人，继续相信他们能把握他，直到宋知道全国能作他的后盾的时候。

这一切都象非常奇怪的政治的踏索戏。宋哲元藉了一连串的平衡动作存在下去，时而讨好于南京，时而讨好于日本人。当日本人要求调走蒋的特务宪兵和解散蓝衣社的时候，宋同意了，人们疑心他是暗中喜欢的。当他们要求他的委员会任用日本顾问时，他照办了，郑重地接受他们的建议，而永不加以实行。当南京方面指责他缺乏社会改革时，他在几个星期内枪决了一百多个毒犯，表示比蒋还积极。他赞助新生活运动；那一运动所采用的孔教格言适合他那封建的灵魂。

在表面上，宋严厉地压制一切过激派。但我在北平认识十多个过激分子，这些人若在南京，早被投入监狱了。宋自己的

部下暗中鼓励某一些反日的团体和出版物。我发现他的兵士在北平城墙上诵读反日的文字。由宋津贴的《北平新闻》实际上对西安事变分子表示同情，它的主笔暗中赞成与共产党的联合战线。更希奇的是，北平拥有全国最有力量的反日学生组织，到后来他们完全支持宋哲元。实际上，当地反日情绪巧妙地由批评宋哲元转向批评南京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日本人对于这种现象摇摆于以下两种解释之间：可欢迎的分裂表现和对于他们的一种真正的威胁。在短短的几个月内，这种奇特的情形，对于国内政治的言论，造成比南京政府直接统治下的任何地方更自由的空气。

宋哲元长于赌扑克牌，善舞剑，有时请我们去作弹子戏。他是一个大个子，生有山东农民的身材，佛陀一般无表情的脸，时时不相称地衔着一支大雪茄。他满嘴孔子的话，一半用来掩饰腐败和虚伪，一半是出于习惯。他在身边也有一些爱国的积极的青年，在他的智囊团的指导下，市政时时显出改革的迹象。但当他的青年部下对于他的敷衍外交和“组织民众”的说词感到不耐烦时，他便用关于孝的经典来训诫他们，或要他们去加入军队，或教他们去同妓女组织起来。他有一种理论：守独身是政治的过激主义的原因，把青年人的激动状况归因于晚婚。

一到为难的时候，宋总要推病，当压力太大时，他便要去“扫祖墓”了。这是一个非常的长时间的扫墓旅行，事实上，终于使日本人明瞭，要想在华北得到他们所要求的東西，必须采取象芦沟桥事变那样的动作了。

当时的国民党英雄汪精卫称他为“反动分子”，但他竟使得日本人用一百万人和二十万万元来取得一片土地；倘若汪先生

自己在北平代替宋哲元执政，由后来事实证明，他们大概用不了两毛钱便可以得到这一片土地了。

七·七

宁为玉碎，勿为瓦全。——中国格言

宋哲元在华北的扫墓，相当于张伯伦在英国的钓鱼，这是与当地危机的高峰相应的。在一九三七年五月，宋逃去山东的故乡，避免日本人在经济、军事、政治方面命令式的要求。其中有一点是日本人特别坚持的。既经在北平和芦沟桥的铁路交点之间，作过一番精密的测量，当地日军当局要求圈地一千多英亩，供他们建筑一个飞机场和永久的营房。这要求实在无法应允，宋哲元的突发的孝思是可想而知的了。

芦沟桥是永定河东岸的一个火车站，在北平西南十五英里。这是平汉铁路与平津铁路的支路西端相交的一个重要地点。一年前（一九三六年五月）日本人曾经非法占据这条支路的东端丰台。占据芦沟桥，等于占据所有南方通北平的铁路入口。在控制永定河铁桥的芦沟桥车站东几百码，是宛平的古城。我曾同朋友们时时去那里，欣赏那因马可·波罗著名的具有三十座秀美的拱门的古石桥。

关于芦沟桥和宛平附近的土地，日本特务部曾同当地中国当局举行了无数次的会议。宋哲元一面虚与委蛇，一面设法保持这最后一道防线。但他不能阻止日本人在附近举行连续的军事演习。在这里，正如后来在上海，日本所分享的外国特权，使他有“权”在中国内部的根据地行动，利用她将要毁掉的全部

不平等条约来达她的征服目的。“演习”愈来愈频繁，终于在七月七日深夜，藉口他们的兵士失踪，日本人突然要求进宛平城搜查——美其名曰“确保和平”！

但那县长却不肯照办；他十分正当地拒绝了。午夜以后，北平被枪炮声震醒了。日本人已经用坦克车攻城，少数中国卫队加以抵抗。在早晨，我驾车到河上，我发现日本人占领芦沟桥车站，与据守宛平和芦沟桥的华军散乱地交换枪火。两方军队隔着几码的距离相持了若干日，我在这战线中间来回穿行，一点没有困难。假如日本人肯撤入他们的营房，这一场纠纷随时可以很容易地解决。

日本人对于是否真有兵士失踪，不论在当时或后来都不会提供任何证据。在招待新闻记者时，我们问他们这事的详情，他们连说都不愿说起这一个兵士。当他们追求更大的目的物时，他们把这一个人完全抛开不提了。这事件是否由特务部计划而东京不知，或不过执行上级的命令，我无从知道，但由后来的发展证明，东京准备尽可能地加以利用。在国际联盟的报告及其后来斥责日本的决议案中，你可以见到日本进攻前的诸多事件的详细记载，浏览一过，便可以为下面的叙述得到充分的证据。

关东军立即开始向冀东和天津输入军队，在七月中旬已经超过两万人。同时，华北、南京、东京以及全世界各首都的中国人，都在努力觅取和平途径。有半打不同的一组一组的条件提出，即刻为新的日本要求打消了。日本并不要使华北独立的任何协定，她干脆要华北。这在当时当地的我们，以及现在回想起来，都是很显然的，日本人所作的调停谈判只是用来掩护那

破坏一切调停的军事准备，日本人所要的解决只是由武力取得的。

但和战问题，屈服与奋斗问题，只能由南京政府当时的政策来决定。中国政府在夏季的首都牯岭开特别会议，蒋介石从各方面感到应作一种决定的迫切需要。连他自己最优秀最亲信的将领也表示，进一步的退让会使国内的局面恶化，同时他那最有力的反对派也来电声明，全力拥护他所采取的任何抵抗计划——进一步的屈服则非全国所能容许。在七月十七日，蒋介石再也不能缄默下去了。他那一天所作斩钉截铁的历史性的演说，表明立即作战是必然的了。

蒋定下四个要点，作为议和的最低限度的基本条件。这必须承认的四点是：一、所作解决不应侵犯土地和主权的完整；二、中央政府所规定的冀察政务委员会的现状不能作非法的变更；三、华北官吏，自宋哲元以下，不能随日本人之意罢免；四、二十九军不能再以阵地让给日本。

“现在我们同胞应当明了”，蒋介石说，“所谓‘最后关头’的含义和此后应有的牺牲，一旦达到那个阶段，我们必须作战到底。假如我们踌躇不决，徒希望暂时的苟安，那末我们就要永远灭亡了。……到那时，我们只有用尽全国的物力来从事争取最后胜利的战斗。”

但，即使在这以后，只要有一线和平希望时，中国方面继续表示希有的忍耐。在廊坊，便有这样一个例，那是平津中途的一个小市镇，二十九军在那里有一个小营房。有一夜，几个日本军官和兵士在那里下了火车，走向中国的兵营，他们要求使用其中的军用电话，中国人请他们把武器留在外边，但日本人不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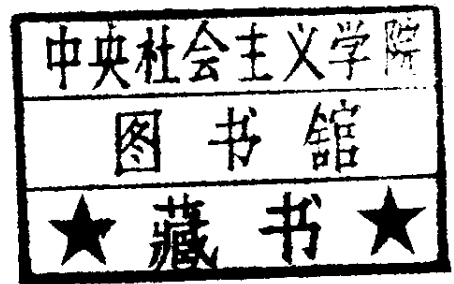
这合理的请求，一直冲入营中，占据了电话交通。

因有非实际被攻不得用武力的严令，当地军官只好听凭这几个日本人为所欲为。于是这几个日本人无缘无故地用电话向天津司令部请求一个装甲车团和若干轰炸机。他们所要的东西不久便到了，向火车站开火，加以占领，驻军在未受直接攻击以前未还一枪。结果华军死伤甚重地撤退了。但谈判依然在北平继续呢。

几天以后，日本陆相杉山元在东京宣布，日本已经派了八个师团(约十六万人)去华北，并集中有二百架飞机。在七月二十五日，华北日军送交扫墓归来的宋哲元一个久在预期中的最后通牒。他们要求宋和他的军队在四十八小时内无条件地从北平附近撤退。这便是终局。宋电告南京，他预备拒绝最后通牒，请加以批准。第二天，在接到回电以前，宋发表了一个简短的声明，略叙他避免战争的努力，结语是：“日本军队不断地派遣和连续的挑衅，使得中国军队除了竭尽物力保护国家之外，别无他途。”

话是勇敢的。但宋哲元的地位到现在已经成为完全不足恃的了。他在北平的一万军队是装备很坏的，既没有坦克，也没有飞机，只有少数轻炮。他们过去不得建造任何永久的防御工事。他的军队，大部分用来执行警察的职务，一小组一小组地分散在各乡村和北平城外的南北营房。日本人已经完成他们对于平津铁路的控制，华军只能由迂曲的乡村道路集中。日本曾禁止南京增援北平——以“谈判”破裂相威胁——因此南方的援助从来不曾兑现。

宋哲元虽然一面遭无可奈何的围困，一面继续希望最后一



分钟的奇迹，但他已经决心一战，使北平的丧失不至毫无意义。他不愿人说，二十九军放弃了它的信誉。戒严令在城内施行。外国人连同未逃的日本平民都避入使馆区(东交民巷)。城门关闭并加以防守，宋命令南苑(北平仅余的防地)的驻军，“遭遇攻击时，应即抵抗”。

日本的攻势开始于二十七日。三队飞机连续轰炸南苑，更有重炮日夜伴同轰击。中国军队约有三千之众，英勇作战，但于实际无补，三分之二被消灭了。他们唯一的防御工事是新掘的沟堑和沙袋筑成的堡垒，日本的炮弹和炸弹象落雨一般地投在上面。在二十四小时的不断轰炸之后，日本步兵跟随一列一列的坦克前进，把中国残军向北平的退路切断。这在中国的抗战史上是一种可怕的溃败，也是一种最苦闷的开始。

第二天，我同路透社的艾米森通过了永定门，沿着初染战血的城南道路爬行。这里还是无人之境，还未被日本人占领，路上有南苑的伤兵残余颠簸和爬行。我们同一个在膝盖和大腿上中了枪弹的少年谈话。他说，他是一个大学的学生，在不过几个星期前，他同其他东北大学和东北中学的一百学生投入军队。因为不断的请求，宋哲元为反日的青年成立了一个特别训练团。合计有三百个学生，中间杂有一些共产党员，这时有二百多个阵亡了。那些人的死亡庄严地表明了北平爱国学生的热诚，他们两年来的活动在唤醒全国抗战精神上尽了非常的功用。这里也有三个中国青年将官丧命，“马革裹尸”原是这一国家的武将的传统呵。

南苑已被毁成平地，到处是在死神前逃亡的遗迹。日本飞机在路上低飞，扫射着兵士和牲畜。在一个地点，一个日本伏

兵用纵射机关枪屠杀了整整一纵队人。马、驴、人的死尸杂乱地堆在一起，田野中有一些农夫的尸身，是在从事耕种时被杀戮的。有六辆新坦克被遗弃在那里；路上散布的手榴弹和弹药筒可以装满一货车。

没有人看护受伤者，仿佛是与任何人无关的。只能怪命运不好，一个兵士随时可有的命运哪。在这里你可以看出，一个军队作战时没有民众支持的弱点。北平有很充分的医药设备，但没有受过训练的组织把那些设备与作战的兵士联系起来。这种情形，几个月来，在每次战后，到处可见。在那一天，我所见到的唯一想为受伤者作一点事的人，是一个身穿灰色长袍，头戴破洋帽的干瘦的老人，他在南门附近惶惑不安地走向我来，问我去南苑的方向。他说他方从保定来，带来由安息日复临会的会友组成的一个救护队。也许他能为保守教派拯救一些灵魂：他象一只鸟一般向南苑飞去了，我再没有见过他。

平津一带暂时处于平静，因为日本人更向南方和西方推进了。但华方的牺牲并非完全无益。这里的抵抗使全国的意志加强，使南京政府的妥协政策更不可能。南京官吏曾对我说，华北的军队永不会作战，这一次的战斗表明日本人必须向其他方面寻找傀儡了。在此后几个月中，二十九军几乎完全在可怕的劣势战斗中消灭了。宋哲元将军，正如他大多数的军官，现在也死了。

过不多久，有一些中央军开始在华北出现，以实践蒋介石的诺言。在八月十三日，战争在上海发动了，一个新的战线展开了，这将是决定二十世纪太平洋的命运的一场战争。

华北前线

日本唯一的目的是把中国击至屈膝。——近卫公爵。

临近天津时，我藉故同拥挤的火车中一些日本兵士谈起来。我用中英混杂的话问他们，为什么与中国作战。在我用一包骆驼牌的香烟款待他们以后，我们便相处得很好了。没有比日本人更痛恨日本对于菸草的统制的了；爱国主义到这地步便不中用了。假如中国有大量的美国香烟，它真可以把全部日本军队收买过来呢。

“我们日本人是和平的，但中国人不断地向我们捣乱”，一个生有突出的牙齿的红颊的少年说。

“下流的中国人在通州杀害我们的同胞”，另一个说。

“我们要从共产党的手中把中国救出来”，第三个解释道。“意大利和德国了解日本，但美国和英国不了解。”

一个聪明的农家少年说，他被召来为天皇服务。“我并不明白战争的原因”，他承认道，“但蒋介石总要伤害我们的同胞，我们要打的是他，并非善良的中国人。”

一个由满洲来的老兵，一个中士，说得一口流利的中国话，为别的一些人当翻译。“我们要教训中国人一番”，他自言自语地道。“他们变得太胆大了”。

诸如此类。他们的回答，与我过去从日本官方发言人听来的话，同样地合逻辑，他们说得很诚恳。那个中士说，别国人不知道中国人是何等的顽强；你永不能信任他们。他用自己在满洲与游击队作战的经验来说明，别的人们都张大了嘴来听。

“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一个和平的中国人会突然打中你的头！”他警告道。

当火车进天津时，天已经黑了。我等待邓颖超，我们经过车站上的日本守兵时不免提心吊胆。也许只是我一个人提心吊胆。至少，在表面上，颖超一点也不惊惶。日本兵草草地检查了她一下，并把地上的蒲包颠动了一番，他们从喉中哼了一声，表示她可以走了。

当我们走下站台时，我们看见有一打中国青年男女被从行列中曳出，驱上候在那里的军用汽车。他们穿的是农民的衣服，但生有知识分子的白手，于是引起日本人的疑心。直到我们走进英租界的铁丝网，我才放了心，在那时的租界内还是安全的。英国当局还不会开始用人命来换取他们自己的便利。到后来日本人要求引渡中国人的权利，他们便照办了。

英法租界的街道为五十万难民塞满，仿佛他们都要搭乘那几条去“自由”南方的船。舱面上的票早已被掮客收买，到可以用时便以可怕的高价卖出了。但外国人可以在统舱带一两个仆人，作为头等乘客的特权。藉助于一个朋友，我为颖超安排好，她又为一个她从未见过的男士充当女仆了。她得到一个去青岛的舱位，到那里，她便可以由那时还在中国人手中的铁路旅行了。

“假如外国人出门不带用人，我们中国人怎能去任何地方呢？”当我送行时她大笑道。

“不要紧”，我告诉她道，“溥仪是在一只洗衣筐中离开北平的”。

当我第二次看见邓颖超时，她在汉口与周恩来在一起，她

依然是一个仆人，但她是她自己人民的仆人了，她作了西北联合妇女团体的首席代表。

十天以后，我自己也要动身了。在最后的时问，我的朋友贝特兰决定与我同行。他刚写完《中国的第一幕》，现在决定去参观红军了。正如我的老婆，他要亲自去查考红军的声望是否与事实相符。在天津，我们与理查兹夫妇和英国诗人威廉·恩普森饮上好的德国啤酒消遣，并为在华的日本人起了一个现在颇为流行的绰号：“小日本”。

我们搭一条英国船，“海口”号，到山东，船上挤得有人睡在船桥上。黑头发的人们象鱼子酱一般散布在舱面上，水手们必得挤路去绞盘。我们登陆的青岛还未被日本海军封锁，但三分之二的居民已经逃走，仿佛是一个放弃了的城市。主持这里的特别市政府的是海军司令沈鸿烈，他因在内战时倒戈得到现在的位置。青岛是日本人想以银弹和阴谋取得的对象。他们终于失望了。

一般地说来，山东的地位是有一点混乱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日本已经占领青岛（那时是德国设防的殖民地），后来又占据了德国建筑的胶济铁路。由于华盛顿会议的结果，也作为在《九国公约》中所得权利的代价，日本必须把这地方交还中国。但因日本人在铁路上拥有重大的财政利益，在青岛投资三万万日元，在全省住有一万六千侨民，所以日本依然把山东看作她的势力圈。为要加强她的势力，日本付给山东的官吏几百万元，但当日军想要攫取华北时，并没有顺利地达到目的。

青岛市政府是由南京政府管辖的，市长沈鸿烈是蒋介石所

委任，但山东其他部分却是半独立的，由军人主席韩复矩统治。当贝特兰和我到达省会济南时，施泰因旅馆(德国人开设)的外人大半相信，韩复矩将作日本的傀儡。山东在当时丝毫未受攻击；日本财产由韩复矩的特别卫队保护；日本飞机，除了例外的一架，从未来过济南。这个例外使得许多人的猜疑得到证实。这一架日本飞机并未投炸弹，只投给韩复矩一封信，庆贺他的“中立”。韩把这封信悬在布告板上，附加了一通他自己的效忠中央政府的声明。但这声明并不能说服怀疑的人。

就我个人看来，韩并没有叛变的可能。中央军正在大批地输入山东；连他自己的五万多军队，也大半由南京任命的军官率领。这个老军阀当然希望这次的冲突在达到山东以前便停止。他不要惹起敌方的攻击，因为他知道，抗战时最先被牺牲的是他的军队和他的权力。正如别的军阀和政客，他与日本人直接勾结；也正如南京政府的官吏，他随时可以同日本人讲交易。这在别国是要被当作卖国贼的，在中国就不必如此了。他所关心的只是提防别人会袭取他的政治地位。结局，他虽未公然降敌，但因他要保全他的军队，不肯作损失过大的抗日阵地战，遂被蒋介石加以军事审问然后枪毙了。

这是一种令人诧异的事实，直到九月中旬，日本人在华北前线所遭遇的只是那些被认为最不可靠的装备最劣的中国军队——“有问题的”河北、山西、山东的省军。然而他们的高级将领竟没有一个降敌的。实际上，华北军队在战争初期遭受了可怕的伤亡。蒋介石显然有意用那些地方军队来作缓冲，以便在他们的后方保全和扩充一个由他居中统率的清一色的新军队。结果，卖国的并不是那些被人造谣中伤的“军阀”，却是自命

“学者”和“革命者”的那些上流人，这已成为中国历史上不变的惯例了。

以平津两地为根据地，日军向华北和内蒙的内部作扇形展开，用中国北方的三条铁路干线作进展的总路线。一路沿平绥铁路，穿过历史性的南口，西趋内蒙的察哈尔和绥远，以铁路终点的包头(戈壁沙漠的门户)为目的。另一路循稍偏向西南的平汉铁路趋汉口。第三路沿平浦铁路南趋山东、徐州，与由上海内移的南线日军会师徐州。

面对着没有飞机、坦克、大炮，也没有任何机械化战事的训练和经验的中國步兵，日本部队以无比的速率注入河北和山西。有几天每日行进三十公里；在一九三七年，有五个月的期间，平均速度是每天十二公里。日本在攻击武器上的优势，使得华军在华北平原上任何长期阵地战的尝试归于惨败。但华军在那时并无其他的战术。许多华军在不曾看见一个敌兵时便死掉了。日军的攻击完全在飞机、大炮、坦克的掩护下前进。这是一种摩托化的机械化的冲锋陷阵。先由飞机勘定中国第一道防线，加以轰炸，然后移向第二道防线，这时大炮紧接着扫荡残余的阵地，为坦克队开路。实际上，坦克队已经“如入无人之境了”。到这时，日本步军才出现，从容进入破碎的中国战壕，时常连一枪也不用放。而飞机和大炮又在攻击第二道和第三道防线了。

当我们迟缓地沿陇海铁路向西安前进时，我们经过尚未被黄河决口淹没的河南北部焦旱的平原，我们看见许多开赴前线的军用列车。这与我在更北方的日本后方所见的军事力量的夸示对照起来，实在是可悲的。在那边，日本人堆积有成千的美

国制的汽车、载重车、坦克，又有成千加仑的美国产的强力汽油。在天津，我见过由满洲开来的长列的日本新火车，成百辆地载有煤油、重炮、子弹、精制军粮，闪光的军官用的新汽车。在这里呢，敞车上载的是营养不足的青年人，用来掩避日本正在轰炸该路的飞机的只是有限的几条树枝。他们携有来复枪、机关枪，除了在末一辆车上偶然有一辆福特汽车或雪佛莱汽车外，再没有别的了。中国在能有摩托机械化之前，必须先有大炮。

贝特兰与我同意，这些灰色军队是不会知道日本后方用来对抗他们的优势准备的。

日军在尚未深入山西时，便遭遇到困难了。山西的山地成为防守军队的良好掩护，摩托机械化的装备在这里不是一种便利，而是一种负担了。装备优良的中央军开始参加，一些中国大炮以至少数飞机也出现了。在这里，第一次，日军必须应付中国红军的游击战术了。现在，中国红军，在与南京政府成立联合战线以后，改组为八路军了。在这里，在共产党的影响下，协助军队的民众动员终于开始实行了。这种作为“民众抗战”的原型的方法现在不仅是一种到处散布的口号了。但关于这一点，留待后来再说吧。

当我到达古西安市的时候，我对于我的老婆在红星下的冒险，怀着非常的疑虑。也许她已经走上游击战线？也许她已经被土匪绑架？也许她已经死于空袭？一切可能性都有的。一到西安招待所，我立即想去当地的八路军办事处，追问事实的究竟。当我看见招待所的周经理时，他那和气的脸上显出一种疑问的神色。“你看见你的夫人吗？”他问道。“她在一点多钟

前由这里去搭往青岛的火车”。

我来得刚好迟一点钟。但警察知道，为要使我离开西安，必须寻见这个善于逃避的尼姆·韦尔斯，于是他们开始从事有效的工作。尼姆当夜在潼关为军警捉住，并被拉下火车。她在《续西行漫记》中说，她只希望从速就死了。但并没有杀她，只把她带到一个电话棚里，在那里我终于又听见她的声音了。她当夜回到西安，在与中国红军团聚了一天以后，我把贝特兰托付给他们，便同我的病人搭车去青岛了。她不曾被土匪绑架，但为更可怕的一种东西所害——延安的饮食。她已经害了两个月的痢疾，变得奄奄一息了。她十分需要住院、休息、好的饮食，以及一个领她前往的护卫，于是我自动地来担任这一项职务了。

第二天，我觉得我到西安来仿佛是算定时间的。在徐州，我们下来换车，在车站上与难民和无家的游民拥挤在一起，这种人是此后两年在战区中到处可见的。我遇见两个从北方来的朋友。他们告诉我，徐州被炸得很重；有八十五架飞机在陇海铁路上的各城市轰炸。我探听关于我在离城不远所见的破火车的事。那便是绿色快车，在前一天被炸毁；死了许多旅客。假如我不把尼姆从潼关唤回，她刚好坐在那一次车上。

在这里，我也同一个从德州前线下来的军官交谈。他述说了—一个希奇的故事，这是一些愤怒的中国农民在经过他的军营时告诉他的。日本人无论走到什么地方，都发狂一般地找肉吃：乡村中所有的猪和鸡都给他们抢光了。关于这，农民们也只好认命了。但后来的一些人，再也找不到鸡和猪肉了，于是把田里的水牛赶回来，活生生地吃掉。他们不耐烦先把这些牲畜杀

死，竟把它们悬在一堆火上，然后用刺刀和指挥刀从那可怜的牲畜身上随意割肉吃。这些牲畜乃是中国农民最好的朋友呀。痛苦的牲畜的鸣声在几英里外都可以听见，但日本人的食欲仿佛并不因此减低。

在那时以前，农民们不曾离开他们的田地。直到看见这样的行为，他们才相信，他们遇见了妖怪，于是逃往山后的中国防线了。他们翻来覆去地说，“他们一定不是人”。

两天以后，我们又来海边。青岛依然是含有凶兆的平静。我发出几封在旅行中收集的快讯，但每隔十天还不能有一条船去上海。幸而有J·B·鲍威尔代我应付《先驱报》的工作，所以我不用发愁。这在战争中是一个难得的时间呢。青岛这时是十分可爱的，晴朗的白昼，微风披拂的夜，这风或从海上吹来，或含有山上的松香。几英里长的著名的白沙滩，在过去这季节总聚有成千歇假的人，但现在却成为我们专有的海岸了；一连三天我们不曾看见一个别的浴人。所有浴棚都关闭了，在弥漫于这半空的城市的静寂中，有一种奇特的预期。我们每天准备看见在每一浪花后面有一队日军登陆。

我注意到中国人并不乘时把贵重的日本工业机器移出市外，当我问起的时候，市长沈鸿烈司令避不作答。有一天，市长的秘书告诉我，环绕本市的一团东北军，正在计划，一见日军临近，便把日本工厂炸毁。我还有一点不相信，但他的话终于得到证实。在我到达上海以后，华军在退出该市之前，把日本工厂轰炸和纵火。损失约值两万万日元，日本在中国各地所受最大的损失。当初不设法把一些机器移入内地供中国人使用，

究竟是一种失算，不过这依然是一种进步的象征，至少中国高级当局下令破坏了一个敌人的根据地。关于“焦土政策”，说得很多，做得并不多，这一次算第一遭有效地实行了。

我终于得到一个船位，船长桥上的一个吊床。我的老婆决定不再去漂荡，要在上海留到战事他移的时候，得到她的许可之后，我又走下去了——去“东方史上最大的战场”。

中国的防御力

看一下地图，与中国比起来，日本是多么小。谁能怀疑我们将来的胜利呢？——蒋介石

在开战后不久，蒋介石对我说过上面一段话，表明了形成他的抗战行为的基础的一个信仰原则。陈诚将军后来把这意思对我解释作“用空间换取时间的战略”。中国文字总是含混不清的，他这说法似乎应当叫作一种理论，并非一种战略；一种无限后方的理论。

在一九三七年，日本的军事力量虽然远胜中国，但中国的陆军却是该国有史以来最大最强的。日本在一八九五年的陆军恐怕还不是中国的敌手呢？中国这时的陆军大概能打败日本用来战胜俄国的军队。考虑到它那短短的历史，不能不说是一种非常的成就。

中国开始成为一个现代国家，比日本晚了四十年。极端保守的退化的满清政府直到一九一一年才被推翻，共和国不曾承袭到前代多少军事价值。但在满清末年，确曾开办过一些军事学校，其中的教员是以日本军官为主的，资格比较老的中国军

事领袖都是从这里边训练出来的。在那些时，日本的政策是训练中国青年，协力建造大亚细亚帝国。在今天，几乎所有他们的学生都在与日本皇军作战了。其中之一便是蒋介石。他所受的正式军事训练，都是从清代的陆军中学和日本东京的士官学校的日本人得来的。

在推翻帝制后十年之间，中国的武力分属在一些半封建的军阀手中，他们养兵并非效忠于国家，只效忠于他们个人。直到一九二四年，孙中山在广州创立黄埔军官学校，才立下一个真正国军的基础。在黄埔，国民党和共产党的青年同被训练作国民革命军的军官，这军队后来推翻了大多数旧军阀。蒋介石是该校第一任校长。他聘用由加伦将军为首的苏联顾问。这些顾问，作为孙中山联俄的报酬，为中国创造了一个以国民革命为政治信仰的军队。在一九二七年国共分裂以后，反共政府建立了，蒋介石建立了南京军事政治学校，以继承黄埔的传统。共产党也在他们的苏区开办了他们自己的红军大学，与蒋的军校对抗。目前的战争开始时，领导中国军队的军官，都是从这两个组织和散在各地的省立军校造就出来的。

德国军事人才在中国和日本两方面各有其影响。蒋介石最初聘用了一个德国军事顾问，包尔上校，随后来了一些别的人。在一九三七年，由法根豪森将军为首的德国军事顾问团共有一百多个军官。蒋氏最现代部分的军队的青年军官，大多数是在他们的指导下训练出来的。在南京军校之外，政府还建有训练大炮、坦克、化学战术的专家的学校。从技术的观点上看，这些学校所立下的训练基础是十分好的。到战争开始时，这类东西的应用还不满十年呢。

中国有一百八十万常备军与日本作战，但这军队的训练和装备是很庞杂的。蒋氏“自己的”，由黄埔或南京军校生率领的，受过德国训练的军队，只有三十万人。蒋氏在这核心之外，团结了八十个师，具有不同的训练和装备，统名为中央军。此外有广西军，由白崇禧和李宗仁两将军统率，从一九二七年以来，他们曾在中国西南作他们那局部的政治和军事活动。他们大致有三十万人，被认作与蒋氏的模范师同样优良的。最后是西北的共产党军，具有非常好的战斗士气和娴熟的战略的领导，但他们的装备连许多省军还不如。余下的是从未完全同化于中央统率下的地方军队，具有平凡的以至极端恶劣的训练和装备。虽然国内各军队现在一致承认蒋氏为总司令，但地方性质依然存在，许多时并没有从事合作的军事连络。

中国军队配有轻重机关枪、自动来复枪，和战壕臼炮。蒋氏的受过德国训练的几师，有轻重大炮和山炮，与日本师团成一与四之比，有机枪，与日本师团成一与三之比。一般地说来，中央军的大炮是很少的，大多数省军只有轻山炮和战壕臼炮。大致中国一师所有的机关枪平均不能超过一百架。在装备优良的第一军中，只有少许抵御坦克的炮。至于坦克自身，为数少于五辆，这种人员的训练也是很充分的。

中国补充战争材料的设备是很有限的。例如，所有兵工厂合计起来，每月只能制造二百架机关枪和三千来复枪，所以连最小件的军器也是舶来的。中国不能制造满意的炮弹或空袭炸弹。战壕臼炮产量很大，这是大多数中国军队最得手的一种现代武器。至于来复枪弹和战壕臼炮的炮弹，中国的产量，差不多可以适应它的常备军的需要。

在其他方面，因采办时没有一定的标准，使得军械的供应成为非常复杂的难题。自动来复枪、机关枪、大炮的种类是无所不有的。自制的或舶来的子弹，适用于一种武器的，不适用于另外一种。一旦子弹的来源断绝，一种新式的枪械时常变成废物。飞机的情形也是这样的。驾驶的学生时常变换飞机和教师，既浪费，又无系统。高级政府官吏每出洋一次，便带回一批新的飞机。象买零星用品一般，随地购买，没有一定的地方。于是收集了许多劣等的货色，伤损中国最厉害的是意大利人。结果，当战事到来时，蒋介石才发现他那夸称将近千架的战斗机，实际上只有不到一百五十架可用。这种国际飞行戏班的最大缺点是，中国没有维持它的辅助工业。许多飞机只要有一点点小毛病，就变成了废物，因为修理的设备太缺乏了。

因为没有集中的组织，没有充分的设备，没有适宜的战事根据地，没有优良的技术，所以军用品的使用必须讲求极端的经济。因此中国在可能时必须避免消耗太大的对垒战和阵地战。中国军事当局显然不能期望在以优势武器从事重要点与线的斗争中战胜日本。中国必须在什么地方寻到一种资本，以加强正式军队的主要活动。先前已经说过，这资本便存在于成百万的人民和他们所居住的土地面积上。单是数量和面积不能制胜；但假如在全国动员中统一起来，它们便可以使敌人不能有效地控制这个国家。

所以中国最现实的战斗目的并非取得形式的军事胜利，乃要使敌人在取得胜利时的牺牲失去效用。这样作战需要一种战术，须包含以下几点：（一）藉了主力和装备的保持，藉了诱敌深入，把战事极端延长；（二）一面在主要前线上从事延宕的活

动，一面在敌人的后方和侧方从速发展游击战；（三）在沦陷区中，藉了抗敌民众革命的政治和军事的组织，使敌人不能获得经济自给的根据地。

“民众动员”，这一名词一定要时常出现于讨论中国的战事的一切书中，乃是达到上述目的基本的迫切的需要。中国有四万万人，但在战争开始时，可以动员的不及百分之一，因为，在过去十年间，中国政府不曾组织和训练和领导农民大众。日本的人数虽然少于中国，但在战争活动上动员的比率却比中国大得多。所以，与普通见解相反，数量的利益在战争开始时是在日本方面的。假如日本能绥靖广大的沦陷区，她不久也可以取得作为中国的资本的面积了。

在华北数省，日本军队只集中在重要据点，城市、铁路和公路，只能很缓慢地向内地展开他们的防区，这本是事先可以料得到的。在他们的刺刀以外，是大量人口所在的成千的乡村，不到大的攻势结束之后，日本是不想加以征服的。这些“孤岛”或“空隙”中的农民大众是可以组织的、训练的、武装的，可以成为中国主力军的有力的同盟。这乃是游击战的老家，日本的胜败最后在这里决定。

纳撒尼尔·佩弗锐利地指出道，“中国方面的问题大致可以归纳成以下的说法：所有中国军队能否把一九三〇和一九三六年中国共产党所用的战斗方法加以有效的采用？”

一切都足以表明这种战略的需要：从速把雇佣军队转变作革命的人民的军队，尽量采用游击战术，与浮动的损失不大的阵地防御相配合，充分发展人民与军事组织的合作。但高级军事当局直到在战争中吃了很大的亏，才认识这一点。在过去，

他们继续在不平衡的火力下从事据点的防御，并把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发展起来的游击战，看作一种不可避免的罪恶。

在上海方面的长期牺牲，使得有训练的将士和军火受到可怕的损失，几乎一开始便毁掉中国有组织的抵抗力。这在政治方面也许是有一定道理的。这种牺牲具有一种心理学的价值；加强民族的自信。蒋介石也许会这样希望，把战争留在上海公共租界附近，一种意外事件可以使日本与列强发生严重纠纷，因而可以引起国际的干涉。此外，假如利用这时间，向内地转移重要的工业机器和技术工人，加速内地乡村的民众动员，以至为动员的武力预备后方根据地，以接替防御东部各省的主要任务，有一于此，这场战争中的重大损失也许是值得的。

但事实并不如此，我们后来便知。

上海战事目睹记

上海：这中国脸上的政治溃疡。——约翰·根室

在九月的末尾，我们缓缓地溯黄浦江来上海，经过一列正向目不能见的灰色线开火的日本战舰，天空有一队一队的飞机飞过燃烧着的闸北和江湾。

这一切引起我一种旧地重临的奇怪感觉。五年多以前，当这同一战事在这同一地方发生时，我曾参观过那一次的预演。这一次虽然规模比以前大，但总是一九三二年的重演。没有人能怀疑它的结局。记忆的感光面凋零得多未快，新的恐怖形象拭去了旧的；毁灭几千人的大战事，象去年的运动会一样被忘记。在一九三七年，上海大部分人已经忘记一九三二年的战事。

到今天又几乎忘记一九三七年的重演了。在含有成千战事的战争中，一场战事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在我自己的头脑中，一场战事模糊了，又进入第二场。

但当这战事继续时，它乃是世界最伟大的表演，即使回忆起来，它的情节也是奇特的，在某种意义上，连希特勒的闪电战也不足以比拟呢。再没有哪一个大都市，有象这样几乎一百万人竞相杀戮的场面。这好象凡尔登搬场到塞纳河上，而历历在目的右岸巴黎是中立的；又好象有一个葛底斯堡在哈莱姆作战，而曼哈顿的余处却是袖手旁观者。

大家都知道，上海有两个：一个外国人统治的上海，是由几千英亩的法租界和公共租界合成的，这地方是将近一世纪前由中国取得的；又有一个中国人管辖的大上海，包括老城区，一大部分闸北、江湾、南市和浦东。在上海三百万居民中，有三分之一强住在外国租界内，其中约有六万欧洲人和四千美洲人。

与一九三二年完全相同，日本军队占据杨树浦和虹口（苏州河北一大段公共租界），作为他们攻击中国人的根据地。在苏州河南，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边界，到处有英法意美的军队防守。在黄浦江面，在依然中立的残破的外滩前，泊有欧美的战舰，满怀兴致地观看下游相距几十码的日本海军攻打那坚守三个月的中国战线。

战事把这小小的国际“国”完全包围起来，但它的大部分依然是旁观者。有时炮弹从头上飞过，有时落进界内一个，而且颇有死伤。日本人隔着公共租界放高射炮，炸弹碎片有时落在外滩上。有一次，美国旗舰“奥古斯塔”号上有一个水兵被击中，

又有一次，一个中国的或日本的炮弹在一个百货商店爆发，炸死六百人。在战事最初期，一些中国飞机无意中轰炸了聚在街上张望的人群，死伤了二千多人。据我所知，这两颗炸弹造成死伤最多的纪录。虽然如此，大部分国际的上海——终必成为日本与西方之间的战场——依然常试度它那不正常的生活。

对于一个战事通讯员，第一次的上海战事，从技术的观点看，乃是一个完全的故事，只有在上海才可以再遇见这种事。对于拙劣的著作家，这是再方便没有的了。备有适当的通行证，你可以在早晨去中国的战线后方，去写一篇《战地目睹记》。然后你可以在下午经过公共租界去日本前线。假如你要十分彻底，你可以去参加中日双方新闻记者招待会，去听取官方的报告。最好的是，你此后可以安坐在中立地带，发出你自己的不经检查的电讯，然后良心（假如不是胃口）平安地入睡。在一九三七年，这同一把戏，虽然不那末容易，因为空中也有一些活动，但依然可以办到。

在任何别的现代战争中，通讯员和摄影员都没有这样的行动自由。当日军内移以后，在日军后方是要受限制的，但在中国方面，你可以毫无困难地进入前线。中国人力求避免开罪任何外国人，不十分了解治外法权并不包含外人自动冒险权，于是时时加以少许劝告。中国兵士把大多数欧美人看作他们的同盟者（上帝知道为什么缘故）！一点也不担心第五纵队。既然有这样的自由，互相敌对的特殊通讯员又是那么多（他们的报纸总以目睹的故事或独得之秘相夸耀），但在上海的战事中，伦敦《每日电讯》的年轻的P·斯蒂芬斯乃是我们中唯一的丧生者，这却令人惊奇了。

这战事是这样的。有一天，在中国招待新闻记者的会中，一个瑞典通讯员尼斯特罗姆在闸北沦陷前由北平来上海，他问市长俞鸿钧，新的中国战线设在什么地方。俞市长把插满针的大地图指给他。

“我们的战线的尾端恰在铁路以西，兆丰公园以外”，他解释道。

“啊”，这个勤俭的瑞典人沈思道，“我想我明天应当搭兆丰路的公共汽车去前线”。他就那样作了。

人们站在所住的公寓的屋顶，看他们眼前的日本轰炸机，把一吨一吨的炸弹，投向隐在屋顶以外的中国战壕。国际饭店的旅客可以从屋顶餐室宽大的玻璃窗中看出来，一面从容不迫地喝着他们的黑咖啡，一面考究日本炮队的射击术。

驻上海的外国军事观察家也得到一个无比的机会，目睹战事的双方，以及海军的炮战。虽然战争的结果是没有疑问的，但依然满有令人惊奇的地方，在新的屠杀艺术方面得到一些新的教训。许多观察家在这里改正了他们对于日本军事力量的估计，有一些人第一次开始相信中国最后胜利的可能性了。

日本在这时攻击上海，是否犯了一种重大的战略上的错误，是颇可争论的。不过，假如主要的目的是在华北“速战速决”，这必然是一种军事上的错误了，因为上海的战事分散了日本的军力，扩大了冲突的范围，延滞了随后的巩固工作，加强了中国的政治团结和决心。作为一种政治战略，这举动是日本人特有的一种错误。所有中国统治阶层动摇的没有决心的分子，都集中在上海内外和长江下游，他们与外国资本结合，在民族革命运动中不断地尽出卖的作用。日本所以不能使中国政治队伍

中这一群人尽早屈服，主要的理由是，在战争开始时，日本把他们的利益摧残太过，减弱他们在政府中的势力，消灭他们的物质基础，否则这物质基础可以使他们牺牲华北来谋和。

日本也许最好暂时从上海撤退，把她的利益交列强保管，这在列强是十分容易办到的。那样，日本便可以集中注意来彻底肃清华北，随后她可以用侵入长江流域相威胁，借了中国内部和外国的帮助，她大概可以迫使南京讲和。但八月初南京军队的到达上海，是日本不能忍受的一种挑衅，更主要地，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性质，使得它不得不即刻除去在政治方面应当保存的和议基础。总之，日本登陆军队既在公共租界内增加，中国的援军也开过来，沿着闸北与他们对峙，显然一场冲突是无法避免的了。

在战争的初期，中国表现了出乎大多数人意外的锐气和军事技巧。面对着黄浦江日本海军战舰的直射炮火，他们几乎把日本人从公共租界中驱逐到江里去。有一个星期的时间，日本军队有被完全歼灭的危险。因为中国的右侧是中立的公共租界，日本人无法加以攻击，因而延滞了他们的援救工作。援军必须由长江在北方登陆，穿过由吴淞到浏河一道二十英里的战线。这些登陆的动作，使得一些观察家看出日本作为一个军事强国的弱点。

中国军队的防御工事建筑得很潦草，然而日本人在一打战舰的掩护下，在优势空军的辅助下，用了几乎一个星期，才能使一支队伍登陆。既经在浏河建立这一新的侧翼，既经由那里结聚充分的军力从事进攻，日本人依然有几个星期没有任何重要的进展。经过两个月海陆炮队的连续轰击，日本人才把华军

阵线攻破，使得华军的右翼从闸北撤退。

这一切使西方军事观察家明了，日本步兵的“攻势”，一旦遇到坚决的勇敢的敌人，即使双方条件大致相等，也并不象到处宣传的那样可怕——日本后来与苏联在张鼓峰和外蒙边境作战的失利，更加强了这一种见解。当中国的右翼既被日本冲破，向苏州河南岸公共租界以西后退时，日军竟不能乘势击溃中国的军队，使得以上的见解在上海格外流行了。日本人的进攻是非常审慎的，因而中国军队得到充分的时间建筑新阵地，于是日本人不得不再度从事长期的轰击和新的进攻。

在华北，日本人所遇到的军队，装备既极端恶劣，又缺乏现代的防御，日本的坦克随炮火前进，时常击溃中国的军队，因此步兵可以不受损失地占领新阵地。但在上海呢，这里有五十万军队，其中包含中国最好的几师，大炮的轰击并不能把防军逐出，坦克的前进一次一次地被阻。大炮很少与坦克连系，仅只一次两次地被用作掩护步兵前进的活动烟幕。

据外国观察家的意见，大炮和空袭的技术也都是不高明的。直到战事结束前几日，中国的汽车运输依然能通前方阵地。虽然日本人在京沪之间有五百架飞机，而且实际上遇不到什么抵御，有一切可能把这些连络切断，但竟办不到。

但火力的绝对优势，虽然在轰炸乡村和扫射难民时不免浪费，依然是不可轻视的，中国的阵地一个随着一个地被摧毁了。成千吨的钢铁，从天空中、从大炮中、从海军炮中、落雨一般投在闸北。据军事观察家说，那一个地方所受集中的炮火是从来最重的。中国的损失之大，显然达到不能长久支持的程度了。

在这种可怕的轰炸下，中国军队的平静的勇气，看起来是动

人的，几乎令人不能相信的。在死亡之前的冷静和任命的意识，乃是中国军队的一种特长，任何西方民族都未必有。有一天，我自己受到日本飞机轮番轰炸的威胁，他们那种完全不顾命的精神使我永远不能忘记。我同那时的美国海军参赞武官埃文斯·卡尔逊少校留在苏州河南的中国战线后方，我们本是去那里考查中国的新阵线的。

当我们经过一个在一些树的掩护下袭击北方日军的中国炮队时，我们遂走上冒险的路了。忽然间，一队日本飞机在头上轰鸣，在炮队附近投弹。我们加速离开道路，刚来得及在第二弹投下前卧在一所破屋附近——那颗炸弹正落在我们先前站过的地方。我们爬起来，再往下跑；回头一看，我们先前卧过不久的地方又被炸中了。同样的事连续发生了好几次；日本飞机在并无目标的地方一路随着我们的逃避轰炸。我们想到这些飞机随时可以用机关枪扫射我们，当我们不能再跑下去时，我们来到一道小河旁边，我们于是溜下岸去，伏在多少可以遮掩的地方。

另一队飞机来了，我看见它们向不远的一丛树中投弹。后来的飞机更向西飞去，于是我们又爬回田中，觉得我们的得救是一种奇迹。这时我看见一个青年哨兵，大致过十六岁，从树丛内一个坟墓后边站起来，戴正他的军盔，拾起轰炸时震落的步枪。他恢复了他的岗位，当我们行近时，快活地招呼我们。同他谈起来，我才知道，在前一晚，他曾留在前线一个战壕中，那里还有十七个别的兵士，一个炸弹投下来，除了他以外，别人都死了。这时，附近没有一个伙伴或官长，他的冷静和安详，使我感动，以至吃惊。

在十一月初，中国伤亡已经达到十五万人，防守的损失显然属于南京的第一线常备军。一些中国最好的师损失过半了，物质的牺牲也是很大的。到这时，中国才想在未完成的三合土防线中预备一个强大的辅助阵地。这道防线，在上海东八十英里，由长江经苏州南达杭州。但在守这道防线的援军未到以前，日本人已在杭州湾登陆，终于使这场战事完结。日本人由杭州湾迅速内趋，透入中国右后方的松江和闵行，迫使防军在十一月九日总退却。在这时，日本人按照他们每次胜利后的习惯，在闸北高空放起一个系留汽球，从那上头垂下一长条飘带，上面写有自吹自捧的字句；不料那天竟发生了一件趣事，打破了十分沉闷的空气。路透社女访员克里斯廷·迪默看见这汽球在火和烟上飘浮，于是慌忙从电报局的屋顶跑下，向伦敦发了一个电讯，说日本人有一种新的秘密武器——“浮空炸弹”。

但中国的后卫依然在南市守了两天，我们在这里看见战事的结局。我相信，一个旁观者再也不能看见象在南市所见的那样逼近而又广阔的战事了。我们与战场只隔一道徐家汇河。这道河不过五十英尺宽，形成法租界与中国地的界限。我爬上一所临河的中国公寓摇摆的阳台，那里已有半打摄影员。他们应当摄就好莱坞从来未有的最完善的战事影片。但我不曾看见这些影片上映，我可以想象，美国那些不耐烦的观众一定以为这都是假的。

在河的右方，我们看见日本人小心地前进，从这一掩蔽物到另一掩蔽物，逡巡在他们的坦克后面。他们的坦克呢，走不上几尺路便停下来，用断续的炮火震动天地，然后退却了。在我们对面，不过一球之远，一架中国机关枪从一个混凝土的堡

垒的方孔中喷射出来。这堡垒便建筑在徐家汇一个狭窄的支渠的左岸上。沿渠有一长列草舍，都藏有中国的袭击兵。从后方什么地方大炮轰鸣，炮弹从头上尖叫。在华方的河边停有一些舢板。船上的人若无其事地吃饭，直到一架机关枪突然向他们扫射过来，他们才伏到席子下去。我永不曾知道他们是否丧命。

轰炸机出现了，使得一串草舍燃烧起来。好几架飞机在一个中国堡垒上轰炸，终于从二百英尺的高度将渠堤炸坏。日本人沿渠轰炸，我们在看台上象盒子里的骰子一般颤动。我看见日本步兵在对岸破墙的后面侧起身来，预备过渠进击。一架战壕臼炮从正面发了一炮，我看见一些带钢盔的中国人伏下来，向后方逃避。现在全部南市火光烛天。侵略者放了一个烟幕，逐渐把全区包裹起来。最后，在渠下一百码处，在浓烟笼罩中，我仅能看出一列日军爬过在他们前面架起的浮桥。中国军队在退却。

我们回市区去取胶片。我在都城饭店遇见伦敦《泰晤士报》的通讯员M·麦克唐纳。这人后来写过一篇最生动的战事通讯，便是炸沉美舰“潘内”的故事。当这条军舰在南京上游被日人轰炸时，他正在舰上。麦克一面与我同行，一面埋怨我误了他的饭。我们又约同卡尔逊，回到迅速变动的“前线”。现在是在几区建筑物以东。走到法国电力厂，我们设法进入院中，走上河旁的水塔顶。我看见斯蒂芬斯的黄色的大脚踏车停在不远的路上，但看不见斯蒂芬斯在什么地方，我相信他一定在沿河的一所建筑物中。

水塔是徐家汇一带的最高点。它矗立在工厂的一百英尺以上，从顶上我们可以鸟瞰全部战局。我们走上低级的平台，正

要再往上爬时，突然一阵子弹向这建筑物射来，这显然来自装在河下游一座建筑物上的日本机关枪。幸而有一道三合土的墙遮住我们，但枪弹乱击我们上方的水塔。枪火愈来愈密，我们爬下来，走进电力厂。枪弹击碎厚玻璃屋顶，玻璃和墙粉纷纷落在涡轮上。十分钟后，枪声停止，我们又出来，这一次走上水塔下面混凝墙旁的一个木架子，在那里我们可以看见河对岸，也可以照像，同时可以遮蔽另一次攻击。

在我的脚下面，是一大片红色。

“看”！我对麦克和卡尔逊说，“这是血呢还是油漆呢？我不记得几分钟前这里有任何油漆。”

当我们正揣测那一片颜色时，我们听见墙外发出一声叫喊，向外一看，便见中国军队拥过徐家汇法租界的铁丝网。中国军队现在完全被包围，再往后退，便进入由南市的黄浦江岸来的日军射程以内了。来复枪、刺刀、手枪、手榴弹、子弹、防毒面具、钢盔堆积在街道上，也有备收藏的纪念品。这军队是十分年轻的，有许多人仿佛还不到童子军的年龄。已经到来的法国守军司令，说话相当和善，一面称许他们作战的勇敢，一面向他们保证不把他们引渡给日本人。

我发觉卡尔逊不见了。四下里一看，我看见他正爬上水塔。摄过几张影之后，我跟了他去，但当我走上水塔时，我遇见一些惊慌失措的法国人从上边下来。随后我看见他们中的一个受了伤。我退下来，向那曲折的梯子上张望，另一浑身血污的受伤者拐了下来。走在他们后面的是卡尔逊，还有几个别的人，拖着斯蒂芬斯的身体。滴在我足旁的颜色，正是斯蒂芬斯的血，并非油漆。他死了。

“我看见一只脚从塔顶垂下来”，卡尔逊告诉我，“于是跑上去看。当我走到那里时，斯蒂芬斯躺在一洼血中，另外有两个受伤的人，还有几个别的外国人，惊得伏在一起不能动。”

斯蒂芬斯被击中头部和鼠蹊。驱逐我们走进电力厂的那一阵子弹，显然是向着塔上的这些人放射的。这是多么困难的地方：在一片饼干大的台子上，离地一百英尺高，无处可以逃避或移动。他们一无办法，只有留在那里忍受了。

这是十一月十一日，几乎是上海战事最后一点钟了。斯蒂芬斯依然在钮孔中带有一朵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纪念的红罂粟花。

第二篇 从上海到汉口

没有领袖的上海

在人民政治组织和教育方面，并没有什么进步。这种失败，随着战争而愈益明显了。

——一九三九年国民党宣言

日本夺取了上海及扬子江流域下游，使中国所有近百分之七十的现代工业不能动员。在上海一地，就有五千五百二十五个大小工厂及一万六千八百五十一个作场，^①为日军所毁，或为日军所夺。即在广州与汉口陷落前，日本已夺去了中国全部电力厂的百分之七十。现存重工业的半数已经丧失。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中国造纸橡皮及纺织工业不是被毁便是被占。他方面，三百个丝织厂停工。上海的五十四家缫丝厂，其

^① 根据一九三九年重庆经济部的数字。

中有五十八个陷入日本人之手。中国百分之八十轻、重机械厂不是被毁就是被充公了。

中国战前工业的殖民地性，可以从这种反常地无意义地集中于沿海地带，与设在租界之内或邻近租界的这一事实上，清楚地看出来。差不多所有官办或半官办的工业，都不听专家的劝告，设立于游弋黄浦江与扬子江日本军舰短距离的射程以内。许多战时工业竟设在虹口与杨树浦公共租界的日本人的防区以内，这一带早已被人知道，一旦发生任何事变时，要为日本海军所驻防。国民党的高级官吏，是上海工业投资当中最多的人，这些人又重在一九三二年战争中被日本人毁灭过的同一地点建设了工厂；他们很单纯不信这样的事件会再发生。同时庞大的国内市场，无人加以注意，它的资源也不加开发。在上海及其他条约商埠，商人、重利剥削者、买办资本，实际上是与国外帝国主义者合作，建立了殖民地经济根据地，阻碍了中国的正常工业化，而供给了日本从那地侵略大陆的必要的立脚点。

如果中国工人在战前允许其组织起来，如果对他们施以任何种类的政治训练，以备动员，中国很多的工业可以抢救而移到内地去。熟练的工厂工人，可以保留中国一方面的前线。可以使日本从租界方面指挥的军事行动，付出远较现在为高的代价。可是这样预谋，在一个政府恐惧工人即使不超过，至少也等于象恐惧日本人一样的情形下，完全不可能。

在一九二七年，六十万以上的工人，曾在上海组织起来，在一个成功的起义下，当蒋介石将军还没有带了他的国民革命军抵达以前，工会便占领了华界，驱逐了张作霖的奉军。但几星期以后，蒋介石成立了反共的南京政府，工会及人民组织都被

摧残。五千以上的工人领袖及其党徒在一次历史上浴血最惨重的事变中，被消灭净尽。即使在那次事件后，南京的劳工政策，依然保持其专制与阴谋的作风。在那想以武力统一的十年中，国民党与外国巡警及上海的外人厂主密切合作，残酷地禁压工人，为其政治及经济权益而奋斗。

外国当局不断地邀请国民党中的流氓协助人仲裁租界内的工潮。公共租界英国人所管辖的巡警不断地逮捕工人领袖交与南京羁押或枪决。即使美国人所有的上海电力公司，对待工人比较地良好，也一直津贴某青帮著名领袖。蒋介石颁布了罢工为不合法的戒严令，并公开地宣布，工人的工作时间（平均每天十二小时）应该加长，而不应缩短。在一九三六年，南京政府正式答应禁止青岛日本人的大纱厂的罢工。

由于这样历史的结果，上海工人（占全国熟练工人半数以上）在战争爆发的时候，不但因为他们没有组织和他们最优秀的领袖死掉或在狱中而没有力量，并且非常郁郁不平与仇视国民党的。后者在过去十年中，曾制造了一种破坏群众组织的工具。这种工具不能在一夜中就使其变为群众领袖的工具。可是即使在这很晚的时候，如果有决心要这样干，动员这些可宝贵的男子与妇女，也并不是不可能。

如果这些工人动员起来，有适当的领导，无数吨的机器工具及金属可以在七月七日至上海陷落前运出。上海的较多数的工厂是由轻机件及工具所组成，体积很小，便于运输。这些工具对于一个争夺大后方的长期战争是非常重要的，在那些地方，因制造业稀少，这些物资实是无价之宝。如果江河船舶及运输工人都已动员起来，如果长江下游四万万农民当中只要有很

少一部分成立群众组织，无数吨的有价值的工具就能安然运入内地。

日本在中国境内的投资，约有三分之二(共约十亿日圆，为数不明的借款尚不在内)，是集中于上海。大部分的日本工业是在公共租界的虹口与杨树浦及与闸北接境的越界筑路区以内。日本棉织工厂一项雇用五万以上的中国工人；实际上所有日本工业皆雇用中国工人经营。如果这些工人组织起来，日本在上海的工业根据地，可以在芦沟桥事件发生后完全毁灭。大部分日本人的工厂能够毁灭掉，而中国军队也许可实际占领虹口与杨树浦。

但事实是当中国军队从这日本重要根据地及立脚点被驱逐开去后，他们让日本工厂差不多安全无恙。上海日本三十个大棉纱厂中，只有两个纱厂被毁。公共租界中只有日本的六所工厂受到严重损害。^①在租界中因为是敌方工业而遭受到的战时损失，也许比之日本人自己所加于那地方亿兆圆的英美投资要少得多。

但在战争计划中展开劳工运动，需要政治组织与共同享有权力，这两者既不是国民党也不是委员长所愿意让步的。即使少数几个中国工业家极愿自动地想在日本侵占或毁坏前，搬走他们的工厂与熟练工人，却有时因这样的努力而受到惩罚，那是为人所周知的事。在上海战役中，淞沪警备司令杨虎损害每一个想作这样活动的人，而从中发了一笔大财。

共产党没有合法的地位，他们当中有好几十个人仍在上海

^① 见一九三八年五月四日工部局“工业现状”的报告。

监狱中，国民党继续压迫任何受他们影响的组织。在日本占领该城不久前，他们才开始认真地组织，到了那时已太迟了。好多政治犯在整个上海战争中仍羁留于华德路西牢内（那里面曾有几个人为炮弹所轰毙）。好几个月后，仍有人请求政府释放他们，但据我所知，他们到今天仍奄奄待毙于上海。

事实是国民党中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分子，在上海有非常浓厚的买办利益，不愿看到其毁灭。他们始终怀着百分之五十的希望，以为列强会来援助他们。他们不愿意他们的工业被移走，或被毁坏，并且他们也认为一个中国不对这国际帝国主义的堡垒捐输血汗，乃是匪夷所思的事。在经过两年的战争中，中国最高统帅不愿正视那种事实，那就是中国长期战的无情的必然结果，任何给养的方法，都不能存在，反让日本人改造成为他们自给的根据。国民党与委员长太为对国外资本的义务所束缚。他们关心于每个条约口岸的“外人资产的保护”，远超过他们把握住那残酷无情的真理，那就是每一个城市让其完全无恙地存在，即无异任日本侵略势力的伸张，而给无数中国人以致命的打击。

国民党不能扰乱以往整个帝国主义势力深入中国中心的路线，从而不能扰乱目前自内部为日本所取而代之的路线。官僚为解救那些神圣的外人资财而受着那些空泛的奖饰——自然政府官吏也有很大的利益在那些资产中——他们以为那种“维持现状的帝国主义者”一定会赞许他们这种服务，而起来反对日本，保护他们的权利，以为酬答，他们也用了这种幻想来自慰。无论如何，他们希望外人阻止日本人，有效地阻止日本人独占那帝国主义利益星罗棋布的地带，作为进攻中国其余地方的根据地。

在上海，我只遇到一个中国官吏，他似乎看得非常清楚，认为这地方的生产工具的丧失，对于中国具有何种意义。这人是宋子文，委员长的内兄与中国银行的董事长。

我有一天问他：“政府的全部经济都建设于环绕上海的四周，当你们失去你们上海根据地后，你们将怎样办呢？”

他回答说：“你以为怎样呢？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在内地组织一新形式的生产。那就得我们人民以极端忍耐出之，但我们却很能够那样试一下，如果别无其他方法。举例来说，我们只要一看中国共产党在江西所应付的同样不利条件，就可知道。只有一个省份在手，他们却能和政府百万大军作战而仍不被歼灭。从那一点，你就能明白，当整个的国家为着一个目的而动员起来所能完成的任务。”

“哎，是的，但那意思是讲，需要一个很大的改革，”我说，这使我想到了红军所根据的特殊立场的农民革命。“你认为政府是准备趋于那样的极端么？”

宋子文眉头一皱，迟疑地说：“也许还没有。但在最后，一定要做到动员一切抵抗力的必要的事。”

“一个好的发轫，可以在这地方进行。如果民众是组织起来象江西一样，你们能够抢救出不少的工业机械。动员会使政府获有很大的权力去征收工业与财富。如果工业家不愿自动地移走，为什么政府不强制接收工厂与组织人民去把它迁入内地与恢复内地的生产呢？”

他同意说：“这件事应该去做。某些事已经着手。也许在上海已嫌太迟，但在其他地方仍有充分时间。我们应当忍耐。”

这些中国最进步工业根据地可怕的全部丧失，与上海熟练工人与中国战时奋斗很大的隔离，都是可以责备的几件事。在几月以内，日本开始利用这些工业及运输工具，这些东西是中国当局在退却前没有移走或毁灭的。日本把上海变为进攻长江上游的一个庞大的根据地。

中国怎样克服这一个在战争开始所受到的巨大损失，我们将在后面讲到。但在这个时候，好多人在这大城市的灰烬中，以及在无组织的由两租界区慈善机关负责的难民收容中，看到中国抵抗初期的结束。

战 场 凭 吊

日军除开增进中国大众繁荣以外，绝对没有别的企图。——土肥原

有时，我漫游上海重大毁坏之区，一英里一英里地走过去，偶然有着一个烟囱，或电线杆耸立着，看到令人伤心。无主的电线残缺不全地悬宕于颓壁败垣上。尸体从瓦砾堆中，发着臭气；每一样东西都是静悄悄地，正象那在冬天太阳中腐朽的死亡一样。

以往，我非常熟悉闸北与虹口的一切，但这时所熟悉的标志已完全消失。行走这可怕的世界中，宛如一个焚馀的地狱，你很可以变为迷惘失神，但有一个人似乎依然认识每一块倾圮的砖，每一架被击毁的机器。这人就是艾黎博士，一个新西兰人，他那时是上海工部局工业部的总稽查。我过去在上海的时候，曾和艾黎一同出发，参加调查工作；那是你所能得到关于这座

城市的最好的教育。现在和艾黎出游，经过了这一国家工业区域广阔的废墟，立即把这些毁坏了的工场活跃于你的眼中。

我们看到日本人围绕着被桎梏着的一群可怜的中国俘虏，扛走任何可以想到的废铁来源。从若干差不多没有毁坏的工厂中，他们移去全部机件，运回日本，那地方再由陆军售料部卖给资本家。货栈中的货物，也全被偷走，任何金属都携走不留一丝。艾黎自己在江湾屋中的所有，也差不多被劫掠一空。

自然，在闸北的许多工厂依然未动，好多在公共租界以内的中国工业(在虹口与杨树浦)也很少毁坏，因为这些是日本首先攫夺在手加以经营的，因为他们完全控制了苏州河以北的公共租界。

对于艾黎，他知道这些毁坏了的机器，都由极端剥削工人而产生，所以铁是真正的血肉之躯，在他简明解释之下，这些东西都变为虎虎有生气。有时，他指点着日本人所还没有搜刮去的一团不成样子的铁，会突然使你想到了全部工厂的景象，正如一个爆炸了的弹片，在倒置的电影中所集合起来的一样。

“那是张智林的汽锅”，他倔强地说。“我叫他在不久以前装置的；原先的那一个是危险的。我奇怪那可怜的机器是否也在那一团糟的中间呢？”

或者，我们到了一堆十分混乱的砖头堆的时候，你仍能从那里面看到毁坏了的傢具，或拆散了的轮子，或轮轴。艾黎就要自动地说：“这是杨兴的电料厂”，“我几月前告诉他在机器上设安全防止物。他不照办，一直等到他的两个工人失去了手指。”

如此等等。这一位艾黎晓得这样几百家被毁工厂的个别历史，以及在它们里面做工的几千工人的生活史，这一种知识是比中国任何人所能知道的还要来得亲切完全。虽然由于他是一个公共租界的检查员，他的权力不及于中国市政府所辖区，甚至对于虹口的中国人所有工厂，也成疑问；但他们都受着他的影响。虽则有好多外国工业家对于他的“改良”的企图表示反感，虽则工部局只容忍这一个由埃莉诺·欣德及他自己指导的部存在，然而他们却有他们的成就，救援了不少人的性命。

因此艾黎明白这些工业所损失的一切，不独金钱蒙受损失，并且就人力上讲，也永远蒙受损害了。对于他，那就是几百万小时的劳力，这种劳力产生了中国工业的财富，以为交换饭碗之资。而这些饭碗却已在火焰中，或日本的炮弹中丧失了。他也知道在这地方的残迹中，也使他十年想把亚洲工业灌注一些合理的举动的企图，同归于尽了。

就我个人讲，我看到那些最恶劣的汗血制的工场的毁灭，不禁感到某种恶意的满足。在日本把工业建筑于妇女的肉体上，而在上海，却时常以青年儿童为吮血的对象，他们当中有好多入，订契约卖给他们的主人，经过好多年变为实际的奴隶。

艾黎有一次在旅途中，曾说起：“一个坏蛋经营着一所藏垢纳污的作场，从孤儿院雇用了六十个孤儿，此地差不多所有的孤儿院，都是奴隶工作制或者是奴隶贩卖所。这一位蠢猪把这些孩子们睡在他机器上面的架子上；他们从不出外，他们每天工作十四小时，机器没有防止危险的设备。他从这上面攫得了百分之百的利益。真是一个好的营业。当我检查孩子们的手指的时候，我发现其中有二十六人失去了指头。在那一个作场中，

总共有三十八个指头切去。”

在战事中，这些孩子们当中，有好几个为他们的锁在工厂中。好多死掉，还有好多被日本人俘虏当为男奴。我记得有一天和艾黎在一起，我们发现几个学徒推翻了惯常的事态。主人曾把他的孩子们锁在闸北的工场中，他隔一两天偷偷地到那地方去看看是否中了炮弹，和拿些食料去供给替他做工的牲畜，一天，这些孩子们哄闹起来，拿了钥匙，把主人自己锁在里面。我很抱歉说，这是我所听到的那一类事件的唯一消息。

艾黎惯常地说：“这些鸽笼为炮火轰毁干净，并不是一件坏事，如果比较好的事件能够代替它。然而那却是最坏不过的事。日本人使事态弄得十倍以上的糟糕；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真正无产阶级的奴隶是怎样的情形。”

大多数人关于这件事都作那样想法，但也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如此。我记得曾听到一个以前曾遭遇过工潮的美国人这样说：那也许是一件很好的事，中国人现在可以“安分”了。他相信这样一来可以使“劳力更廉价一些。”对于日本人——的确可以办到这一层了。

八十万以上的工人，因上海战事而失业。好几个月来，公共租界与法租界挤满着两百万的华人，至少当中有一半人是部分地或整个地陷于绝境。在上海战事终了以后，男子妇女及儿童，喧闹于隔绝中国南市与法租界铁门之外。在这些地方，饶神父设立了他所谓中立区，有三十万被困陷的人，拥挤在这地方，以求获得这位神父所能给他们的短期的安全。

艾黎和我从由越南与法国军队防守的铁丝网看过去，在铁

丝网的那边，形容可怜的无组织的民众，终日祈求铁门开放。并讨乞面包与水。不时有中国救济机关，从法租界方面，准许走到这旁边来，把馒头或面包从铁栅上面抛过去。不时有着中国童子军(他们在上海战争中，做着成人的英勇事务，其中有好多人牺牲他们的生命)，带着几桶水来。四周的大火从烟雾弥漫中吐着光耀，这些烟幕，是你在他们后面的天空所能见到的唯一事物。好多在那些凄惨状况群众中的人，都有着绝望的为烟熏黑的面孔，其中有好多人头部四肢受伤而缚着绷带。那情形看起来很象巴黎六月的叛变，所缺者只是这个地方没有革命的情绪。这地方只有无武装与无组织的受惊吓被封锁的人，想从他们的邻居获得逃出牢笼与援助的办法。

好几个月中，你不能走过任何偏僻的街道而不踏着这次大灾祸的牺牲者。公共租界及法租界的难民收容所从没有能够收容十万以上的人。其他五十万以上的人，睡在行人道上及街上，房屋及店铺的走道中，窗壁间，垃圾堆中，他们利用随身所带的蓝布小包裹，做着枕头，破布与旧报纸当做被褥。巡捕防止这些无家可归的人，聚集在大街上，这些地方，他们常在夜里流荡到一起，从电光照耀的店铺橱窗，获得些温暖。每一条弄堂中，苦难的人们蹲踞着、立着，或寻找有空地的地方去睡。

我到这些地带，这些楼面以及出租房屋去搜寻秘密，我的报纸需要有些故事。好多人在那里日夜不断地轮流着睡。他们在楼梯的两侧，划成了重叠的边界，在这里面的，大部分是妇女。你从一层楼到一层楼，得小心穿过这人体横陈的地带。虽则夜间是冷风刺骨的，每一个这样租屋的屋顶却都被人占满。三四层楼的房屋原来预备住四五十人的，却住了四五百人。

即使在收容所中，似乎比较卫生一些，然而好多星期中，每天平均仍有二百人死亡，他们都是饥饿、痢疾、霍乱、伤寒、红疹伤寒及其他疾病的牺牲者。有一天，在一个救世军所办的大收容所中（一万七千人拥挤在一个学校旧址的各教室中）我看到六十个尸体搬出去，其中大部分为妇女与小孩。救世军竭尽了他们全副的精神，在这里面，还可找到一间产妇室。至其他地方，赤贫的产妇，时常在走廊中、弄堂中，有时甚至在行人道上，或街道转弯角上生产。

好多基督教的工作者也竭力来参加这种工作；但我也遇到好多外国人，他们似乎一些不知道关于这些人出于寻常的事。来往于他们日常购物或公事房的琐事中，他们把车从静安寺，或霞飞路，或海格路开来开去，只看到在他们面前的汽车。在他们的意见中，整个的事件，有些“过分的夸张”。我曾在俱乐部，或中央饭店舒适的餐台上，听到有几个人说、收容所实际上是一件可怕的东西。“这些难民将养成专吃不做的习惯。他们决不想再去做工。那是一个职业呀。”

非常奇怪，这些人却对几个无主人的猫狗的痛苦，引起许多可惊的关切。在富有的上海，大众饥饿当中，本地报纸的通信栏里，常填塞着欧洲读者的不合时宜的问题。关于当心金鱼问题，曾引起热烈争论，报纸上登载了好几天。我记得曾有一个写信人发表一封使人眼泪都会掉下来的信，请求大众把他们家中残余食物煮熟，放在垃圾桶旁，以供那些饿狗食用。另外一个“老上海”，则表示非常难过，因为当他驱车经过法租界时，他曾看到一个带着口罩的狗，流落街上，没有主人，因为担心那条狗没有吃又没有喝，害得这位写信人一夜不能安眠。那些

对于一两条饿狗作不合时宜的烦恼的人(其实狗可以从那面的壕沟中的尸体,吃得很饱),显然对于那些无数儿童为贫困所束缚,没有卧具,没有食物,没有父母,在饿毙的惨状下,是不会引起他们的同情的。

我对他们的心理,不求甚解;我只不过尽报导的责任。

同时,夜生活已恢复。所费极奢的旅馆酒店、咖啡店、妓馆,在苏州河以南,做着好生意。汽车在靠近我住的楼面的那些四元一跳的舞厅旁边两租界上的各区域停满。头发上擦满了油,穿着绸衣的中国人在地板上婆娑起舞,非常自得其乐。我敢说这些人当中有好多人是那些工厂在租界上未受损毁而赚钱的主人,或者是那些地主,他们把租费增加了一倍,同时把难民从他们的货栈中赶出去的人。……一个爱国志士作了一次演说并在这些地方的某一处投了一个炸弹,希望把他们都置于死地,好多人有一时期裹足不前。但那些经营这种事业的流氓,却雇用了保镖,公开地陈列于那儿,并在门口,用外国巡捕站岗。安全的信赖,不久又恢复了。

我想起我在北战场的朋友所给我的好多信,讲到穿着棉衣的军队寒冷而死,及手指因为没有手套而冻落了,不能拿步枪及手榴弹。我奇怪,这是为什么呢?是不是为了这些头发油光光的穿长衫的人?他们舞票的代价及一夜饮酒所费,就可救出一打人的手指或生命吧?外人控制下的上海的中国殖民地的产物,是世界资产阶级当中最腐化的一群,除开香港的类似的人以外,实莫与伦比。中国的战争,如果不包括摧毁这一城市流氓在内的邪恶势力,将变为毫无意义。

无数没人收殓的尸体仍在这些活动隔开几步的房子腐朽

着，这一件事我觉得特别令人反感——因为那些干这样活动的人，不是从前线回来的战士，在再去拚死前寻找一些欢乐，而是中国人所称的“解闷的纨绔儿”。在相反方面，上海西面的战场，那地方我和艾黎星期日去散步过的，空气非常新鲜可爱。那是一个奇怪的逃出尘嚣的地方，可是对于我们，却是一个对于这可伤心的城市，一个可以改变观感的地方。一个人至少可以相信，上海不是中国。一个在这发芽滋长的泥土上，意会到横在那以外的中国的力量与广大。一个人又能感觉到在疮痍满目而出产仍丰富的土地内，有着新生希望的把握，远较那当前的死亡，更来得大。

公共租界西面，及苏州河南面，田野中充满着炮弹孔穴。混合在腐朽的兵士尸体中，是着蓝布衣服的农夫，他们仍深耕着他们的田地，努力不怠。日本人在这一带大规模的纵火焚烧，差不多经过一星期之久。村庄都成为可怜的焦土；以前奇怪拱形的桥，都变一团枯木，栏干向着天。日本人仍在灰烬中，搜索金钱与古玩。被征服务的中国群氓，搬走了最后一片的钢铁：锅釜、窗框、门轴、犁、车轴绞链、铁钉、螺旋钉——巨细不遗。田野中撒布着没有爆发的手榴弹、枪弹、炮弹，这些东西都逐渐被人收集起来。到处有着为高射炮弹击毁的钢盔，半浸没于最近所降的雨中，将那些戴钢盔的头颅，自然地埋在水中。武装的日本兵士，监视着一群中国人，命令他们掘去在战场上倒下的士兵，四周的残余尸体及泥土。

我看到一个年轻的兵士尸体上，找出了两张染着血的一元钞票，孙中山的两个头叠得很齐整地放在他的棉外套的袋中。

同志，不要忽略他的微笑的情人的照片，是在他一半已吃

掉的手旁。你拿走了，他决不放在心上，他已决不会啜泣，你可以用他的钱来糟塌他的爱情，这件事不会遭到死者的要求停止。他所要求的，只是把那腐黑烂熟的尸体清除掉，这尸体据说曾有一个妇人对他表示亲爱，他是急切要清除那从未好好地生活过而只消耗于死神面前的生活污点。不，不，不要沮丧，把一元钱退回他，那钱是救援你的母亲或你的少女的勇敢所获得的微薄酬报。把他的尸体衣服剥去呈露于雨中，他将如此感谢你，这样会加速他的骄傲消失在这美丽的无名土地上的美丽长眠中。

沿着这一带走过去。你可以看到到处有着紧握的拳头，或一条手臂，一条腿，一个被击碎脑盖和赶成的坟墓作抵抗。学解剖学的人，你也许会欣赏这种景象，这种为炸弹任意所造成的解剖，在那供给上海的蔬菜的公共汽车经过的大路上，行路的人看也不看地从一座堆着尸体四四方方的角堡的桥上走过去。藏有火药的手榴弹仍点缀着农夫所践踏的小径上。在那地方，你可以看到污泥中，有着一方识别的标志：用一件制服的一片代表着“张友民”，他的其余身体，早为那游荡那地方的，以充满着蛆的尸体为食料的贪食的狗所吞噬。

农夫挑着小袋的米，经过裂痕满地弯弯曲曲的田野，到上海来出售他们的生产品。有时，日本人叫他停下来，要求赋税，榨取几个铜子，或几个角子，或者解下一个老妇人的一只用得很旧的银镯。在公共租界的边境，他们付一元的“输出费”，以便他们的包裹能经过铁丝网。我们问那些农夫，他们来自多远，其中大部分人，都说来自五六里以外，虽则我们也曾遇到过几个走上两三天，带了值几元的谷类，冒着各种勒索的危险来到

上海出售。青年男子与青年妇女是没有的，只有年老的人与儿童。一个年长的人带了一个女孩与两个男孩，在另一条路上行走，据说是回到他的农村中去。他的房屋或他的所有物，已荡然无存。

他愉快地说：“还是有田，还是有泥。”

在战场中，少数几个农夫在他们自己田地上面建筑起来的芦席棚中发抖，深恐土地也被人携走。有几个农夫甚至在毁灭的土地上耕种，很小心地绕开那些尸体。我看到一家人环绕着烤火，靠近一堆黑色的灰烬，那一堆以前就是他们的草棚。他们眼睛红红地沉默地注视着那柔弱的火焰。艾黎拿出一些钱给那近边的小女孩，她难为情地加以接受，当我们问她是否怕时，她苦笑了一下，摇摇头说，“现在虽痛苦万分，但最后我们可获胜利。敌人要退回去，好日子就会到来。”她却以我们所不及料的精神说着。

艾黎这个人

工人是社会的健全的分子，与他们共命运乃是我们时代的真正冒险事业。

——艾黎

我第一次遇到艾黎博士，是远在内蒙古，那时是一九二九年的干燥的六月，虽则我从没有想到我有一天会写这些关于他的几节文章，我可知道他是一个有些异乎寻常的人。

我们是仅有派到张家口以西去的做“振灾专使”的外国人，那地方有三百万人，濒于饿死。除开我和中国政客所乘的专车

外，只有四等车和无顶铁棚车，塞满着农民与货物。在后者的车中，我很吃惊地看到一个欧洲人走出来吸一口空气，在火车站的月台走着，我走向他去，对艾黎作自我介绍。

他是在那些黑暗带病的群众当中，一个特别不调和的人物，他的太阳晒红的面孔，满带风尘，上面的头发乱蓬蓬地竖起。他仅是一个中等身材的人，但却有着庞大难看的手臂和腿。当他用着那庞大的两腿，按照他的特殊姿态立着，他看来好象植根于地上似的。他的大头，有着好象一座石头的大山雕刻出来的侧面，引起我的注意。

我推测他在那使人窒息的车中，也许困苦非凡，我提议他来和我们在一起。引起我的不快的是，那位政治家对这建议不赞成。若干英国人曾污辱那位可怜的人，他生存着好象专门从事报复似的。如果我那时更其了解艾黎的为人一些，我必更能知道他是一个随遇而安的人物。对于那一方面，他比我们，更其能做一个好的伴侣。

他笑着说，“没有关系”。“看那奇怪的地方”。他的目光注视着那广大的蒙古草原在眼中移转过去的优美风景。“它象我所来自的新西兰。”

这一件意外的小事有着象征的意味。艾黎从不引起人家的不安，或污辱触犯人家，也不对他的蔚蓝色眼中所看到的，远方人民看做奇迹的加以干涉。他能接受一切——任何大量中国所能呈现出来的东西。对于那些明白中国的人，中国有着一种高尚，不过有时是过分奇特的使人满意的制度。

我们在萨拉齐分手，我在太阳如焚的不毛之地作了一个短短的旅行，在那些地方，我第一次看到饿死的人。我不过只是一

个惊惧万分的观察家，而那位艾黎，那时已在上海工部局任职，却选了这地方，作为他的休假的对象。他在那地方过一个夏天，在传染着伤寒症的人民中间工作着，分配账粮给他们，看护他们的瘦弱的儿童，使他们恢复健康。

我眼中充满了这种景象，我回到北平为纽约《先驱论坛报》写了一篇通讯，一个纽约的小孩读了这篇通讯，从纽约寄来一元美金给我，救济饿民。据我所知，那是我的通讯所能做到的唯一好事。但艾黎却做着更多的事，而其结果，使他变成了更具人道的人，并且为他某一种人生目的的开始。

第二次我见到他时，他已做着—个孤儿的养父，那孤儿的父母在饥荒中已经死去。他替他的养子取名为艾兰，而将他送到上海一个基督教学校中去读书。

两年以后，艾黎由上海工部局资助，派到邢普森爵士那里去，帮助修筑长江大水后的堤防。我又再写了几篇通讯，而结果艾黎又领了一个灾况中的孤儿，作为艾兰的兄弟。他替他的第二个儿子取一个教名，叫做迈克尔。在工部局一群人当中，白人的大人先生与苦力同桌，认为乃匪夷所思的事，因此艾黎家族变为一种神话。因为在几年以内，那两个不识字的农民孩子，变为两个漂亮的青年，这是任何义父都可值得骄傲的事。在中学中，他们领导他们的同级同学读书游戏。最后，在圣约翰大学中，艾兰被选为级长。那是在中国对于一个来自不知名的农民家族的孤儿极光荣的事。

有着那高瞻远瞩的眼睛，他的带些红色的头发，他的英国人的鹰爪鼻，艾黎是一种纯粹洋鬼子的形相，足以使中国儿童吓得举止失措。可是他今天也许比之任何外国人都要受他们的

敬爱。即使在工业合作时代以前，他已帮助了好几百个从上海到蒙古的不幸的儿童。他自己的儿子，变为他解决中国青年问题及了解中国人情感的各项困难的手段。他曾经领养了他们，而他们也决定了中国现在也一定欢迎他们的。他和他们经过关山河川，走遍中国，和他们在一起学习言语写作。他深入中国农村及城市生活的中间，因此使他和环绕在他周围的人具有同样思想情感。

迈克尔与艾兰都怀着热心与很大的志向，而艾黎也鼓励他们对人类热烈的同情。当战争爆发时，艾兰正准备进医科学院。在中国放弃了大学教育，是一件牺牲很大的事，因为一万人当中只有一人可受大学教育。但这两个孩子，毫不踌躇，离开学校，到内地去参加志愿兵。艾黎请我赴他们饯别的小宴。象两个互相友爱的真正同胞兄弟一样，他们也是孝敬的儿子，但父亲却用着一切祝福，遣开他们。

可是没有人象艾黎那样痛恨战争。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他自己还在学校中，他随着他的几个兄长们的后面，一同加入了新西兰的军队中。他的长兄阵亡。艾黎自己两次受着毒瓦斯的伤害，可是他却继续胜利地作战下去，一直等到战争快要终了时，才受着重伤。他受过威尔士王子颁发的英勇奖章；但从大战中出来的他，失望到极点，深感战争的浪费与愚蠢。在那种心情下，他来到上海担任工厂检查员的工作。

不过艾黎并不是一个和平主义者，他深信应为某几种理想而作战。逐渐，自由中国的观念，把这几种理想合而为一。他认识了中国虽有时在黑暗中摸索，但却是一个很快地苏醒转来的民族，正走向自由解放的道路，如果能让其完成了它自己的

命运，对于世界却有某种极大的价值。由于他是一个极端实际的思想家，他把他的信念，建筑于儿童及担任着中国一切工作的平民身上——换句话说，就是那些很少外国人当他们为人类的农民与苦力身上。

在他自己的经验中，艾黎一再很明白地看到中国最贫苦儿童伟大的潜力。如果给他一半的机会，这些儿童的未来，他们在社会共同生活的权利，保持他们人类尊严的权利，以及他们反对任何方面奴役他们的必要条件，将变为这位极端仁慈的人的信条——为了这一信条，他愿意牺牲他自己及他儿子们的生命。

我认识艾黎，远在我知道他的精神力量与实际意识所产生的那种稀有的人格以前。他是一个一世纪前帮助人家居住于新西兰的爱尔兰人及英格兰人开拓者的子孙。他的两个叔祖在美国内战中，帮助北军作战；内中有一个，是内布拉斯加州林肯城的奠基者。艾兰的父亲，是一个享有不动产的农夫，又是一个小学校长，对于新西兰进步的社会立法，极有贡献。为服膺他的主张，他费去他最后一生的二十年，为改良教育及宣扬农业中“工厂农场”而奋斗。

为实施他所主张的理想，老艾黎把他自己的土地交付给他的儿子及其他青年们，在那里，他们消磨他们的休假，在一起学习工作。他不是一个人有国家偏见的人，他敬仰任何民族的勇敢与天才。因此他用那位著名的毛利人酋长黎威德门尼波托的名字来命名他的儿子，这位酋长，曾以类似中国今天所采用的游击战方法，来抵抗红衣军新西兰严酷的边区，造成了艾黎坚实的体格，正堪和他里面的精神匹敌。艾黎有一

次告诉我，“那是一个空旷艰苦的国家，有着吹过茂草而为犷悍的爱尔兰人生活在他们中间的卷地的冷风。一片金黄色的金雀光，无数的家兔，和湍急着的奥雷蒂河——在这地方，当我儿童时代，几丧失我的生命，不止一次。

他的父亲对于社会浪费及愚蠢，很易感气忿，他的爱尔兰血统的遗传，他的受野性未驯的国家的严格训练，在这个国家里面，人们必须互助，否则就必遭死亡——同时受着那个没有解决一些东西的战争经验的教训——这一切都有助于一个人适合于居住未来人类大同的世界。

这也是使艾黎在这次战争所付与他应尽的重大任务应具备的必要条件。

工业合作社的诞生

中国工业合作，代表人类的复兴，经济的进步与民主政治的教育。

——孙夫人

当他的孩子离开了以后，我时常与艾黎会晤，并且时常同他一同出去干他寂寞的任务。虽则日本人侵占了苏州河以北的租界，他们却允许艾黎和其他公务人员尽某些对于他们有利的义务。但他的关于他们恶劣行动的报告，日渐引起他们的敌视，于是对他发出不断的警告。日本浪人和雇用的流氓扩大他们的活动于苏州河以南，好多中国爱国志士被暗杀。投掷炸弹，变为家常便饭。刘湛恩博士不愿做日本傀儡，在离开我住的那楼面门口几码以外地方被暗杀。人头放在那些认为“不合作”的外

人住宅旁边，而报人与外国新闻记者也被投匿名信，以处死来恐吓。

我的妻子，生病恢复健康以后，从北平到上海来和我在一起，憎恨这令人气短的行为。

艾黎在一天工作完毕后，时常跑来，和我互相交换关于最近发生的暴行的新闻。那些消息总是非常可怕的：大概总是关于最近某报或某通信机关，从窗中吃了一个炸弹，或那一个曾发现某一人头在某人的门外。但我们更时常讨论到我们共同的某一信念：认为中国除非发现一个方法，动员劳力资源，以及为那种我们预先见到的而不久以后必普遍采用的流动战建立工业根据地，否则必然要失败的。

这样每天的讨论，使我们逐渐在心中形成了一个观念，这观念竟全变为中国战时工业民主化的基础。在尼姆^①习惯地聪明的思索下，有一天，我们的思想，突然奇葩怒放，想出了工业合作，可能在战争进行中，产生一种新社会。它们可以把迅速的建设，和生产的难民救济，劳工的训练与军事动员，民主政治的经济基础，保卫游击区的反抗封锁，与反抗日货经济侵略的方法，放在一起。

虽则我们对于中国政府是否会赞助这样含义广泛的计划，深致怀疑，但这是一个打开环绕我们四周的无法解救的沉闷的希望。我们有了这样的观点，心胸为之一畅。我们愈讨论这问题，我们愈相信它的有实施的价值。梁思成，一个在美国受过教育的工程师，参加了这思想的集团。梁介绍了那位温文尔雅

① 斯诺夫人笔名——译者

多才多艺，有着社会眼光的中国大人物之一，非凡的银行家徐新六一同到来，他变为一个热烈的赞助人。另一位早期的合作者，是英国领事馆服务的一分子，从他的口中，仅合作一字也引起宗教般的虔诚。

这一件事深获我们一致赞许的主要原因，似乎是在我们认为艾黎是唯一在中国可以产生必要的组织，以求其实现的人。因为艾黎信任这工作，我们知道这一定会成功。这工作吸引了他，他草成了对这运动的技术计划——因为他已当它是一种社会改善事业。我们发行了一本小书^①，这本书中主张在内地建设三万所小合作工业。这在一九三八年春天，造成了普遍的信任，不久以后，这书以好几种中英文版本发行。

同时，若干中外人士，也有着同样的见解。我们组成了一个中国工业合作委员会。徐新六当主席，他担任着这一职务一直到他乘中航机在广州附近被日人击落，用机枪扫射身死为止。

艾黎组织了一健全的技术组，其中包括两个那时与上海电力公司有关系的中国最良好的工程师，名叫林福裕(译音)与吴祖飞(译音)两人都是美国工程学校的毕业生。合作专家卢广绵，他曾在苏格兰受过教育，也是另一个早期的参加者。这些人今天都成为他们所产生的二千英里长的工业合作线当中占着技术与组织上的最重要的地位。

但工业合作究竟是什么东西呢？它的第一要件，是一个各项情形的历史的综合物。战争使中国重工业遭受了厄运，资本从

^① 《中国工业合作》出版于上海。

内地逃入租界，而运输的断绝，使新建设特别困难。但我们对于工业合作有信仰的，因为有三四个基本的条件对于它们有利。

第一件事，是日本军事线自动地封锁了广大的区域，外货不能深入到这些区域里面。这些地方，中国工业可以暂时绝对独占其国内的市场。第二，中国劳动力，因有着几百万难民在侵略的惨祸达到以前移入内地，实际上变为无限的源泉。第三，中国大部分的天然富源及原料，几年之内，不致被人征服。即使在沦陷的省份，也有广大的空隙，为中国游击队所控制。在铁路区与日军驻防区之间，自足的中国工业可以维持下去。

最后，中国政府把新工厂集中于西部少数几个城市的计划，会招致轰炸而被毁灭。当全国都在日机很易飞达的距离内，没有工厂可以永远不受危害。几千万这样半流动性的工业单位，建立于日本摩托化部队所不能达到的区域，小心地掩护起来，没有显著的大烟囱，也没有大厂房，可以为中国全面长期的抗战，获得一个工业的基础。

但这不但需要动员劳力；并且那项动员，得首先需要有一个进步的前途。劳工需要与独立战争发生利害关系，并使其具有牺牲的意义，及负有参加与负责的意识。战时工业中的工人，应使其坚决具有军队般的士气，及感觉为经济的民主制度奋斗的精神。

理想上，那需要一种机构，可以调和工人消费者及政府间的合作——那就是人民、行政当局、及作战军队间的机构。工业合作，遂变为解决这问题的工具。我们相信中国工人，从救济基金中予以必要的财政援助，予以利息低微的政府借款，防止

那种毁灭掉信用合作的腐化政治的管理，一定很快地可以适应这种紧急事态。中国工人，正如艾黎所说，完全能够经营他们的事业，并且一定很欢迎有取得自己工厂的机会，以便同时学习用民治的方法来经营。

一直到此为止，战争还没有为大众推进了一个有积极希望的口号。这地方有产生一个的可能——同时也是一个急切必要的。

工业合作原来的草案是把全国分为三大经济防卫区，或称工业线。前线的单位，应该便于流动，甚至便于移走，并且能够在日军后方利用水力或人力，便于经营，在开始的时候，利用着自焦土下的城市所抢出来的轻便机器与工具开工。这些单位需要军队的全部维护，并获得有训练，有组织的民众，当这些工业是他们经济生命线的共同合作。

第二线包括广大的前线与后方的中间区。在这些地方应该建造一些分量较重的工业，惟在形式上仍须具有半流动性的，在紧急事态到来了须依赖它们自己的运输合作机构，撤退至安全地带。看来中国最后，必完全被封锁，因此中国不独应该必须发展工业的自给自足，并且须发展一种适合于她抗战的特别形式的运输制度，我们主张组织规模庞大的运输合作社——包括骆驼、大车、骡子、马、以及人力负载。第二线的运输与工业两项可以这样变为适合于游击的条件，一旦当战争到达了这些地带以后。

第三线或后方区的工业合作，是设于西北西南及东南在初期可不受日人侵犯的各省内。在这些地方，矿业应加开采，以及为所有三个地区制造机器。在这一带，在中央总部指导之

下，要尽贩卖分配之责，要设立训练学校、合作医院、退伍军人、及战士遗族的职业的中心区、病院、育儿院以及其他艾黎所梦想的社会副产物。

由于事实证明，那些草案完全可以实施，虽则开始的时候在汉口并没有引起深刻的注意。怀疑论者，以及失败主义者叫它为杂凑的理想。那些老中国的外人，仍在那儿悠闲地嚼舌。

“这计划是难于成功的，因为有家族制度的存在；中国人的个人主义倾向太厉害”。

“苦力太没有知识，不会经营工厂；他们一有机会，就要携走工具及借款。”

“难民不愿做工，难道你不晓得那件事么？他们宁愿在难民收容所中领取不要钱的米粮。”

如果这事不为英大使卡尔热烈赞助，没有艾黎参加在内，工业合作计划听从了其他外行人的劝告，也许要寿终正寝。卡尔爵士在英国外交家的阵营中是一位崭新的人物。他最近刚来到中国代替那位被日本人用机枪扫射受伤而退休的休格森爵士，这一袭击，日本人现在也许深觉懊悔，因卡尔证明是一个坚决反对绥靖的人。从他来到后一天起，卡尔爵士对于中国抗战，即予以广泛热烈的同情。虽则显然他不大获得张伯伦政府的赞助，这一政府中的人物，把希望放在东京的克雷吉爵士身上，可是他以其个人的立场，没有放弃任何他所能做到的机会，使英国坚守“扩大对华援助”的诺言。

也就是卡尔爵士，他以个人的资格，把工业合作的计划，送呈给蒋介石、蒋夫人、及行政院长孔祥熙博士。中国政府在那时的态度是这样的，虽则工业合作或许并不专为反映国内需

要而推进，但这三巨头当英大使敦促的时候，愿意来试一试让其产生。蒋介石的忠实的能干的心腹端纳也看到工业合作的重要，热烈加以赞助。在七月中，卡尔爵士受中国政府的请求，把艾黎从上海工部局方面解聘请到汉口，介绍给蒋介石和夫人。

到了今天，关于工业合作的中英文文献，日渐加多，工业合作，对于好多人，是认为战争所产生的最有希望及最有建设性的成果。以怎样艰苦的奋斗与冒生命的危险，造成中国的一些进步，已由艾黎的被委托参加那些努力以求实现他的新“生产互助”计划，在我们一些人的前面表现得很清楚。这事也许可经为我们时代人类最大冒险事业之一。以往劳伦斯带给阿拉伯人的是一种破坏性的游击战技术，而艾黎带给中国人的，却是有建设性的游击工业技术。

当孙夫人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她笑着说：“艾黎又领养了另一孤儿。”但她对这一运动，从其一开始，就予以热烈爱好的援助，并且征求到她的兄弟宋子文的援助。孙夫人凭借了她的聪明的智慧及无误的直觉，看到工业合作可以补充国父孙中山三民主义中最重要及最被忽略的部分。

她说：“这就是他所说的民生的意义，但使其成功，它必须是一个受生产者管理的真正民众运动。”

在最初的酝酿中，我参加了一部分，我深觉我象电机轮及难民其中的一个中间物。但《每日先驱报》不久就召我去担任采访战事的任务。那年六月，我再到内地去，到达了被围中的汉口。

第三篇 南部前线

政治一瞥

——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孟子

武汉是个双生的城市，位于长江上游，距离上海约六百英里。这地方是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分裂的舞台，又是中国战时的第二首都，但它不是马德里。

我到武汉的时候，正在它失陷之前三个月，当时公正的政治预测，都已假定，这地方是业已失陷了。英国大使卡尔有一天对我说：“要是我们能够使这些人不再说‘当武汉失陷’，而改说‘如武汉失陷’，那将有很大的好处。这儿所需要的，正是那种‘不许通过’！^①的精神。”

^① 西班牙内战时政府军的口号——译者

幸运得很，我竟能住在海军青年会秘书那间小小的楼房里，这房子一向是汉口许多外籍记者聚集的地方。不久之后，路易·艾黎应蒋介石的邀请，到武汉来，着手搜集机械，以建设一新的工业。他搬来和我同住，每天清早，天刚透亮，一个报童的尖锐的叫声，就把我们喊醒了：

“武汉日报！武汉日报！”

我们很喜欢这个小孩。在他那清晰的尖声中，蕴含着一种勇敢的挑战，似乎在召唤这古城里的每一个人，能够及时醒来。艾黎说，这叫喊声是新年的钟声，使他的希望复活。

但是在“武汉日报”的喊声过后一两个钟头，时常又传来一阵微弱的叫唤，这叫唤者的声音，似乎与汉口的真实情形更加吻合。我们始终不明白他叫唤的是什么，不过谁都会觉得他是在说“我的爸爸和妈妈已经死了！我的爸爸和妈妈已经死了！”二千年来的宿命论与惰性，都已明显地包含在这哀乞一样的调子里。

“那是没有用的，那是没有用的，”他似乎在这样说。

这就是武汉。在这里，青年、勇气、毅力与自信正不断地受到恐怖的压制，而统治阶级的内部的疑惑，又迫使他们拼命去寻找妥协，以支持他们的政权。

世上从没有一个战争，象这次东亚之战一样的充满着荒谬的矛盾。因为是一个争取独立的半殖民地的国家，中国就象一面镜子，反映着各国的贪婪、伪善、和矛盾的外交政策所不能免的国际无政府状态。因为是一个半封建的国家，虽然它亟欲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国度，可又不断否定它本身的目的。

比方，拿德国的对华政策来说。一九三七年，德国的势力支

配了整个的中国陆军，在工业、贸易、政治和文化方面的影响也渐形显著。德国对华的贸易，只次于美国和大不列颠联合帝国，而且比德国对日的贸易来得大，获利也来得多。一九三七年中国开始实施的建设计划，其中德国所占部分，比其他各国都来得大。在中国军官层中希特勒所采用的方法，业已发生深刻的印象。国内某些组织，也仿效纳粹的模样。蒋委员长本人对希特勒非常仰慕，大有英雄互相爱怜之意。然而希特勒的签订反共协定——作为一种威胁，以拒阻苏联的干涉——终鼓励了日本扩大其殖民地的掠夺，造成了征服全中国的战争。

战事爆发后几个星期，德国商人过去二十年辛苦经营得来的收获，已大半为战争所消灭，而当日本设立贸易与资源的独占政策之后，他们为中国政府承办的业务，又丧失了数百万元。因此，德国商人十之九反对希特勒的远东政策。

但有一种贸易却在不断的增加，中国从德国方面购得的军火，占全部输入军火的一半以上。德国军事顾问也继续在华服务。甚至在希特勒公开发表辱华演说之后，蒋委员长与德国顾问仍保持密切接触，政府中某些官员对纳粹的崇拜也依然如旧。只有在日本以盟友资格施行压力之后，希特勒最后终于在日军进攻汉口最危急的时期，命令全部军事代表团撤回回国。这七个德国顾问虽与蒋委员长订有契约，但全体于一九三八年六月弃他而行，其中且有一个是犹太人，当他回国之后，希特勒立刻把他关在集中营里，以作为他服从命令的酬报。

英国的政策也非常动摇不定。就表面而言，伦敦始终追随史汀生主义，拒不承认日方以武力改变的现状，同时又赞助国联决议，答应不做任何足以削弱中国或增加其困难的行动，并且

以信用借款贷与中国。英国在华投资，总额逾十二亿五千万美元，但在日本侵华战争中，这巨额投资的价值已失去一半。然而英国商人依然每年由日本输入价值千百万镑的货物，使日本获得外汇，用以购买更多军火，来毁灭更多的人命与财产，攫夺更多的英国贸易，侮辱更多的英国侨民，并破坏英国平准金所支持的中国货币。

美国又怎样呢？新政官员与国会议员时时斥责日本，差不多每个美国人民都希望中国得到胜利，报界也共同痛责日本的不义。但日本却从美国得到大批的飞机用汽油，其份量占其全部输入的十分之九，美国还供给她巨量的铜、废铁、钢、以及占全部输入百分之八十二的合金。在一九三八年，日本由美国输入的飞机与零件占全数百分之七十六，此外，我们还把各项最新式的武器的图样与计划卖给日本，并且派送有经验的技术专家连同专门机械，以指导日本如何去制造此类新式军火。我们的商人把整个的飞机工厂与汽车工厂原样不动的移到日本。同时，我们又是日货最大的购主。因此使日本得到了购买更多军火所必需的外汇。

美国一面斥责日本是盗匪，一面却又不断武装这些盗匪，直到这次欧战爆发之前，美国商人供给日本的军需原料，占其全部输入的百分之八十。当中日战事刚发动的时候，美国曾颁布一道愚蠢的法令，禁止一切美国船只运载军火至战国。交战国必须自购自运，日本是拥有充分的商船队的，而且当时她不仅占夺了中国全部的海运业，而且封锁了全部的海岸线。因此，这一法令无异阻拒中国获得她所能向美国购得的少量军火。此外，我国在华商人的活动，自日军占领了沿海区域之后，大部

分仅是有利于日本，因为后者实际上已控制了整个的经济。我们一向斥责日本破坏条约，但我们对这侵略者的支助，至少要比我们给予中国的“援助”大过十五倍至二十倍。

我们某些糊涂的孤立派的议员，似乎真的以为，这种帮助日本的举动，就等于那种神秘莫测的“中立”。当人们提到我们不应再武装侵略者，或者更易明白地，主张不应以军火供给交战国双方的时候，这些绅士们又说这是拉着美国去参加战争。自然，如果我们禁止那些对征服战争是那么重要的输出品，至少有一小部分美国商人，每年要丧失三千万至四千万美元的纯利，然而这数目，至多只等于美国目下正在建造的超级主力舰的造费的三分之一而已。难道是等我们把充分的武装供给日本之后，再和她开战吗？

给予日本以喜剧式的慰藉的，是意大利。意国在中日战争中并无何种损失，只失去中国的善意而已。但它却从日本方面得到很好的代价，一方面它获得了外交上暧昧的协助，另一方面，意国人民又得到了反共盟友的特殊的待遇。事实上意国给予日本的帮助，要比英美小得多。有一个半醉的日本军官，在上海某次宴会散席时，曾对一个意国官员说：“意大利，日本，是好朋友。意国人是最后被日本逐出中国的人。”这故事也许是伪造的，但它实质上是正确的，这一点，再没有人比意大利人知道得更清楚。因此，他们尽快的出卖双方，以赚到一些现钱。

意大利人利用他们在日占领区的特殊地位，接管中国财产，在上面悬挂意国之旗，然后从华人方面索取该财产的一半价值，以作为“保存”该财产的酬报。他们以同样方法接管中国人的轮

船，装载一些有毛病的枪炮与军火穿过日封锁线，沿中国海岸开进华军的驻区，有时又把上海的重庆人员出卖给日本人，以领取一些赏金。自然不是所有的意国人都是如此，我只是把某一个著名的黑衫队员告诉我的话记录下来而已。

唯一执行坚决的政策的国家，乃是苏联，这是必须承认的。一九三〇年，日本由苏联输入的物品，约值四千万日圆，依据经济专家斯泰恩的估计^①约等于日本当时由泰国、越南、英属婆罗洲与菲律宾输入品的总值。但到了一九三二年即日本侵占满洲之后，这贸易突然停顿，而且从未恢复，而在现行战争中，苏日贸易总额仍不及美日贸易总额的千分之一。^②日本除开从库页岛得到一点点油的供给外(这是日本战胜沙俄之后获得的)，她始终无法从苏联得到可以帮助她进行侵略的物资。

同时，苏联又是各列强中，唯一认真执行国联决议的国家，自一九三七年国联大会斥责日本违反盟约之后，苏联便以极多的飞机、航空员以及军火供给中国。苏联反与中国订立互不侵犯条约，如果其他列强竞相效尤，那么，这条约已给远东的反侵略前线奠下一个以保存中国独立为中立的国际反侵略阵线。

就中国国内情形而言，它显然陷在它自身的种种矛盾之间，而这些矛盾，似乎只有在日本侵略的不断的压迫与推动之下，方才能够解决。政府摇摆于独裁与民主之间，因此很难决定它的外交政策。在中国政府许多极高级的领袖人物之间，他们认为中国是受骗的，完全为着美法英与苏联等国而战的。行政院长本人曾告诉我说，墨索里尼警告各小国慎防民主国家的话是很对

① 见香港China Air Mail第十九期。

② 一九三九年贸易额不及二百万美元，见上引书。

的，他们使得弱国倚赖他们的援助之后就叉起手来，熟视无睹，“我们认清了，我们全是些傻子，”行政院长这样说。但中国的统治者在与列强来往时，又自以为他们是民主国家，但对内的统治却依然是独裁的。

谁都感觉到，在官僚军队与民众之间，正隔着极大的鸿沟。在这个全国经济的中心区，始终不曾训练和动员千百万的农民与工人，每一个人暗中都恐惧地感到一九二七年的往事——这是国民党时刻不忘的——确有重演的可能，如果民众真的以民主方法组织起来的话。

各城市内部的工人，正如城外的农民一样，都一样得不到组织的权利，因此有许多人到现在还不明白这战争的性质，整个农村都没有动员，士兵与民众的关系总是十分恶劣。撤退熟练工人与工具的工作，简直没有进行，约有四十万吨的机械，被遗弃在长江下游各城市里。单举如下一例来说，中国最大的产铁中心大冶，在失陷之前六个月，当地积有铣铁约达五十万吨，但当局从未把它移至内地，后来却反而大闹铁荒。如果当地工人动员起来，这批铣铁即使无法移至内地，那么万不得已时，也可以把它掉在河里，然而日本人却原封不动的接收了它。

千万轻伤的人，为着回后方医治，备受辛苦大多死于半途，否则即因无法追随退却大军，而为日军所屠杀。政府从未组织农民作为担架夫，也未曾教授他们以急救的技术，否则必定有许多轻伤的人能够活命。在农村里组织民主的人民自卫团，可以使日方巩固后方的工作，遇到极大障碍，同时，正在进行民族革命战争的政府，也不至象现在这样遭遇极大的困难。

所谓“赤色的汉口”，自然是无稽之谈，但谁都能够看出，要

求改革的暗流正很湍急，而且时常有波纹现到水面来。行动的自由是没有的，说话倒比从前来得自由些。知识分子可以相互闲谈，甚至可以任意批评，只要他们没有组织别人的企图。

政府本身仍然是在一党独裁之下，而以蒋介石巧妙地保持党内的，和国民党与其他各党派之间的平衡。说也奇怪，国民党仍然是唯一合法的政党，虽然它与其他各党派组成了抗日的联盟，虽然共产党的存在实际上已为所有的人所公认，但没有一个共产党员在政府中占有一席重要的位置。国民党为着对抗共产党在民众间的影响，又鼓励向来备受压迫的某些政治派别再度出面进行宣传工作。因此而复活的计有社会民主党、青年党，和国家社会党。这是国民参政会创立的先声，目的在阻止中国走向民主的道路。

这里不妨说一说那些小党派。他们所有的党员，大约总计不会超过二千人，虽然他们的领袖说的数目比这来得大。就他们的纲领说来，全都大同小异，一致主张在战后实行平均地权，政治的民主化，以及“终极的社会主义”。在谈话的时候，他们的目标和共产党的简直无甚分别，不过实际上他们都不是“斗争的”政党，而且与民众毫无联系，因为他们都没有武力，因此也就只有忍受那拥有武力的国民党独裁的压迫。

此外还有一个第三党，它创立于一九二七年国共第一次分裂的时候。正如它的名字所暗示的一样，第三党一开头就取着妥协的纲领，他们强调民族利益高于阶级利益与政党的政策。维持统一战线是它的不变的主张，但它的得力党魁邓演达（黄埔毕业生，前陆军政治部的部长，与目前陈诚将军的职位相等，）却为蒋介石的党徒所暗杀，自邓被害之后，第三党遂趋消沉，只有

在给闽变提供理论背景时曾有短期的活跃，一直到抗战爆发，国民党才请他们回到汉口。

这四个派别可看作是国民党内部的少数派，每一派都有它自己的主张，但全都缺乏强有力的民众基础。这些“政党”在汉口并无合法的地位，但他们可以经由他们在国民参政会中的代表发表他们的意见。

还有别的许多集团，包括救国会与东北协会，都容许参加国民参政会，但大部分的代表还是依据地域选出的。国民党也容许共产党有七个代表参加，这数目跟其他各小党所得到的相等。国民参政会的二百个会员，完全为国民党所挑选，为着防范未然，他们又委派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七十个委员为会员。至于工、农、兵、学生不但不能选出代表，甚至连被派定的席位也没有。因此国民参政会的一切决定，决不会有不利于国民党的可能。没有一个人当真把国民参政会看作是一个民主的组织，大概只有共产党才竭力去使它成为一个堂皇的民意机关。不幸，这组织毫无控制政府与官僚的权限，因此它的一切活动都归徒然。

然而，这组织虽然是一种滑稽的东西，但它是国民党所赏赐的最民主的一种代表会议。有许多人相信它“大概可以做出一点什么来”。不错，有点出人意料之外，这会议的主席本人当真做出了一点事情来。汪精卫之出任国民参政会主席，不能归咎国参会本身，他是国民党所委派的，而且他还被举为国民党的副总裁呢，在国参会开会的时候，汪精卫希望大会会支持他撤换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而由他本人继任。但孔祥熙是蒋介石的连襟。汪的党徒曾弄到一百人在他们那张弹劾孔祥

熙的提议上签名，但这计划没有成功，蒋介石本人却以及时的警告打消这个运动，使之无法提出通过。

在一个人民的政治意见被压抑而无由表达的政府之中，那些最恶毒的人民公敌，便有着充分的机会，为其私人的权位与利位，而非常公开地积极地进行其叛卖国家的工作。上面的事情就是一个例子，这是极值得注意的。中国统治阶级内部的主和分子，其数量之众，比外间知道的还要多，他们与日本在各方面保持密切的联络，也是周知的事情，（意大利的领事馆就是他们与日本沟通消息的媒介）。这日趋成熟的政治危机，充分表明了一个积极的有组织的对抗在朝党的反对派，在严重困难期间，确有着极大的价值，虽然他们被剥夺了参加政府内部的权利。在汉口时，如果国民党跟着汪精卫跑，它便有被左翼消灭的可能，这种威胁使国民党不得不调和那些互相冲突的阶级利益，结果终于推翻了汪的对日妥协的建议。

自然，在国民参政会这政治骗局后面，中国的基本矛盾依然存在。这就是国民党与共产党的争夺领导权。统一战线显然是一种脆弱的办法，如果它的基础——武装抗战——终于破裂的话，它要团结全国就不可能，国民党不承认共产党是一个对等的政党。它的几个代表备受监视，既不许他们召开民众大会，又不许他们组织任何部分的民众。共产党忍受所有这些压迫。但所有这些并不能掩盖如下这一事实——随着战事的进展，国内政治的与军事的力量的比重，业已迅速改变，万一国民党全部对日投降，共产党已可以取得民族的领导权了。

这两个政党的裂痕仍然十分深刻。例如，国民党始终坚持土地政策与一党独裁，在对日作战时，不准不应改变，反而应

当加强，共产党的主张却与此相反，他们认为抗日武装斗争，只有与政治上和经济上实行民主的改革同时进行，方才能够得到胜利。在华北共产党军队占领的地方，他们实行了若干变革，这些使国民党大为震惊。

虽然共产党业已放弃没收土地的政策，作为统一战线的条件之一，他们现在还是努力组织地方政府，这些地方政府默许把汉奸的和在逃亡地主的土地分给无地的贫农，并充分利用一切的休耕地与荒地。富农丝毫不受干涉，不过纳税比较贫农稍高。总之，在共产党军队开到的地方，贫农与中农都得到好处，因此，大部分的民众都热烈支持战争。在这种经济变革的基础之上(这一点在西北一章中另有详细说明)共产党便以新的、温和的革命方式，在军事上和政治上组织人民以从事全民抗战。

虽然这些发展，主要仅限于日军所占领的内地，而且当地国民党的政权业已大半败溃，但国民党对这些的痛恨，还是不言而喻的。国民党本身是代表豪绅与地主的利益的，它自然认为这些改变土地制度的行动是非法的，而且决不愿在其他区域再作类似的让步。国民党领袖，甚至不管这些变革是为着制胜民族敌人，仍然一味痛恨，并且不愿给游击区以微小的接济。最后，国民党还拟好向共产党“收复”失地的计划，这就是说收回那些共产党早已从日军手里夺回的地方。这一计划的实行，使新的内战随时都有爆发的可能。

在这种情形下，蒋介石这一人物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蒋本人一向是以保持国内势力均衡的重责自负的。因此，如果我们对蒋的认识能够更加明白的话，我们对战时政策的复杂性，也许可以更加清楚一点。

蒋 介 石

在侵略者尚未遭到最后失败之前，抗战决不中止。

——蒋介石

我想，我们在过了每个安息年^①之后，全都应该重新检验一次，因为据说人体的细胞，每过了七年，就要经过一番澈底的变化。究竟战争给予人类生理上的震动与精神上的苦恼，是否加速了这种变化的进行呢？这样的讨论我还没有见到过，不过人们在经受了仅只一次的轰炸之后，他所发生的变化，有时倒比有生以来的变化还要厉害得多。马克思曾在什么地方说过，在大动乱的时候，“也许一天就发生了亘二十年的重大事件”，目下我们许多人就正生活在这样的时代中。如果我们说时间与炸弹没有使蒋介石改变了的话，那是不可想象的。

当我和蒋介石握手的时候，他用着他那惯常的喉音和我说话。我想我当时看见他那薄嘴唇上掠过一丝笑纹，但立刻就消失了。许多人说蒋在战事发作后老了许多。在我看来，他似乎还是那个灵活而纤弱的身躯，还是那双聪敏的眼睛向人注视。我觉得他的生活比较不算紧张，他似乎正享受着内心的悠闲与更大的自信。当我问他一个关于未来的问题：即假如汉口失陷了怎样，他的回答是这样的：

“我到的地方，就是政府与院部的所在与抗战的中心。战争的结果决定于领袖如何指挥民众抗战，而非决定于两三城市的

^① 犹太人以每第七年为安息年——译者

得失。”

显然，他那种自诩为救世主的抱负，或是他的自尊心，抑或是使他说出这样的话的别的什么，的确是很牢固的。他这样说，不是在吹牛皮，而只是在陈述他的福音。看样子，他似乎真的相信，不管日军如何蹂躏中国，除非他们能在精神上、肉体上或政治上，保护了蒋介石，否则他们就别想征服中国。

蒋介石本人决定政府重要官员的人选，又是陆军、空军以及残余的海军的总司令，国防委员会的主席，以及国民党的总裁。没有一个日本人在军事上和政治上能有他这样的权力。当他后来继孔祥熙为行政院长，继汪精卫为国民参政会的主席，又接任政府联合银行“四行”的总裁与四川省政府的主席之后，要分别军人的蒋与银行家、政客、官吏、政治家与官僚的蒋是十分困难的。人们也许要说，在一个拥有四万万人口的国家里，那个委他自己担任这么多职位的人，如果不是一个天才，就是一个妄大狂者。但蒋与这两者都不象。跟中国一样，他一身集合着许许多多的矛盾，其中有好些也许将在战争中得到解决。要了解所有这些，只有从整个的历史背景上入手。

蒋本人拥有如下许多特性：顽强、坚决、无情、奋发、野心、机动和热爱权力。诸如此类的特性，他比任何人种的普通人都包含得多，而这些也正指明了他的个性与领导的特点。他不是知识分子，但他是一个力行的人；当别的人还正思索的时候，蒋已依照他的本能行动起来了。他承认他是一个实验家。

“不行不能致知”，他曾经这样写；又说“唯一的失败是在不能行”。在蒋的全部政治理论中，这大概是最革命的观念了。

他之所以有今日的成就，可说也完全得力于这一点。在中国任何决定，不管是好是坏，如果它能迅速加以执行，那么它十九是可以得到胜利的。

蒋这种个性的形成，主要是由于他崇拜古代的英雄。他比普通的中国人更重视精神的价值；他所实行的改革，差不多都偏于精神的改造，而忽略物质的条件。例如他多年来推行新生活运动，企图以这一运动来感化那些被他俘虏的赤色农民，但他并没有改善他们的基本生活条件，一味把孔夫子的旧道德——礼、义、廉、耻——训导他们。如果蒋本人曾考察一下这些改革的成绩的话，他也许不会象今日这样子，然而他的主张还是始终未受影响。

他曾引用过孔夫子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他这两句话，把他所想的“廉”字一字的意义完全描划了出来。另一桩他十分重视的事情，是“义”，所谓“义”，就是“上下有别”。^①

蒋相信精神的力量能够克服一切的障碍。当他在西安被捕时，他“决以正气与精神的力量与之（指当时商议将他交付人民审判的人们）斗争”。接着，他又在他的日记里——这日记实际上恐怕是在他获释之后写成的，但无论如何，值得重视——提到他备受“古来忠烈”“总理之大无畏精神”，耶稣殉难之精神，以及“慈母之教”等的激励，所以他说：“景行既夙，应求无愧。”

这位“精神家”之所以不因战场的失败而气馁，显然得力于这种对正气的信仰。当我问他，究竟他根据何种理由，认为中国可以获胜的时候，他泰然自得地对我说：“日本已经遭受了精

^① 见董显光作《蒋介石传》英文本，一九三七年上海版六三七页。

神上的失败。军事行动没有必要的精神的基础，便不能成功。因为日本的精神观念是不正的，所以日本不能获胜。”请想象任何一个欧洲独裁者嘴里说出这样的话来！

但是蒋介石却喜以世上唯一的裁判者自居，由他决定何者为善，何者为恶，而他本人总是在“善”方面，别的人却总是在“恶”方面。反对蒋的人，如果不经过“认罪与悔悟”，蒋是决不与他和解的。张学良因为从未“认罪”，因此他仍然是一个囚徒。蒋喜欢把每一个不满他的人，看作不忠于国家的汉奸，而不把他看做是政治上的反对派。事实上，这是蒋本人最严重的弱点之一，而某一些阿谀他的人，也正竭力利用他这个弱点。

中国历代君王，除开那些伟大的历史领袖而外，差不多都因为他们一味听从周围那些“是是”的人的谗言，而终于失败，这是中外如出一辙的，如果蒋本人疏于防范，那么他也不免要步人后尘，成为那毁灭所有君王的谄媚的俘虏。在他周围的某一些“宦官”，都是些精于吹嘘奉承的专家。例如，他们之间有一个最得意的狡计，那就是他们打听了蒋喜欢读的是那些书（大半都是古旧著作）之后，就囫圇吞枣的读完它，在下次拜见蒋时，把书里面的意思和字眼说出来。

蒋本人必须经常了解他本人的真正实力，这是十分重要的。因为不管他的头衔如何惊人，他并不是以简单的命令行施其统治权力，而是运用着巧妙的以此制彼的权力来行施职权的。他对于政治局势，有一种可说是心灵的感觉，而就他本人的历史背景看来，他是一个虚空而不着边际的政治家。他以其精神上的确认，把各政治派别的忠诚，集中在他一己身上。中国人特别擅长的运用以此制彼，使自己敌人同归于尽的权术，蒋本人

对此是非常娴熟的。

蒋介石不是一个欧洲式的独裁者。论起他的实权，他也没有被人民推选的领袖——如罗斯福总统与英国的首相——那样的大。他今日所享的伟大，仅只是各种力量的综合的象征，设若他一朝死去，这些势力还一样没有基本的改变。那些说蒋是“中国的统一者”的人，未免把非常复杂的实际情势，估计得过于简单，他们把集团的推动（指对中国的统一的推动）与一个人的人格视为一物。

这种观察决不会减弱蒋个人的影响与他的统治地位，只是说明了他的某种局限而已，至于蒋本人的成就以及他的坚决抗战，倒并不因这而有所变更。现在蒋是全国公认的领袖，也只有在他继续成为中国统一的民族抗战的象征时才如此，如果他有一天背叛了这种付托，他的权威马上就会失落。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历年的重大事件，已使他今日居于如此重要的地位，以致能以不幸方法破坏中国的统一的只有他一人。同样，他对于抗战的坚定，也表示了中国为独立而作的战斗的尊严。

我们还不知道，历史对我们当代的人物，将作何种品评，我们也不知道，它将怎样去调解蒋介石领导中的许多矛盾。要判断一个人，只能从他本国整个的环境入手。英雄本非天生，而是由历史最深刻最微妙的配合所造成。中国有比蒋更好的思想家、组织家与军人，但如果他们走在他们所生活的社会的前头，那么谁能认识他们的真正的天才呢？然而应指出的，是中国的环境乃在不断变革中。

现在如果我们更仔细地去考察蒋介石本人，也许我们可以用他作为战时中国的政治气温的温度计。

争 讼 的 遗 产

什么是民生主义呢？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也是社会主义。……不过中国不需要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专政。——孙中山

蒋介石的少年时代与中国国父孙中山的完全不同。孙中山是一个非常贫穷的孩子，他到十六岁的时候，还没有过一双鞋子，蒋却是一个中等商人与地主的儿子，一八八七年生于溪口。溪口是宁波的一个小乡村，而宁波则是中国最老的通商口岸。

蒋的父亲在他九岁的时候就死了，以后教育他的是他的母亲，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他非常敬服他的母亲，时时表现出对她的恩感。虽然自他与宋美龄结婚以后，他已成为一个美以美教会的信徒，但他的论理观念依然是半封建的孔教主义者。

蒋显然很早就想做军人，但到了二十岁方才进保定军校。他在那里只念了几个月，接着改进日本的士官学校。一九〇九年就在该校毕业。毕业后他又在日本的第十三野炮队勤务。这两次合计起来，一总只有三年。在日本的时候，他遇到中山先生，并加入国民党，回国的時候恰巧是满清政府被推翻，自此之后，他便同中山先生一道工作，企图在地方军阀中活动并推倒他们，但没有成功。因为一再失败，他显然很不高兴，终于在一九一七年退出政界，到上海从商。不过当国民党找到一个强大的盟国——苏维埃俄罗斯——之后，他又加入政界了。

他曾奉中山先生之命到过苏俄，回国之后便被委为黄埔军校校长。他在苏俄的时候，见过托洛茨基，但没有见过斯大林，

他对加伦将军有着很好的印象，后来加伦也作了国民党的苏俄首席军事顾问。当他由苏俄回到广州的时候，国民党军人中曾见过红军和对它的组织，做过短时的研究的，只有他一个，因此他自然做了黄埔的校长。这学校原是仿效苏俄的红军大学而开办的。蒋介石本来碌碌不足道，自此之后，（即他三十五岁的时候），他在国民党中，就开始飞黄腾达起来。他做了国民革命军的总指挥，这军队最后终于控制了华南的大部分。接着到了一九二七年，发生了“清党”事件，关于此后十年间的阶级战争的情形，已有许多著作述及，这里只想约略说明蒋在这十年内战中所扮演的角色。

社会的和经济的事实，不用说是这冲突的基本原因，但也表现在对同一主义的两种解释上面，因为两方面都在争夺革命的领导权。孙中山先生这遗产，是有点暧昧不明的。中山先生关于实现三民主义的方法，似乎自相矛盾。在某些地方，他肯定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是同一种东西，但在别的地方，他又不满足于马克思主义。这是国民党内部的矛盾所使然的。实际上，中山先生关于三民主义的演讲，都是临时发表的，这演讲与其说是拟定未来的严密的政纲，勿如说是在调解党内的矛盾。国民党是一个包括富者与贫者的政党，中山先生既是这政党的领袖，他又无时不想保持党内的和谐，因为国民党的分裂，已使他的计划一再遭遇失败。此外，中山先生又是一个力求进步的人。

中山先生本人的基本的同情，是从未改变的，他没有一个时候不与被压迫的下层阶级站在一道，他认为革命主要是解放他们。孙夫人宋庆龄曾这样说：“他所计划的一切，在他看来，

都是改善大众生活的手段。解放了的工人与农民，就是他所说的建造新的自由中国的柱石。他清切地承认，这两个阶级是中国推翻帝国主义时完成国家统一的基本力量。”^①由于孙夫人对中山先生的无限景仰，这解释的圆满与忠实，是谁也不能否认的。

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在他临死之前不久，起了非常深刻的变化。在他中年的时候，他还是相信中国可以借一种国际计划，以取得英美的援助，用他们的资本来发展中国，使之成为各国的市场。他充分准备信托英美，以它们的援助来渡过中国的过渡时期，在这一时期中，中国国民党就在英美等的“保护”之下统治中国，中国也仍然是欧美资本的半殖民地。在上次大战之前，他曾经不断依照此项计划，向英美法德等国呼吁援助。最后，他还以具体计划，向凡尔赛和会提出，请求各国，在安定远东和平与发展巨大市场，使各国均获其利的基础之上，共同发展中国。

中山先生当时的思想，似乎很受英国著名经济学家霍布森的影响。霍布森氏在他的《帝国主义》一书中，曾说：“如果西欧数国的资本家能作聪明的合作，不再互相残杀以争夺各别的掠夺区域，他们就可以在亚洲组成一个联合的国际企业，这计划也许可以使整个西欧资本主义，得到另一个活动的而且获利的世代。”^②

然而欧洲伟大的政治家，似乎没有一个与霍布森具有同

^① 见宋庆龄：《中国不可征服》一九三七年上海版，这里值得一记的，是孙夫人与我谈话时，曾斥责莫里斯·威廉（一个归化美国的俄国人）的谬说，因为他曾说过中山先生是一个“反共份子”，恰恰相反，据孙夫人说，一直到他死时中山先生始终把共产党员当作最可靠的盟友。

^② 见J·A·霍布森：《帝国主义》第二十页。

感，也许，他们中大多数的人还没有听到霍氏的主张。中山先生的国际合作开发中国的提议，除被斥拒外，没有得到何种回答。在凡尔赛和会上，那些伟大的和平制造家没有阅读他的计划，看样子，戴丝帽子的外交家们，都把中山先生看作一个无害的狂人，世界列强都不喜欢有一个民主的新中国。他们仍然专心一意地去分割世界，使目下的“世界事件”——日本也许会这样称呼它——终于无法避免。

只有到这时候，中山先生才认清了中国只有依赖他自己的资源去争取自由与平等。只有到这时候，他才放弃了受西方列强“保护”的念头，并接受了革命的观点：即只有在推翻了国内的封建制度，与恢复了本国的整个主权之后，中国方才能够发展，当时准备援助中国实现此项计划的，仅有苏联，所以中山先生之主张联俄是毫不足奇的。

但是孙中山先生晓得，在他自己的国民党中，正有许多仍然反对土地革命，希望与外国资本保持不平等关系的份子。他晓得与布尔什维克的联盟，将使这些右派份子震惊。后来他终于要求苏联代表越飞与他签订一个用以减轻他们的惊恐的文件，这就是一九二三年一月的《孙文越飞协定》，两人在这协定中承认中国当时还没有“实现共产主义或苏维埃的条件”，当前的工作，乃是完成全国统一与民族独立的任务。

孙中山先生还同时接受了共产主义的观点，认为民族革命如不与民主的土地革命——土地的平均分配——与保证工农的民主权利同时实行，就不能得到最后的胜利，^①因此中山先

^① 远在一九〇五年，孙中山先生业已采取平均地权为同盟会（国民党前身）的基本政纲了，

生邀请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这种输血不仅使国民党复活，而且使它获得进步的与热情的领导，就是这领导使它在北伐初期得到的胜利。

现在左右两翼关于土地问题与工农政治地位等的分歧，不用说是更不单是理论的了。这是不同阶级为争夺民族革命领导权而作的基本斗争。右派要求在国民党“保护”的时期内，对内地地主——商人高利贷者的半封建经济，只作温和的和渐进的改革，同时又因为他们梦想得到资本主义列强的合作以发展中国，因此自愿作为帝国主义利益的保护人。至于左翼的纲领，我们上面已经说过，是要求施行迅速而澈底的革命变革，把落后的半殖民地国家变为现代的独立国家。双方争论集中于中山先生民权主义与民生主义的解释上面。当中山先生在一九二五年逝世之后，他遗留下的教义，因时期先后的不同而有着许多的矛盾，而这些矛盾就支持了保守派与急进派。分裂至此已无可避免了。

蒋介石为着急欲获得苏联顾问的好感，时常喊着世界革命的口号，而且公开宣言“三民主义的实现就是共产主义的实现。”^①他很获得鲍罗廷的信任，在中山先生死后，他不断从苏联得到军火与款项的接济。但他是属于右派的；他是一个保守主义者，而且是相信“保护”的。有许多证据可以证明了在广州的早期，已阴谋在他的力量充分时肃清共产党。他果然这样做了，那是在一九二七年四月，当时广大的群众运动正开始分配

^① 见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广州出版的英文《广州年鉴》(Canton Year Book)。

土地。蒋介石刚领导胜利的北伐军打到上海，便推翻两党的联盟与政府，在南京建立起他自己的政权，并得到长江下游的银行家、工业资本家、地主、上海强有力的“帮”以及——这是不用说的——国外帝国主义列强的支助。

蒋介石的南京政府，把一切的共产党员，一切被“纯化了的国民党”认为是赤色的任何组织与团体的会员，看作是判死刑的罪犯。千万个进步的领袖、学生、官吏、士兵以及工农都被杀了。残存的共产党员组成了小小的红军，拼命守住华南的山头，而内战已遍布许多省份。共产党员继续分配土地，组织地方的工农政府，蒋介石则恢复地主制度，重树起田地界石，并屠杀叛徒，摧毁农会工会。这十年的虚耗，牺牲了无数受教育的，有罕见的领导才能的青年，这数目是如此惊人，而中国又是如何经不起这类人材的丧失啊！

蒋介石的统治，并不能给土地问题以任何基本的解决，不过全国四处却高喊起要求土地的呼声。这要求从每个不满的农民的心底里发出来，红军由此也得到了无可动摇的基础。大地主土地的分配，也许要影响全国十分之一的人口，但二万万五千万农民却可以因此得到苏生。如其这土地改革以政府收买土地的方式加以实行的话，它所费的数目，也比之内战的耗费倒要少得多多。

另外两种改革，即剥夺贪官污吏的税权与建立各县的民主政府，如能实行，也可以使蒋得到新的巨大的自由农民的热情的爱戴。假如一面实行土地改革，一面推行农村的政治改革，再加以合作工业的国家经营，蒋也可以使任何反对派失去强有力的口实。这样，全国就可以迅速实现真正的统一，而全中国

的力量，至此也就可以表现了出来。

再退几步说，如果在本次抗战爆发之后，蒋介石能够解放工农，组织他们，成立一个民主国家，获得他们的拥戴，并使他们自觉为保卫新获得的权利而作战，使全国不再有地主与被压迫的农民之分，那么，这跟目前的情形比起来，是有着多么大的不同呵！

自然，如果蒋介石当时代表着容许这种变革的利益，它根本就用不着分裂（清党）。正如上面所说，蒋不是一个社会革命者，他代表着一个非常脆弱的与地主联盟的买办阶级。他本人那坚强的财产意识与天赋的保守主义，使人不觉得有政治变革的必要。年来他拼命要完成统一，但他不晓得这种政治变革正是统一的基础。他本人的阶级背景与教养，只告诉他变革土地制度是道德上不容许的行为。界碑正如阶级一样，是永远不能更变的，“上下”是应当“有别”的。

表现于西安事变的中国社会的新动力，最后终于迫使蒋介石停止内战，考虑与共产党再度接近。在西安事变之后，他认清了他不能同时对付国内与国外的敌人。这是一种基本的和解吗？还得看以后的情形如何再说。共产党并没有“认罪”与“悔悟”，也没有放弃它作为独立的政治存在的权利。虽然他们承认蒋是抗日的国军的总司令，但他们仍然保留他们自己的领导与他们自己的政纲，而且他们还不断代表着实行澈底的民族民主革命的要求。

共产党承认蒋的地位是枢轴的地位，他们相信，战时全国环境的改变，政府与军队的阶级基础的变动，坚持统一（基于民众的革命动员的统一）的必要，以及中国抗战与世界形势的

关联等，将给蒋本人在全国政治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带来了新的意义。民众的动员越广泛，战争的革命任务也就越大，这也将迫着蒋本人成为更革命的领袖，如果他愿意保存他那“抗战中坚”的地位的话。他们相信，战争越持久，蒋介石也将被迫更加倚赖民众的支助。

因此，“推蒋前进”成了他们的口号。在汉口的时候——正如我上面所说，——他们在自由中国扩大政治影响的可能，尽为国民党所剥夺，好象已失去了推动的作用。然而，当日本帝国主义深入了中国内地，在国民党主力撤退的地方，他们集中力量动员人民，建立起了新的社会。已表明他们自己的领导的思想。在这新的社会中，为着更清楚地了解，共产党与国民党对中山先生遗教的阐释，有何差异的地方，我想在下一节说一说新四军的故事。

“亡失”的红军

政治是一个革命军队的血液，没有它，革命军队便不能生长、发展，甚至不能存在。——项英

当前红军的主力，撤出江西苏区，向西北作伟大的长征时，^①曾留下一部分部队掩护他们从事退却。这赤色后卫军是孤立的、被封锁的，而且不断被穷追达二年以上，直到官方正式宣布他们业已完全被消灭，但中日战争爆发之后，他们又突然出现，作为长江下游日占领区的游击部队的中坚。他们过去所

^① 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对此有详细的叙述。

遭遇的一切，外间是很少知道的。直到一九三八年八月，这奇怪的部队的领袖本人，才告诉了我。我说的这领袖，就是那活了许多次的项英，据农民们说，他是“由坟墓里出来”当新四军的军长的。

为着解释目下这“非正统的”战争，以及为着指出中国抗日游击队的坚苦作战的具体背景，我觉得，这里有简单叙述一下项英坚守华南苏区经过的必要。也许这叙述还可以帮着说明，作者在本书末尾所试作的判断。（即关于这种战斗方式在中国抗战中的成效的问题）。

当前红军于一九三四年退出江西向西北进发时，红军当局认为除最低限度的需要之外，决不将第一线部队充作后卫，因为当时苏区已四面被围，留下的部队颇有全部被歼的危险。结果正规红军留下的只有三千名，这些就是死守最后阵地的基本力量，此外还有七千名赤卫军（民兵），约二万名非正规的游击队，合计约三万人。但当时由四面向他们进扑的军队，论人数比他们多十倍，论火力比他们大二十倍至三十倍，因为红军只有一万枝步枪，数十挺机关枪和几架旧的迫击炮而已。他们大部分都以手榴弹、刺刀、大刀、标枪等为武装。几千个由十一岁至十五岁的男孩——少年先锋队——也参加保卫苏区之战，他们有许多的人确参加过肉搏的战斗。

这决死部队的指挥官就是项英，整个红军主力的命运，大半就依赖着他的刚勇与忠实。共产党之选中他，不是没有原因的，项英不但是一个真正的无产者，而且还实际参加“无产阶级”革命，获得了高级的军事的与政治的地位，象这样的人物是很少见的。事实上，项英的样子就是一个“典型的苦力”，他

有又大又厚的鼻子与双唇，一副突出凹入的牙齿，还有一双穿起草鞋来十分舒适的粗大的脚。总之，这个细小、结实、强壮的人，暗示出了刚毅的力量与劳苦的生活。

项英一八九九年生于湖北，十岁时死了父亲，便开始做工，在一家纱厂里当学徒，靠工钱赡养他那衰老的母亲和年幼的妹妹。到了十六岁，他已升为正式的工人。他读过的关于俄国革命的书——他幼时曾进过四年小学——使他想到把他的同伴组织起来，以改善他们那非常恶劣的待遇。不久之后，他的行动使他注意到当时刚成立的共产党，他又从共产党的知识分子那里，懂得了革命的历史与口号。就在这些指示之下，他组织了中国第一个铁路工人的职工会，第一个钢铁工人的工会以及别的许多工会。

不久之后，项英便成为千百万工人的希望的象征，和改善那可伶的生活的手段。对于当时还未取得政权的国民党，他又是一个权力的象征。在一九二四年国共第一次合作之后，项英被举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员，一九二五年，因为他是当时突然出现于全国各处的职工会的负责人，机器工业和手工业工人归他指挥的约五十万，蒋介石之能由北方军阀手里夺得汉口，项英的确有极大的功劳。

一九二七年国民党反革命之后，项英继续领导汉口与上海的秘密工会，但国民党对进步工人的残杀是如此惊人，以至只有在江西“工农”红军的势力区域内，才有组织工会的可能。项英进入江西苏维埃共和国，还是一九三〇年的事，开头他是红军大学的学生，随后被举为工农革命委员会的主席，并陆续在苏维埃政府内担任好几项职务，如土地部、劳工部和调查部等

的部长。跟中国共产党许多最有材能的领袖一样，他差不多完全从实践中受到训练。他所有关于政治与军事的学识，都是多年来在红军保护下进行战斗与组织时学习到的。

这种训练，使他能在一九三四年执行了他那非常重要的任务，而且获得成功。当红军主力为准备长征，集中在瑞金附近时，后卫军便代替他们，守着主要的据点，不断阻止敌军的前进。不意、机密、以及得力的后卫，在共产党突破包围线的计划中是最主要的，这些都因此得到了保证。将近一月之后，南京方面方才发觉主力红军，业已退出，但这细弱的部队还是牵制住巨大的政府军，使之无法南下，同时主力红军已能够集中力量，进攻敌方最脆弱的碉堡线，冲入湖南，顺利地开始西征，自此之后，国民党将军们始终无法阻止他们。

千万南京的军队水也似地泻入荒芜的江西，压迫残馀红军不断向东面福建广东与浙江的边境退却。他们的无线电机被夺获，被毁坏或自动放弃，以致与西征部队完全失去联络。至此他们已成为一支处境艰险的军队。当我一九三六年在西北与共产党人在一起时，我曾问起这件事，毛泽东与周恩来都承认，他们对这后卫军的命运，毫无所知，有许多人还坦直地认为他们是全部亡失了。

但实际情形怎样呢？

退出瑞金之后，项英把他的部队改编为第七、第十和第二十二抗日先锋红军，还有一个第二十四独立旅。他自己指挥配备最好和由最有训练的干部组成的第二十四独立旅，开向赣闽边界。稍后，在一九三五年，第十和第七军的大部，终在江西东北的弋阳附近，陷入重围，被迫进行死战，结果差不多都被消

灭。第十军军长是项怀洲(译音)被杀,第七军军长方志敏被捕,因至死不屈,终被杀头。

自日军第一次侵犯上海之后,即一九三二年,中国共产党已把他反帝的口号改为抗日的口号。到了一九三四年,抗日成为他们在军队与民众间进行宣传的中心。共产党领袖们对国军的主要政治要求的估计是正确的,连蒋介石本人也被迫秘密采用抗日救国的口号,以提高他部下那些正与红军作战的军官的情绪。

蒋介石一九三四年在军官训练班上发表的演讲,已不再仅作反共的宣传,而进一步解释“剿匪”为抗日的准备了。在第五次围剿时,他所造的每条公路,每条战壕,每座防舍,每座碉堡,以及每座桥梁,都被蒋称为抗日的防御物。每个被杀的人,每个花费的钱以及每次战斗,已不再是仅为反对苏维埃与支持国民党独裁政治而牺牲,而是为着“抗日”了。

因此,由一九三四年到一九三七年,双方都以当前的敌人作为日本帝国主义者!不用说蒋是企图以这口号来挑起部下的士气的,因此他竭尽所能,阻止红军反日宣传在他部下的下级士兵中散播。同时,已退至武林山的项英部队以及第七第十两军的残馀,虽然以抗日为号召,仍不能减弱他们所受的压力。在一九三五到一九三六年,包围他的部队的由十五万人至三十万人,而他们的部队则在一万至一万五千人之间。他们运用捉迷藏战术,竭力以新兵补充缺额,并从敌方取得足用的枪械弹药等作为自身的给养。一九三六年夏末,他们在福建西部的主要的苏维埃根据地,已被摧毁,敌方所施行的有效封锁,迫使他们不能不采新的战术,以求生存。

“根据我们当时的情势”，项英这样告诉我，“我们决定把部队化整为零，分成几百人一队的细小的游击队，散处于广大区域之间。这新的编队，使我们放弃守卫根据地的一切企图。我们规定军事行动，仅以迅速袭击我们能加以突击的小队敌军。这些方法使我们能够保持我们自身的实力，虽然因为完全失去固定的作战根据地，我们的物质条件是越来越恶劣了。

“到了一九三六年年底，我们的部队实际上是一以当百。敌军没有让我们休息，每星期至少有一次接触。我们时时以为我们西征的部队是整个完了，夜里，因为害怕突袭，我们不敢在镇里或是乡里睡觉，只能睡在山头丛林之间。有两年之久，我夜里从未解衣，有时甚至还带鞋睡觉。全军的人，差不多全都如此。那时候我始终穿着那件又破又旧，满是补钉的棉衣。

“我们从未吃饱饭。要是没有老百姓帮忙，我们准要饿死。我们有许多小股队伍，给南京军队切断，但当地农民却藏起他们的枪，解救他们。农民们都很愿意把他们的米分给我们。我们的农会仍然秘密活动，一面报告敌方军情，一面又掩护我们。农民们一想到地主回来就愤恨，而在他们看来，我们的失败，就正表示地主制度的恢复。不久之后，敌方对那些与我们友善的村庄，开始整村的捕，整村的毁。

“我们与外界失去一切联络，全象野人一样，依着本能生活与战斗。我们许多最优秀的指挥员，不是死于战场，就是死于疾病，我们没有药品，也没有医院。我们的军火越来越少，许多枪炮因为没有兵工厂修理，终于变成废物。我们甚至无法制造子弹。因此在使用的时候极端节省，有时农民们偷带一些给我们，但封锁使这件事越来越困难。

“我们时常退至人迹罕到的深山丛林间，我们认得福建与江西的每条小路，每座山头，我们也学会了四五天不吃东西，然而大家却越来越结实，越敏捷，跟野人一样。我们的好些瞭望哨，实际上完全在树上过活。军队里那些青年兵士，能以惊人的速率上山下山。有许多次南京军队的包围，离我们的军队只有几里路，但由于我们熟悉路径，和得到农民的帮助，我们时常能够突击和冲破他们最弱的一点，或者完全避开他们。

“我们甚至没有听到一九三六年十二月的西安事变，这消息传到我们耳朵里，已在好几星期以后，但我们的情形一点也没有改变。不但没有改变，西安事变后南京已能够把他们最好的军队调来进攻我们了。从一九三六年年底到一九三七年四月，他们的进攻简直没有一刻停止。当年春天，他们动员了三十个师，企图歼灭东南中国整个的红军。在最后一次的进攻中，他们动员二十五万人包围武林山，包围圈的直径只有二百到三百华里。

“反共军逐渐缩小包围圈。他们造了许多路寨和碉堡，驱逐许多农村的农民，运走一切的食物，然后放火烧光。他们烧毁了山下几千万颗的树，决心围歼我们。我们许多探子和传令兵被他们俘获。这种方法使某些在地的游击队员吃惊，他们企图脱逃，其中有些被捕，终被杀头。

“到一九三七年年底”，项英继续说，“我们仍然没有得到主力红军的训令，也不知道朱德与毛泽东的消息。后来我们有一个探子，终于带着西安事变的全部经过和西北内战终止的消息回来。我们立刻给政府和进攻部队发出一道宣言，重申我们对统一战线的拥护，并要求停止内战。我们愿意签署三月十五

日延安发表的共产党宣言，无论如何这呼吁毫无效果。

“甚至到了七月，日本已进攻芦沟桥，我们所受的压力仍未减少。我们发出另一个要求统一团结的呼吁，并请求把我们派至前线对日作战，结果还是没有反响。八月，我们还被进攻。上海的战事越来越扩大了，但只有到了上海失去之后，国民党方才开始谈判。军队开始调至广东与广西，派至长江前线。当时南京很怕我们利用这个机会回至江西。

“剿共军总司令熊式辉将军本人，在安于我们继续存在的情形下，还作过破坏我们的最后的尝试。他的代表应允给我们某些指挥官以巨量的贿赂，叫他们领着部队开到福建，并确实保证将改编他们，参加长江流域的战争。这些努力都归徒然。当时我们的军队已减至五千人，我们的步枪也减至三千支，但留下来的人，都是身经百战久经风霜，不仅是坚强的战士，而且是服从纪律，心坚似铁的革命者，我们长期的严厉试练，已肃清了意志薄弱者与叛徒，所有的人，差不多都能够领导别人作战。

“熊式辉将军以各种方法消灭我们的企图全归失败之后，他最后终于要求我和他见面。在这次会议中，我们与熊式辉及何应钦(军政部长)成立协定。以后关于把我们改编为政府统辖的新军的事情，由共产党在南京的代表负责进行。我本人则到陕北，在那里研究了几个月，不久便接到委任令，我也就回来担任新四军军长之职。”

项英这个以实行的双手握住性命的人，以自信的调子结束如上的谈话，不用说，这自信在他显然是实际的真理。“延安的每个人”，他说，“都以为我是死而复生的，但谁也不觉惊异。

我们革命者都有复生的习惯。你看一看朱德、毛泽东、彭德怀、他们都已‘被杀了’几十次！当作一个个人，我们没有什么，但当作革命的一部份，我们却是不可征服的，不管中国革命‘死了’多少次，他还是要活过来，除非中国本身能被消灭，不然的话，它是决不会消灭的。”

人民的军队

只有武装的人民，才能是民族自由的真正堡垒。

——列宁

一九三八年一月日本占夺南京之后，蒋介石最后批准赣闽共产党改组为新四军，在长江下游南北岸，进行活动有限制的游击战。叶挺是这支新军的军长，项英则为战地指挥官。

叫叶挺与项英合作，是一种巧合。十一年前，叶挺是老四路军——在北伐时称为“铁军”，第二十四师的师长。这部队拥有许多最勇敢也最进步的黄埔干部，而且是北伐军的先锋。当他驻扎在武汉时，叶挺给项英的工人一千支步枪，在国共分裂以前，他们就以这些卫戍武汉。这些枪械后来又武装了中国的第一支赤色游击队。在富有历史意义的南昌暴动时，叶挺领着他本师和朱德贺龙等的部队一起参加，开始组织红军。后来，他又是不幸的广州暴动的首领。

在广州失败之后，叶挺当即退休，不再参加内战，一九三八年他之被委为新四军——纪念那光荣的“铁军”——军长，也许就是这个原因，因为这在蒋介石的脸上是很过得去的。但叶挺本人既是黄埔毕业生和著名的革命军人，他是很能接受共产

主义的，虽然他本人不是一个共产党员。

项英和叶挺建立一支新的抗日军队的消息，在前苏区内迅速传播开去，因此千万的农民开始徒步由很远很远的江西、浙江、安徽、湖南、湖北、福建等省赶来参加。他们有的带着在内战时藏起来的步枪，那些有钱有米的人，也拿出来作为“抗日的贡献”。几千个刚由监狱和反省院放出来的“赤匪”，也回到他们领袖这边来。少年先锋队与赤卫军，则携带着生锈的标枪、手榴弹和斧头参加！从占领区的各城市里，又来了许多学生和记得项英是他们的领袖工人与机匠。就象《水浒传》里所说的情形一样，四面八方的人都应着宋江的号召前来参加。

但是带领着这支奇特的志愿军的叶项，和其他残留的同志们，必须把那些从未动员和意志沮丧的民众动员起来，并使他们的军队能够打击那配备比他好上无数倍的敌军。但只经过几星期的训练与改编，新四军便于一九三八年四月，集中在他们被派定的区域里，虽然充溢着自信与斗志，但非常缺乏金钱与武装。农民们带来的机械总共三千支，他们又掏掏自己那几乎一空如洗的腰包和得自外面的捐款，购置了一小部份，再加上旧时红军的枪械，这二万人的军队只有一半枪支。蒋介石无论如何不肯增加他们的火力，其实，这是可想而知的，他决不愿意帮助这支他久欲加以歼灭而没有成功的军队，因此他始终不肯发枪械给他们。

新四军占有苏皖两省三分之一，人口平时约一千九百万，现在又加上许多难民。当日军进攻汉口时，这地带的国民党军都已退却，日军占住城市公路与铁道，新四军则夺回其余的地方。这军队当时要获得民众的信任，是一桩异常困难的工作。千万

的土匪与海盗不断蹂躏居民，其中有些受日本的津贴，有些却以掠夺来维持生存。新四军必须解除这些“错误的游击队”的武装，或是重新教育他们。其次，它又须对抗日军的进攻。某些地方绅士，在日军协助下，组织地方政府，拒绝中国军队的援助、入驻或合作。这些傀儡政权也是应该摧毁的。最后，他们本身没有兵工厂、军用仓库和医院，使游击队得不到充分的供给，而农村经济的破产是异常尖锐的。

费孝通博士在他的近作中，给长江区域下游农村经济的恶化，作了一番可靠的叙述。这区域恰正是新四军活动的地方，费博士所述的恶化，也充分指出了新四军动员民众时所遇的困难。在日军实行空前掠夺之前，这地区的贫苦本已非常惊人。极重的地租，各式的苛捐杂税，贬抑的农产品价格，吃人的高利贷以及山样的债务，迫使农民抛弃了最好的耕地。丝价的降落百分之六十以上，使农民最重要的一种副收入，一扫而光，小地主与佃农至此已不得不更倚赖高利贷者。

依照费博士所说，这整个区域的地主豪绅，正是受政府委派的税收员，他们的地位跟印度的地主一样。当地衙门所要求的指定款项，由他们负责征收，因为佃农始终不知道被派的整个数额，所以他们不仅要缴付地租，不仅要交纳捐税（这捐税本来是应该由地主本人缴纳的），而且还要给收税人的地主，加上一些额外的献金。

这些收税人拥有警察的权力，可任意逮捕任何没有交纳租税的农民。那些不愿意在冬天坐牢的人。就不得不向高利贷者叩头求贷——而这些高利贷者又时常是收税者与地主本人。这些贷款的本钱和复利总计，半年要达贷款的四倍，一年要达贷

款的七倍。这区域的千百万曾经是自由的农民，现在都成为无产者，而这显然是地主——豪绅——税吏制度那种日甚一日，贪求无厌的剥削所直接造成。关于这，我想留在下一章再讲。

新四军开头给农民证明他的部队有着革命的纪律。项英说，“军队的纪律是民众组织工作的基础。民众运动的迅速开展，与战斗的胜利有着密切的关联。没有纪律，便得不到民众真正的友谊，没有民众的友谊，军队便不能提拔当地的民众领袖，没有当地的领导，民众运动便得不到成功。”^①

新四军最大的资产，也许就是它的革命的传统，那就是：组织的方法，百折不挠的精神以及战斗的战术。

“革命军队胜过雇佣军队的地方”，项英对他的部下这样说，“就是由于革命军队是为社会福利而战，而不是为着抢掠与升官发财。我们是为社会与民族的自由而战的，因此我们的军官与士兵实际上一律平等。为什么要不平等呢？我们全都为着同一志愿而战，只有志愿相同的人，相互之间才能称为同志。有同志爱，然后有团结，有团结而后有力量。战争不外是两种这样的力量的争斗。我们的力量是优于敌方的，因为我们的同志爱比他们浓，使我们万众一心的我们的目的，也比他们的大。

“在我们的军队里，只有工作之分，没有阶级与身份之别。我们过着同样的生活，有着同样的权利。军官没有特殊的徽号。我们不论是官员与士兵，完全没有饷银，大家得到的只是粮食与极小的生活费。我们大家都明白，在极度困难的时候，连这生活费也会取消，以作公用。我们的军官绝对不能贪污，在军官与

^① 见一九三九年伦敦出版《中国农民生活，长江流域农村生活的一般研究》一书。

士兵之间，毫无不可告人的秘密。”

新四军的力量是基于它的政治教育制度。“战争是政治的继续”，项英说，“军队是一种为实现某种政治目的，而进行武装的政治斗争的组织。政治的领导保证了革命军队的精神思想，生活与其行动。”每个军事指导员都有一个同级的政治指导员与他并肩工作，每个部队，在连以上的，都设有一个政治部，负责进行军队的教育与民众的宣传等工作。军事的与政治的决定，都在士兵之间讨论，而每一个重要的决定或改革，都要得到全体的赞同与谅解。政治指导员指导士兵读书，和他们分析政治问题，除一般的教育而外，还辅以各式各样的活动：如宣传、军事卫生、民众组织和娱乐等。士兵俱乐部归他们监督，借着运动，游戏比赛、研究、和政治辩论等，使士兵享受一种舒快的新的集体生活。除八路军外，这在中国的军事组织中是绝无仅有的。

但是，依照项英所说，除非革命军队成为民众生活的一个有机部份，它便不能成功。“军队是民众的武器，因此军队与民众是同一家族的家人，分享着共同的快乐与不幸”。这在久已统一了的现代国家，乃是老生常谈，但在中国，却必须在理论上，事实上，一次又一次的说下去做下去，直到民众相信这些话。民族军与人民军都是新的术语，甚至这名词在现在还是新鲜的。我相信第一个采用人民军这名词的，乃是共产党。

新四军在组织民众时所遇到的困难，比之他们北方同志（指八路军）要大得多。在南方，跟华北晋察冀边区那样的战时统治，是无法建立的。国民党爱惜他们前时在长江三角洲的政权，他们禁止新四军创立某些机关，以进行必要的政治的与经济的改

革。新四军克服一个城市，国民党立刻恢复前时那种党部的统治，没有人民的议会，也没有民主的政府，他们又不许新四军在后方设立有组织的根据地，象八路军之以西方延安为根据地一样，甚至他们在乡村里开办的学校、医院和工业，也要他们自己派兵保护。这样说来，成为他们唯一的根据地的，只有民众的爱国情绪了。

不管这些困难，新四军仍然组织了广泛的农村自卫团的密网，军队驻扎的地方，他们的政治宣传队，便进行说服当地民众的工作，告诉他们，保卫家乡是人民本身的、也是军队的任务。流动剧团，时常以浅显易懂的演出方式，介绍此类的剧情，然后再依据统一战线的基础，进行农村动员的工作，他们提拔及训练当地领袖，使他们足以领导地方自卫团，并且武装他们。最勇敢的青年则编为敢死队，在经常变动的战线附近，执行小规模游击战争，再由敢死队中选拔新的后备兵，以补充军队本身的主力。地方领袖，由上海来的学生与工人，红军的老干部，都是新四军抗日军政大学的学生，千百个干部就在这学校里，接受短期的，但是紧张的，关于组织和领导革命群众战争的训练。

一个动员了的乡村，究竟有什么价值呢？这表现在军队作战时民众跟着作战。这表现在获得胜利时全体都很欢欣，因为大家帮着得到这次胜利。这表现在一个士兵出发作战时，他晓得自己要是受伤，决不会被丢弃在战场，将有人民志愿队来抬救他们，或把他们送至医院，或把他们藏在乡村里，等到敌军返回防地。因为战士的威望已经提高，不是佣兵而是志愿兵，家族已不再以当兵的儿子为“废铁”了（这是根据中国土语：“好铁

不打钉，好男不当兵”而来的)，自由农民也为着他的家族的好田地，为着他的乡里与国家民族而战了。

农村动员的目的，是要每一个男人女人与小孩，都为保卫地方而工作。少妇参加为宣传员、组织者、教员与看护。老年妇人则缝衣做鞋安慰在前线的“他们的儿子”。老人则受投掷手榴弹的训练，以对抗胆敢单身走至乡村附近的日兵。少年人则组成耕种队，帮着他们在前线的父亲与兄弟或者侦察敌情，或在军中执行勤务。经过自卫委员会，村民可以晓得战事是否迫近本村，又因为他们已有组织，早作防备，所以他们可以迅速携带女儿，值钱东西以及畜牲鸡鸭等退至事先准备好作为逃难的地方，在那里他们可以得到军队的保护。

新四军与民众间的有机的联系，再没有比他们那公正而著名的医药服务，表现得更清切的了。一九三八年，当华南红军改编出发抗日时，他们完全没有救护组织，他们大多数的军医与看护，都已在内战时被杀了。但在一年之后，当林可胜博士率领中国红十字会救护队访问他们时，他说，由“清洁、修理和对病人的小心看护”说来，新四军的医院在整个第三战区中允称第一。到了一九四〇年，新四军可说拥有中国最好的军医组织。这是一队一队缓缓建立起来的。他们已开办了两个医务训练班，十家医院，八家派遣医院，二十个旅（大队）救护站，二百个营（中队）救护队，三百个连（小队）急救队，^①这是怎样完成的呢？这医药服务的绝大部分，可说也是从那生产了米、丝和自卫团的同一地土里生长出来的。

^① 见一九四〇年香港所出版的《新四军医药服务简报》。

自然，说它是中国最好的军医服务组织，也不是怎样了不起的，因为在战争爆发时，中国整个的军医组织，大概是全世界最坏的了。从上到下，它充满着欺诈、无效率、不胜任、罪恶的冷淡等污点，一般说来，这只是使负责组织军医处的师长多捞一些外快而已。也就是这原故，他们公然虐待着伤兵侵吞中饱。在内战时，他们大部分是倚赖外国教会医院，去治疗他们的伤兵的，本次战后，因为大部分留在日占领区的伤病兵都被惨杀，这种卑鄙龌龊的行当方才暴发出来。自此之后，特别是在林可胜博士的贤明的指导与他那个模范的红十字救护队的帮助之下，才有了很大的进步。

组织新四军救护队的医生与看护、像该军的士兵一样，都是志愿的。其次，他们一开始，就得到叶挺军长的全力的支持，叶本人对救护工作异常重视，并邀请盛博士领导这一工作。因为盛博士不仅有高深的医学修养，而且是中国几个富有革命的毅力与热情，足以进行此种困难工作的著名医生之一。第三，参加这一工作的青年男女，都为这军队的革命历史所吸收，他们一样为救国热情所激发，抱有救护祖国战士的热望，以及亟欲使他们成为全国其他救护队与个别医生及看护的模范的决心。他们发誓忍受军队与人民所忍受的同一危险与苦难，同意与他们过着同样的生活。最后，这救护事业之得以迅速发展，是由于民众的合作，他们训练当地民众为救护人员与助手的才能，以及运用一切可能得到的便利的聪明。

博士着手工作时，只有五个医生一个男看护，后来逐渐增加，配备也逐渐改善。

据林可胜博士告诉我，中国登记的医师只有一万人，其中

胜任的不过二千人而已。即使这二千人完全参加军队救护工作，每一千个兵士才有一个医生。新四军显然认清这一事实，他们尽力创设自己的医务训练班。他们毕业之后可以作为助手，可以治疗轻伤士兵，或救治重伤者使他们可以移至后方医院。这样的助手，每六个月可养成一百人。他们除携带药袋之外，还带着枪支，有时且同兵士一同战斗。他们在战场施行急救并把他们送至安全的后方。这种战地服务对于中国士兵也是从未见过。

但新四军给予民众的医药便利，也许使民众最深切地了解了人民军的意义。这是前所未见的。男女看护，不仅执行正规的军事救护，而且在军医指导下，参加公共卫生的工作。这军队既然这样倚赖民众，那么民众的健康自然是值得极端重视的。个人的与公共的卫生，以及预防传染病等的简单规则，应当加以推行，病人也应当加以救治，在新四军成立一年之后，他的医院和流动医院诊治了五万三千名伤病的民众，其中大半是完全没有收费的。

象这样的事实还可以开列下去，但我在这里只想暗示出他们的坚苦与伟大，象这样的军医传统是任何国都可以引为光荣的。这些执行救护的男女，实在配加上英勇的称号。他们冒着健康以及生命的危险，去实现这伟大的工作，而他们所得的酬报乃是农民与兵士的道谢。他们穷到无以购置外科手术用具，只好由他们自己的工厂制造钳子、剪子和解剖刀。他们穷到无以建造新式病院，只好利用寺院和住家改造为病房。当他们许多主要供给的来源断绝之后，他们便在自己的实验室和药厂里制造代用品。

新四军竭尽全力改善驻区里的人民的生活，休耕地尽可能加以利用，时常由军队加入耕锄，所以它可以从当地取得一点粮食。在农民的耕具和种籽都被夺去，或是赋税与高利已使他们破产的情形下，要恢复农业的生产是件极困难的工作。此外，普通的人民与乎军用必需品如农业工具、手工业工具、衣服火柴、纸张印刷机器和建筑原料等，全都异常缺乏。

新四军为着改善这种形势，它着手组织了他们自己的工业合作社。在极大困难之下，他们从占领区里偷运进了一些轻机器与工具。不久，新四军已有了他们自己的机械厂和流动军火厂（能制造地雷、手榴弹、子弹、臼炮、大刀与刺刀等）。一个印刷合作社也成立了起来，他们又教导农民们纺织，用当地出产的棉花、苧麻和大麻制成粗劣的衣服。他们曾向中国工业合作社呼吁，请求他们到新四军区域内组织难民生产队。^①

但是，一个军队的最后试验，乃是它所得的军事效果。根据一九三九年中所发表的，关于这方面的不完全的报告，^② 我们可以看出，正规战与流动战，欧洲速决的闪电战与东方这长期坚持的持久战之间的杰出的提示。第一个显著的事实是，在新四军作战十三月中，他前后接战五百三十次，参加每次战斗的至少不过数百人，而且这战斗本身，没有一次是十分重要的。但他们的不断攻击，以及结果差不多每次都是游击队胜利这一

① 重庆政府拒绝资助工合，到这游击区域里开办事业，但海外某些爱国华侨，因感于新四军的作战成绩，给予相当捐款，在美国同情人士援助下，开始在新四军区域内发动一个创建国际工业合作社中心的运动。

② 见萧向荣作《二年来的抗战》，载于一九三九年八月《八路军军政杂志》。

事实却是重要的。一九三八年他们平均每天有一次战斗，在一九三九年有时一天要作战两次。

第二、敌方伤亡虽小，但不断增加，据叶挺估计，每天他们要死伤日军三十人，每天如此，周以继周，月以继月。第三、他们给予敌方交通线的损害，比给予敌军的伤亡还要严重。第四、最重要的新四军得到民众组织的协助，使敌方无法巩固军事胜利，进行有效的政治控制与经济掠夺。最后，因为新四军主力的极端流动性，迫使敌方不能不维持极大兵力，以保持所有的战略据点。

在新四军开进其驻区之前，日军觉得只有三个联队，就可以控制那些没有组织和没有武装的民众。到了一九四〇年，日军驻兵已增加到三师。在新四军开入之前，当地许多区域，都为各地傀儡政府所统治，到了一九四〇年，这些伪政权只有在日军刺刀直接保护下，才能行施职权。以前小队日军可以自由在乡间路上行动，到了一九四〇年，甚至在南京近郊，（单此地就有自卫团七千人），也必须有强大的护卫。

为着避免长篇征引，这里只就新四军出版的《战报》中随意摘录几节，因为这些正是他们的活动的生动的描绘，由此可以推见其他的：

（一）某某支队某部队，在进行侦察时，进攻丹阳附近敌军，击毙敌军十二人，夺获步枪十二支。

（二）某支队破坏金坛西面济西桥（译音）与古梁桥（译音）间公路八十八里，两桥也被毁，携回大批电话线与电线。

（三）某某支队便衣队在天皇庙附近埋伏袭击敌方军用卡车，卡车被毁，死日军十二人，夺枪十二支。

（四）敌军一百二十人向大桥移动，中我地方部队埋伏，激战四小

时，在我军增援之后，敌方始行退却，是役毙日军五十五名，夺枪甚多。

但是新四军的军事进攻，跟这军队的别的工作一样，简直没有得到军事委员会的援助，不但没有援助，而且不断阻挠该军建立自给的经济根据地，否则他们的进攻活动决不会限于此种程度。一九三九年之末，叶挺将军告诉我，新四军兵员约四万人，有枪不足二万支，部队一半以上的兵员仅以手榴弹与大刀为武装，他们的主要任务，是随同带枪的人一同赴战，看看是否有因死伤而掉落的步枪。到了一九四〇年九月，新四军军力已有三万五千支步枪，和四百六十挺机关枪，这火力的增加主要是从敌方夺来，在战时以这样的方法增加军备，不但延缓而且代价极昂。然而不管这军队兵员的多少（大致等于中国五个整师），军事委员会给予新四军的补助费，是每月十三万元！

读者也许可以想象出，这经济奇迹，以及以如此细小的款项供应如此大军及上述各项活动所需的那种献身的精神。他们之所以能够生存，民众的援助显然是最重要的原因。假如没有无党无派的救济组织，如“保卫中国大同盟”以及“中国红十字会救护队”（这组织给新四军许多药品，医学配备，和一点技术的帮助）的支持，他们的负担甚至还要重。

后面我们讨论八路军在西北的成就时将继续检讨这两种战术和战略的相互作用。这里所指出的乃是新四军已把基于民众动员的长期抗战的意义，充分显示了出来。假如他能得到大后方资源的供应，假如政府能够准许他们武装和供应他们已组织起来的民众，扩大他们的作战地区，那么他一定可以得到更富有戏剧性的效果。

香港的插曲

除非日本剥下英国的厚皮，让所有的东方看清，
否则东亚的永久和平，永远不会实现。——安藤提督

一如所料，汉口终于在一九三八年十月底陷落，不过稍为快一点儿，因为广州也差不多同时失陷。关于引起这些不幸的悲喜交错的事实，我想这里用不着重述，几个有能力的观察家，早已加以说明了。在广州、汉口失陷之前，中国人对这些挫折并不介意，因此，这些事实的最大的意义，大概就是告诉日本说，以后它再也找不到一个可以结束战争的重要的城市了。

这时期最坏的地方，也许就是过去到处发生的错误，又再重演了他们没有适当地改组和迁移工业设备与熟练工人，而且在这两个战略城市失陷之前，也未曾加以毁坏，使之不能成为敌方的作战根据地。广州与汉口仅稍微受损，并未成为焦土。这种优柔寡断所生的影响，在几个月后就已表现了出来，因为日本利用了它已所夺获的资料与工厂，推进了它向内地的侵略。

此后几个月，我便住在香港，这珠江口的海岛，是广州对外贸易集散的地方。在蔚蓝的太平洋上，它很象一颗静定的真珠，每次当我由内地到来之后，维多利亚殖民地的古怪的景象，时常使我感到惊讶。钱的价值对比，在这里简直叫人不敢置信。香港饭店客人，每小时花在喝酒一项的费用，就可以救活几百个在汉口岸边席地而坐的饿殍，或是拥塞在各处路上的难民；而那些富有的中国人，每天晚上挤在广州菜馆里互相宴请的用费，也足以购买充分药品，以治愈那些因疟疾痢疾而垂死

的千百万兵士。

约摸一百年前，英国在击败中国之后，就掠夺了香港，作为它的战利品之一。到了一九四〇年，这海岛和对岸的一片租借地，已代表了一万万英镑的投资，并且是中国沿岸英国安全的最后堡垒。它一向付出可观的红利，在现行战争中，更达到了它繁荣的顶点。广州失陷之前，中国输入的军火，极大部分都由香港输入，因此巨额进款，不断滚滚而来。就是此后它还不断经由越南与细小海口，与中国内地进行繁盛的贸易，一面还把巨量的军需原料运至日本。

香港许多英国商人对中国抗战所抱的态度，跟唐宁街一样的漠不关心。虽然他们的生存，完全倚赖着中国住民与贸易，但他们总认为这不是他们自己的事情。在他们看来，为日本征服所“孤立”的，不是细小的香港，而是中国的大陆。他们中有些人还不断的对中国抗战表示厌恶，因为它阻挠了贸易的恢复，只要是中国投降的话，那么一切又都可以欣欣向荣了。那些抱有这种政治见解的人，正衷心地企望日本与其早日的盟友英国联合起来，这样，他们两方就可以从“发展”中国得到大批的利润。这些人对过去十年来日本与中国的情形，似乎毫无印象。

自然，由鲍尔温到张伯伦政府的英国外交政策，也大半持着同样的观点。张伯伦显然既从未明白各侵略国间利益的共通性，也不相信欧亚轴心有实现的可能。我记起一个重要的英国银行家，由伦敦乘飞机回到香港之后，所表示的极大的不满。他的意见跟他们是相反的。在一次谈话中，他告诉我说，他行前曾见过西门爵士，西门在一九三九年春间，是张伯伦内阁中

最有力的一人。当时他竭力说动西门，请他给予中国一笔信用贷款，以作为防御帝国的一种方法。

“我竭力以譬喻和简单的事实，使西门明白我所说的意思”，他说。“我告诉他说，如果欧洲发生战争，而日本已在中国获得了胜利，那么我们以及法国荷兰在近东，就全都处于孤立无援的地步。我说那时候我们将不能防守香港，也许甚至不能防守新加坡。我想尽法子使他明白，以借款的形式在中国投下一千万英镑的资本，要比为着加强新加坡舰队，花上一万万英镑的款项更要值得。

“中国是我们的外卫防线，这一点，在西门看来，似乎完全是荒诞不经的。他的意见恰恰相反，他认为日本总要获得胜利，英国应尽可能表示高超，使他适应新的情势，借以保护帝国的利益。‘中国离我们远得很哩’，他说，‘我们除同情外，再不能给他别的什么，现在远东的情形，实在坏得很，不过这些都是不能避免的。弱肉强食，你晓得的’。”

不用说，也有许多对中国抗战在世界变革上的意义，能真切了解的进步的英国人士，他们在募集医药与救济方面，做了很完满的工作，香港政府对千万中国难民的照顾，也要比上海方面好得多。温善的香港总督诺锡国爵士和他辖下的某些官员，对日本的侵略，以及这种侵略对他们本身的意义，已逐渐采取了现实的观点，但我觉得，他们这种警告，并未引起本国政府的注意。我从未在任何地方，遇到一个比香港主教更精明胜任，热爱民主，自由与人道的友人，他可说是东方的坎特伯雷大主教。他一人做了十人所能做的工作，并从香港给予中国以许多有效的援助。但是在那些“上等人”中间，一向却把同情

中国视为是破坏秩序的倾向，因而对那些热切关心中国的人，时常称之为共产党员。

另一方面，那些未到过中国只见到香港华人的英国人，他们之看不起华人爱国情绪，确有其原因，我们不便加以苛责。这地方挤满着富有的地主、商人和官员的妻妾，这些人在日机开始轰炸的时候，就席卷他们所有的财物，逃到香港来，希望英国狮子保护他们的资产。他们都幻想着，一到战事完结，他们又可以安全地利用他们的资本，参加“复兴”工作，捞他一大笔钱。

许多银行家估计，逃在香港一处的游资，达华币六万万，据说还有二十万万元集中在上海的公共租界上。一个负有使命到美国去的中国银行家对我说，在一九四〇年，差不多有九千万美元的中国货币逃到外国去。中国不能征收这些资本，因为实际上这些都是由外国银行放出去的，而半殖民地的中国政府之无法加以法律的统制。然而如果某些高级官员和他们的太太们自己，不曾热心于外汇投机的话，要采取更有效的办法，也还是可能的。

在殖民地的一百五十万华人中，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本地人，他们的家族已有三或四代住在香港，很傲慢的自认为是香港人；另一种是难民和移住的人，他们自认为是暂时的寄住者，在前者之中，有许多从未到过大陆，他们说和写英文要比中文好得多，而且还接受了英国的习惯与标准。而许多富有的“香港人”，因服务或捐助，而受到英国皇家赏赐的爵号或褒奖，已成为在地的贵族，而在他们周围，构成了一个畸形怪状的中等阶级的英国社会。其中好些因为先时做了鸦片之类的买卖，

发了一大笔财，现在都在经营商业或银行，或则拥有许多皇家的地产。他们把孩子送到英国公立小学去念书，过着英国小孩一样的生活，接受英国的传统的教育。这些人死心塌地倾向英国皇家，而且对此感到十分满足。

日本人非常妒忌地注视着英国这种殖民地化工作的成就，这使他们想到自身的失败，因为他们始终无法使高丽、满洲和中国那些被统治的人们比较地忠顺于日本。要是能够使那些闲存在英国银行里的资金，移到他们自己手里，这在他们将是怎样的一种意义呵！但日本帝国主义的弱点，是在它的财政基础并未巩固，以及它不能使中国社会的任何一个阶级得到安全。英帝国主义者在印度、香港以及别的地方，却与殖民地的资产阶级组成同盟，给以英国法律与秩序的保障。日本却不能这样做，她自己亟需立刻从军事征服中得到报赏，这就强迫她残酷地掠夺中国的各个阶级，固然她不得不能给买办地主阶级一些残余利益，而且又不能改革土地与税收制度，以博得全体民众的支持。它的投资完全是极短期放款，在它没有生利以前，它已不能不收回这资本了。

日本既不能获得中国真正某一阶级的同盟，不得已只好倚赖一个总的阶级，这阶级包括贪财的官僚和一部分流氓无产阶级——流氓、凶手、龟奴、毒贩以及强迫的劳工与士兵——他们论工领酬，并不是真正忠顺于日本。唯一可以使它得到中国一个重要阶级的支持的方法，就是把西方帝国主义势力从东方逐出，以减轻中国某些份子所受的外国的压迫。它必须在东方找到一种相当于欧洲的犹太人的外人，又因为英国最易遭受打击，所以日本挑出它来，加以攻击。

当香港和伦敦缓缓看清了日本反英的基本目的之后，他们的意见改变了，英国人开始明白了，他们自身的前途，与中国作为一个自由独立而民主的国家存在，有着密切的关联。然而，无论如何，只有在急降的轰炸与大批的屠杀——这在远东已发生了两年多，但全世界却一直关心地注视着——扩展到欧洲大陆之后，他们方才看清了这一点。

有一天，我在香港跟三个新由欧洲到来，自愿到中国作医药服务的医生吃饭。他们都不是政治家，而是好的医生，但因为一向住在欧洲，使他们成为革命者与国际主义者。假如他们住在本国，此刻要不是应征入伍，参加反法西斯的战争，就一定给投进集中营里。他们相信，他们可以在中国参加为自由与人类爱而进行的国际斗争，三个人对这一点都有着他们自己的见解。

他们中有一个，曾先后参加过近二十年来每一次重要的但都失败了的革命；在匈牙利、奥地利、德国与西班牙。他对我说：“每次我都在失败方面。这实在是单调的”。他半幽默地但又带着一种古怪的谦逊的神情注视着我。“我现在只要你答复我一个问题，不要转弯抹角的，而是象兄弟一样，用一句话答复我：我这次到底有没有站在胜利方面的机会呢？”

我想了一想，然后这样对他说：“在这次战争中，中国每次都要打败仗，但它却在胜利方面。你要我用一句话回答，那么我说：胜利者已在失败中而失败者将得到胜利。”

我想，这是一个慰人的警句。失败者收获，胜利者哭泣。但衡之我的良心，我不晓得这话是否正确。本来事情是应如此的，除非历史真的开倒车。我觉得香港这地方已过份助长了我的怀疑，这正是我应该回到内地再度与现实保持接触的时候了。

第四篇 一条舐吮自己创 伤的蛟龙

月光和炸弹

虽然有在四十八小时内毁灭一个一百万人口的城市的可能，但一切战争的主要因素——人——并不因此而消灭。

——何塞·米亚哈将军

“桂林”号在广东附近被日机击落后，中国航空协会决定在夜间从香港起飞。飞机于早晨二三点钟秘密离开香港，破晓时飞抵重庆，此种游击飞航每星期有一二次。我搭的是道格拉斯机，由战事发动后一直在这条航空线上服务的美国机师驾驶，破晓时到达重庆，它在扬子江上游，离上海一千五百英里。

这是我初次赴川，四川意即“四条川水”，是中国第二大省份，人口最多，四千二百年来，重庆一直是一个城市，但直到中央政府选它为战时首都时，它依然是全世界最落后的城市之一。亚洲若干大川都从东

西藏边陲流入四川。其中嘉陵江和扬子江刚刚在那由坚固岩石构成的海岬下边汇合，而草草建成的重庆便在这岬上建立它的新旧废墟，在盖满松林的小山和铺满红土的田庄中间。这里，阔帆的民船和小汽轮载着富庶的成都平原的土屋沿扬子江下驶——通过三峡，横过危险的激流，直达汉口和上海——直到战争封锁了扬子江，切断了它日益发展的贸易。

我于一九三九年初夏初到重庆时，它是一个湿热、肮脏、混乱的地方，内迁的中央政府在空袭前后在这里建立一些秩序，完成一些建设。这完全是一座无计划的、人口拥挤的中世纪城市，绵延许多平方英里，平常人口超过五十万，而现在却减少到十万左右了。在黑夜，这个数目多少有点增加，但当月亮照耀着黄色的扬子江时，它立刻又减少了。交通的速度降低了，跟乡村的情形相仿。雇不到车子，而一部人力车——当你设法雇到一部的时候——从城市的一角拉到另一角，需要两个钟头。

一幢一幢的建筑物在五月和六月的野蛮空袭中被炸毁了，市民死难者四千余名，而现在，要是天气清明的话，每星期总有新的瓦砾堆出现。日机总喜欢在月夜实行空袭，因为这时它们可以从汉口根据地沿着扬子江的银色标帜飞至它和嘉陵江的汇合处，这里便是首都所在地，无论如何掩蔽不了。

有一个时候，我跟《纽约泰晤士报》记者杜尔亭 (Tillman Durdin) 及其勇敢的夫人佩吉住在一起，她刚从上海来此，经历未曾经历过的空袭。他们有一座小屋在市中心，在峡谷脚跟两所兵营和一所军火库的中间。然而大家都认为这是一个理想的所在，因为除了偶然的场合，日机难得击中一个军事目标。

广大的公共避弹所正在开掘着，但据说三分之一的居民依旧没有保障。最早得到警报的政府官员们坐在汽车里往城外疾驰——最先是各部长，其次是副部长，再次是较小的官吏；民众立刻也追赶上去；他们一看见成行的官车向西疾驰，便丢下一切，跟着奔跑。人力车、货车、牲畜、人，争先恐后地沿着大街狂奔，象一阵暴风，把面前一切都带走了。

我凭借杜尔亭的月季证，它给予我们一个很好很坚固的避弹所里的一席之地。这个避弹所的顶盖有三十英尺厚，周围都是废墟，附近是公寓房子。每次警报一响就有二百名左右的中国人在这里，在全然的黑暗和更难堪的逼人静默中躲那么二三个钟头。这个避弹所有一次直接中了炸弹，炸死半打在洞口徬徨的人，我们因此爬到它的深处，闷得半死半活，心里不免怀疑起来：索性等在洞外试验自己的命运，看炸弹会不会投中“你”，也许比闷在这里好些哩。

一天晚上，在接连几次空袭后，杜尔亭夫妇请邓颖超和叶剑英将军吃饭，但我们大家都因缺乏睡眠而觉得十分疲乏，很少谈话。他们很早离席，回到他们自己的地窟边沿去。当半夜又响起第一次警报时，我们已呼呼熟睡着了。

“就让我们在这里坐一个通夜吧”，我向杜尔亭提议。我曾估计平均被炸的机会不过二千二百三十一个中的一个吧了。我的估计完全错了。但我们决定：如果我们留在这峡谷边沿的新鲜空气中，即使有炸弹飞来，也来得及从谷边溜下去，躲避弹片。然而佩吉不赞成这个意见，我们终于听从了她，跟她走下街道，刚刚在第二次警报前躲进洞里。

女性的直觉是不错的。避弹所里猛烈的震动告诉我们，附

近某些建筑物中了炸弹。当我们在空袭过去后跑出洞来的时候，一座紧靠着我们的大建筑物炸毁了，大街上有些房子在燃烧中。我们沿着肮脏的小路赶向那所小屋，在路上遇到一颗未爆炸的炸弹，它切断了我们原想坐在这里过夜的石造的洞。再往前跑几百码，我们走进杜尔亭的花园，只见网球场上铺满了脏物。再过去，那座房子完全被炸毁了。一颗炸弹刚刚落在厨房外边，在杜尔亭的办公室旁边爆炸了。这使我们对于某些美国人表示同感，他们回国宣称自己所受的损害什九是由美国的铁片和美国的钢所造成的，这些东西由用美国机件造成用美国汽油开动的飞机载到我们的头上来。

佩吉断定事情大概比已经知道的更坏得多。她在黑暗中检验着，发觉某些玻璃依然无恙，而地下室也没有遭受一点损害。她立刻对于整个未来的展望投以更乐观的光影。但马丁，斯图尔特，怀特和别的新闻记者不久都来到这里，摧毁着地下室，以完成这里的破坏。这个破坏队一直工作到黎明。他们把屋子各部分都拉下来，于是离开，衣袋里装满了纪念品。

当杜尔亭夫妇和我正在收拾着碎片的时候，卖菜油的小贩照常出现了，他从墙壁的缺口看进来。“你们今天要多少油”？他带着往常的严肃神情问。我们说一点也不要，他又挑上担子不声不响走开了，既无遗憾，也不惊奇。他大概每天早晨都要失掉一两个主顾的。即使我们的尸体躺在瓦砾堆中，他会不会流露出更多一点情感，也是一个疑问。

我们幸而在“空军医院”里找到房间，空军当局显然以为它太暴露了，与原来的目标不符，因此把它改造成一个招待所的形式。我们原想睡一会儿，但结果简直睡不成。工人们正在房子

下边炸地窟，每隔一定时间，炸药爆炸一次，使这里充满了闹哄哄的氛围。他们一直炸到半夜，而在静寂的间隔中，我刚刚睡去，日机又来了。我们睡态朦胧地跑到比国大使馆，特桑代办把我们安置在他的房子下面的河边，靠近本市边缘，一个浅浅的避弹所里，一个重型炸弹很容易把它炸毁的。

我们刚刚听见头上飞机的嗡嗡声，钻进防空壕里去的时候，那种可怕的空气的冲荡，那种尤其可怕的滋滋声，作为一个重型炸弹的前奏的滋滋声，便到来了。有不断的爆炸声，而一阵猛烈的震荡使我们滚在一起我以为那滋滋的几秒钟，躲在地壕里比站在露天野地上更要可怕得多，因为在外边，你至少可以看见危险，可以断定危险的来临，而在地下，你的内心只有充满象要被击中似的挂虑。最初，声音是抖动的，象橡皮汽笛的尖叫声一样，立刻充满了一个角落，而接着它的音量渐渐增加起来，直到你完全相信自己这一回的确成为腊肠了。

炸弹接连落在河边，两三个有高度爆炸力的炸弹落在大使馆门前的石级跟前。我们从防空壕跑出来，看看外边被炸的结果。特桑的地方是一个屠场，但真正的损害还在下边，那里，一方片建筑物变成了一座由木头和瓦砾堆成的山。几辆汽车被压成了奇形怪状的碎片，空中充满了灼热的尘雾。月光中躺着一些青年士兵的尸体，显出被压死的人那种特别凄惨的软棉棉的样子。他们真象用烂布片做成的玩偶一样，好象在临死的一刹那，全部骨头和血都从他们身上被压出来了。

“Allez! Allez!”我听见特桑尖声喊道，而一队奇怪的人马冲下石级，特桑用一根手杖敲着大使馆卫队的脑袋，一边向他们哼着莫明其妙的话。他不住尖叫着，好象发疯一样，把他的不

解事的卫兵们赶到瓦砾场上去。我跟着他走过瓦砾堆。在月光、尘埃、烧过的火药和人肉的气味中，我看见蒋介石的卫队长史丢恩(音)。我不知道他怎样来到这里，但他的确跨立在瓦砾场的一个洞口上，用他的手杖狂乱地翻动着石块。

“这里有活人在”！他叫喊着。特桑随着他的援兵赶来了，他们全体开始工作起来。搬动着木料和石头，而杜尔亭和我替他们拿手电筒。我看不见什么，但史丢恩说他听见有谁在呻吟。过了几分钟，他发见一身棉衣的背部，一个脑袋倒插在两块石板中间，经过五分钟的小心发掘工作，才把身体掘了出来。是一个少年。说来奇怪，他还保留着相当的意识，说里边还有人在。一个五百磅的炸弹投中了那座刚刚在他们防空壕上边的建筑物，要不是史丢恩听见呻吟声，他们全体都要被活埋了，救护人员赶来了，把他们统统掘了出来。

最最可怕的轰炸悲剧是不久前发生在城外的那一次。当一群人正穿过坟场的时候，一队飞得很低的轰炸机出现了。因为畏惧机关枪的扫射，他们躲进几座四川人埋葬他们的死人用的敞开的坟穴里。日机显然无法在城里投弹，就随便把炸弹卸在这坟场上。这群可怜的人一下子都被炸死了，而且被埋葬了。

在我未到这里以前，杜尔亭曾经凭着舒适的河边战胜了所有的空袭，而我好象是一个约拿。^①两天后一个奇怪的事件更加减少了我本来很少的衣服时，似乎可以断定我是一个招致灾祸的人了。一天下午，我出门时，我把一条多余的裤子挂在招待所里的床沿上。一张小桌子放在床和窗中间，桌上放着一瓶水，

① 典出圣经，意思是不吉利的人。

下午的阳光正照在这水瓶上。集中的光线通过这个水瓶在我的裤子上燃烧起来。幸亏刚刚来到重庆的贝特兰跑到我的房里找我，担负起童子军的工作，把开始烧着桌子的火扑灭了。要是再过几分钟，我们都要呆在街上了，因为木架房子在十分钟内就要烧得粉碎。这座房子始终留在那里，直到最近一颗炸弹投中了它，把它炸毁了。

实际上，重庆并不象我们意想中那样恐慌。许多人度过了所有的空袭，甚至没有过一次千钧一发的逃避。从全体居民说来，民气正在一天一天进步着。日本已经作了好几十次的空袭，投下了好几万磅有高度爆炸力的炸弹和燃烧弹，但它不能毁灭这个首都的精神；那已经是很明白的事情了。

日本第一次空袭重庆，是在一九三九年五月，刚在冬天云雾消散，暴露了这个城市的隐藏处以后，当一般人的希望最为微弱的时候。重庆没有防空的武力，只有少数几架高射炮。由国际情势看来，光景也很惨淡。美国没有停止供给日本军需品的征兆。张伯伦似乎准备由克雷吉爵士在东京发动远东慕尼黑会议。重庆政府还在动摇不定。许多人正在经受着生平最大的苦闷。和平传说在垂头丧气的氛围中荡漾，某些官员据说跟汪精卫有私人的谅解。

在接连三天中，日机把重庆进行了最残暴的轰炸，任何城市都还没有经受过的轰炸。它们是四川最初的猛烈空袭。象一切从没有看见过炸弹的作为的人一样，数千市民忽视当面的危险，随便站在露天下观望。好几百人被炸死在街道上，或被陷在火墙后边，因为在二天内烧毁了十二分之一的市区。大多数炸弹都在众人拥挤的商业区爆炸，商人们和工人们都挤集在商

店里和其他房屋里，它们象熟透了的甜瓜一样坍塌下来。差不多有五十万左右的民众逃走了，商业停顿了，市政给破坏了，政府各部院准备更往西迁。这时候，日机突然中止访问了。为什么？它们显然相信自己已经“扫荡了重庆”——正如占领南京以后，他们就以为“消灭了中国军队”一样。

但在这日机莫明其妙地给重庆以喘息时期中，市政府重新组织起来了，几百个避弹所和防空壕从岩石上修筑成了，强有力的救护队和清除队组织起来了，避火道贯穿了最拥挤的市区，政府办公处和司令部迁移到四郊去，分散在广大的地区上。当我从华北长期旅行回来时，重庆也许成了全世界最安全的战时首都。在坚固的沙岩上，在高高的河岸上，很容易建造很深的，足以抵御最重炸弹的避弹所。可惜一开始没有这样做，那当然是很可悲叹的事——但中国人大都在过桥时才开始搭桥的。中国也象英国一样，有时在灾祸未来以前也有所谓应付计划，但难得实行这项计划。现在，日本可以炸毁这古老的城区范围内所有的建筑物，但依旧无法毁灭作为中国政治中心的重庆。

然而轰炸使我第一次明白如下的事情：日机的空袭不是完全不能理解的事，而在某些条件下，毁灭首都的民气和设施，是可以利用这种手段来完成的。然而这些条件都是很特别的。第一，市民对于本市的防卫工作和预防设施的反应必须很弱，以致他们脑子里出现了一种信念，认为本城已注定了灭亡命运，无法挽救。第二，有高度爆炸力的炸弹必须配合着燃烧弹，投落在最广大的地区上，使恐怖变为绝望，绝望变为惊慌，惊慌变为民气败坏，抱头鼠窜。第三，侵掠的飞机必须实行长期的不断轰炸，以保持此种心理上的压迫，使市民陷入肉体败坏的状况。

态，使全市的经常生活趋于毁灭。市民的睡眠、饮食、和安适必须不断加以剥夺；交通、工业和市政必须使其麻痹。

恐怖的持续是战胜民气的可怕的因素，为要达到这个目标，无须庞大的空军。每次只要少数几架飞机飞那么一两个钟头就够了，如果有几次用大队飞机轰炸一天一晚。这样不停地干两星期，便足以粉碎一个防备不周的城市中心，使它不能再起一个战争因素的作用。如果这个城市靠近陆地前线，可能用伞兵和第五纵队先行攻陷，再用突击队加以占领，则上述轰炸行动才有其“公平”的代价。如果他们的任务在那样情形下被“完成”了，则以歼灭市民为目的的空袭才能算得“成功”。

这样占领城市的可能性既不存在于重庆的场合，也不存在于其他大多数被日机轰炸的城市场合。直到一九四〇年八月，日机在中国已经作了一万一千多次零星的空袭，其中六千多次是发生在远离前线的民众住场和始终没有军事目标的地区。这些空袭所毁灭的生命财产，还不及它们所创造的新生的斗志之半。因为那些空袭没有“完成”上述的任务，它们反而激起反侵略的浪潮。它们不过更加提高了人民大众的抗战精神，同样提高了他们的物质力量，使人们加强自己的团结，准备支持必要的措置，以实行更大的持久战斗。

被对于中心市民区的广泛滥炸所杀死的人数还比较少，三年来日机炸死的民众不到二十万人。但一切被炸城市里的几百万劫后余生却因此激起了深深的狂怒和厌恶，他们对于侵略者有一种特别切身的憎恨，你如果没有钻过地洞，没有伏在田野上躲过直插下来的轰炸机，没有看见过母亲找寻她儿子的尸体的破碎头颅的光荣，没有闻过被烧死的学童的气味，你决不能

完全了解这种憎恨。这恐怕是日本对于中国的统一的最大贡献。

但最重要的，还是轰炸在中国人的脑子里唤醒一种重建中国的决心，比敌人能够毁灭的还要快。现在让我们看看他们抱着什么希望，用什么工具干着这个不平常的尝试。

自由中国的基础

中国的新景象，为日本所促成——而这新景象是在西部的。——W. H. 端纳

当人们在感谢战争把“有教养的中国人驱至西部”时，时常忽视了。这人口的移动，是在内地迫切需要受过技术训练的人们时发生的。华西以牺牲游击区域，剥夺它大部分优势的技术人材，便利了自身的发展，而政府为着抗战也集中其力量于华西而忽视了华东，并且还有意在若干地方显示出它的这种态度。

然而，如果历史真的是以剧烈的跳跃与“波动”——借用一个著名地质学家的话——作着英勇的迈进，只有小的变化才能避免广大的灾害的话，那么，中国的回至西部，或将是全世界最重要的一件大事。战争显然已在中国激起了一阵社会波动，其变化的深刻，正跟欧美许多极大不幸所发生的影响一样，现在我们来想，欧美当时的不幸，对于其后的进步乃是必要的。同样，中国的放弃华东而被迫开发华西，使之现代化，也许终要被人视为当代最富于革命意义的事件。

为什么中国要到现在才发现了他们自己的西部呢？原因是

非常复杂的，这里只能作一些简单的说明。

首先，今日被称为“新中国”的，实际大半是最老的中国。尽管人种学家与汉学家对中国民族的起源有种种说法，一般都公认中国文化的发源地是在西北，最初大概在渭水(陕西)的上流，然后传到汉水流域与黄河流域。中国的发源地是在甘肃、陕西、宁夏和河南，只有到很久之后，这些省份才变成干燥的地方。汉人以其基于河川、运河与灌溉制度的农业经济，逐渐趋向东方平原，开头沿着黄河流域扩展，其次再及于长江以至太平洋，然后到达了多山而肥沃的东南。

当西欧由海道与中国接触之后，近代商业与工业的大中心，当然集中于东部沿海一带，同样铁道与交通，也大半仅限于东部的沿海区域，劳工移动的时期开始了，中国工人对变革中的中国的认识，要比富有的地主多得多，地主们开头非常小心地由内地跑到通商口岸来，而国外帝国主义者乃是这些口岸的真正的主宰者。在群山叠嶂阻隔之下，大部分的华西，仍然与这改变了东部的产业文化不相接触，而且对其集中的势力，抱着敌对的态度。这一次的庞大战争终于震开了由城市回到农村，由太平洋回到中亚细亚的中国人的眼睛。

在日本侵略发动之前，遥远的华西，在大部分的中国人，甚至是受教育的华人看来，乃是未发见的大地，距非洲腹地一样的遥远和难信。几年之前，我曾和罗克博士的远征队穿越滇省西部，南入缅甸，但由昆明铁路的末站出发，一直花了我们六个星期，当时这省里连公路都没有。不过此行是值得的，我在那美丽的边界上，看见了中国的未来。在这次旅行中，我从未遇到一个“外国的”中国人，后来，当我回到沿海地方，我也

从未遇到一个知识分子，曾到过他本国这一块伟大的地方。

至于西方的传奇、传说与历史，不用说，是中国人遗产的一部分。西方在中国小学儿童心眼中，是荒诞的古典作品《山海经》里那些最惊人的神话的故乡。这古典作品叙说许多无头的人、贯胸的人、巨人与侏儒、有翅的母牛、人头的毒蛇、飞沙走石的沙漠与西北海外的蛮荒。这些故事中，有一部分，无疑也包含着斯威夫特在海外《渠轩录》中所讽喻的真理，而且流传至今已达二千年。中国古代著名史学家司马迁的著作，千百年来，也使中国人知道了他们的西方，而《三国志》也使每一个小孩，晓得一千七百年前曾发生过大战的那些历史上的河川、山岳、峡谷与丛林。

然而，关于这些内地边区的潜藏富源的近代科学的知识，却仍然极少，而公众对这些的忽略，也足以惊人。外国探险家对于当地地理的情况，要比中国人知得多。在汉口和广州陷落后，那千百万跋涉长途，越过高山与大河以找寻新的住处的人们，他们所有关于发现、危险、艰难与冒险的先进经验，实在可与十九世纪美国向西方移殖的人们以相比。

就地理上说，中国的面积在四百万方英里以上，比整个欧洲还来得大，或相当于美国和大半个的加拿大。日本现在自称已占领了一百万方英里以上的地方，包括满洲、内蒙和华北。她在中国本部约占有六十五万方英里，但真正被征服的地方只有极小的一部分，到了一九四〇年，我们所说的“自由中国本部”，即西藏、内蒙古与游击区不计，仍有二百二十万方英里，约九倍于德国本土的面积。

中国人把“自由中国”——这名称实际上是很不恰当的——

分为东南、西南和西北，“东南”包括沿海各省如浙江、福建与广东，以及为上面三省所围护的江西。广西、云南、贵州、湖南、四川和西康则统称为“西南”，这地区与越南、缅甸和西藏交界，面积约七十三万方英里，比日本本部要大五倍。至于“西北”，则包括如下几个大省，如陕西、甘肃、宁夏与青海，总面积约六十二万方英里。

此外，中国还有着极西的新疆，其面积之大，约等于整个西南，而且约当战前德国全土的四倍。

谁也不知道中国究竟有多少人口，根据不完全的数字，现在住在自由中国的约有二万万五千万人，那些被日本控制的地区的人口，尚不计在内。单西南一地的人口，约等于日本的两倍，四川一省已有五千万至七千万人，说不定世界上的四川人要比日本人来得多，但在四川，以及别的所有的自由省份，你所能找到的现代工业，却没有你在日本大阪一处所找到的多。

除开煤铁之外，这可说是处女地的华西，拥有中国最有价值的资源，其地位只次于满洲而已。煤的储藏量相当多，在西南据估计约有一百三十万万吨。四川与西康的铁的储藏量，已知的总数达四千万吨，虽然大半是菱铁矿，质量较差。云南是东方一个拥有许多极有价值的锡矿的地方，而且还富于铜、水银、铅、锌、锰和锑等矿产。

西南与西北到处都可以找到各种有价值的矿产。江西有大的锑矿，它与湖南、广东出产的锑砂合计，约占全世界锑产的一半。江西还拥有钨、铜、钾、煤与铁的矿藏，广东的钨砂在世界市场上是非常有价值的东西。总之，现代工业所需的基本矿藏，在中国的各处都可以找到。

再往北看，新省西康有着铅、铜、镍、锌、黄金、石膏、石棉、石墨和硫磺，还有铁矿与煤矿，此类矿产，西北各省都有多量的蕴藏。据说青海的金矿特别丰富，新疆金的采掘量已日见增加，一九三九年金产值七十五万元。新疆是遥远的、荒芜的。但它却有许多重要的矿产，如煤、银、石脑油、硫磺硝石与碧玉。

然而，关于这些地下的矿藏，也仍然无人知其确实的数量，只在许多地方作过表面的调查而已。地质学家与工程师对同一区域的意见，时常不相同。例如，据说甘肃拥有一些油矿，政府也在那里开了几个小小的油井，国联顾问斯丹帕尔博士几年前曾说，甘肃的油藏，是世界最有价值的油藏之一，但这跟外国油公司的意见恰好相反。在甘肃的邻省陕西，穷苦的山居者掘开油浸的地面，以简陋的压榨法提出油来，拿到城里去贩卖。在共产党边区政府服务的地质学家，最近曾在陕北作过一番详细的调查后，宣布他们发现了富有油藏的矿脉达四十处之多。但为了他们没有钱，又不能取得外资，结果无从开发。

因为没有现代的交通与工业，大部分最好的资源至今仍然没有开采，特别以西北与新疆为例。交通最发达的是华南，而四川是政府施行工业化计划最适宜的省份，虽然它所有的基本矿产并不多，但它是自由中国的经济的、政治的与军事的焦点，它有最多的人口，农业生产也最盛。它是中国新公路网的中心，其水道交通更比其他部分，给予了便宜的运输便利。

中央军现在已控制了四川，银行家在那里很有信用，私人资产也觉得比前时更有保障，四川的众多的人口，富饶的农产，以及有价值的盐矿，使政府得到很大的税权，而桐油、菜油、

猪鬃皮革等的出口，更有助于自由中国对外贸易的平衡。一九三九年中国猪鬃的出口，值二千八百万元，桐油出口约七千三百万元，后者在政府统制之下，约占中国对美输出总额的三分之一。在英法封锁滇缅与滇越边境之前，重庆就是以它作为抵付由美购得的汽车和机件的主要物品。

西南在战前大半是自治的或半独立的省份，但现在已成为中国抗战的主要根据地。西北的几个部分，实际上是完全独立的，在西南地方，约有属于二十三种种族的一亿五千二百万少数民族，他们从来被吸收或被感化，虽然他们生活在中国的边界，至今已经数百年。西北又有一千万回族与数百万游牧的蒙古人，藏人与维吾尔人，他们散布于极广的地带，只有到最近才和机械时代发生接触。他们强烈地卫护着少数民族本身的权利，始终不承认他们是中国人，并反抗中央政府的直接统治。

宁夏和甘肃两省，都有一部分蒙古族；青海和西康的一部分则得之内藏。云南向来是独立的，境内许多部落的辖地，也久已实行自治。中国政府应当谨慎对待他们，避免在国境内外的某些未开化的种族中，引起了种族的或宗教的敌对，这些小种族，一向宣言他们远在汉人到来之前，就已占有了那些地方。少数民族反对大汉族主义，正如重新爆发的国共内战相同。中国与边疆外的小国如不丹、尼泊尔、阿萨姆、缅甸、越南、暹罗——这些都曾经奉中国为宗主国——的关系，现在也成为非常有趣的和非常重要的问题。当日本及欧洲帝国主义封锁了滇缅、滇越的边境之后，如果中国觉得有重开这些边境的必要，而英国可不愿意这样做时，究竟中国将采用何种手段以解决这个问题呢？用帝国主义的还是用革命的手段呢？

如果“自由中国”要做到名实相符，不致徒拥空名，那么这些就是建立起一个比战前更坚强的和更贤明的国家的基础。许多见过这个“新”中国的人，认为战争打破了这区域几百年来的孤立，结果也将因这里建立起一个亚洲的有地位的新国家，——一个在全世界生产者消费者中，占有第一等重要地位的国家——而使战争宣告结束。但是与目前中国农民的苦况相形之下（这些下面另有说明），他们这乐观似乎是毫无根据的。然而谁又能够否认，这种可能与需要不会给他们带来实现的保证呢？

生产的贫乏

日本不能打击我们，因为我们本质上就是一个农业国。

上引这一类的意见，在中国是很普遍的，但不幸的事实乃是：因为中国是一个非工业化的国家，所以日本能蹂躏中国。

高丽（朝鲜）、满洲、印度所有英法荷等国的殖民地，以及革命前的俄罗斯，也全都“本质上就是一个农业国”，现在中国发觉她属于同一范畴，显然对她并非有利。恰正是为了这一点，所以引起了日本对她的侵略。空间，是中国方面一个因素，但她不能与产业的落后混同。唯其因为中国仍然“本质上是农业的”，所以巨大的空间不能加以部分的利用。如果中国的工业经济能充分利用她的巨大的空间的话，那么日本是决不敢侵略中国的。

同样，中国现在也不能拚命恢复她已失去的工业，而工业对于任何一个要在现代战争中获得胜利的国家，是最基本的东

西。中国在作战最初三年中，已失去了她百分之九十五的工业，因为上海、杭州、无锡、南京、汉口和工业的工厂都没有内移。

自由中国因为是一个未经发展的国家，她的最大的困难是运输与交通。在一九四〇年，她的旱路（雨天即失作用）尚不及五万英里，但美国铺有路面的公路却达五十三万英里。在各自由省份中，五分之一的公路是在战后开始筑成的，现在每天约增加七英里。最重要的路线，是由重庆至新疆的公路，长三千英里，由重庆至腊戍，长一千五百英里，这条路使华西与缅甸及印度得以接通。

经由上述两路以及另一条由越南至广西的公路，和由河内至昆明的滇越铁路，在主要海口失去之前，总共运入了中国必需军火与工业品的百分之九十。内地的一部分铁路现在还在中国人手中；即由河南郑州至陕西宝鸡的陇海路，由湖南衡阳至广东韶州的粤汉路，由江西安昌附近至浙西的浙赣路。一条由衡阳至桂林的新铁路已经完工，现在正在增筑，使她深入至贵州省会的贵阳。

自由中国的铁路还不上八百英里，而美国同样大小的区域，却有着十六万英里。中国铁路被日军夺去的，约八千英里，包括华东与满洲。西南现在已在构筑新的路床，也许将来长江流域与云南、缅甸及印度洋之间，可以有铁路的交通。此一工程虽曾迅速进行，但因英帝国主义者绥靖日本，封锁缅甸边境，禁止铁路材料运入，终于被迫暂时停止。

由缅甸、越南与香港至内地的航空线照样运载旅客，而重庆与各省省会之间的内地航空线，只须几小时就可到达。一九

四〇年中苏间新设一载客运邮的航线，即由重庆至哈密再由哈密至莫斯科。中缅航线则与皇家航路相连，又通至香港，或太平洋飞剪号航线相接。飞机对中国达官与外人，的确天赐之物，按外汇说，内地票价便宜得出奇，但是对那些没有地位或出不起票价的普通人，依然毫无帮助。

普通人民另有一种办法，那就是搭乘汽车。但公路上行驶的汽车，百分之九十为政府及半官性质的独占公司所有。中国汽车总数不到二万辆(美国已登记的却有三千万辆)，其中十分之一在滇缅路上行驶，一九四〇年七月因英国封锁该路，全数调至所谓“赤道公路”。

中国所有的汽车都是美国货，而且差不多都是最新式的，政府命令在公路上开驶的每辆汽车，应首先运载如下六项，即军火、士兵、药品与伤兵，政府贸易独占品，油与汽油，以及工业的需用品，在此六项之外，还用无数的东西，而最后一项，才是搭载旅客。几家真正商业公共汽车的座位，在许多天以前即已预定一空，而私人汽车，实际上已不再存在。

中国需要十倍以上的货车，在十倍以上的公路上行驶，但它却不能输入足够的汽油以开动它现有的车子，甚至即以一万辆货车而论，如每车每月开驶一百英里，中国每年就必须使用四千三百万加仑的汽油，这项汽油的价值，依一九四〇年的市价计算，约需五万万元，此外，修理及换胎的费用约需一万万元，这两项合计，已等于中国政府每年预算的三分之一。中国大部分汽车闲置不用，就是因为没有足够的汽油。越深入内地，汽油越发稀少，比生命还要宝贵。普通市民如没有政府的签证，就不能买到它，而签证十九是领不到的。

补充稀有的摩托运输的，是千万辆的骡车，这些车子都使用旧的美国汽车的轮子与车胎。每只骡车的费用，在一九四〇年约需三千元，即车轮与旧胎二千五百元，骡子与车子五百元。骡马的数量并不多，有许多为军队所专用，因此又动员了一大队的人力车，我曾亲眼看见一大队手推车子，每车上装着八分之一吨的棉花，推到五百英里外的地方去。但最缓的乃是千万的骆驼，驴子与背运人伕，他们在各自的硬结的背上驼着其重量令人相信的各种物品。

滇缅路每月可以运载九千吨的货物，牲畜又运了另外一万吨，滇越路每日可运一万二千吨，另一条滇越路约可运二万吨。在西南边境被封锁之前，自由中国所有现代运输工具，每月可以运入五万吨，至于由水道小路等通过战区与封锁线的，则不计其内^①。跟战前的比较起来，单钢铁一项，中国每日输入的其总额即已达五万吨了。中国对苏联接济路线的倚赖，当所有各路都已封闭之后，当然是更不用说的了。

在政府迁至华西之前，当地实际上没有再生产的工业。而由长江下游抢救得来的又不多，因此工业发展的速度，完全看运输主要机械的力量如何而定。这决不是一个修补破旧的问题，而是从战争的混乱和不断的抗战中，织造一个差不多全新的工业。

基本缺乏的是钢。在重庆统治下的各省份中，并无高度标准的钢的生产，甚至连足以制造机械的好钢也很缺。西南和四川可用的废钢极少，简直无法买到。即使输入外国废钢仍属可

^① 第一次欧战时，美日为着接济在法的一百万大军，每月须运输七十五万吨的军火与用品。

能的话，单运输一项的花费，已使它无法大规模使用。中国必需以增加铁的生产量，来解决这个问题，在一九四〇年，它的生产量约五万吨，而自由中国的钢的生产量，每日仍只有六十吨，而且并不是都适于制造军火之用。以这跟日本钢的生产比起来，其差额实在惊人，因为据计它每日约出产两万吨。

政府仍然以更大的精力与实践来对付这个问题，它开发华西若干当地的铁矿，建立若干小的比斯美尔炼钢设备与熔铁炉。虽然自由中国能够生产足用的铁与钢，以适应战时工业化的需要，但炼钢工业的前途似乎并不怎样乐观，除非新疆与云南出产的铁砂质量优良。就中国已知的十三万万吨铁砂储藏量而言，有百分之七十已在满洲失陷时沦于日本，其余四分之三，又在察哈尔、内蒙与长江下游为日本所攫夺。一九三一年，占中国铁出产百分之八十以上的铁矿，也已被日本夺去。同样，中国战前所有的熔铁炉，除小部分的配备由长江运至重庆，也已全部委让日本。中国最大的熔铁炉，即北平附近的龙烟，每日能出产三百吨，竟毫未损坏地为日本夺去。现在只有游击队的活动能阻止日本利用龙烟铁厂，或阻止察哈尔铁砂对它的供给。

关于中国工业的“长征”，即由沿海迁至遥远的华西一事，已有许多的叙述，但我想大半的叙述恐怕有极大的讹谬。政府的确曾经计划过。把受威胁的各城市的工厂，移至内地，但因未能推行广大的动员，以致阻碍了少数有意把大规模的城市工业改成为小规模农村工业者的努力。这一半是由于官僚的无能、腐败和愚蠢，一半却由于中国资本特有的“买办”性质，而政府又不愿强征他们的产业或资本，因此只有极少数的民族资本家把工厂移至内地。另一方面，如我们上面所说，几十万万

的游资却“暂时”逃至海外或沿海各通商口岸的租界里。

我这里只想举出一例，以概其余。在香港几十个中国的百万富翁中有一个是著名的国民党官员，他的妻子最近向政府聘请的一个工业专家提议，请他辞去那个(非常重要的)职位，代她到上海去经营几家纱厂，她力说最近中日可以实现和平，而有关各列强又会保持租界，投资在那里确很安全，而且利息是那样高，这工业马上可以获得厚利，所以这计划是十分正确的。最奇怪的，是那位工业专家当时正在她丈夫的部里任职，负责建立某几种主要的工业，而且又拒绝她的请求。但愿我能有充分的篇幅，把我个人所知的，那许多不但有这想头，而且还加以实行，始终不愿在中国内地冒险投下一元资本的人们，充分记述下来。

结果私人经营的工厂移到内地去的，只有三百五十四家。以欧美标准而论，这些都是极小的工厂，它们的机件总计不过六万三千吨，比起美国一家大的钢厂来还不如。其中包括机械厂、电料厂、纺织厂和化学工业厂，其余的尽是些各式各样的轻工业。一九四〇年初，这些工厂开工的只有二百家，而且一半集中于四川一省。有许多还要等到新电厂完成后才能开工。自由中国全部只有二十家电力厂，其中十五家是在经济部翁文灏统辖下的资源委员会经营的。

其余的工业，除“中国工业合作社”(在人员与组织上，“工合”与其他工厂完全不同)外，差不多都为政府所独占经营。它直接拥有锡矿与煤矿，还在甘肃开了四个油井，油的产量额能令人满意。四川的炼铜厂也为政府所开办，昆明附近的另一家炼铜厂，也为政府所经营。此外，政府新近还开办了铅、锌、

锡等的冶炼厂，制造机械、无线电机电料、火油和榨油等工厂。它还和银行家及私人资本开了一家造纸厂，一家苛性钠厂和别的各种工厂。这些都是认真的冒险，而规模最大的，是榨油厂，全日需用汽油与火油一千加仑。许多别的轻工业或重工业，都在计划或建立中，但在自足自给的工业尚未完成之前，许多方面的困难是必须克服的。

这些简陋的工厂，有四分之三完全供应军事的需要，而且差不多吸收了全部以铜和钢的出产，消费品是极度缺乏的，虽然它也许还不致象消费者要求较高的国家那样地惊人，然而无论如何，它确已非常严重了。棉布价格，到了一九四〇年中旬已涨了百分之四百，一条普通毛巾要买到二块钱。制成品价格的飞涨，较之农业品要高得多。艾黎及中国工合提倡者的预言，业已证实了，因为战时经济只有在极广泛动员人力，以自国资源应付本国市场需要这一理论的正确，业已越来越发明显。（关于我在西北亲眼所见的工合运动发展的情形，下面另有叙述。）

不管大部分工业景象如何黯淡，我却在技术人员，特别是工程师中，发现了一种坚决的精神，与乎对中国必能复兴的能力的确信，这与官员的失败主义恰正是一个鲜明的对照。下面就是一个例子，当我在西北旅行时，曾见过一个青年工程师，那时候他刚从香港回来，他对我说曾花了两天功夫在香港购物。

“你买了什么呢？”我问他。他从口袋里摸出一个盒子，当我面前打开来。

“这是我买到的最好的东西，”他装着鬼脸说。那盒子里面装着的，充其量，是一副假齿。

“不是给你自己买的吧？”

“是的，”他非常认真的说：“我现在用不着它，但几年后是用得着的，在战事没有结束之前，我恐怕是不能回香港去的。”

这种无限的忍耐精神，在军队中是非常普遍的，虽然，由于战争的工业基础的薄弱，他们的作战效率已大受限制。但在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一组织，因为中国工业的命运，现在完全靠着军队保护工业的能力，这正如军队的命运，完全为供应他们的需要的工业能力所决定的一样。

中国的主力

我的军队可弯而不可折。——蒋介石

首先不管中国在计划、行动和指挥上的弱点，我们在判断中国陆军时，必须记住一个最重要的和最惊人的事实。这事实很简单：这个被愚弄的、落后的、贫穷的中国，这个被东京称为“不是一个国家，只是一个地理名词”的中国，这个欧洲人蔑视地指出，在日本机械化部队进攻下，至多只能支持六个月的中国，毕竟仍然站着身子迎击它的敌人。远在奥地利人、捷克人、波兰人、丹麦人、挪威人、荷兰人、比利时人、法国人和罗马尼亚人迅速溃败沦亡之后。

这些不幸的中国人有着许多足以自傲的理由。与一切的显示(包括他们自己的。)相反，中国内部的团结，已经多少抵挡了许多次的打击与危机。在千万困难之中，他们又组织了新的根据地以继续进行抗战。不管千百次的接触与十几次防卫战略据点的大战，中国战术上的巧妙，终使敌军无法达到她的主要

目的：即歼灭中国的主力。在所有多次的战斗中，中国军队还没有遇到一次跟法国所遇到的在一星期之内即已损失了法军主力一样的不幸。这蛟龙自一九三七年之后，曾受伤倒下了好几次，但每次它都苦痛地挣扎着站起来，再行从事战斗，而每一次当它舐好了它的创伤，它更加确定地感觉到，日本人这次致命的打击又落空了。

不管它的工业机构如何草陋，中国在军事战场上并未受到打击，反而显出稳定的，不过是迟缓的进步，在重庆，一个曾经注意过中国每次战斗的，最胜任的美国军事观察家，对我这样说，现时中国军队所受的训练，所有的配备以及军事的指挥，都比开战以后任何一个时期来得进步。一个苏联军事观察家，刚就长期旅行和考察了一半的战线回来之后，也对我发表大体相同的意见。他们两个因为惯于西欧式的寻找决战的战争，全都自认无法发见一种战略的目的，他们都觉得，在军事意义上说，这种战略完全没有一处显出了决定的作用。

事实是这样的，中国的军事领袖显然把决胜分成了好几部分，单是使日本无法获得全胜，在他们看来也算是一种有限度的胜利，蒋介石曾满意地对我说：“本来，日本希望在三个月征服中国，打至我们屈膝。日本的目的，是求得迅速的胜利，这一点，已在好久之前就被我们击破了。所以这事实在我们看来，也正是一部分的胜利。”因此他把每天战事的延长，看作是日本整个挫败的积聚，而无数小败的综合，将成为日本最终的失败。

中国军事领袖对这种战略的信念，从未动摇。这战略原理，即“持久战三阶段”，本来是由共产党领袖毛泽东拟成的。简单

说来，这三阶段是：（一）日本进攻，中国“在空间上后退，在时间上前进”；（二）日本攻势在西南山岳地带达到她的顶点，日本作战力减弱，中国继续动员，两方陷于相持；（三）日本国内及国际矛盾达到破裂点，配合中国的最大限度的动员和大规模的反攻获得胜利。

然而，有一些人，关于在某一特定时间进入某一特定战争阶段一点有着不同的意见。欧战爆发之后，许多中国人相信“大规模反攻阶段”已经到来，当时我恰好在延安，而毛泽东的意见与这是完全不同的。他认为战争只刚要进入第二阶段——相持阶段。在这一方面，蒋介石的意见，大体也跟他的相同。两个人都认为在没有达到完全动员以前，抗战的路程还是很长的。这一点，从中日双方军力的对比上是表现得非常明显的。

由于中国人本身的夸张，人们时常夸大中国陆军在数量上所占的压倒优势，不错，中国在战争初期拥有二百万的常备军，但它的受过训练的后备兵员的数量却非常有限，尤其是军官人材更感缺乏。强迫的军事训练，还不能产生足以重视的学生后备军，在战事开始后，新军官又必须受过充分的训练，而集中指导的征训制度，也进行得非常迟缓。在战争初期：部队的补充都由各负责军官自己设法，而他们时常是以民团作为补充的。

中国人力的资源，现在由于战事的继续业已多少减弱。有一半的人口，就住在日军占领的区域中，只有游击队才能加以动员。华西的壮丁，有千百万人正在执行运输、造路、工业、开矿和农业生产等工作。行政院秘书蒋廷黻曾对我说，在自由中国执行民团职务的壮丁，约达二百万人——这数量比前线的作

战部队还要大。

没有一个人能够确切知道战争开始后中国士兵被杀的数字。中国政府跟日本政府一样，没有发表过完全的死伤的名单，一九四〇年二月，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发表一篇文告，估计中国死者三十六万二千人，伤者一百零八万七千人，但在同月中，官方文告又说单一九三九年一年，疗治伤兵约六十七万五千人。远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蒋介石在公开演讲中承认，自七月抗战之后，中国方面伤亡在三十万人以上。这可能是过低的估计，但甚至如若后来所受损失，其平均数并不较以前的为高，那么三年来战争伤亡也要达二百十六万人。据一九四〇年许多外国军事观察家的估计，总数也由二百万至四百万。无论如何，损失至少要等于原来所有的战斗部队，这是可以确定的。

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陈诚将军，最近曾说，目下前线作战部队的数目为二百五十万，正受过军事训练的壮丁则达一千五百万。但是，只要他所说的数目有一半可作为编队的后备军，那么中国已可以有三倍的兵力以代替眼下在前线作战的部队。有人也许要问，为什么中国不把它的兵力扩充至一千万呢？这主要是由于供养军火和运输的问题。只有高度工业化的国家在战时能够保持一队集中的五百万人的大军，但中国工业的薄弱，我们已在上章说明过了。

一九三九年，自由中国各省只有三个重要的兵工厂，最大的一家是重庆附近的第二十号厂，每月能出产二百架机关枪，十三万发迫击炮弹，和一些自动的与普通的步枪，它不能制造大炮。另外两家也出产各种军火，不过数量更少，而各省设立的军火厂，则只能制造枪弹与小的武器。步枪子弹的生产总量，

每天大概不会超过几百万发，所以只能补充二千英里战线每天的耗费。中国如要配备更大的陆军的话，它只有迅速建立许多小兵工厂，分设各处以应急需；或则大量增加它的输入品。中国还可以采取“流动兵工厂”的办法，在敌军后方，把随身武器供应五百万游击部队。但军事委员会却决定主要依靠进口军需，这理由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中国购买外货的最重要的信用贷款，是从莫斯科得到的。一九三九年，苏联又把贷款增至七万万五千万卢布（一万万五千万美金）。苏联对华的援助，与华盛顿进出口银行所给的贷款完全两样。美国不过是以非军需品换取中国的军需原料，丝毫没有一丝赠助的痕迹。英国的五百万镑贷款也是如此，因为规定条文的苛刻，中国至今只能动用极小的一部分。

西北公路的地理上的限制，还是十分严重的，据说苏联援华军火，由黑海开至缅甸，再由缅甸运往云南，比之经由西北公路还要合算。每一辆运载军火至西北的苏联汽车，需要十五头牲畜或骆驼以运载供应的汽油。

至于空军呢？美国柯蒂斯·赖特和内陆航空公司合办的中国飞机公司，在云南、缅甸附近，开了一家制造厂，一九四〇年每日可以出产二十架，但这工厂本身不能制造引擎、机件与机轮，这三项都靠输入。大概每架飞机可以比自国外买来的便宜百分之二十，但美国老板却都得了巨额的利润。另外一家装配工厂，由苏联管理，设于新疆。云南还有一个美国机师教授的航空学校，西北也有几个学校，但由苏联人员负责训练。中国空军人员，在汉口大战末期，差不多已牺牲殆尽，余下的数量极少，而且比较不足重视。

中国今日的战斗机都是苏联供给的，中国若干次空战的胜利也应归功于苏联机师。一九三九年，约有一百五十个苏联机师住在成都附近，其营房之大，足容六百人寄宿。在甘肃省西部兰州附近，停有苏机一百五十架。计划经常保持五队的实力。可见苏联援华抗日的态度。苏联对华的援助，如战争进入决定阶段，还将大量增加。

除空军而外，中国陆军还聘请了约五百名的苏联顾问。他们大部分完全限于提供战术的和技术的意见，并在各军事学校任教(各学校约有干部九万人)。同样，每一方面军都附有苏联顾问。但是，甚至苏联军事代表团的领袖，对蒋介石的影响，也决不能与法根豪森将军(前德国驻华军事顾问首席)相比。蒋显然只需要军事上的指示，而苏联顾问也有意规避不谈战略问题。至于政治教育，不用说完全由蒋介石本人的政治部负责。

苏联的军火供给，虽然是重要的，甚至可说是主要的，但中国还不能单靠这些供应构成一个大规模的反攻的基础。假如苏联加强了中国的空军，中国自身却没有足够的运输与燃料的储藏，没有大炮与炮弹，没有足用的步兵和巨大的火力。即使中国没有更多的坦克——甚至没有飞机——也还可以对付的话，无论如何，它不能以稀少的大炮与有限的运输进行反攻。大量的军火已储积了，但这与驱逐侵略敌人时所作极大努力的极大需要，还是不相称的。

我们时常听说中国还保留着它的“机械化部队”。这种传说是没有根据的，因为中国只有两个轻坦克师(老实说来，还只能称为轻坦克旅团)，包括机器脚踏车哨队、化学战队、摩托化的炮队和几千名摩托化的骑兵。初时中国的乐观分子，还希

望可以得到国外大量的援助，他们心想中国可以组成一队强大的，可以在反攻时冲锋，克服重要战略据点的摩托机械化部队。现在看来这种想法，正如梦想中国可以由外国运入的飞机，组成一个强大空军一样的狂妄。日本曾长时间竭力去嗅出这些躲在西南某处的机械化部队。最后，在一九三九年南宁失陷了之后，其中有一师曾领导反攻，企图收复南宁，结果在失败时失去了它一半的配备。

一个没有摩托工业，没有油的资源，没有重军需工业，和没有海军以保卫它进口航路的国家，要企图建立一个机械化的军队，似乎全是一种梦想。但中国的将军们，犹如别的将军们一样，只在失败中获得教训。现在，有一些已认清了，还不如把同样的款项用以输入机械，来得更有用些。中国如果有了基本的再生产的机械，它就可以建立必需的基本的工业，和设立一种有价值的内地小型军需工业的制度，而这些正是中国目下迫需的。

在汉口失守之后，蒋介石终于认清了，中国反攻的基础，只在于丰富的人力，与乎组织民众的效率，这一事实，比之推动机械化还要来得重要。不用说，如果日本能够胜利地绥靖她的占领区，剥夺了他这一优势，那时候他显然只好无限期地在西藏的边境住下来。因此，在一九三九年的著名南岳军事参谋会议上，他宣布了他的新计划，这在他实在是一种革命的宣言。

“人民比军队更重要”，他说，“游击战比阵地战更重要，士兵的政治教育比军事教育更重要，宣传比枪弹更重要。”

不久之后，蒋便模仿延安共产党的抗日军政大学，开办了

一个游击训练班，教导正规军可以作游击战。共产党最有才能的战术家前红军参谋长叶剑英，也被聘为短期顾问。一九四〇年陈诚将军宣布，除前线部队而外，已派遣总数达二百万名的军队开入日占领区，叶剑英却认为至多只有五十万而已。他对我说，这些部队大部分集中于长江北岸，即湖北、河南、安徽、鲁南与河北。

但几个因素阻挠了这种新的游击队。必须记住，在主力华军撤退之前，并没有准备好支持流动部队的独立的军事、经济与政治根据地。在这些依样画葫芦的游击队中，不懂政治领导，和军民合作建立此类根据地的技术，因此有许多立刻就被消灭了。要把旧式的，不惯于军民合作的军官，在极短时期内，训练成为民主的，能够得到人民的支持与保护的人物，又怎能成功呢？另一个弱点，就是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人员，最关心的是从共产党同胞手里“收复失地”，而不向日本收复失地。

在游击区里作战的军队，如得不到民众积极的支持，马上就会受到民众积极的反对。如果它不能运用巧妙的，运用当地资源的方法，以获得民众的拥护，那么它必然要变为以强力压迫民众加以支持的匪帮。——在这种情形下，它已不再有防御价值，而先成为敌人的目标，后成为敌方的盟友。那些新的游击队指挥官如果懂得他们是完全倚赖民众的支持的，他们都可以做得十分出色，——这差不多都是模仿共产党的工作方法的。至于那些用旧法作战，没有得到动员民众的队伍，全都马上就消灭了。

军事训练总监与副参谋总长白崇禧，是中国最有才能的军事指挥员，新军质地的改善，可说是他的功勋，在战前他和李

宗仁将军胜利地守卫着自治的和强大的小省广西，拒绝服从南京的国民党，因为他认为一九三七年以后的国民党是反革命的。南京人员时常斥他为“反动军阀”，但当试验到来，蒋介石握住全国抗日战争的领导权之后，广西军队却是最强大的一个抗战堡垒。在抗战中，他们始终勇敢作战，不断在华中首当日军攻击之要冲，甚至在他本省广西被侵犯时也是如此。

法根豪森将军有一次曾不满地说：“白崇禧是中国唯一的将才，我可以把一切教育他，因为他是唯一一个承认他一切都不知道的人。”白崇禧的出任参谋长（虽然他的意见并不见得有何力量），的确改善了军事人员的才能，和有助于全国的统一。他反对反共的黄埔干部所抱的内战心理，而竭力在新的军官中培育一种革命精神，而这精神已从他自己部队的勇猛中表现了出来。白崇禧是一个国民党的老党员。但他在广西的施政，却多少与共产党所已实行的相似。中央军将领，晓得革命教育与群众组织，在抗日斗争与争取胜利中的价值与必要的并不多，而白就是其中的一个。在批评那些有心内战而无意抗日的人员时，白崇禧总是勇敢的与直率的，就是他对蒋介石有不满的地方，也毫不踌躇地表现了出来。

“共产党所应用的有效的方法”，白崇禧坚持着说：“革命的国民党都可以实行。国民党对共产党用以获取胜利的方法，不应烦虑，应大大烦虑的，乃是它应如何在它的统治区域内去获得它。共产党是抗日的，而且打仗打得非常好。只要他如此，我们不应反对他们，而应帮助他们。”

“共产党是不能用压迫加以破坏的。如果我们的领导比他们的强，比他们的进步，那么我们就可以对抗他们的势力。国

国民党要作为一个政党存在，只有领导民众走上进步的大路。否则，不管压迫共产党如何严厉，它本身还是不能存在。一个政党不进步不发展，就只有灭亡。而现在进步的途径，就是采取一切方法去获胜，如果这次战争是在国民党领导之下获胜的，那么国民党将比以前任何一个时候都来得强大。”

国民党和军队中的顽固分子，对这些意见非常痛恨，但赞成这些意见的人，却比表面上以为多。许多有着革命背景的青年，都被强力编入陆军中，设若内战再度爆发，他们的反应，也许将完全出乎人的意料之外。

就上面的进步看来，军队与民众已有了更密切的关系，如果我们说，由于军队被迫更加倚赖民众的支持，以致它的领导不得不反映一种真正民主的意志，这也许不是过份乐观的断判。不管它现有的许多缺点，中国国军(共产党军队也包括在内)是一种伟大的成就，而且寄托着全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光荣与希望，他握住了中国的政治命运，这是对的。只有那些准备为祖国而死的人才配统治它。

另一件事，中国千百万被压迫的民族不外是亚洲被压迫民族之一部分，他们解放的希望就寄托在这军队的胜利上面，假如中国最后终于失败的话，那么，现在认为他们的奴役只是暂时的台湾人、朝鲜人、满洲人和蒙古人，也将被迫自认为是永远的了。不但如此，如果中国明天屈服的话，还有什么能救出别的东方人，那些目下快从西欧帝国主义压榨下解放出来的安南人、菲律宾人、马来人、爪哇人、暹罗人、缅甸人和印度人，免受东方新帝国主义的野蛮的奴役呢？

第五篇 中国的“工合线”

一个理想的史诗

中国工业合作社正在打下中国新民主的
基础。 ——克里普斯爵士

在日方加紧其海上封锁之后，倘不是中国工业合作社——即“工合”——有惊人的发展，那么中国前途的希望，就要暗淡得多。那个朴素的念头现在已经变为二千英里长的一条活的链条，即使日本造一座新的长城把中国完全围住，这链条也天然能够继续扩大。由于它的更进的发展，中国不但许多种军需品，而且日用东西，都依然能够得到实际上的自足自给。

在工合的技术上面，中国找到了一个对付空军威胁的工业防御的原则，可以适用于力弱然而地大的国家。这原则不过是如此：集中在人口稠密的大城市里

的工业，在不断的轰炸之下，无法有效地或安全地做工，所以必须撤退，分成小的单位，散在广大的区域中，务使轰炸机失掉其唯一决定的后方目标——即是机器、交通和熟练工人的战略集中的固定化。

一九三八年七月里政府委任艾黎做中国工业协会的主任技术顾问时，那个协会没有一家工厂，一架车床，或甚至一个凿子——而艾黎本人就是它唯一的职员。我们已经看到大部分战前的工业都已失去，同时全国的技术人员分散在东西南北。在中国，在太平时，组织是够困难的；而叫一个外国人着手去除这样的障碍，困难似乎是无法克服的。老资格的“中国通”都把艾黎看做一个说大话的家伙和一个梦想的人。

怀疑的人现在正忙着取消他们的话，因为艾黎今日就等于千万个战争中被遗弃者的重生的希望和未来。他们有些唤他“高鼻子”、“工合人”。故事是艾黎自己讲给我听的。有一天他坐在一辆旧公共汽车里经过江西，这时在他前面的一个长胡子的老者对坐在旁边的一个青年说话。

“中国人做起飞行员来要比外国人好”，那老者莫名其妙地批评道，“他们四面八方都看得见”。

那青年露出牙齿笑着，恭恭敬敬地说道：“那是的确的么”？

“的确之至”！那老绅士喊道。“只要瞧一瞧我们背后那个高鼻子好了。给那样一个东西挡住了，他怎么看得见呢？”

对于艾黎来说，那个英国鼻子并未成为阻挡的东西。在两年之内，工合在中国创了一个从纸上计划到实际行动之间的最短距离的记录。从克服的困难看来，工合在一个富有得多的人们都在轻松得无算的负担下失掉希望的世界之中，可以作为一个

个伟大国家的勇敢、机敏和持久力的纪念碑而存在。

工业合作社发展得那么快，以致昨天的资料还没印出来就已经是陈旧。一九四〇年十月初，这些袖珍工业有二千三百所以上，分散在十六省中，在七十个分部的技术指导之下。这条“工合线”，一路从敌后游击区直伸入中国的大后方，从蒙古高原而至云南山地。工合经营着机器厂和矿山，造出它自己的许多新工业的设备，这种新工业以一星期大约二十五所的速率出现着。三十万人的一个大群直接依靠这个组织活命；给更多的千万人提供了工作条件。

艾黎当然只是首先推动轮子的“发动机”。他和他所有的独一无二的后盾是对于中国人员的必要的保证，就是说这个组织有一个不受传统的官僚政治，引用私人和贪污舞弊的烦累，循着真正的合作的路线而发展的机会。有了这样保证之后，中国最有才干的工程师和技术家中就有一部分放弃了优厚的待遇，以惊倒爱讥嘲的旁观者，自愿投入这支新的工业军队。

要理解工合的精神和它迅速的成功，我们必须明白它中心人物的不平常的背景。这个中心里面含有几个年青的受过美国训练的中国工程师和机械师，他们没有共同的特殊政治信仰。却跟两个人有一致的关联：艾黎和一个叫做斐义理的奇僻的美国教士。

若干年前，老人斐义理得到结论，就是以入地狱做天火燃料来威胁买不起《圣经》的中国人是没有用的，他使他的同事们大为惊骇地宣布说，道德的行为在这里受着饭碗的限制。基督教的考验在于它改善人们生活的能力。中国需要少上《圣经》课，多开技术学校。老斐义理在美国底特律改信了这些念头。福特也以

为把科学知识传授给对于工业得了新观念的青年，较之无论多少说教，对于振作精神有更多的作用。他们作了一个布置。福特出钱办了一个研究院性质的工厂学校。斐义理每年从美国工程大学挑选一百个“品行不及格”的中国学生来进福特学校，他们在这里受到机械工程的健全训练，其中混杂着斐义理的传布工业之道的重药剂。

艾黎在上海对于斐义理和斐义理的许多学生发生了同情的联系。他们大家憎恨浪费，在他们看来，生命被那原想解放人们的机器所毁灭，是一切浪费中最不合理的浪费。然而许多年，斐义理的学生们回到一个不欢迎这些观念的中国来。他们在上海办了一所训练学校，把技术和工业的社会使命教给工厂学徒。但是革命和反革命来了，开始了十年的反共内战，而在一九二七年上海大暴动以后，斐义理眼见那最恶劣的剥削和恐怖时期到来了。他一定变得非常丧气了吧。又因身体不好而愈郁闷，他就在一九三五年悄然自杀。

斐义理的人格依然活在他所训练的最优秀的青年身上。他们是优秀的技术专家和优秀的基督徒，但是在一个亲属主义、政治腐化、剥削和贪婪的社会里面，他们绝少把任何工业之道付诸实施的机会。这次战争第一次给了他们机会跟他们所要帮助的人民的的生活相接触。当工业合作社开始动员技术人员建立一个新的生产机构的时候，他们又一同找到他们的路径了。现在，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的行政和技术领袖，大多都是那年老的教士机械师训练出来的工程师。其中三个是在上海帮着草拟基本计划的。

艾黎和斐义理的学生们，以一笔小小的行政基金和政府的

贷款为后盾，差不多只靠了一种共同的信仰和热忱而动起手来。他们知道他们是在试验，可能轻易便失掉他们的机会，所以他们不要在理论上多浪费时间。盛行的是艾黎的散文风的格言：“使事情进行”，和“要紧的事情先办”。不久，受了这个组织的直接的非政治性方法所吸引，其他许多有才干的青年男女都开始自动参加。艾黎自己每月只支一笔等于美金大约四十元的薪金，这个事实鼓励了第一等的工程师们放弃报酬丰富的位置，而拿仅够购买食物的一点钱为工合做事。

技术人员和组织人员一直往乡下去，着手进行教育民众了解一个新观念的浩大工作。他们每到一处，就召开会议，宣传他们的原则，挂起他们的布告和牌子，答应以技术援助和贷款给与愿意组织起来从事生产的人们。怀疑不得不为实行所祛除。慢慢地，最先的几个单位获得了公众的信任。这些人说一句是一句。请求不久就大大超过了少数职员和可用资本的力量，几千个被列入候补表中。

工人们依照康健、经验和性情而登记、选择，并依照行业而分类。合作人员教导他们如何组织，如何开会，以及如何研究当地市场。技术人员帮助他们找得机器——常常从沿海在陆地上拖了几百英里的——怎样选择安全的工厂厂址，以及怎样运用，后来是怎样制造简单的机器。最重要的，他们教导他们怎样临时应用可得的物料。学校开设起来训练不熟练的难民、会计、组织人员和技术人员。

贷款都以年利六厘到一分放出去，在一个高利贷常每月要那么多利息的国家，生产者对于遵守共同章程的保证，被当作担保品而接受下来。在所扣若干成的工资和利润中，难民们依

分期拨还办法，偿还他们的欠款，成为工业的股份工作者。在这新国土上资本的调转是那么快，货物的需要是那么大，以致有许多单位已经还清他们全部最初的欠款，而再借钱来扩充。同时，有好几百家合作社现在经管他们自己的业务，只由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的外勤职员给与技术指导。

织布、纺纱、编结、印刷和运输合作社最先出现。一个村庄开掘一条河流，使它供给水力给一个机器厂；这个想法传播得很快。面粉厂、造纸厂、风箱和炉子是用直接水力或藉工合酒精开动的工合机器来运转的。别的工业迅速地跟着出现：制造玻璃啦，开煤矿铁矿和金矿啦，硝皮啦，提炼糖和油啦，织物啦，化学品啦，印刷啦，出版啦，等等。铸铁厂开了起来，工合的许多机器厂之中现在有着一些极隐蔽而结实的单位在游击区里。

工合的工厂制造医药供应品、制服、手榴弹、电气设备、货车、帐篷、担架及其他军用必需品。四万个工合纺织工人现在供给全部中国军队的毯子——其中一部分以前是从日本输入的！几百所小型工厂中代表了五十多种工业。

在这迅速的复兴背后，有着关于几百个实地组织人员和工厂工人的不屈不挠、机敏和自力更生的无数事迹，倘使艾黎在写这篇经过的话，他就会只说这些事迹的。但是努力的大小也许从他自己走动的纪录中最可见到。在最初的两年中，他赶了一万八千英里以上的路。请相信一个自己曾经在这块弹痕累累的地上穿过一小部分的人的话，在战时中国的大道小路上赶一万八千英里路是足以自豪的事情啊！

骑着脚踏车，坐在军用车上开开又停停的从一个村庄到另

一个村庄，坐了运送伤兵的车子或骑着马到作战区域里去，但常常用了他自己不知疲乏的两腿跨向前去，艾黎在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最优秀的职员身上，锻炼成一种要把工业和合作的音信带到国内最远僻的角落里去的几乎像救世主似的意志。他亲自组织了许多现存的合作社，从南京郊外新四军游击区里，直到远在甘肃的回教徒纺织者。

“他是一个超人”，工程师中有一个跟他一同奋发前进了两个月之后说道，在其他的绰号中间，他得了“九生的人”的绰号，因为有九次当他所坐的公共汽车和货车在不平稳的新路上倾覆或遭破毁的时候，他都幸免于死。一个仁爱的天使似乎看守好这个移动的目标。有两次炸弹直接击中他所躲藏的防空壕。在近来一次工合出品在重庆的展览期间，一个二百磅的炸弹直接掉在那个洞口，艾黎及主要的工程师和组织者林福裕和卢广绵就都立在洞里。

“幸而它不是工合的出品”，艾黎说道，“否则它便不会不爆炸了”！

“在这两年里面，你所经历的最最激动的事情是什么？”我有一天问艾黎等着听什么别的险遭不测的事。

但他想了一下，随即咯咯笑着，回答道：

“一个冬天的早晨，我们刚刚在离开蒙古边上的一个小村庄，这时候听到叮叮咣咣的铃声，我们让在一边，一大队的骆驼从雾里走出来，它们的呼吸在严寒的空气中凝结成霜。它们走过的时候，我们惊异地看见那领头的骆驼带着工合的那幅巨大的丝旗，我们的红三角画在装货的大箱子上。

“这是一个骆驼运输合作社，在搬运游击出品。给我在一

起的那几个人是从温暖的南方来的，他们突然明白他们是一种遍及全国的东西的一部分。当那些骆驼吐着鼻息走到曙光中去的时候，他们是怎样向它们欢呼啊！是的，那是一件激动事情！”

绝少中国人看到他们战时的国家，象艾黎那样多的。他的路程叫他通过受着黑死病、回归热，和其他传染病的骚扰的地方，这些病他不是始终可以免染的。他害过骨痛热病和疟疾。一九三九年在江西赣州，他给伤寒拖倒了。有一个月，每天在空袭期间，他寒热发得点汗，不得不从一个临时医院（设在一个火油栈房里面的），被抬到河对岸田里的一个躲避地方去。他总算脱逃了出来，象一往一样地无处不在而精力饱满。

有一回，艾黎当空袭中间，在一个上帝不到的什么洞里写信告诉我说：“此地并不算坏，只是耗子糟糕。它们拖掉我的肥皂、鞋子、衣服和纸头。”有一回我在川西成都看见他。他刚从藏人聚居的松潘步行二百五十里路回来，走过极少中国人没有武装的人作伴而敢走的山路。没有一个字提到他的艰辛，仅仅说他欢喜吃他的玉蜀黍和酪浆；但是热情勃发地谈到河流里的金子和高原上的羊——以及被他争取到合作工业来的活佛！

这难以叫人相信，我问他怎么弄成功的。

“藏人仍旧照埃及老法子，用手来纺他们的羊毛，那位老先生从来没见过现代的纺车”，艾黎瞬着眼睛说道。“我随身带着一辆我们的新纺车，这把他从消沉中救了出来。他说他做活佛做厌烦了，要干一点有用的事情，于是我们就请他做我们松潘谷里第一个军需厂的厂长！”

但我从别方面听说，真正使藏人转变过来的，却是艾黎夜

间同那边撒野的骑手们一起骑马穿过狭小的山径。他表现出他照当地规矩行事的能力——这包括狂饮他们在狂奔时从一匹匹马上传递过去的烈酒！

艾黎越多看见这个惊人的民族的勇敢和多谋，就越相信一种激发他们惊人的复元力量的民众运动的健全性。“这不是我们所已做到的事，却是还可以完成的事”，他不住地重复说道。“我们的目标是三万个合作工厂。当我们达到这个目标时，日本人就得把他们可笑的小刀卷进他们的席子里去，自己带回老家，再开始摹仿中国。”

是的，工合是一个成功，这是没有疑问的。只有重庆的某些政客看见它正在成为在他们控制之外的一种新的、民主的劳工阶级动员的主要经济基础时，才越来越惊惶地看着它。它发展得很快，比全国的政治生活要快得多而又多，这里就有着它未来的一个危险。事实上只有战争促它前进，只有战争才说明使这样一个组织可能存在的各种情形的奇特凑合。工合之所以处于那些反对任何种投降，要求坚决继续作战到获得中国独立为止的势力的前卫地位，这是一个原因。

这里，我将很简单地，把作为这个最有希望的民主工业运动发展背景的政治机构，描出一幅略图来。

国民党和官僚政治

中国没有阶级……中国一点也不受到资本主义的灾祸。

——陈立夫

二千多年，中国被一种三头政治自上而下，从未自下而上

地统治着，这三头政治包括皇室或军事的势力，一种以独占教育为基础的职业官僚和乡绅。每一个官吏都得对他的上司们负完全责任，但是职位较高的，就没有一个可以被他的下属着令负责，人民是尤其不必说的，人民参政的权利是从来没有被容许过的。

在这古老的世袭的农业国里，专制制度是象它在欧洲的大多数同时代国家一样有效。但是当中国进了现代的贸易和工业世界的时候，以前的机构开始失掉它的可能性。资本主义的发展，帝国主义的紧压，和贸易中心的发展，产生了热望握到政权的未成熟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而在农村里，土地所有权的加速的集中，使地主与农民之间的传统的敌对趋于尖锐。

一个跟中国社会突然变动的经济基础相调和的人民政府的需要，就是清朝倾覆的背景。这同一的要求，带了更多的自觉表现的，支持了国民革命；就在这种人民大众的希望上面，国民党握起了权来。但千百年的传统重又武断地要求建立一种新官僚政治。十二年内，给了十二个理由，解释继续不给人民政治权利，尤其是延期实行地方自治，孙中山先生始终认定后者是他政纲的基础。

在一九三七年，国民党治下各县，一个也没有得到自治的，极象旧时的世袭专制政治。中国划分为二十八省，国民党治下各省的官吏都由国民党中央所委任。省又分为一千九百零五县（凡国民党拥有实权的地方），县长也都由这官僚政治所选派。即在边疆区域和特别市政府的场合，这也是事实。既没有国民代表会议或参事会，也没有任何种类的选任职位。甚至对于最起码的小官的委任或罢免，人民绝无合法的开口资格。

党的组织的控制，跟官僚政治的政权的控制，成了同一的东西，然而后者跟军权并不合一，却是互相联系，如过去一样。在一九二七年后，军政二者恢复了跟地主士劣的传统勾结。国民党遂代表那样一个利益的结合。再加上城市里在抬头的买办、商人、银行家阶级。这后者，尤其在江浙这两个沿海省份里，构成了这官僚政治的财政靠山。中国的银行家大多属于所谓江浙集团，国民党内圈的握权派也是这样。

这是一党政治的常情，不同的派别在国民党内部角逐着那官僚政治的支配权。其中最有力的是“二陈派”，通常就称为CC。这要回溯到国民党的早期。二陈是陈立夫和陈果夫，都是帮助过孙中山先生反对满清的故浙江地主和秘密会社领袖陈英士的侄儿。这一位陈英士曾在党里把蒋介石跟他自己的两个侄儿一起提携过，据说二陈是和蒋滴血为盟结为兄弟的。

孙中山先生在世的时候，陈氏弟兄一个都没有多少影响，但他们是浙江人，对于他们的同省的同乡蒋介石却是有价值的。蒋做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时候，就叫陈果夫做他的秘书。后来，陈果夫就任国民党组织部长，他在那里帮助破坏党的左翼。陈果夫立下CC的基础，就是在那里。

弟弟陈立夫到美国去，在匹兹堡大学得了硕士学位，那以后他就回来走果夫同一条路：先做蒋的秘书，随即就任国民党组织部长，最后当国民党的秘书长。他据有六个别的位置，其中有情报处和军队中政治训练的掌管。陈果夫近年来实际上已经不做事情（因为肺病已入严重期）。但陈立夫一身兼了两人的差使。

陈立夫现在四十多岁，面孔生得漂亮而且惊人地年轻。他

反对共产党。在他看来他们是一种病，他无法不透露他的憎恶而谈到他们。这种敌视总似乎是他的排外心理的一部分。一个有机智的人有一回说陈要辩护任何中国东西的优越，从三民主义的矛盾到四川的臭虫。希特勒发现耶稣是亚利安族的子孙。陈的僚之一告诉我说，他在一次行政院会议里占去两个钟头，竭力要证明《易经》已预见到爱因斯坦的相对论。

在战前，CC的权力变得那么大，以致蒋介石作为国家领袖的行为受到它密切的影响。所谓蒋家天下，陈家党。也许再没有影响力是象CC官僚政治那样严重阻碍民主制度的发展的了，现在CC的转变或可指示政治变化的性质。

国民党通过中央政府的直接控制，以及通过它在各省各县的党部，而行使它的行政权力。党部的首脑平常总是一个惟命是从的爪牙，他(倘使并不直接统治)挑选行政人员。在十分之八以上的中国人所居住的农村里面，党部通过跟地主、商人和重利盘剥者的勾结，而实行统治，自然采用半封建的土地和赋税制度。农民在这个政权里面没有发言的权利，除了革命这一个传统的权利。

这个机构在农民的拥护为政府所不需要的时候摇摇摆摆地前进，但当大城市失去的时候，却开始崩解起来了。国民党不得不退到内地和西部各省的市镇和乡村去，在那里，它的影响很弱，从前的勾结非常不适于动员工作。战争把它最吃重的要求加到农民身上：增税、征兵、强迫劳动涨价和敌方的暴行。人民必须在政治上组织起来应付这些牺牲，新的政治和经济权利必须给与农民作为革命斗争的基础。但这样的组织，就等于把新的权力给与农工；而党部的机构里面绝少能够控制和指导

那种权力的民众领袖。它尤其缺乏能够获得人民信任的青年男女，而且当然受到它反对改革的豪绅分子的妨碍。

总之，战前的官僚政治除了保持它对于农民的传统轻蔑以外，还保持那旧式士大夫对于农民的恐惧。不断地使研究中国社会的人感到惊异的，是官吏之流方面这一种意见的巧妙，就是以为农工是没有自治能力的。他们能够为国而死，能够养活军队和官吏，能够建造道路和工厂，能够供给国家全部的生产能力——但是他们没有熟读经书或者学会外国文，所以他们不知道怎样挑选他们本村本镇的行政者！这一种把独占教育和治理才能混而为一的陈旧的官僚见解，除了最革命的知识分子之外，谁都是固持不改，这是中国政治停滞的一个基本原因。

在它背后，当然有着官僚对于发见他自己被罢免的真正的恐惧。“一般说来”，一个极尖锐的中国评论家写道：“国民党里的人总有点以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不难’，但是控制中国愈益抬头的民主势力却非易事”。

所以国民党官僚政治不要“民众运动”，除非是它自己独力把持的；而因为没有真正的民众组织可以是一个并无民众基础的狭隘政党的把持物，这种态度只是成为妨碍而已。但是国民党控制着现行的行政机构，能够而且确乎坚持任何不在党的控制之下的战时组织都是不合法的。自发的和独立的团体被封闭。工人、农民和学生即使是地方规模的联合会也都不可组织，当然也不准其他政党来组织他们。“动员委员会”由豪绅组成，他们平常除了他们自己的佣兵——当地的民团——以外，是动员不起谁来的。

结果是已经表现出来了。从东部各城市撤退时，军队和党的机构在背后掉下了未经武装和未经动员的乡村，这些乡村敌人可以毫不费力地剥削。在他们后面，各种救国运动起来了，其中有些是共产党领导的。这些运动填补了那政治的空隙，在日方能够巩固以前，用一种新的民主的方法把人民组织起来实行民众抗战。这种发展似乎常常比日军的占领，更使CC和其他反民主派烦心得多。

对于政治控制的角逐，因为蒋氏地位的意义在发生变动而愈形复杂，蒋氏的地位作为团结的象征，不得不承受性质完全不同的分子的广大信仰。这里面包括各部分的军队——例如他自己的黄埔毕业生、广西派、地方军的将军和他们的军政下属，共产党军队和其他游击军——再加上职业的政客如改组派（在汪精卫出走之前），政学系以及那些多少有名无实的政党，它们构成不得不相互维持均势的羽翼。蒋氏巧妙地利用一派对付另一派来维持他处于舞台中心的地位，但是他自己的政治基础越广，对于那官僚政治的安全，威吓也就越大。

CC的对手中间，最触目的是政学系，这一派里面包含着颇有教养的知识分子，他们有意识地要想达到与从前士大夫之流一模一样的地位。它的分子相信中国永远不会是一个民主国家，而必须无可避免地藉助于旧式的专制，在这专制中，几个高高在上的聪敏人使他们的服务为军人所欠缺不了，而在实际上统治国家。自从一九一一年以来，他们一向是一种职业的帮闲的官僚，有时在国民党内部，有时在国民党外面，但老是在周围聚集着一批握权的人物，他们希望在这些人物的服务中从上面来造成中国的命运。倘使如某人所说，CC是国民党的瘤，那么政学

系可以称为国民党的腰子流动病了。

“无论谁抓到政权”，政学系里一个最能干的分子有一次对我说道，“在他攻击一通之后，总都是回过来请我们帮他统治不可。”

这话充分暗示政学系的投机哲学，但它最好还是用一个深通世故者的一句使人信服的警句来表示：“在人面前说人话，在鬼面前说鬼话。”在一九四〇年，有五十多个政学系分子在那官僚政治里据着高位，需要说什么话，就说什么话；有几个是部长，其他是各省主席。这一派的天才在于它联合中国资产阶级集团去操纵地主的特殊手腕，以及它对于日本和美国的非常好的了解——它的党羽大多是日美留学生。它的弱点是它跟任何种类的民主运动都没有关联——它在旧式上级官僚的根本的轻蔑之中保持着这个弱点。

另外一个，威吓CC继续统治的因素是汪的变节到日本阵营里去。他代表寄生的官僚阶级跟新武力相结合的一种传统倾向。在现在的场合，他要做那帝国主义国家跟地主之间的联络者，这些地主的权力正受到游击区里民主动员的威吓。幸而日本人愚钝，不了解他的地位，无论如何也许在客观上没有力量给他必要的合作；但他的现款却依然吸引了几百个小官僚去帮着组织傀儡班子。在上海，一度是国民党权力的一个堡垒的流氓之辈也分裂为二，一部分到了汪那里去。国民党若干党员是叛徒中著名的人物，这在觉醒中的中国是对于国民党威信的一个打击。

这个主要的国民党官僚政治的机构这样受到几方面的威吓。它不得不找一个方法来（一）恢复游击区内敌对的政治领导势力所得到的权力；（二）加强其在西部诸“新”省里的权力，与

党内别派相竞争；（三）防止它不满意的和失败主义的党羽转到汪那里去，而覆灭一个正被战争迫往左边的政党的权力。

国民党确乎承认那些必要，而改变了它对于民众组织的纯粹消极的态度——这一个事实似乎暗示它不是一个“破产的党”，却是能够适应新的政治要求的。国民党在一九三九年宣布了一个确定的诺言，就是：“于抗战胜利接近之日”立即实行地方自治并选举中央政府；这是意味深远的事。在它的六中全会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采用了一个宣言，^①宣言中除了别的事之外，作了这一个骇人听闻的承认：

“……总理革命目的，在于建立民有民治民享之国家。……当从积极方面，相互激勉，以履行吾人革命民权之获得。……吾国近年国力衰弱，民力散漫之现象，推其本源，实由忽略总理革命程序，以表率自治单位之精义与地方自治开始实行法之规定，因为筹备自治，未彰其实力。一切政治建议既未能确奠其基础，而组织民众，亦舍本逐末，由是推进，抗战既起，此种缺陷，更见显著。……”

然而不应该由此而存幻想，以为国民党领袖们有意要承诺一个用民主方法选举的政府。它的意思不过是说国民党承认有保卫和加强其政权基础的必要而已。那在它所定的国民大会选举规程和地方自治法（假定于一九四二年实现）里是明明白白的。在后者的场合，人们预见到一种“民主”的形式，在这种形式之下，不过以对区长的顾问的权力赋与国民会议，所有的区长都是国民党官僚政治的事实上的委派会员。这当然不是意外

^①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二日。

的。从来没有官僚的独裁，除了在极端的逼迫之下，而放弃政权的把持，倘使国民党证明为例外，倒是使人惊讶的。然而，这些有限的权利的给与人民，也正表示人民要控制政府的要求有增无已，使国民党方面必须加紧其保持统治的努力。

在未沦陷各省，别党的党员依然被排除在政治活动之外，而国民党现在又透了口气，开始了一个急剧行动，即剥夺他们在游击区里的相对的自由。为了这个目的，CC跟各个军政集团合作，组成一个战区党政管理机关，企图破坏日军后方的左翼民众组织和民选政府。这时常引起冲突，其中包括几十次对非国民党军队的公开武装进攻以及跟非国民党军队合作的个人的监禁和屠杀。蒋委员长常不得不居中调解从这种政治竞争方式发生的争执，并防止其扩大而为大规模内战。

为要加强它在未沦陷各省的地位，国民党恢复了它对于乡村中政治训练的注意，并努力在青年和军队中间扩大党员数。陈立夫曾在一九三八年告诉我，国民党有党员约二百万人；但是其中只有十分之一是活动的。所创立的新组织中，最触目的是三民主义青年团，它以激烈反共为目的。对于中学生和大学生，实际上是强迫，必须加入的。所有学校以及军队里的政治教育，都委任转选的CC羽翼来加紧统制，这些羽翼也占据差不多所有战时各部各机关的职位。

在西部，省党部和地方党部大概都跟着政府权力而扩张。对于倾入这些“新”省的大部分资金的控制，使那官僚政治很快地扩张它的影响，并为几千个新党员找到位置。几百万元的政府贷款放到那些新区域里去；这笔钱全部都经过那当权的一派，被他们跟乡绅合作着分配，当然成为把党部势力打入新地

盘的工具。

一个例子一定已经尽够：党部在农村信用合作社中所任的角色。在一九三九年，约有五千万元，在据说由CC派控制的合作管理委员会的监督之下，放进这些“自由省”去。这在理论上是一个膨胀农村放款刺激生产和增加购买力的方法。但是在国民党决定使县长实际上成为所有合作事业的支配人之后，“合作社”就成为政治性多经济性少。它的自动性质被夺去之后，当然成为一种画虎不成的东西了。

我有一个朋友是合作社专家，他老老实实把他工作的困难细说给我听。贷款系经由政府银行付给县长，县长奉命组织一个信用合作社。这是常有的事：他爽朗把绅士们叫来，大家把钱分掉，算是组织一个合作社。有时绅士们以重利盘剥的利率，把钱再放给贫农或佃户——现在就有许多贫农因为无力归还这种合作社债务而关在牢里。有时，绅士们把钱用来合股囤积米或火油，或垄断别种货物。无疑的，这办法使钱流入农村，且是迅速扩大党部影响之一法——尤其在四川——但也是毁坏合作社信用的一个稳当方法。

有极少的几个团体设法要不受CC的赞助和比较，不受官僚权力的压迫，而发展；中国工业合作协会事业上就是其中之一。工合的领袖们想要真正建立一个以人民自动拥护为基础的纯洁制度，他们拒绝一切想把这个组织置于任何党派指挥之下的企图。这个态度常使他们跟官僚头儿发生冲突，这些官僚头儿用了许多方法来压制工合会，如以“共产主义”这些捏造的罪名，强迫它开除技术人员、或组织人员，并逮捕其他人等。但总而言之，这个运动设法遵循合作原则和民主理想，获得惊人成就；

并设法维持一种多少不受各官僚派节制的行政——由于许多极复杂的特殊条件，这里无法讨论。

我在上面所说关于国民党政权机构的话是不完全的，因之，可以说是不公平的。然而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方法可以在几页中间忠实地讲述中国目下的政治实施情形。读者会明白国民党并没有把民主政治行于中国，但那并不是说它没有真正在努力救国救民的党员。国民党在党员中间有几个忠实、苦干和热心的人。和准备为国而死的爱国者。它的党员有几个是在战争的每一考验之下，忠实地无怨地站在他们的岗位上。有许多忠诚地做长时间的工作，拿着现在不算很大的经济报酬。

中国的党部制度是“自然的”政治进化之产物，也许是向着进步的变化中的一个“必要”阶段。看到国民党里落后分子中最严酷的批评家有几个近来自己也做了党员，至少是使人鼓舞的。只有几个闭起眼睛瞎闹的人才以为它的行政制度是理想的。许多人只把它看作在一种惊人复杂的局势中的临时办法；比较诚实和懂事的，则承认当那复杂局势成熟的时候，国民党非立即跟它一同变化不可。无疑的，它要这样的。

成都和赴成都途中

夜深沉，鸦片灯出现……

虫扰人眠，鼠行乐……

但这里总有一天办工业……

自由的人造他们需要的东西。 ——艾黎

从重庆坐飞机到成都，要比坐车走陆路来得简便，但是我

要看看那边的乡村，和一些工业合作社。我错过了一辆军车，随即等一辆英国桑尼克罗夫特工程公司送给孙中山夫人、现在正在到前方去的大型救护车，等了几天，影踪全无。我正要坐飞机走了，这时候卢广绵告诉我，他要坐一辆新的美国货车到中国工业合作协会西北办事处去。他邀我一同去，毕竟如期开车了。

驾驶一辆两吨的货车通过世界的这一部分，似乎须有做“玛丽皇后号”船长的谋划和责任。作了长时间的、神秘的谈判，去得到甚至够行一段短程的汽油，以及用来满足路上所遇各种查询者的货单和护照。好的司机极少，他们的薪金比官吏还要大。有一些使他们的职位显得非常体面，带着一批足够经管一座飞行堡垒的人手。我有一回坐了一辆军车，车上的司机有六个“跟车的”：一个机匠，两个管减热器和汽油的用人，两个换车胎的，和一个开车的帮手。他所少的就只是一个管航行仪器的人。当这个家伙戴上白手套，坐在车轮后面的时候，你就感到动身到陌生海港去的一切激动。

工合第三号货车上的我们的司机，由于有卢广绵在车上，是稍带拘束的派头，卢君派了他的会计主任朱君分配汽油，决定停车的地方，并经管文件单据。朱君虽是一个优秀的会计，可并不熟悉烧油的机器。然而他仍然勤奋地通知那司机；什么时候转动联动机，什么时候慢下来；而且永远在调整那玻璃遮风，在试验车胎的压力。他甚至告诉那司机——司机还受着痢疾的妨害——什么时候停下来大便。我跟其他十二个搭客一样，觉得在这样小心不过的处置之下，十分安全。

横在重庆和成都之间，是最肥的地皮中的一块。那铁锈色

的泥土一年有三次收成，它丰富的化学成分似乎是取之不竭的。耕耘过的小山围着道路，乡村和人相继不断。农舍的特异的建筑，使见惯了造在稻田里的平顶泥平房的从中国东部来的访问者，感到惊奇。四川的村屋，在它的极倾斜的三角形草葺屋顶下面，常是二层的楼房，有着刷白的黑松板镶装的墙头，所以远远看来，极象英格兰的乡村。那景象的某种说不清的性质——也许是那鲜明的绿色和偶然一见的吃草的羊儿——加深了这种幻觉。那些乡村里，在万种臭味和普遍的败毁氛围之中，污秽的小客栈和全然的混乱，带着一些迪更斯的气味。四川是封建的欧洲由美国飞机和三引擎日本轰炸机给现代世界联系着。

中国无论什么地方都不是这样地赤贫，这样地贫富判然。在四川，有几家极其富有的人家，都是有几千亩田的大地主；也有穷得叫人不相信的人家。中国的旅行者向我说起他们的惊骇，当他们发见四川乡村里农人穷得甚至买不起破衣服来遮住他们女儿的背，所以在出嫁年龄的姑娘完全裸露着做事情的。成都金陵大学里的斯迈思博士引用一个近时的调查，说百分之七十的土地是属于百分之七的人民所有。有些例子，田赋预征了六十年——这个负担结果是转移到了佃户身上。几年前几千个农民发见继续为军阀和地主的利益而种田是毫无希望时，真正放弃好田好地，到城里去当难民。

鸦片更进一步增加了四川的衰败。四川以前几乎出产中国全部鸦片产量的一半，云南和四川是最后两个感到政府禁烟运动的效果的省份。一九三九年，蒋介石亲任四川省主席之职，开始决然努力扑灭鸦片。他已获惊人成功，鸦片的出产和消费二者都跌至不足重视的比率。但在四川各处，你仍然见到多年的

鸦片和苛政的消耗。

那些副产之一，是一种我从未在中国别处见过的特异的惯例。四川开满了茶馆和饭馆，前者是绅士和流氓的聚会所，后者一直开到街上，颇象人行道上的咖啡馆。在较小的市镇和乡村中，在这些饭馆四周，徘徊着一群群备有蒲扇的衣衫褴褛的男孩和几个女孩。你刚坐下，他们也就把你围住，开始赶开苍蝇，不给飞近你的食物。探问之后，我才知道有几千个流浪儿童都是这样生活的。客人照例把桌上的残饭留给他们，有时再给一两个铜板。他们里面，有些是真的孤儿——因近来的征兵而数目增加了——但是有许多却是被懈怠的穷人或因鸦片而破产的父母所委弃的。

“你为什么不把头颈洗洗呢？”我想要引他把袖子离开我的汤，这样问一个摇扇子的。

肥皂和水跟他自己的头颈发生关系，这景象显然是过于奇妙，他放声大笑了。“我么？我么？洗我的头颈么？热水是给人喝的，肥皂是给富人使虱子不近身的。叫我怎么洗头颈呢？”

四川的这些“小鬼”，露着不洗的皮肤，生了颗粒性结膜炎、疥癣、湿疹和脚气病，是叫人丧气的，然而他们欢心的机智和他们的江湖奇艺却使你微笑。饭馆老板以道家的宽容，欣然安于造成这类讨厌人物的世界，并以同样的好心，承认那些童丐尽有使他的顾客厌烦的权利。显然你不可打碎一个人的饭碗，当然也不打碎一个孩子的。

这样的少年，前途完全没有希望？红军“长征”通过四川，其中几千个都欢天乐地跟了去，这是可以了解的。当你（象我在红军中一般）看见他们中有一些，倘使得到一个机会，会变成怎样

出色的青年时，这些小生命的活剧真是痛心的悲剧。因之，蒋夫人的孤儿院是新生活运动所曾做过的最好的事情。但他们不能用他们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那么广泛，早就应该成为国家的一个自认的责任。工合会完全以私人赠与为经费，自办孤儿工读学校，也已经证明他们能够从这样的料子造成中国最优秀的人，倘使政府对这工作给与协助的话。

我们在荣昌——一个颇大的城——停了一下，在这里工业合作社发展极快，来不及弄贷款来作它们的资金。虽然四川的合作社给人印象较其他地区为淡薄，但是荣昌这个分部却并不落后。自从开办以来，在差不多六个月里，它已设立了五十三个单位。那清洁得纤尘不染的分部办事处，所有的职员，是几个大学毕业生，他们拿着比食宿多不了多少的报酬而工作着。在他们的合作社中，他们似乎以一个印刷工场为最得意，这个印刷工场有十一个社员，他们在组织合作社之前，大多是失业的工人或“谢师”（即不拿工钱）的学徒。现在他们的生意超出他们所能做的，有一倍之多——生意大多是从别的合作社来的——他们正在计划扩充。

我访问了几个别的小工厂，他们似乎全都十分乐意这种合作劳动的新方法。“十根竹管比一根难弄断”，他们说明道。贴或挂在墙上的标语使那地方有一种微薄的更生氛围。^①我尤其被一个专做麻布衣的清洁小裁缝工场所吸引。这工场有十四个社员，从前都是没事做的，有几个是别地方来的难民，只有两个是战前就相识的。这一种由各家的人承担的集团所有和责任，正

^① 例如，“有福共享，有难同当；”“士兵在 前线流血，我们在后方必须流汗；”以及“全国的工人，觉醒起来，动员起来！”

是外国专家们告诉我们，说是“因为中国人太个人主义”，永远在中国行不通的东西。

当我们无法渡河到内江这个愉快的城市时，我们不得不在一个小镇上过夜，因为跟这阴沉得难以形容的小镇一对照的关系，也许我记忆中的荣昌要比它应得的更为辉煌。门口挂着一块过甚其辞的招牌“江边静憩”的那个客栈，甚至在四川也是一个肮脏的垃圾堆：后廊当作了厕所，椽子里有很多耗子，我想那地方已经有一世纪没有打扫过了。因为我把我装寝具的袋子留在贝特兰那里，我不得不困客栈里的被褥——那是最最无法入睡的地方，除非你生了章鱼的皮。经过一个钟头的不平等的挣扎之后，我把床铺让给了它的老住客们，而到厨房里坐等天亮。我记得孙中山先生曾经竭力主张中国不是殖民地而是“次殖民地”，受着不是一国资产阶级而是各国资产阶级的剥削。这里在四川，这名辞有一种不同的意思：那地方是它本国“微菌阶级”的次殖民地——为全部的实验场备就好行方便的供寄生虫食宿的主体。

“你知道”，我记得另外有一夜两个人在同样情形下坐等天亮的时候，一个年轻的受外国训练的工程师对我这样说，“一个抽水马桶，比所有孔子的经典，具有更多的文明。”那是事实，只因为孔子而生于今日，也许会同意那工程师的话的。

下一天，我们被空袭警报耽搁了几个钟头，当我们等待飞机的时候，在河里游了一回水。我们始终没有看见飞机，但是天黑后到达成都时，我们才知道六十二架轰炸机已经把位于重庆成都之间，四川重要城市之一的嘉定，炸平了一大部分。四川省城成都本身近来已受了飞机几次的访问，有几个炸弹丢在华

西大学的校舍上，我和一位加拿大教士一同住在那里。中国东部的几个大学在这里结束了他们长途的行程，并在一个校舍里。其中有一所就是美国教会办的金陵大学，它赶了一千五百英里以上的路，把它的教职员和学生聚集在这西康的边上，这些移民刚刚住了下来，那时候敌机就到了，伤害了大约一千个平民，并毁坏了这城市的一大部分。教士们看见他们的信徒和学生被美国的军用品所屠杀，感到非常伤心。

“我们从日本侵略上面拿到无数的钱”，已经目睹过南京暴行的恐怖的斯迈思博士说，“然后送几块钱到中国来修补几个伤残的身体。我们谈兄弟之爱以及和平，但是中国人眼睛里看出来，基督是外国参与日本侵略的一条‘阵线’。我们怎能回答他们呢？”

斯迈思博士是太谦逊了。他和其他象他一样的人们，正在天天以他们自己的英勇和忠诚的行为来作回答。美国人可以感谢教会里的教师和科学家给他们在中國留下了好大的面子。你不能讥讽这些现代的基督，他们不怕死在异国而跟他们的群众留在一起，他们救治伤者，他们帮助从废墟之中从新建设。有几个也许犯错误，有几个过分热心，但极少不比批评他们的人好的。

即使在战争中，也有六千多个大学生——约占全国总数七分之一——正在教会学校里受教育基督教医院和全国基督教服务总会治疗几万个兵士和平民的创伤。教士们在任何需要最初的和自愿的援助的地方，做了数不清的战时工作，他们无疑地救了几千条命。除了别的事情以外，有几个把他们的援助给与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在成都，我发现斯迈思博士等在积极为工合分

部主任苏先生（他自己是金陵大学的一个基督徒毕业生）招集和训练人员。

金陵大学的一些教授和学生，在战争爆发之前，已经在南京附近的乡村里实验纺织团体，希望政府给与支持，来复兴几种破产的农村手工业。该大学在一九三九年迁到重庆的时候，就把他们的经验和学识听便工合应用，这些经验和学识证明为非常有用，尤其在改良纺车和布机的发展方面。多亏因为这一种帮助，工合的织物合作社才于一九四〇年达到这样的进步，就是它们能够接受一百五十万条羊毛毯子的大批军队定货。单是在成都和近郊各村里，当我在那边的时候，就有大约五千个妇人和姑娘在纺羊毛，而当地工合的职工每天已出产一千二百条毯子了。

斯迈思也帮助在成都附近设立一个合作机器厂。这是“工合线”上最大者之一，有一百五十个工人——机匠、木匠和铁匠。一天，我骑了脚踏车，和斯迈思一同到一条小溪的柳树成行的岸旁，去访问那掩护得很精致的工厂。那时候，工人们主要地从事于布机和纺锤的制造；大抵由于工合会的倡导而发展起来的新的羊毛工业，需要几千架的布机和纺锤。人们一边工作，一边唱着在他们合作训练中学会的抗日歌；在露天眼看和耳听都是极愉快的，想起上海工人的那些黑暗的监牢。

在我动身到北方去之前，我入了迷，几乎把我的旅行根本取消。

我受了另一位客人的迷人的黑眼睛的诱惑，这位客人住在狄更逊博士的花园里，就是我在成都奢华地耽搁的地方。他是一只叫人无法不爱的极幼小时期的熊猫。当我知道一个当地

猎人愿意以差不多等于十块美金的代价弄一只熊猫给我的时候，我决定捐给动物园，坐飞机带一只回家。但是中国政府叫我断了这念头，它宣布说：熊猫，象外汇一样，除非经当时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的特准命令，不得出国。

中国艰苦的建设者

人们很有理由说中国人“使贫穷成为一种科学”。

——史密斯

我感觉到四川的广大，当我们离了本身已在省中部的成都，向北，在田地和荒原之中，又坐车走了三天，然后爬行而通过那高高地在山中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剑门关山隘，就是在几世纪之前，三国时代的战士们打过大仗的地方。

幸而我能够在成都从肯纳德借了一个寝具袋，所以我不再为虫虱所困扰！然而我还是很高兴跟四川那些肮脏的小客栈告别，而发见自己又在陕西那种有着它崩坍的黄土小山的熟悉的景色之中。那对照真正是立时的：就在山隘的那边，在交界的地方，四川的蹩脚道路让位给了路面光滑的公路，这公路在幽雅的树木和比较扫得清洁的乡村之间转向前去。走进这些乡村中的一个，你就又感到战争的接近和一种照例的兴奋。农人在大街上来往操练，走着常步和快步。家属和朋友当真聚在那里看着“好铁打做钉”。偶然唱一只歌或者欢呼鼓励的话，虽然在四川，看见征兵们头颈里套了绳子被拖过街上，仍是普通的事。

在陕西的第一晚，我们又回到了“工合线”上，当我们在褒

城附近，停下在一个工业酒精合作社技术主任杨玉珍博士的精舍前面。在杨博士——一个受德国训练的工程师——身上，我发现一种对于秩序和清洁的可羨的爱好。

“他一定要保持他的生活标准”，在我们到达之前，卢广绵尽情地警告道，“不论他在什么地方。倘使他遭殃，算不了什么，他说趁此生尚在，他要过得有味，谁知道下一个炸弹掉在什么地方呢？”

在酒精厂的前面，杨博士造了一座五间房的砖头精舍，走廊宽大，室内陈设着外国椅子、桌子和床，以一间备有瓷浴缸、厕所和抽水马桶的寝室为布置的顶点。除开从他西安的家里搬来的家具不算，那地方只花了杨(他自己掏腰包付的)国币二千五百元(当时约合美金二百元)，但那给了他“土皇帝”的地位。比那精舍更惊人的，是他所备的食物。他从一群包括十一头的瑞士山羊，得到他自己的奶和白脱油；他教会他的中国厨子烤出轻如羽毛的面包和“罗而”。在所有这种奢华体面之中，走动那朴实的穿了工作罩衣的杨博士的身体，他是一个漂亮的灰白头发的五十岁的人，工合技术专家中年纪最长的。

杨是一个东四省的亡命者，象他们大多数一样，抗日情绪极其热烈。他原在沈阳兵工厂里做一个机器工场的场长，一直做到一九三一年，那时，我们记得，日方弄掉一段铁路轨道(正如他们一九三七年在芦沟桥附近弄掉一个兵一样)。为酬报起见，就占了一块两倍于日本那么大的领土。“事变”以后，杨南下到西北，在那里，他跟德国工程师们创立陕西省的酒精工业，地址在咸阳附近。莫明其妙地，政府在战争开始之后，命令把咸阳的厂关掉。显然作为把基本工业撤至四川的总计划的

一部分。杨就此失业。

这是工合的一份非常的好运道。明白西北有继续出产酒精的必要，并急于要出一点力，杨自动加入职员里面，跟卢广绵和工程师吴去非商谈之后，他们拟定了开办一个合作工厂的计划。一个幽静的小山给找到了，在这小山里面——真是在里面——杨造了一座大的蒸馏所，它开始每月出产一万加仑。整个厂只花了国币六万元(当时约合美金三千五百元)，它是这样地发达，所以在开工以后三个月内就还了一万一千元。杨正在用当地原料照样再造一个蒸馏所，预料要有加倍的容量。

酒精不仅为军事、医药和工业用途所需要，而且作为燃料而立即畅销，工合会现在只有西北这一个厂。跟汽油混合之后，它就代表巨额的节省，在那里从外国输入的汽油零售要二十块钱一加仑。那合作社里，约有四十个工人。跟这个合作社联在一起，杨办着一个学徒学校。那地方全是“小鬼”，他们大家都似乎崇拜那个喝山羊奶的怪人。虽然他的开支两倍于工合会所能酬谢他的数目，来“保持他的生活标准”，但是杨却再快活也没有，他说他生平第一次觉得自己有用。

在襄城东面车行两小时的地方，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城市汉中，它靠近那在南方极远的地方流入长江，一度曾是旅行和货运要道的汉水。今日，它的两岸上排列着淘金的人们，其中大多已经组成了工业合作社——一共四百六十七个，当我经过的时候。中国银元的跌价使这种工作获利甚丰：一九四〇年时，金子在重庆卖五百元一两。我花了半个钟头看一个合作社进行它原始的淘洗手续，淘着一百磅沙泥。他们筛到末了，在筐子底上发现极小极小的一片金子，似乎颇为满意了。

“它妈的”！一个拖辫子的年老裸体的淘金者高兴地说道：“小得连唾沫都吐不着的，可是倘使你有了够多的话，你就可以向无论什么人吐唾沫了！”

工合的汉中分部在它能干的合作主任李华崇之下，组织得很好，李是西北大学毕业生，大约二十七岁。他和他的职员十八个会计人员，技术人员和组织人员，依照合作办法，同住在一个宽大的宅子里，他们每人每月付等于美金一角的房租。这里也有一间洒满阳光的“董事室”，在那里，一天早上，我参加过一个四周各乡村合作社来的代表会议。虽然汉中分部还不到六个月大，但已有五十一个单位在生产了，制造棉布和绸、皮件、墨水、纸张、肥皂、蜡烛、机具、机器零件、玻璃、编结物、衣着、化妆品以及足够摆满一家百货公司的零星杂货。

汉中附近一个小木厂以它野心勃勃的名称“江浙工程合作社”打动了。它只有七个社员，二千四百元的共同的借款股本，它虽然只经营了五个月，但是每月却做一千多元的生意。到苏联去的那条从前运丝的路在远处经过，省政府向他们定造路上新的中俄文牌子，这事社员们认为很光荣。江浙工程合作社取这个名字，是因为它的社员大多是江浙两省来的难民。它颇可代表这一地区内的小工合单位。

社员们共同住在一个清洁得无可挑剔(至少在我看见的时候)的宿舍里，床是双层的，隔壁一间是俱乐部，它把读书和娱乐的设备合在一起。有一个合作书籍的小图书馆，和一个该区合作报纸的订存册子。一天的工作表跟社中的规程一同陈列在显著地位。墙上挂着通常的劝勉性质的标语：

工业合作社是真正工人的工厂！

工业合作社是抵制日货的方法！

清洁就是卫生，康健才可做更好的工作！

工业合作社是民生主义的实行！

在我们的社会上，只有做工的才得吃饭！

当我进去时，主席叫他的社友们向我敬礼；这位主席把他们一致通过采行的规定日常生活的规程，拿给我看。五时半吃早餐，六时开始工作。中间有一个钟头吃午餐，工作再继续到六点。出于他们自己选择的一天十二小时工作；显然，人们为自己而工作的时候，就不在乎时间之长了。其他的共同协议禁止在作场里吸烟和吐痰，浪费时间，大声叫嚣。未得主席许可不得擅往社外，要爱护工具。社员轮流做值日，来实施规程。凡工人屡次犯规或不服从主席，可在全体大会里予以开除，其股份由其他社员购买之。

汉中附近另一个有趣的难民合作社是一个织物社，它的零售室门上贴着：“我们为人人工作，人人为我们工作”！和“前方他们杀敌，后方我们造货”。这里，主席是一个极崇拜李太白的人，却把他的文才用到实际的目的上，用诗来写合作社规程，好叫他们更容易记牢。这一位诗人织工光荪甫是杭州人，他曾在杭州一个工业学校里读过染色和织造。当中国工业协会挂起它的招牌时，他有一天踌躇地走进去问合作社怎样组织法。“我懂得织布织毛巾的法子”，他说道，“我曾经在本地一个织造厂里做过事，但厂破产之后，我以教书为职业了。我知道布机和编织机器埋在什么地方。倘使我有一点钱，我就可以把旧工人聚集几个来，开始生产。”

当问他要多少钱时，光诚惶诚恐，要求足够买一包棉纱的

资本。他得到不只此数(三千元); 由一个工合工程师的帮助, 他不久就把几个无业的工人动员起来, 急切开办一个合作社。当我去参观的时候, 这个织物厂里一月出产三千元货, 社员们正在计划开办一个新的染坊。

出城到乡间, 回到宝鸡去的大路上, 我偶然发见一个值得特别提起的临时凑成的杰作。它是一个合作社玻璃厂, 能够造出各种各样的玻璃器具, 包括医用和军用的东西在内。我计算它全部的借款资本为数仅约美金一百二十元。完全用当地的料作, 它的巧妙的建造者以那个不足道的数目, 造了两个炉子, 六间各有一百二十磅容量的熔化室, 一个烘炉, 以及其他各种设备, 它们大多象泥和草做的, 可是显然极其适用。那只主要的炉子的烟囱, 大约三丈高, 外面涂泥(偶然地恰是战争颜色学的佳作)。中间砌一圈瓦, 设法用一个竹架子箍住了。这东西完全是徐鸿林的创造, 他是日本留学生, 在山西兵工厂里一直做到日军把它占去为止。他是水晶体专家。这个合作社有社员三十人, 大多数都是被徐训练出来的女难民。七个男吹手和捏手, 是仅有的熟练劳工。

汉中过去一天路程, 是另一个工合分部, 也许最好不把它的名字说出来, 虽然我确信日人现在得了汪精卫公司的帮助, 一定已经把它画好在地图上了。这个县里也有五十多个合作社, 那个小城作为一个战时交通和工业中心, 享有着空前的繁荣。大街中有一条改名为工合路, 工合会在这里维持着它自己为工合工人的孤儿和儿女办的小学, 它自己的医院, 一个技术训练学校, 和西北唯一的试验所——这一切都巧妙地掩蔽在四郊。

在这里附近, 是“工合线”上那家最大的合作社机器厂。由

它自己的水电厂所发动的这个机器厂，是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在“重”工业方面的第一个尝试。当我经过的时候，它主要地在从事纺织机器的制造，以应付军队紧急的毯子定货；但在过去，曾经为其他合作社造过许多种机器。它也曾一度造过盒子炮和步枪，一个月里造了七万个手榴弹。但政府现在禁止它造军器，谁都不知道究竟为了什么。工人中许多都是东三省人，从已被蒋介石解散的张学良的东北军的那小兵工厂里来的。得知他们的老机器要被运到南方什么地方去，或者当旧铁出卖的时候，工人们团结起来，在中国工业合作协会下面组成一个合作社，把他们的车床和工具，收还了一些。

在这工合分部里的其他合作社，包括一些煤矿、运输、皮厂、羊毛织物厂和一家造纸厂。最后一个，我相信，是那时陕西最大的造纸厂。跟厂联在一起（厂有广大的空地），工合办着它的小学校。所用的特别工合教本，是在工合的厂里印刷，印在工合的纸上的。除了别的东西之外，从最小的学生起，都受关于合作原理、以及体操和军事训练的教导。那个小孩队长为了表现给我看，叫他的同学们在那空地上进行操练，象黄埔学生一样漂亮。

这里另一个特点是一个工合医院，那城里仅有的一所，原来是作为工厂工人的诊所而开了的。它的医生是一个教会学校出身的青年，唐文和医师他把他的工作看作是布道和爱国服务。他的薪金那时是国币三十元——在作者写此文时，约合美金一元二角五分，这数目，我相信，是给医生界创了一个最低的纪录。他的小医院以一共有六张病床自豪；住院病人每日收费一元——在美国说来是四分。医生和护士为这个高价辩解：“因

为这里吃的东西很贵”。自从开办以来，这个医院已经给几千个工合工人和他们的儿女，给几百个乡人，种痘防天花，打预防伤寒的针和预防霍乱的针。除了别人之外，他还给记者打针，取费半分美金。

越过这个小小的十字路车行一日，来到了宝鸡，关于这个勇敢的小组织，得到更多的见闻，这个组织出现得迟，但空前有效地帮助在世界最古老的国家的诞生地上，建设一个新国家。在我继续行程到那游击邦里去之前，我要稍稍停一下，来描述这西北的工合之家。

明日的希望

我们被炸一次，重建一次。我们被炸十次，重建十次。
——一个工合标语

宝鸡是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的西北办事处，在它下面，在五省里面设十二个工合分部，一九四〇年时拥有近八百个合作社，从川陕边界向北一直分布到榆林长城边，从甘肃西部兰州一直分布到东面晋豫游击区。这是一块极大的土地，比法国大四五倍，是中国工业合作协会五个分区办事处中辖地最大的。^①

这个小城在战争开始时，原是一个毫无生气的偏僻小地方，在这里骡夫和骆驼夫把他们负载的货物卸落在陇海铁路的终点，但它现在却有大约七万个居民，具备了一个边界发达小城的一切热闹。它发展得这样迅速，以致新的“外”城门还没

^① 这五个办事处是：东南、西南、云南、川康及西北。一九四〇年为华北各游击区设立第六个办事处。

造成，已经成为城市的中心地带了。泥土的街道上挤满了骡子、马匹、马车、骆驼、货车和行军的人们，这地方有一种偏僻西部的粗野样子。宝鸡偶然遇到了好运道，有一个颇为开明的县长王丰瑞，他的热心的支持帮助合作运动迅速地生根，而为这个地方赢得了“工合城”这个别名。

在这里，在距离卢广绵到来开设一个办事处不到一年的时候，我发现工合傲然在经营着它自己的批发所和零售部，它自己的学校和训练班，以及它自己的装着本地仅有的淋浴设备的俱乐部。附近的合作社制造着鞋子、帆布袋、衣服、机具、肥皂、颜料、电气用品、糖食、军装、绑腿、帆布床、帐篷、毯子，等等。合作商店是城里最大的店铺，我去访问的时候，它有二百多种不同的货物，代表六十三家作坊和工厂的产品。后来，它一部分被炸毁了。但中国人冷静处之。他们说日本人免掉他们拆除已经不够用的房屋的麻烦，进行以更大的规模来重造。当附近一个合作社铁厂也被击中的时候，那些灵巧的铁匠声明对于那炸弹的全部碎铁有优先权，收回的钱足够偿付修理费用。然而，这样的损害在工合工厂中间是极少有的；它们大多造在郊外，从空中望起来，它们象乡下人家的茅屋，倘使被击中，也是偶然的。

宝鸡的合作大商店是受合作社联合会的一般指导的，但因为大多数的工人做生意的经验都很有有限，所以工合办事处的职员帮着经营。董事会里三个董事是办事处的人，四个由联合会选举。零售平均每天五千元，批发生意更大。我在那边的时候，军队方面买了十万元的药水纱布，和二万四千元的布。不久之后，它定制二十五万条羊毛毯子。三万磅绷带，三万磅药水棉

花，和几千件大衣和担架。这些必需品，在工合上市之前，当地是一样都不制造的。

迅速的发展把很重的责任摆到办事处职员四十六个组织人员和技术人员身上，但他们正从一个训练学校添补助力，这学校已经毕业了六十一个男人和十个女人。这些青年每月拿等于美金一二元的薪金，穿着棉布短裤和衬衫以及草鞋，象他们向着教导合作的工人们一样地吃和住。在宝鸡办事处和分部双方的职员都共同住在朴素的宿舍中，他们的吃食费钱极少。淋浴在娱乐室隔壁，是用美孚火油箱做成的靠重力供水的装置，有小的球状东西调整水流。洗一个澡，历时十分钟，收费五分。

一天早上，当我坐在我的铺上吃一碗冻米——一种工合出品——的时候，一个剃男装短发，穿蓝布旗袍的眼睛明明亮的年轻女子，极其谦逊地走进来，自己介绍是任珠明，这位伦敦经济学校毕业的任女士，是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妇女工作部的主任，并且如某人所说，是“此间附近最出色的人”。这一位堂堂的小妇人刚从甘肃、陕西艰苦地旅行了一个月回来，她在那边创办着识字和训练学校。她把身受的艰苦和冒险（在一世纪以前，中国妇女没有一个会梦想单独去冒这些艰险的），一点都不放在心上；她只有兴趣谈她的工作。

几千个妇女和孩子从日军或从黄河泛滥的地方，向西逃了几百英里之后，在这里，在渭河和汉水的古老的流域，在起浪的麦田中间的黄土村里，停了下来。他们住在芦扉棚里，在本省人旁边，这些本省人自己也象难民们一样地贫穷和没有知识。县政府发米给他们，但也只发米而已。任珠明有出奇的信念，以为这些没有希望的人可以组织起来，成为国家的一宗资产，

以代替作为国家的一项负债。

任女士和她的四个助手——五个姑娘解决两个广大的省份！——先从难童开始她们的使命，给他们办小学校。有时她们借用合作社的房子；有时露天的田野就是他们的教室。在六个月里，她们组织了十九班，招得了义务教师指导他们。除了识字以外，无家可归的儿童和孤儿还学数学、地理、简易卫生学、战争发展、自由歌曲和合作原理。通过儿童，获得了妇女的信任；通过妇女，获得了社会的信用。

任女士说：仅仅是求知的热情就使她们能够迅速地把儿童组织起来，对于妇女这可不行。中国一句古话说：“女子无才便是德”。西北的妇女依然是非常保守，有许多缠足，而传统又教导妇女必须服从男人，不得男人许可不可走一步路。在某一个村里，一个女人想要加入合作社和读书，被她的丈夫用牛鞭子抽打。个个人都同意这是惩罚“越轨妻子”的适当方法。

“于是我们转变到娱乐，说说笑话，讲讲关于这些母亲和妻子的故事，她们了解她们国家的运动，鼓励她们儿子和丈夫去参加作战”，任珠明说明道。“我们讲关于女子所做的英勇事迹的故事。我们发现这些故事非常有效和感动。这样，我们回到教道德和品行的传统中国法子——用牺牲和英勇的故事。”

要在乡村里赢得对于合作社的承认，必须除了难民，并须把当地的妇女们卷入这个运动。有一回，任女士发见几家穷人家住在一个洞里，跟中等阶级的乡村妇女相差只有极短的路，这些中等阶级妇女对于她们邻人的穷困满不在乎，但自己也是闲居，要做点有用的事情。她为这两批人都组织训练班，两批都立即组成合作社。明白自己有着共同的利害关系，她们在组织

中看到了团体的一种新的力量。

任珠明的工作恰巧做到足够证明它的可能性的地步。在教了九个月书之后，她和她的助手们已经组织了二十一个合作社，包括差不多六千个妇女。两个纺织训练学校教会一千多个妇女运用改良纺车和布机的方法，这些妇女中间有许多正在工余的班上，以她们所学会的教给别人。妇女工作部维持着十七所给工合社员子女，给妇女和穷孩子读书的小学。在宝鸡除了男人之外，女人也可进一所高级的纺织训练学校，学习这种行业的技术方面的知识，和组织合作社的方法，这样每一个学生毕业时才可以到外面去，在这种工作方面领导一个乡村。

说起来，这些小小的成就在数量方面还不足以给人深刻的印象。但在受到影响的人类生活中所发生的面目的改变，却是惊人的。男男女女正在发现一种共同生活的新方法；他们第一次感到生活有了目的，感到属于一个集体的意识。他们第一次为了一个比老板或家庭或仅仅他们自己更为伟大的人格而做工。有许多都从他们微乎其微的利润中，慷慨地捐给前方的兵士。他们中有一些议决把所有工余时间用来尽义务给军队做舒适品。战争开始改变现实，对于他们自己的将来具有着意义。

毋怪任女士恨不得有一百万元，以代替那时拨给她的工作经费二万元。她没有从政府得到直接的援助，不过蒋介石夫人从救济费里给了她上面所说的款子。后来，海外华侨和美国人的捐款足以使她们增加职员，把训练扩大到西北数千个别的妇女。

在中国所成就的经济的奇迹，用外国货币来说的时候，是十分使人难信的，除非你亲眼目睹。我把一笔小小的零钱捐给

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在宝鸡所办的一个孤儿训练学校，只有二百四十六元，约合美金十三元。这个数目买了二十二个女孩子穿的冬衣(工合出品)！任女士设立她第一个四十个人的纺织合作社，只花了差不多等于美金三百元的资本。这个数目除了十四架纺车、四架布机、采办第一批原料、以及兼作工场和课堂的一座乡下房子的租金——这几项的资本之外，里面还包括那四十个妇女在两个月的预先训练时期内的吃食和书籍的费用和四个教师的薪金哩！

所以中国是靠了微乎其微的数目战斗着生活着。

艾黎常常梦想：以美国一艘战舰的造价或那些“吃角子老虎”的一天收入，在中国可以做些什么。但是事情完全成为可笑到狂妄的程度，当我有一天觉察：单是一个普通美国妇女每月化妆品和美容的费用，就可供给一个中国妇女的衣、食、住、教育和合作工业中的一个位置。用了美容家从美国妇女一年所收的费用(在一九四〇年，等于中国国币四十万万元)，你可以把永久的生产性的救济给与中国二万万人。……

我在宝鸡访问合作社用了一个星期，但我却没有看到它们的最后一个。在我小住在那里的期间，几个新的合作社，组织成功了。在它们稀有的发展中间，许多理论和实践的问题仍是没有解决。例如，会计是一种神秘事件，批评者说工合工作人员永远学它不会。但是在它的训练学校里，职员方面正在编订一种简易的簿记方法，从合作社招来的年轻学生们以惊人的速度理解着。六个月以后，如会中会计每星期的查帐所证明，许多合作社的帐都记得完全满意了。此外，购买原料和推销出品也是需要经验的难关；但是在处理这事情的工合联合会里，男女

人员正在学习它所有的错综关系。卢广绵叫我相信：目下虽有弱点，但在整个组织之中，没有问题不能终于被合作工业的股东兼经营者所克服的。

然而远远地存在着这一切小型工业的战后前途这个主要问题，以及它为资本家竞争所消灭的危险。人们承认，工合的第一个任务是帮助战争得胜。人人都同意，倘使中国打败，那么中国工业不论合作社，或非合作社都不能生存。但除了领导成员外，合作社的工作人员也都在想到明日。

“我们许多人现在用手工的工具来做工”，他们中有一个说道。“但是我们正在制造机器，我们懂得怎样开机器。我们正在赚钱，我们能够在一二年内还清我们的借款。倘使我们把我们所有的工厂都聚集拢来，把我们所有的赚头都聚集拢来，那么我们联合的劳动可以变为强大。倘使我们能够制造机器、开机器，那么我们能够把大工厂管理得跟任何人一样好了。”

西北办事处职员和工合联合会已经把它们全部的财产都储积在一个区金库里。它最后将接收所有的合作借款，经营一般的银行和保险业务，成为所有工合单位的公共存款处。股份的支配权属于合作社自己，它们购买股票以二成纯利和五厘毛利为限度。当一个“全国工业合作社联合会”，成立的时候，西北区金库就将并入一个全国金库，后者本身被认为一个“全国工业合作社银行”的先驱。

这是显然的，合作工业只有在那样地迅速建立起它自己坚固的集体资力的条件之下，才能存在。第一批的借款是从财政部长兼全国救济委员会主席孔祥熙拨作这种试验用的全国救济金里来的。在营业成功表现出来，若干可为性被承认之后，几

家银行发生了兴趣。在一九四〇年，中国工业合作协会订了一个契约，使它得依年利八厘的利率，从四家政府银行，动用差不多四千万元的一笔借款资金。

同时，政府继续帮助给与职员做事的费用，作为它重雇程序的一部分。^①因为工合只对孔祥熙负责，拒绝变成国民党下面的一个机关，所以它可能作为一个比较不受党派节制的民主运动而发展。但是倘使这种民主的性质应该予以保卫的话，那么工合协会对于现在作为非常办法由政府付薪的那些服务，非发展其自己的偿付方法不可。那种协助可能是或者在任何时候被任意取消，或者要求以官僚政治控制这个组织为交换。

大多数工合领袖都充分明白那一点。他们确信，倘使战争为期够长，那么合作社除了维持那些训练学校、医院和社会服务以外，并将成为充分强大，能付这事业整个技术和行政方面的开支。前者实不受政府支持而经营，其得以成为可能，都是主要由于国外热心赞助者的帮助——尤其在菲律宾，那里到一九四一年已募集中国国币约一百万元，来发展这个运动。但西北工业合作社联合会对于它自己的合作社学校、医院和寡孀孤儿训练中心，已在捐助巨额的维持费了。倘使别区都联合起来，大家把他们的资财储积在一个中央金库里，那么全国规模的有计划的合作生产将成为可能，这个组织能在任何部门应付私人工业的竞争了。这样至少就是工合的忠诚的建立者们和它数千个工作人员的信念。

^① 整个工合协会行政的维持费，包括技术人员和组织人员近千人在内，在一九四〇年，每月仅约合美金六千元。海外捐给工合协会的钱两倍于政府所给的职薪补助金。

然而，对于这种抱负，从官僚绅士和工业资本结合而成的政治集团而来的反对，料必增加。到现时为止，政府政策容许基本工业和交通由国家独占，其他工业由私人资本家控制。在工合获得举国公认之前，如我们所已见到的，政府计划把战时“工业建设”几乎完全看作跟工业和资本集中在西南几个大城市里的意思是一样的。把工业分散建立在最宽广的可能的区域里，这种意见在政府的经济学家中，得不到几个赞助的人，而工人做老板的工业最初被人所嘲笑。到一九四〇年日方的封锁使政府许多以输入外国机器为基础的计划无法发动，同时日机屡次的猛袭，把重庆附近新的工业集中点毁了不少，工合计划的战略这才受到了拥护。

所有的新条件都有利于工业合作制度的迅速增大，这个制度倘使得以在平等的条件上作资本和市场的竞争，那么结果当可供自由中国制造消费品七八成。但它将有提高工资水准并改善全部工业的工作状况的倾向，甚至于或者会使政府为了保持国家工业中的熟练劳动起见，不得不增加工资，并实行雇员分红制。所以政府将来或则根本修正其工业化意见，或则把合作事业排除于重工业之外。后一步骤可能是致命的，因为合作社非自己拥有基本的和服务的工业，就不能稳固。

倘使美国会通过中国政府，放一笔巨额借款给工合协会，那么对于中国合作工业化的反对可完全消灭，工合的生存可获保证。许多在远东的美国人现在都相信，要防止日本以中国工钱低廉的货物席卷世界市场，压低我们自己的工资和生活程度，并使战争陷于危殆，最好的方法，就是支持合作生产，为中国抗战后盾。他们的立论是：老板兼做工人不会剥削自己，这种

工业会提高东方的工资标准和购买力，因此建立美国输出品尤其是现代工具、机器和运货车的未来市场。

在另一方面，倘使美国和英国竟然把真正巨额的未曾特别指定用途的借款放给中国政府来购买机器和供应品，那么工合之将被迅速肃清，正如这种借款支用时将发生中国官员的揩油、居奇垄断和投机，是同样可能的。抗战以来，中国人民虽遭剧烈的经济衰败，官员中却有一些已经倍增了家产。^①或改善了境遇。倘使我在这里不欲说得更详细些，这不是因为缺乏证据，而是因为——老实说——难以说得详细而并不无缘无故损伤一个从全体看来总是极值得世界援助的运动。

然而，倘使美国和英国在中国人民建立必要的民主制裁以前，不负责任地把巨额借款供给现在的官僚政治自由使用和操纵，那么一个结果可能不仅是在经济方面象工合这样有希望的发展的有效的窒息，而且是在政治进步方面的显著的倒退。怎样一个奇妙的矛盾之论啊！中国虽然极需要外国的援助，但得不到援助反而帮着造成那些条件，它们因为迫着政府非寻求人民更密切的合作不可。使人总算可以认为民主在中国是一种可能。

在一九四〇年八月，几百个美国人，内中约有七十个菲律宾工程师，签了一个请求书给罗斯福总统，要求美国以后借给中国的钱应指定作为通过工业合作社的扩张而发展国内生产之用。该请求书提议：代替了只把钱或信用转给中国的银行，或者把数百万元注进沦陷区救济机关的碗中去养日本人从中补充

^① 一件惊人的事情：没有证据证明自蒋介石以下，任何高级官员，除了区区不足道的自薪水所扣者外，尚缴纳个人所得税。

其工厂奴隶的难民，华盛顿应该把借款借给中国工业合作协会购买工具、机器、运货车和其他必需品，而帮着在中国建立生产性的救济。

关于工业合作社这个题目，我还没有写完。稍后一些，我们将见到它们怎样扩展到游击区里，以及它们在全民抗战的战略中尽着怎样极重大的一种任务。

第六篇 回到西北

中国的激流

“不变”的中国正在争取战争的胜利，因为他们终于变了，而且是朝着进步的方向。

——欧文·拉铁摩尔

和平主义者尽管竭力否认，历史却证明着确有“进步”的战争和“反动”的战争，证明着战争的物质损失跟所做到的社会进步比起来，有时是相对微小的。一般说来，在进步的战争中，旧秩序被一种更适宜于新条件的社会模型所代替，而在反动的战争中，旧有的传统只是又一次战胜了新的，或是在无谓而徒然的对立中，跟它本身同一水准的另一种传统或社会交战罢了。

在中国，共产党宣言抗日，因为他们说这是一种进步的战争，是民族和民主的革命的延长，他们声言这

是“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一个阶段，他们曾始终为此而奋斗。一九三六年，毛泽东在保安对我说：“如果中国打败日本，那就表示中国人民大众已经觉醒、动员、而且达到他们的独立了。因此，帝国主义主要问题也就解决了。”

不管世界接受他们的逻辑与否，现在大部分人都同意（至少在理论上）中国目标是进步的，值得支持的。甚至中国传教士中纯粹的和平主义者，也都在尽他们的力，帮助“争取胜利”，他们相信那目标和斗争是很有价值的。这里我想暂时撇开政治经济的广泛范围不谈，看看是否还有其他变动的征象。

虽然没有发生革命，但战争对人民的社会文化生活却已做了许多“革命”的工作，这也许是革命的前提。就边区政府的情形说，这些都是旧日苏维埃时代开始的变动的继续，常作为一种新的社会哲学所指引的变革的一部分。除了摹仿共产党的战略和游击队训练组织的技术之外，政府当然很少有意地努力袭用共产党的方法。但战争本身却重复了那红军方法所产生的许多条件，而人民的反响有时也造成相等的结果。久居中国的人谁都明白，整个的中国人很少达到一致，说他们矛盾也未必尽然。绝对性是不存在的；最后一句话往往是两极端的调和，谁都不坚持。全部中国人构成了一种模型。但却并无定形，不能用言辞来准确限定何种形式。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象中国变动得这么快，也没有一个国家比它更密切地与过去相联系。下面将随意谈到的“新”现象，大部分是很久以前就在中国社会中开始了，在国民革命时期中粗具了形式，现在又一次更显著地表现了出来。

举一个例，这次战争也许比以前任何灾难更深刻地动摇了

中国的家族制度。自然，这种制度并非中国独有的，而只是亚洲残存的许多封建和半封建社会的特征。它在印度依然强盛，在日本，除了特殊的不同点外，也许比中国更有力。全体性战争把严重而复杂的问题课给每个中国人，家族主义有限的手段再也不能单独应付了。群众在空前的灾难之前需要安全，结果便造成了社会结合和互相依赖的新形式，以及顺从广泛集团权力的更大愿望。

几百万的人民离开了他们的亲戚和父母，有的由于军队的征募，有的在混乱中死里逃生，但千万的人却是自愿别离家庭去为国效劳的。假如中国的盖洛普^①向今天的中国青年提出一个“你的第一义务是什么”？的问题，那答案大概可说是革命的。多数的人将回答：“为中国”，而不是“为我的家庭”。

孔子所说的“无违”，意思只是说一个人的最大义务，对父母应该“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日本内阁书记长风见章曾告诉日本政府说：“你必须带去统治中国的一切，便是《论语》”。然而二千五百年来孔子在中国文化上的统治，已被多方面推翻着。孝已不再是向来认为光荣的事情了。

儿童们对于从敌人战壕里拯救一面中国国旗的孩子，比之对于一个卧在冰上诱捉鲤鱼去奉献母亲的孩子，常感到更大的兴味。我个人知道有几十个青年完全抛弃了他们的家庭去从事“救国”的工作。我又知道，有许多家庭拆散了，因为儿子们不愿留在占领区后面侍奉他们的双亲。最显著的一个例子是王克敏的女儿，她痛斥她的父亲为叛逆，逃到自由中国反对他。成

^① Gallup美国民意测验的创始者。

千的青年在战场上牺牲他们纯洁的生命，犯了孟子所谓“无后”的最大不孝的罪恶。陈立夫这样努力于复兴孔教，他是否可以这样教导他的学生，说传后比为中国牺牲更重要呢？一个没有为后一代牺牲的决心的生命，究竟还有什么价值呢？

如果不破坏孝的义务，中国压根儿不会有军队，更自然决不会有革命。也许尽有许多社会革命家遵守着一切孝道，但就我所知道的，我却从未碰见一个战场上的战士，而不否认对家庭的传统义务的。因此，我可以断言，这种行动在中国人一生中实是一个决定的步骤，这是他在接受新社会的理想之前，心理上必需的准备。除非这么做，谁都不能担保他在危急关头不会为了增加家庭的幸福而脱逃，或窃盗，或变为叛逆者或反动。正統的孝道是封建制度的支柱。它跟社会革命是不能调和的。

自然，稍有常识的人，谁都不会想着孔子从来不是中国的民族英雄，而不应受他一定历史地位的尊崇；正如人们认识要把中国文字改造为现代的语言，有实行拼音文字或拉丁化的必要，而决不就认为这种改革，将根本抹煞了中国象形文字在考古学上的永久价值。

孙中山夫人曾经写道：“在我们的历史记录中，孔子将占着许多重要的几章，因为他对中国文化有一定的功绩。”但“我们现社会的机构正剧烈地变动着，要解决大变动所引起的许多问题是困难的。孔教不能帮助解决这些问题；它已丧失了所有实际的价值。……孔子的教条是彻头彻尾封建主义的和专制的。我们必须认识孔子的影响是怎样深刻地渗入于我们的艺术、文学、社会科学和道德。我们必须以最大的努力，从我们的生活

和思想中把孔子的观念彻底肃清。”

另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情，即：宗教或至少是偶像崇拜，似乎已到了迅剧衰落的时期。基督教被公认为一种有用的制度，因为它的领袖们能从社会和战地服务中来实行他们的信仰。但人民却很少相信神明保佑的祷告和祈求。中国佛教的社会影响在战前本已衰落，现在是实际上等于零了。成百的佛教和道教的寺庙在战争中毁灭，受凌辱的菩萨的无灵，也许更加深了中国传统的对于天上威权的怀疑。

在僻远的内地，我看到一座古庙改作了印刷所，印刷工人统统是无神论者。在中国，到处是菩萨被抛弃在雨中，庙宇改作了医院和堡垒，很少引起人们的抗议。我曾看见许多彩雕的塑像装上了纺织机，工人喜悦地在它们的脸上擦洋火。我看到农民的孩子，恶作剧地给它们装上了希特勒式的胡子，并且在它们泥塑的褪了色的大腿上，涂着“打倒日本”的口号，这些孩子在几年以前看到这种塑像是要发抖的。工业合作社恢复了许多当地的手工业，但曾在所有乡村最为发达的锡箔业和香烛业，却并不在内。

各种偏见正在消除着。东部诸省的人民成千的涌入西部小乡镇。在川、陕的酒馆中，你常可以听到同时说着半打以上的方言。成百的医生、工程师、护士、兵士和学生都流迁到异乡工作，他们都不能说当地的方言。海外的工程师都回到各地工作，在以前，偏见和“风水”的迷信是排斥他们的。

上海妇女训练云南人和甘肃人从事纺织。东北的流亡者替河南军队制造绑腿和制服，广东医生替言语不通的兵士疗治创伤。上海来的残废兵士跟湖南的寡妇结婚。这样多的省份和方

言混和着，边陲森林地带的土人，从未见过中国的地图，惊异地发现了他们土地的广大和多样性，并且每天准备接受一桩新奇的事物。

许多中产阶级的家庭，几乎丧失了他们所有的一切，有的现在是完全普罗化了。许多地方贫乏的物质条件使学者、商人、兵士和工人处于同等的境遇，成为同等收入的一群。中产阶级人们学习了一些穷人的哲学。保守主义和阶级歧视的经济基础多少是破坏了，而代替以一种战争，不幸和希望的同情。在重庆，有些人力车夫得到比商人更多的收入，而石匠的工资也比有些官吏高。在整个的自由中国，技术工艺的重要性有着从未有的货币价值乃至权威。到处的着重建设，促起了对双手有训练的人们的注意。学者和政治家所全部靠赖的便是这些工人——石匠、木匠、铁匠、机械师，他们真正创造了自由中国，——除了他们之外，似乎都是无用的人，只会说话不会做事情。就我看来，在这些有着有用的双手的人们中间，正日益产生一种力的自觉。

侵略所造成的物质损失的数量，是巨大而不可胜计的。然而你听到人们说，这对于再建是一个大帮助。除了生命和生产手段的损失之外，有些城市的破坏，并非全然是悲剧。公路、工厂、学校、医院以及其他的公共处所，在各地建立起来，如果没有破坏，也许几十年内不会做到。这些改革常成为新的活动的焦点，这确乎使整个社会生活起了革命。生产形式改变的社会影响，进步人口的荟集于落后的西部，以及西部的成为政府主要的战争根据地，在这里说起来显然是太复杂了。

当然，自力更生和自信的精神日益成长着，他们认识中国

必能摆脱日本有力的战争机构，忍受英美铤铁对日的源源接济，并且以人家极少的援助，使敌人陷于严重的失败。空虚和自负多半已在中国消灭。一种深刻的自信代替了它们，因为中国眼见着那曾经认为比柔和的中国人要坚强得多的欧洲民族，都一个又一个的在侵略前面倒了下去。

中国不曾产生比欧洲第五纵队更坏的叛逆，不曾铸成比协约国盲动更浪费的领导上的错误，也不曾犯过甚于张伯伦主义的错误估计的外交罪恶。失败主义现在似乎多半限于官僚主义者以及怀念沿海安乐窝的富有人们。这是民族成员的一种新骄傲。特别在军队中，你可以看到一个达观民族的各种基本美德的综合。每一个兵士，在不可避免的灾难之前，都表现了可惊的坚忍、持久、愉快、沉毅的勇敢，以及对于苦难的毫不介意。

这种穿得不好、吃得不好以及配备不好的战士，究竟出于怎样的精神鼓舞，而能视死如归呢？谁知道！对于上帝或宗教神话的信仰，似乎很少作用。日本人带了佛教符箓和千人针护胸去打仗，以为这样炮弹就打不进去了，并且知道他将上升天国而再生为崇高的上帝。基督教徒可以为救世和来世的信仰而牺牲。回教徒自信地向前望着未来的先哲的乐园。但中国的兵士却不带护身符，不说祷告，便连忏悔也没有一句的死了。孔子不曾拿天堂答应他，在他怀疑的心灵的深处，他很少有专一的信仰。他爱中国，但他也爱生命。究竟是什么秘密的鼓舞，使他愿意牺牲自我呢？

每个人都要求普及的教育，因了战争缘故，识字运动已有很大的进步。在军队中，识字的人可以成为良好的士兵；未受

教育的人是不能教他使用现代兵器的。如果人民不懂得希望他们做的是什​​么，他们就不能完成它。成年教育已在许多乡村中施行，义务教育也用各种临时的方法推进着。除了群众教育广泛而普遍的要求之外，更造成了一种智识活动和自由发问的空气，这原是属于民主社会的黎明期的，但在一个政治压迫还在普遍实施的国家中，这却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奇迹。然而这里常有着一种为真理的真正热心和“把握”的能力，这显然是根据了真理属于中国一边的普遍的信心。

许多旧的态度改变了，对于有用知识的输入，也很少反对了。据传在这次战事中间，有一位国立药科大学校长，因为拒绝拿某官吏的蛙皮方剂替代西药而被撤了职，但在人民大众中间，现代药物和科学却已获得了普遍的接受。每一个医院可以治疗十倍的病人，如果它有人手和设备的话。“科学”现在已成了普通士兵中间常常听到的一个名词。成千的农民看见飞机从头上飞过，并且抛下死亡来，因而认识了一种命运正在孔夫子所从不知道的世界中摆布着。如果有人对他们讲，他们便好奇地热切地倾听着说明，他们又常切望他们儿子去学习科学的解答，犹如以前希望他们中翰林一样。

政治上，尽管很少民主，但在蓬勃的讨论中，却表现了可惊程度的民主。照理，一个人在朋友中间可以自由发表他真正的意见。茶室中到处是政治谈话和批评。没有一个人的名字是神圣的。“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现在已成了一句过时的孔子格言。政治是每一个人的事业，谈话中的批评到处普遍。如果发现了贪污，再也不能因为是孝子而遭宽恕。他们也许仍能逃避极刑，但广大的舆论却一定要置他们于死。

日本在占领区的政策恰和这种倾向成了显著的对照。风见章的忠告已被采纳。日本正拿《论语》来统治中国。

日本认为孔教对于控制她的征服品极有用处，关于这个事实，无法在这里作更深刻的分析。中国统治阶级的知识分子往往对侵略者的这种意识形态具有同感，这明示着他们不能代表“新型的社会。”这是重庆战时领导阶级弱点的一个关键，也是中国学者阶级和布尔乔亚中残存的封建主义的一个说明。幸而，上层尽管对下百计提倡正统的孔教，但自由中国基本群众的趋势却似乎走着相反的方向，战争给予革命的中国人的进步诺言，便在这里。

国民党的政策和自由中国的真实情形固然跟日本的统治方式很多不同，但在那共产党未被排斥的区域中，日本最严厉的反共论点，似乎也被采取着。共产党是彻底的反孔教者，这一事实，跟他们坦白的提倡社会主义，也许同样的引起了保守布尔乔亚学者的反对。反共的文化人攻讦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异国”的学说，但我却往往猜想，它的所以被痛恨，主要是因为在中国传统的不敬态度的后面，还听到了那曾经讥笑了他们两千年的老子的笑声。

孔子是至善论者，是传统思想的世界主要潮流的砥柱。中国道教哲学创始者老子，则是威廉·杰姆斯所谓“意志坚强”的哲学家之一——自然主义的、现实主义的而且是唯物主义的。道教不信什么与人同形的上帝，认为思想与事物在“道”的无所不包的原则中是等同的，即一切事物的全体性与自发性。它嘲笑孝道：尘埃即尘埃，一切祖先在“道”之中都是平等的。它的无为的精神，嫌恶优劣之间的“礼仪三百条与行为法则三千条”；

在“道”之中，农民跟王公一样的善良。老子和庄子不相信固定的道德和制度，但都跟黑格尔一样，承认一切事物不可避免的变动性。孔子在一个“衰微”的国家中是不适宜的；老子可十分惯常。不过，共产党在战斗的传统上虽然可以暂时得到道教哲学的支持，但当他们树立了他们新道德的传统和制度时，老子就要笑他们了。

无论如何，老子和庄子都是有力的民主主义者，他们相信“一切事物的平等，”包括性别在内。在这一点上，比孔子更能与战时中国的社会变动相协调。孔子教人是一切事物都不平等的，尤其是性别方面。他承认“妇女是人类，但比男子低一级。女子不能让她有任何的自己意志，这是自然的法则。”但在今天变动的社会中，如众所知，中国妇女却要求着并且已逐渐取得新的平等待遇。她们的解放，也许是这次战争的真正社会收获之一。中国妇女今天担任着男子做的一切工作，从领导游击队到管理工厂和学校。除非是民族的失败，什么力量都不能剥夺她们在社会和政治生活中所获得的发言权了。

一九一一年前清时代柔弱的、三寸金莲的、连正眼都不敢瞧人的妇女，如今，她们的品性和人格已在战争的锻炼下成熟了。有多少被迫肩起家庭负担的农村妇女，发现了应付的力量；有多少胆怯的男子，受了妇女界勇敢和义愤的激励，而不得不去行动？

自然，“妇女动员”仍是不够。无数百万女子受不到任何的训练，这犹如在我上面所说的各种社会变动的趋势中，无数百万人仍属除外一样。在有許多区域中，战争只造成了死亡、疾病和倒退，一切旧日的罪恶，依然像以前一样在广大地域中猖

狂。然而，在许多别的地方，在落后而辽远的你所料想不到的乡镇中，战争却促进了思想的感染和变动，无异经过一次革命的斗争。

举例说，几年以前，谁梦想得到在那社会停滞了二千年的荒瘠的陕西黄土岩中，今天会有一个伟大的大学，训练着千百的女孩子去当护士、教师、新闻记者和自由的战士？在这些年青的女壮士中间，而不是在那为了读书还要鞭挞他们妻子的农民中间，中国看到了从目前苦难中生长出来的未来希望。

边区政府

如果没有共产党，没有八路军，以至没有边区政府，中国就要陷于混乱了。

——毛泽东

我从宝鸡东行九十英里，通过中国仅存的铁路之一——陇海线，到陕西的首府西安去。黄河对面的日本飞机场离此只有半小时路程，因此两年以来，西安城曾屡次被炸。一大块地方烧掉了。著名的迎宾馆的餐室和一排侧屋破坏很重，但我却异常幸运，得到了一个装着弹簧卧床的房间，墙上只有几个洞。我立刻去睡，毫不听到什么，直到破晓警报才响起来。你在那里只能逗留十分钟，连喘息的功夫也没有，当我们到得城墙下面的防空壕时，一队中国人所惯称的“鸡群”，正好布满了天空。

一九三六年，我在这西安迎宾馆第一次碰到中国红军，他们护送我通过反共军的防线，到当时的苏维埃区去。在我回来

的一个月后，蒋介石全部随员也就在这里被张学良所囚禁，当时张以“军事的劫持”来说服蒋介石发动对日抗战。后来我的妻子独自逃过西安的警察网到苏区去旅行，一九三七年，我又来跟她会面，并且护送她通过战区到沿海一带。我自己对于这个城市并无特殊的爱好，但我却不能不经过这里到延安去。

西安是一个国民党辖治下的反共堡垒，跟日本统治下的各地几乎没有分别，但八路军在这里仍设有一个联络站，经常载运旅客和接济品的车辆，可以从这里开赴游击队的前线。因此，它又是到“边区”去的一种跳板。

自从我最近一次访问西北以后，延安已成了一连串这种神奇的游击区的根据地，而每一游击区，都有着或多或少的自治权。他们的领土几乎全在日军的后方。人们必须记住，华北的大部分名义上尽管已于一九三七年为日本所征服，但却仍在中国军队的直接控制之下。边区填补了日本防区之间的空隙，在那里，表现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民众动员的最大努力的景象。主持动员工作的政府虽然大部从共产党方面取得他们的领导，但它们并非就是(当然也不能是)社会主义的国家。它们是根据《三民主义》激进民主的原则而成立的一种战时制度。

这种独一无二的制度，是从华北地方的政治特殊性和战争所造成的条件中合理地发展起来的。这里，我们必须约略回顾一下一九三七年七月以前的情形。西安事变的解决，让共产党和红军控制了一个约等于英格兰大小的区域。它包括了陕北，从西安北面几十英里外的三原到长城，西面伸展到甘肃平原的边缘，拥有甘肃省的几县和宁夏省的一二县。在这区域中的苏维埃共和国解散之后，共产党的政策宣言改变，一个特殊的行

政组织成立了，叫做陕甘宁边区政府。它宣称是一个建立于联合阵线基础之上的民主政权，实际上确曾把官吏选举权不分阶级地普及于人民——这在中国是破题儿第一遭。当一九三七年九月红军以八路军(现为第十八集团军)名义编入国民革命军并被指定在山西作战时，这种边区政权已暂时获得蒋介石的认可了。

延安成了新的临时政府的首府，象它在以前苏维埃共和国时代一样。它是八路军的后方大本营，也依然是共产党的政治中心。随着共产党军队向敌后东北部的进展，延安的势力也扩充到更广大的区域。今天，它已成了一种游击队的大本营，指挥着从陕西东到黄海，从冀豫的黄河北达满蒙的抗日活动。

游击区域中的所有边区政权，控制了约等于战前德国两倍的总面积。它们多少跟陕甘宁边区的模型有分别，每一个政权在政治形式上是不同的。它们都效忠中央政府，它们的武装力量也在蒋介石的最高指挥下。但它们在政治上对延安比对重庆更密切，就是动员的方法，也是多半沿袭着从前的苏维埃，而很少采取国民党区域中地主、士绅和党政统治的方式。它们并不象后者一样的在军队、公共机关和总动员工作中竭力排斥共产党，边区政府是建立于联合阵线的基础之上的，它们并不摈拒任何抗日的政党，而允许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员可以一样的担任官职和参加政权的活动。

山西的意思就是“山之西”，因毗连山东省或“山之东”得名，而山东又与海相接。山西位于那从陕西流入的黄河沿岸，在陕西，旧日的苏维埃有着它们的根据地。现在，山西相对的“自由主义”以及它抵抗的坚韧性全是一贯奇妙的环境所造成。三十

年来，山西省一直是老军阀阎锡山将军的辖境，他的势力一度曾遍及华北。有一时期，人们都说山西是“模范省”，但进步的观念改变，最近几年来，更常听到有人叫做“落后的省份”。阎维持着他区域的自治和他自己的军队，印行他自己的钞票，颁布他自己的法律，而很少顺从南京的中央当局。后者曾尽力干涉他的自治，而当一九三五年时，阎不得不吁请中央军来击退当时的红军，因为红军惨重地打败了他的山西军。

不少的人曾预言阎锡山将出卖给日本；但转瞬之间这些常常讥笑阎锡山的“爱国者”，有许多都已变成傀儡，而那位老军阀，却依然为了他神圣的山河战斗着。不错，他的行政组织是腐败的，封建的和无能的；但阎锡山不是叛国者。一九三五年，他似乎认识有些事情犯了严重的错误，开始设法补救，他把有些进步的青年吸收到他的政权中，并且努力联合和组织他的人民。在一九三六年，他甚至庇护有几个主张“联合阵线”的人，那时候，这个名词在南京是足够把你送进监牢去的。他的想法有许多很象河北省的主席宋哲元。他认为要抵抗南京和日本的两面压力，必须取得人民的支持，而他自己则在两大势力中间，尽可能长久地维持着平衡。

当日本最后侵入华北时，阎锡山不得不下了决心，他也象宋哲元一样的做去，没有多大的成功，但却鼓足勇气，效忠于中国。日军轻易地冲退了他的配备简陋、训练和领导都不够的山西军队，他的半封建的行政机构迅速地崩溃了，许多官员都随军逃走。在一个月里面，那“华北的战略钥匙”的山西，有一半以上被占领了。阎不知道怎样指挥流动的战斗，那无组织的人民也没有一个能够领导游击抗战的地方政府。地方官吏从不争

取人民的合作，他们在军事上既无训练，在政治上也没有修养。

老阎锡山无法拯救他所爱的山西，他只能听取那打入他的内层的年轻激进分子的意见了，他们时常劝他改组行政机构和动员民众，现在，他们忠告阎锡山，跟那蒋介石命令他们来助他保卫山西的共产党军队维持友谊的联络——学习他们的战术和组织方法，并采用那些方法努力准备人民的长期抵抗。阎锡山确是这样做了，结果山西便成为中国国防系统最强的堡垒。

因此，八路军开入山西，受到阎锡山的欢迎，并在他的指挥之下，因为他是第二战区——包括山西、察哈尔和绥远诸省——的最高长官。山西的北部，原已落入日本人手中，当共产党军队北开时，他们恰遇到大队省军向黄河溃退。得了阎的允许后，红军就沿着他们经过的路线，立刻开始训练和组织民众，以支持军队和增强士气。分遣的政治工作者集合并改组了一部份山西的军队，以适应流动的战斗。他们还创办学校，以训练山西新军的领袖，一切这些，都是在日本的攻势中进行的！八路军循着日本侧翼防线的外面移动，它的主力渐渐地回到晋北和河北的今天所占的地位。

大队的中国军队因了有组织的人民的支持，可以在日军的后方存在；广大的中国土地，仍在他们的管制之下，而双方谁也不能消灭谁；这些事实，对于阎锡山，犹之对于许多旧式的军阀一样，是一种新发现。这一切，当然便是卡尔森所称的“正统战争”最特殊的特征。就地形说，这种现象在华北是可能的，因为那里有极好的天然屏障，如广大的河流，丛深的森林，和不能通过的山岳地带；在它们后面，大军可以相对安全

地避免突然的进攻。因为这些屏障常是依各省的边境而成的，控制边境最为重要，因为非把一切“边区”平定，征服可说是不能完成的。

在区划北方的一个最重要的“联结点”，山西、察哈尔、河北在太行山的乱峰中间相接，第二边区政府就位置在这里，那领土是由八路军克复的。他们一到达山西的东北部，这些志愿的游击军就把那各县城执行日军命令的地方傀儡政权解散了大部分。事实上，他们现在只能存在于日本重兵的直接保护下，但日本缺乏充分的兵力来占领最重要城镇以外的地方，因此他们只能派遣周期的剿伐军，突击和攻掠一下乡村，以维持他们对内地的“控制”。

山西的政治工作者到处教人民怎样形成他们自己的政治和军事组织，并鼓励他们选举自己的乡村和县政府，以代替那傀儡政权。一九三八年一月，经了一次蒋介石特许的五台山代表会议以后，晋冀察边区政府宣告成立，于是一切都统一了。这边区政府主要是在共产党军队和他们所武装所训练的自卫队的保卫下，但也包括当地国民党的代表，以及代表现在游击区中数百万人民的各种人民团体。它的权力范围自然依照军事形势而不同。一九四〇年七月，这政府直接控制了山西东北部，河北中部和察哈尔南部的七十县，面积约等于意大利大小。

晋冀察边区政府曾在太行山中建立稳固的根据地，八路军派遣了精锐部队通过日军防线向东深入鲁北。在这里，从日军手中克复了许多个县，并且建立了第三边区。还有，另外几个部队穿过平津间的日军防线，进入冀东，即日本在长城以南第一次建立傀儡政府的地方。后来他们深入内蒙东端山岳地带的

热河，那是一九三三年由日军并入“满洲国”的。他们又进入陕宁北面长城一带的绥远。

鲁北方面组织完备的边区政权，跟晋冀察政府维持着有机的联系，事实上，游击队的陆上交通，一直从直隶湾的天津近郊伸展到延安。在热河和冀东，游击队还只有一些原始的军事根据地，不能在任何点上支持一个稳定的政权。但无论如何，他们却通过群众组织完成了某种程度的行政的控制，这些群众组织，形成了内地一切抗日活动的人力根据地。

军事上最重要的是另一个包括晋南豫北和河北西南大部的边区。它的面积也许要比纽约州大两倍，拥有晋冀察政权下的同样的人口——约一千二百万。晋豫冀边区在中国历史上以“上党”著称，战略上异常重要，中国古时有句话，“拥有上党者即拥有天下”。（译意，原文找不到——译者）“天下”便是大西北；这在今天仍是正确的。上党控制着到渭汉流域最便利的通路。所以，除非把中国军队完全扫荡，日本就无法在黄河以西实行大规模的侵入。

在现代，比战略利益更重要的是上党区未开发的丰富的煤铁资源——几十万万吨，这种资源的诱惑也是日本侵入最初的原因之一。在抵抗没有完全摧毁之前，日本不能利用这种资源取利。他们虽一再发动剿灭上党区游击根据地的军事进攻，但是经了三年的努力，这区域中的中国军队反而比日军初来时还多了。日本控制了主要城市和交通线，但广大的陆地却为山上堡垒中的中国二十五万以上大军所统治，那是任何边区所夸豪的最强大的力量。

上党区的保卫者是混合组成的，主要包括了以前曾为死敌

的两支军队。当我最后一次访问西北时，那内战中以剿共著名的卫立煌将军，指挥着十万中央军，以豫北和晋西南为根据地。他最接近的邻军和晋东南的共同保卫者是八路军的三师，在可敬的朱德和著名游击军司令彭德怀的领导之下，当内战时，我曾跟随彭的旧有第一方面红军在宁夏旅行过。此外还有五万当地志愿兵组成的山西新军，他们在训练上曾得八路军很大的帮助，并有阎锡山的支持。在晋省西南，则是阎自己原有军队改编的残余，约为六万人。

上党区不象晋冀察和陕甘宁边区政府样的统一于单一的指挥，它包括了九个不同的行政区，每一个反映当地驻军的性质。在八路军活动的地方，乡村动员的方式很象别的边区，山西新军驻防的区域也是同样情形。在中央军以及改编的山西旧军控制下的区域，那政权比较近于国民党的旧方式，因为它们自由中国里面仍有根据地，较少倚赖民众的支持。不过，即使在后者情形下，许多人民团体也蓬勃地发扬着，而这在别的地方是禁止的；此外，在军队和人民之间，在不同的军队和不同的政治理想之间，都有着很好的合作精神。

一般说来，边区政权现在给农民树立了他们从不知道的最有能力和最民主的行政机构，人民和官吏之间的鸿沟，大部份堵塞了。以后我将更详细的说明一个进步的边区政府怎样活动，以及老少男女的人民怎样动员起来，把每一份力量贡献于社会的幸福。

日后的斗争并不仅是侵入者与防卫者的斗争，同时也包括了中国内部党派、阶级、军事、政治以及社会利益和理想的冲突。一切发生的事情在西方人看来常认为是演进而不是革命，

也许要懂得它充份的意义，至少必须了解中国的历史，我可不知道西洋人究在怎样做。那一幕幕发生的事情是这样的伟大，只有用史诗的形式才能希望把它们重现出来。勇敢的男女们今天所做的一切，将是几千年后野史和传奇的资料，但也许只有中国人才能了解和记得他们的英雄和勇士，才能珍贵他们的主张和真理，正如只有中国人才能在《三国演义》这部奇书的复杂叙述中认识它崇高的地位一样，现在这一时期跟三国有许多相象的地方。

然而我要离开本题了。这一切只能算是我再度访问延安记录的一个前言。我前面曾经声明我的见闻有限，但如果读者仍愿跟着我到地球上最奇特的“首都”，那末，我们还可能知道一些关于历史上一个最英勇的斗争的幕后人物和理想的有价值的事情。

雨中之旅

到延安的路是中国青年的生路。 ——鲁迅

战事开始以后，我走到一处地方，那怕是最料不到的地方，总有那肋下挟着一本《西行漫记》的青年，问我怎样去进延安的学校，在有一城市中，教育局长象一个谋叛者似的到我这里来，要我“介绍”他的儿子，让他去进延安的军政大学。在香港，一个发达的银行家也使我吃惊地作了同样的请求。我看到他儿子舒适的环境，说道：“那你儿子就必须睡在泥坑上，处置他自己的食物和洗涤他自己的衣服了。”

“我知道这些”，他答道：“不过，他如果再在这里逗留下

去，他迟早将不得不替日本人去洗涤了！”也许他比他的沿海一带的同业们，对于将来有着更明白的见解。

假使我在上海或汉口或重庆设立一个招募站，我可以募集好几个大队；这也许是对中国最好的贡献。可惜我未受招募的委托，而我跟延安的“内部关系”，也没有超过因战时饮食而在我肾脏留下的伤疤。我对这些未来的独身游击战士不能帮很多的忙。据我所知道，“溜入”陕北最简易的途径是步行。成千的青年们都是步行的——从几百英里的距离外。当我回到西安时，他们还从中国各地源源而来；现在，胡宗南将军率领大军控制着到苏区去的大部分通路，就他的眼中看来，青年男女如果加入八路军或到延安学习，就等于犯了叛国罪。

这位安徽的小将军是蒋介石的黄埔军官中最能干而最有力的一个，自从蒋介石在广州训练他以来，确乎一直是蒋的宠儿。他统率着第一集团军，那是所有中央军配备最好、训练最好的精锐——也就是蒋介石个人的骄傲和快乐。战争爆发以来，它实际上不曾打过仗，它驻防在西北，显然是为了隔绝红军势力的蔓延，同时也作为新的力量发展的教导团。可笑得很，俄国方面来的军火，大部分都拨归胡的部队——如果大规模的内战再起，它将形成反共运动的骨干。

胡宗南是一个办事能干和富有吸引力的人物，他是复兴社的领袖，这复兴社是蒋介石剿共时期中秘密组成的。复兴社主要包括了黄埔和南京的军官，采取着纳粹的方法，无疑还受着德国顾问的鼓励，有一时期，它公然以“盖世太保”（德国的秘密警察）作模范。在一九三七年，这个组织准确地反映了蒋自己的政治理想；直到希特勒离弃蒋介石的军队，即当元首宣称

打败日本为“精神上的不可能”之后(这使中国的知识阶级的骄傲,受到怎样“精神上”的创伤啊!),某些亲纳粹的倾向才告消灭。但它仍坚守着如下的原则:消灭赤色分子,服从领袖和拥护独裁政府。现在,第一个口号主要自然用政治手段执行着。胡宗南自己负责组织中央军的特务部和政治宪兵,它们的任务之一便是使青年隔绝马克思主义的沾染。除了他黄埔的同学陈诚之外,胡宗南在少壮军官中间也许比任何青年将领有更大的势力。许多人都认为在蒋介石继承者的一辈中,他是陈诚的主要劲敌。

随着战争的进展,眼见许多青年都跑到“匪窟”去,这自然日益困恼了“复兴分子”,于是他们采取着一切可以阻止的手段。沿路设立了侦察站,特务宪兵拦阻着青年旅客,搜查他们,并常把他们送回胡宗南的感化学校,这在共产党是称为“集中营”的。它跟胡宗南的军政训练学校相联系,军政学校又多少模仿着延安的学校,事实上也曾造就了一些能干的青年军官。但延安的倾向者却被称做“落后的学生”,除非他们声明对共产主义不再有兴趣,他们不能正式入学,或被认为无用之材而遣送回家。

这种奇特的军队之间的绑架,甚至包括了穿制服的八路军人士,他们往往在军部自己的车辆上被捕——车辆也不时遭没收。有一天,一个过度热心反共的宪兵误拘了一个八路军的军官,甚至对他说“共产党匪徒”无权乘坐公共汽车或货车。这位穿着普通士兵制服的军官,原来就是八路军野战司令彭德怀。他立刻把这个宪兵扭到天水的中央军司令部,此后这种行动总算暂时停止了。但当我到西安时,又发生一种新的纷扰,那就

是断绝对八路军的汽油分配。事实上，当我坐上一辆过度载重的货车时，我很为自己庆幸，因为这是几星期来第一部到延安的车子啊。

那巨型的道奇汽车高高堆着行李和接济品，例外加上了十四个旅客，有三个是女人，我们在往北的尘土飞扬的路上蹒跚着。中午到达三原，我们在八路军的交通站过夜，半夜里开始落起雨来，到天明路上已是不能通行。陕西的雨一开始就落个不停，有时一落便是四十天。这一次落了五天才停，但等我们可以上路已是一星期了。三原的一星期是可想而知的寂寞之极的情景，但我似乎是唯一怨恨耽搁的人。我的同伴们都安定下来读着站中图书馆所存贮的政治军事的书报。时间对于他们在战时与平时并无不同；在这种态度中，正有着一个了解中国的关键，西方人如果不经过亲身经验，是不大把握得住的。

我们的耽搁，至少使我熟悉了我的旅伴，每天晚上，我跟他们几个人在幽黯的菜油灯下玩着扑克牌和辩论战争与革命的大问题。其中有中国工业合作社游击队检查员孟云卿（译音），他是到延安本部去参加会议的。还有共产党领袖陈昌浩的小脚太太，带了她的儿子去看他那著名的曾被巨金悬购首级的父亲。她在路上表现了绝好的精神。当司机者清除路上难走的障碍，或当我们听了警报散避时，她一次又一次的痛苦地撑着小脚攀下车来。然而她从不诉苦和表示一生中未有的颠簸的劳顿。年少的陈在精神、行为乃至容貌方面使我颇想起了旧时的一个同学，因此我在三原便给他起个名字叫做“伯特”，并且教他装着奇怪的样子。“伯特”直到最近才发觉他的父亲还活着以及他的父亲是谁，因为在内战几年中，他的母亲是绝对保守秘密的。

有一年轻的姑娘，是一个湖南商人的女儿，她曾脱离家庭去加入新四军。在那里住了一年，现在，穿着一件夺获的日本大衣，要上延安的女子大学去了。她是一个美丽的孩子，温和而快乐，但却象皮革一样的坚韧，她十分能够照顾自己，夸言曾在新四军获得射击的奖章。此外还有一个湖南人，从新四军来的一个年青的官员，当旧日南方苏维埃时，他曾跟萧克和项英一同战斗，他也穿着一件褐色厚呢的大衣，他称为“天皇的礼物”。他曾把枪弹打过这件大衣的主人，而在那残破的衣角上，他还骄傲地指出他目标的记录。

这个短小的湖南人认为现在比之他当红军别动队时的艰苦生活，实是一个“繁荣的时期”。有一天大家辩论什么是“痛苦”。一个人说痛苦是“除了小麦外没有东西吃”。另一个人说最恶劣的食料是蕃薯。许多中国人，特别是南方人，认为小麦和蕃薯都不宜于人类的营养。第三个人说：“但是草还要恶劣，除非里面有蚱蜢。”

“没有草，没有蚱蜢，只有老鼠——我们曾经有过这么的一次。”湖南人露着讥笑的牙齿，突然的说。“那末这就算是真正的痛苦吧”，每一个人都同意了。但一种恍惚耽于美食的神情偷偷地在那老战士的眼角流露出来，他慢慢地摇着头。“大家别说老鼠不好”，他说。“它们可实在不坏，要是你懂得烹饪方法的话。”你得知道怎样选择，剥皮和清洗，怎样把它饴起来——最好是蜜饴，但当然在荒年时你不会有蜜糖的——还有，怎样烧和烤。“很香”，他象梦似地作了结论。“如果再放些适当的红胡椒，味道比童子鸡还好哩。非常好一吃！”

唔，如果法国人可以看了烤干的癞虾蟆狂喜，英国人可以

特别嗜好生牛肉，而美国人喜欢牡蛎液，那末，蜜饯的老鼠也许真有味儿。不过我个人总不能被说服，还是喜欢我的一碗饭。

讲到饮食，当我们在三原闲荡时，孟和我雇了一个厨子带到延安的外宾窑洞去。一天，我们在泥泞的大街上走，想找寻一家面包店，路上我问一个挈篮的小贩买一些栗子。“你从哪一国来的”？他问我。我告诉他我是美国人，他说他曾经在西安府附近替一个英国人烧菜。孟感到了兴味，便问他是否愿意到延安去当一个外国式厨子。

在我们车上的货物中间，装有全套烧西菜必需的用具——坩锅，盘和汤勺等——以及盆子、刀、叉和羹匙。负责采办的职员在西安买到了这些东西，于是又去找寻厨子。他无法找到一个愿意接受八十元以下月薪的人。最后他明白所有西式厨子的薪水向来被帝国主义者抬高了，如果因了雇一个薪水比毛泽东还高好几倍的厨子而造成延安的特殊阶级，那是不好的事情。所以他决定把用具带去，不再找厨子了，心想到延安时再召集会议来讨论这件事。

孟对这个卖栗子的小贩反复盘问了许多关于西菜的问题，以证明他不致说谎。然后说明他的工作是替偶来的外宾烧菜，给访问的将领和其他要人制办筵席。在孟描述延安生活的动人并且说他还能在那里受教育之后，那小贩就同意了十五元一月的工资。第二天晚上，厨子陪了他的老母同来，很明白，他们对此事已起了疑心，以为是军队绑架那儿子的阴谋；几个月来，他似乎一直逃避着兵役。兵士们向这老嫗说明八路军跟别的军队的不同，以及他们不要征兵而只要志愿兵的理由，我足足听了半夜。最后，她似乎满意了，第二天早晨我们离开三原时，厨

子也上了车，其他旅客都马上跑过去用“大义”来说服他。二天以后，我见他已戴上八路军的制帽了。

“这是什么？你莫非已经入伍了？”我问他。

“不”，他笑着说，“但在这样的時候，我可再也不去卖栗子了。”

我的中国话因为好久不说，变得十分生硬了，而在车上的时间中，使我有了温习的机会。我的难题之一是对我旅伴讲一个谜子，这谜子是我在重庆听到的，经我一转述，多少已经走了样。

我说：“当咸丰年代，宰相要一个最聪明的人去当广东的总督，因为这个职务是非常困难的。因此他召集所有最好的学者到北京，加以最严格的试验。最后选出了三个人，智力完全相等。一天，他召唤这三人入宫，告以选定其中一人的困难，因为皇上对他说如不能找到最有才能的人，就要把他斩首。于是那宰相从桌上拿了五只盘子，三只蓝的，二只绿的。他把盘子拿给候选者看，说道：

“我把盘子分别放在你们每个人的头上，然后请他们到另外一间没有镜子的屋子里去，你们在那里不许讲话，或互装手势。第一个从屋子里出来的人，把所有三只盘子的颜色告诉我，并且加以合理的说明，那他就可以去当广东的总督。

“于是宰相如法做去，叫三个人到隔壁一间屋子里。十分钟之后，其中一个跑了出来，宣布三只盘子都是蓝色。他是对的；在他说明以后，宰相就任他为总督。他的说明怎样呢？为什么没有一只盘子是绿色的呢？”

全车沉默着，大家想了很久的时候。在我们快到延安之前，

那个喜欢老鼠的湖南人作了准确的答复。他的解释，比我所能解答的还好。

延安的重聚

在延安，中国共产党已实现了欧文·傅利叶时代原始的乌托邦社会主义者所梦想的公社生活。

——奈姆·韦尔斯

所有共产党人对于他们延安的新“首府”，是很骄傲的，保安来的老战士常常问我上次访问之后，觉得有什么进步。这个问题初看似乎是讽刺的。因为城中几乎每一座屋子都毁坏了，事实上，延安已成了完全受空袭破坏的大市镇的唯一例子。日本显然没有完成他们的任务，因为他们几乎每天在继续轰炸那地方。单是这一处，日本一定已经消耗了几百万元了。

但是建设和城内的破坏并进着。在城墙的外面：一个新的都市正在成长中。千百的建筑物连列于岩影之间，或密布在无尽的起伏的黄土间的小凹地，一层一层新掘的窑洞，沿山边开着大口，有好几英里长。约有四万从事各部门战时工作的人，成天在那窑洞里上上落落。

乐观主义是这些人们永久的习惯；他们拿它穿在身上象一件精神的甲冑。“延安比保安好，是不是？”毛泽东问我道。“自从你一九三六年访问我们以来，我们曾竭力在各方面求进步。给我们以时间。如果我们能保持现在进步的速率，到一九四五年我们就可有一些东西给你看了。”

当你看到他们用自己特殊经验所造成的事物时，你就不得

不承认：虽然是在穴居的首都，他们却过着快乐的日子。他们的军队已扩增了三四倍，现在防守着数千英里的新疆土。他们跟中国其余部分不再完全隔绝了。他们在陕北有一个坚固的小小根据地，除了给轰炸打断外，他们在那里可以训练成千新的军事和政治的平时领袖，并且树立他们自己的制度。

物质条件改善了。矿藏和原料工业正在发展中。在保安的时期，只有最冒险的商人才肯在当时苏区和“白”区之间做生意。现在，几家私营的大规模贸易公司，借着他们自己车辆的运输，都很发达，因为延安为了鼓励商业，业已取消一切商人的捐税。陕北的棉花、羊毛、皮革、植物油和谷类是出超的。工业生产——大部是手工业——大大地增加着。工业和生产者的合作社适应了市民和军队的许多要求。消费合作社拥有着堆积农村人口必需品的贮藏库。政府的管制把物价抑低了，在那里，物价通常要比任何地方低百分之三十到四十。

农业生产也扩增了。大量青年尽管为军队所征募，边区政府却仍动员一切体力强健的人们从事耕种，开垦了一百万亩（十万公顷）以上的荒地。地方的保安队和驻军也参加这工作，还有所有学生和“职员”。甚至银行家都不能免。一天早晨，我到边区政府的银行去，这一天银行停止办公。全体职员都出去收割了。由于生产运动的结果，陕北以前的粮食恐慌已经克服。市场上充满着谷物和蔬菜，羊肉也多而便宜。这区域，在食粮方面是自足的。

许多新的公共机关都位置在山麓间或在那隐蔽于小径中的新的政府建筑中。教育竭力推进着，新的印刷所替前线 and 后方出版着各种书籍、杂志和报纸。许多外国的著作被译了过来，

刊行标准本，并且用中国文编著自己的历史和革命理论的教本，我有几个保安朋友现在成了作家，都拿他们著作的原稿给我看。毛泽东、朱德、洛甫以及其他军政领袖的选集都印成了普及本。有小说，报告文学，论文，和关于战争的军政书籍，也有自然科学，艺术和文学的译文。我很惋惜那当我一九三六年离保安时正在编纂中的集体创作的《长征》史，竟已放弃出版了。据说是为了“对联合阵线不适宜”。

公共卫生的工作业已改善，全部的卫生布置似乎很好。这区域中虽流行风土的传染病，但两年以来还不曾发生过。延安有自己的药厂，除了大量的绷带纱布和工具外，还出产了三十一种标准方式的药品。在外国留学回来的药学家的指导下，一共有八十个药剂师。边区中央医院有病床一百只，每天门诊病人约二百名，完全免费诊治人民，并且包括了一个产科收容室。在附近的村镇中，还有八路军国际和平医院的分院，在外科和畸形疗治方面有着特殊的设备。重伤兵士可以很幸运地回到后方受专家医生的诊察，如阿塔尔博士领导下的印度四个代表，阿博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英国医生服务队中的医师。

另一种革新：除了许多食堂之外，当地乡镇还有一个小棚搭成的现代化酒吧间，和一个能够专门烹制南北大菜的厨房。我一到之后，就去那里参加欢迎中国作家和学生慰劳团的茶会，他们在国民党元老张继将军和黄埔军官贺衷寒将军的领导下，遍访着各地前线。

贺衷寒的莅临延安，可说是难得的事情，因为他是上面说过的法西斯派“复兴社”的第一个领袖。据说他最初竭力反对慰劳团访问“叛逆”的延安，后来又拒绝自己亲身去，到了最后，

却又不可思议地改变了他的初衷。延安的人们在十分诧异之余，很周到的优待他，并且给他以各种调查的便利。谁也不知道他的印象怎样。穿着光亮的皮靴和挺直的制服，腰带间闪烁着灿烂的金刀，他跟那代表当地各文化团体的穿着棉衣的主人们，恰成了显著的对照。

张继一向是红色分子的死敌，现在却竭力主张党派合作。我看他是一个魁伟的灰色长发的人，有些象哲学家，当他作一次恳切的演说，盛赞八路军的努力和爱国时，贺衷寒很感到局促不安。我觉得他似乎在暗示地忠告他年轻的同僚，这情景是怪有趣的。

“我现在是一个五十八岁的老头儿了”，张继开始说：“我再也没有个人的野心，或党的野心，我为什么不对你们都爱中国的青年坦白直说呢？是的，我是四十五年来一个革命者，其中有三十年曾跟着孙中山先生一同战斗。但我虽然为国家效力这么长久，就能说我不曾犯过错误吗？例如，我后悔我在一九二四年的错误，当时我反对孙先生联共。当时，我不同意他的解释，说三民主义与共产党没有冲突。我这态度也许于中国有害。不幸，孙先生死了。只有他的聪明才智可以避免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七年的悲剧。”

当他继续说下去时，全场是一片沉默。国民党代表在听众前面说这样谦逊的话，这是第一次。张又讲到最近的国共冲突，他当向听众保证国民党的元老们都拥护联合战线，不希望再有内战。我觉得这个老人对中国青年说着心坎里诚实的话：民族的团结比什么都重要，只有在这个信心之下，中国才能图存。他在雷鸣的掌声中坐了下来。

自然，对于大公无私的爱国者，疗治这些争取领导的两大劲敌间的旧伤，比什么都重要，即使这创伤不常因新的冲突而扩大的话，尤其是共产党，似乎从不肯放过任何协调的机会。几天以后，当那在山西前线驻防两年的何柱国将军的军队通过边区时，又举行了一次盛大的宴会，以欢迎这个红军的死敌和他的官员，以及两位苏联顾问。

何柱国将军于一九三六年张学良的停战协定后，就停止进攻红军。那年我跟旧时红军在甘肃时，事实上指挥进攻的便是何柱国。从何部俘获的几匹马——他是指挥骑兵的——使红军组成了他们第一个骑兵队。我也曾骑过其中的几匹。因此我那天坐在群众中间欢迎这个人时，我觉得有一种异常的感情。那个欢迎的晚上，挤在新戏院中——城郊中一个大建筑——的当有二千人，男女学生、兵士、工人、农民、老的和少的都从各方面徒步而来。

何将军作了一次激烈反日的演说，充满着意料中的语句。继他演说的是俄国人，是一个金发的青年，有着愉快的眼光和异常动人的微笑。很少人听得懂他的话，但他宏亮的声音是这样表现着信心，他的扫射听众的激昂姿势是这样优美，以致博得了听众的全堂掌声。我心想他大概答应以一二个机械化部队来帮助抗战吧。但他老练的中国译员，完全摹仿着他的姿势以及尽可能地的声音，终于马上把事情弄清楚了。实则那俄国人只是申说苏联对于世上一切被压迫民族的同情，赞美中国抗战的英勇，以及预言日本的早日崩溃和中国的必然胜利。

年轻而诚实，那是好的，我希望我也能分得他的乐观。在我的沉思中，很惭愧，我也被请求讲了几句话。

我最不喜欢对任何人演说。我十分知道那些青年要听的话是什么。可以使他们欢呼的莫过于保证美国支持他们。但人人都知道美国拿了那破坏延安和其他城市的金属品，以及杀戮他们千百同志的军用原料接济着日本。我能否认或减轻这种罪恶吗？是否可以对他们说，干这种事情的是资本家，完全违背了美国人民的意志？当真的吗？我衷心同意伊利诺罗斯福的话，“拿铤铁和军火卖给日本的责任，全在于美国人民的肩上。”事实是少数人从这里赚钱，其余的不加责备。是否可以安慰这些人们，说美国妇女宁愿坐视他们受难而不愿舍弃丝袜呢？

我忽然记起艾黎在公共汽车上碰到的老人，他曾说到大鼻子的外国人和他对航空的妨碍，我认为这是确实的。我把这故事全告诉了他们，以代替演说。

所以外国人因了他们的大鼻子，没有远大的目光，那末，我的朋友们，怎还能叫他们通过重洋看到而且了解你们的苦难，以及他们为什么不应帮助日本杀戮你们兄弟姊妹的理由呢？我们居住的是一个短视的世界，是一个疯狗的世界，的确没有一个人能看到他自己鼻子以外的东西。中国不能等待别国带上长距离的眼镜。你们的领袖毛泽东曾经说，每一个男女必须学习“用他的牙，他的手和他的足来战斗”，所以中国可以单独获胜。他是对的，谁都靠不住，只除了你们自己。

然而我凭什么权利拿我黯淡的陈腐论调来苦恼这些决心牺牲的青年呢？我于是含糊说了一些乐观的希望，另外一二则笑话，就很快的回到了我的坐位。接着合奏开始了。

是的，合奏，我在这里第一次听到了冼星海的作品，这位青年谱制的歌曲现在普遍传唱于黄河到黄海。冼自己也在那里，

领导着他特别的乐队，有中国的铜锣、洋琴和笛子，有外国的丝弦和梵哑铃，以及用美孚火油箱和土产弦子制成的，他自己的特殊发明品，指挥的是冼星海自己，他究竟是疯子还是天才，我可不知道。他们说他的欧洲教师都断定他是前者。

但我所听到却是好的。它有生命，又象说话，它抓住了听众的情绪。他莫非是一个偷儿？有贝多芬的节奏，但未必全是，有些几乎是巴哈（德国音乐家）的格调，也有象《红楼梦》“Red Chamber Dream”名曲中的低调，忽而是一个爬山者的歌唱，忽而是船夫疲劳之余的小曲，是河流的怒吼，是枪枝的相击声。冼星海叫这只歌曲做《黄河》，这在形式上是一首史诗，它的重音部分由六十种声调合唱着，它在诉说国家的胜利和失败，民族的死亡和新生。唱也唱得好，毫无可怕的歌剧中故意做作声音的痕迹。这里全是自然的声音，饱满而有力，操着悦耳的中国国语。然而，它尽管很多摹仿外国，但仍然是中国的——不过是明天的中国，向西方开着半扇门。

什么机遇使得冼星海教授带了他混合的音乐到这辽远的陕西呢？我知道那是延安的鲁迅艺术学院。这里有着五百个作家、艺术家、戏剧家、作曲家和他们的学生，他们都是来自各省和海外的天才者，他们在附近的村庄中建立了一个他们自己的艺术家居留地，位置于——任何一切的地方！——教堂和寺院中。因了这个学校的创立，现在延安在艺术上也象在政治上一样成了进步分子的“麦加”。因为在这里，群众艺术不致犯叛国之罪，他们尽可随自己意思来“提高群众的文化水准”。几天以后，我又做了这些“文化匪徒”的坐上客（这是中国文化的守旧者称呼他们的），在他们中间，见到了几个北平和上海来的老友，他们

对我说着他们自己对于战时艺术的理论。

在《黄河》节目完毕之后，我顺序退了出来，恰在毛泽东的旁边。

“你觉得怎么样”？他问着。

“好极了，这是燕京大学合唱《救世主》之后，我在中国听到的最好的合唱。”

“是的，这是我们保安戏院之后的一个大变革。”

女英雄的大学

我爱孩子们象一个组织，但我自己却不要有一个。
我必须应付军队中的工作。——康克清

延安仍生存于它自己价值的一个知识世界中；一切问题有着不同的成就，教育方面特别来得显著。过去四年以来，任何地方没有象陕甘宁边区政府这样表现着教育的迅速进步。延安这个小村镇，六年以前连大部分中国人都不曾听到，现在已成了全国最大的教育中心之一。它的物质条件尽管简陋，而且几乎每天有敌方轰炸机的降临，它却仍贡献着广泛的各种教育和崭新的文化影响。

老徐特立在苏维埃时代当教育委员时，就奠定了新教育制度的基础，他是前湖南长沙普通学校的校长，以五十岁时加入共产党出名。在他到陕北之前，整个区域中只有一百二十所学校，教的只是一些四书。在一九三九年年底，有了七百七十三所小学，七十九所模范小学和十六所高级小学了。群众教育超过了自由中国的任何区域。还有七百个特别补习班和二百〇八

所的成年夜校。在以前，陕西的几所高等教育的学校都在西安。现在，延安除了一所中国最大的艺术学院，一个技术训练学校和儿童工合职业训练学校之外，还有四个中等学校和三个大学。工合职训学校的学生都从“小鬼”中选拔，大半是孤儿，以酬报他们对于爱国服务的忠诚和辛劳。

在内战停止以后，旧日的红军大学改名为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它的教室散布在延安附近的各处窑洞中，我在那里时共有二千个学生，而山西各分校的学生则有八千多。直到一九三九年为止，全部大学集中于陕北，但后来在通过国民党区域的路上，有许多学生被扣留或羁押了，这才决定把学校的大部分移到日军后方去。这样可以避免与反共集团的摩擦，日本人显然反而是一种较小的麻烦。从抗大修完军政学程毕业的，总共每年约有一万人。课目内容主要还是跟旧日红军大学一样，但技术和物质的设备却改善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训练，主要是在说明联合阵线和三民主义与共产党政策的关系。

但在延安教育机关中完全新创，而我认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却是女子大学，一个真正女英雄的大学。它围抱着肤施附近的两座山，而由二百个光景的窑洞组成，其间连接着一条整洁的公路，向下盘曲到苍翠的山谷。在其他附近小山的侧面，是纵横曲折的玉蜀黍和蔬菜的田园，学生们在那里自己种植着，每天一大清早就起来到田野里劳作两小时，然后去上课。有四百个女孩和妇女就这样学习着一切，从纺织到看护婴孩乃至复杂的英文和俄文的文法。

一天早晨我跟一个朋友骑马到女大，在那里消磨了开扩眼界的一天，参观了大学的教室和宿舍，并且享受了学生合作食

堂烹制的一顿甘美的蔬餐。从前的苏维埃首都保安是不能跟这相比的。共产党妇女的面色也好了，当王明美丽的太太，女大系主任孟景树和别的三位教师陪伴我到每一个窑洞去的时候，我不禁注意到这点。职员和学生都穿着棉制服、布鞋和草鞋，她们的短发上面戴着军帽。不敷脂粉。远远看去你辨不出她们和男孩子的分别。她们总是露着笑容，象你在中国到处劳动人们中所看到的一样，没有了这，这个国家对于多半外国人将感到象一个永久阴暗的天空般的窒息。

这个女子大学有着中国各处来的各种年龄的女孩子，最使我惊奇的是其中北方人占着大多数。人们常说共产党的理想决不能使华北人民发生兴趣，有人相信中国“共产主义”是南方的产物。但在这些中国革命家中间有句格言：“地方领袖必须发展每一个新的区域，使其加入革命。”他们知道外来的领袖对于地方乡镇只能负责有限的部分。在今天，军队所到的地方，他们就增加着新的补充，并且选拔最优秀的分子到他们后方的学校去再受训练。

从一九三七年被日本“征服”的山东到女大来的学生，比任何省份都要多。其次河南，再次是河北和山西。江苏第五位，此外四川、陕西、广东、湖南、湖北和东三省的人数大约相等。有两个女孩子从辽远的青海和西康来。约有百分之六十的学生是十九到二十岁；其余都是二十以上三十以下，只有五个在三十以上。有一个工厂工人和著名劳工组织者的学生是四十一岁。大多数都不曾结过婚，十人中大约一个有丈夫、在党里、前线或担任其他战时的工作。在这么僻远的角落里，有这么一个全国性的女子大学已够诧异；而其中的妇女还在兵荒马乱中来自

中国所有的各省，那就显得分外惊人了。我奇怪她们怎样跑到那里来，一问之下才知道大部分妇女都从占领区从日本防线后面几百英里外跟着危险的游击队来。那是一种真正求知的饥荒。有几个美国女郎，会从战区中跋涉五百英里去进一个窑洞的大学，而在那里还得种植她们自己的菜蔬。

大部分学生是工人或农民的女儿。其余都是中等阶级家庭出身，只有一打光景是“资本家”。资本家中最著名的有新加坡华侨胡文虎的女儿，胡是以贩卖疗治百病的“虎标”万金油发财的。四十一个学生是大学的程度，一百二十九个中学程度，有二百个以上还不到高级小学程度。我奇怪，对于这样程度不同，省份不同，教育背景不同的妇女，究竟教以那一种课程，我于是去问女大的书记郭清(译音)。

“我们有三级学生”，她说。“有几个初到时连读写都不会。我们把她们编入特别班，只施以初等学校的教育，学习些中国语文、社会问题、卫生、政治和军事常识”以及简明的党史。一年之后，有的便可升入第二级。这级必修的课程是社会史、政治经济学、中国共产党的问题、三民主义、军事问题、初步哲学以及公共卫生的问题。

“还有是高级研究班。入学资格必须是大学或相当的程度或受过我们特别班和第二级的训练。高级研究的学生须修习政治经济学、马列主义、哲学、世界革命史和一种外国语。这里我们训练着战时工作或现行别部门的专门干部，俾他们担任占领区中的政治工作、教育、医药工作、宣传、合作组织等。我们也设有选修课程，如英文、俄文和日文，文学和音乐、簿记、速记、新闻学和纺织缝纫等。”

三级联合上课的是中国社会问题和“妇女运动”的讲演。不用说，这种教育跟中国任何地方所施行的完全不同。没有一门功课跟国民党和教会的学校相同，它们很少注意职业式军事的教育，自然更没有马克思主义或共产党的理论！在女子大学中，一切课目都渗透着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包括了共产党自己对于三民主义的解释。

整个体系是战时制度或他们所称的“非常时教育”。但这是切合实际的；他们并非无用的律师或哲学博士的过剩生产，这对于陕西人民生活无异是一次地震，在红军进驻这个区域之前，他们还象驴子和马一般的被雇去“劳动”，而女人则留 在家里，积聚他们的工资。

女大入学的一般条件只要体格健全，有合作精神，并在民族斗争中为妇女解放而战斗的决心。劳工阶级的妇女或是从事反日工作的妇女或是从日后各临时军政训练学校出来的学生，都可受优待。大多数学生不是共产党员。准许入学之后，还须经过程度审查的考试，妇女们这才可以插入三级中的一级。请求入学者远超过了可以容纳的限度，因此名额将扩充至一千名。

学生们过着很好的社会生活，有充分的业余时间从事竞技和运动。她们在一个山麓里建立了自己的戏院，在一条清流旁边洗涤着自己的东西。他们有运动场和篮球场，也有健身房和骑马场。在下面山谷中的管理处和合作社的屋子外，围着一道墙，大门口由肩着认真的刺刀的女哨兵驻守着。访问者须有特别事情才可以进去。那精神要比美国大部的女子学校好得多了。

毕业生多数从事乡村教育的工作，次多数是回到他们游击区的老家去领导群众组织。也有进抗大继续受军事训练。许多学生已参加了游击战。战区中妇女干部的任务，包括了动员工作，农民的教育和组织，以协助战斗的部队。

西方的教授们也许很难想象一个窑洞的大学，其实“窑房”不是一个潮湿阴暗的洞，而是一个真正的“窑屋”，可以温暖而舒适的居住。在我离开延安期间，窑洞的建筑已有进步。天花板高了一些，房间也开阔了。当地的掘窑洞者常认为黄土墙是刷不上石灰的，但实验却发现了一种白石灰，现在已被广泛地应用，使内部的光线改好了很多。地上铺着砖，正面是中国纸糊的窗棂——很稀奇，这种纸窗可以透过玻璃所不能透过的紫外光线——你可以有一个比许多简陋学校来得好的房间，也要比伦敦东区(贫民区)的每一家清洁得多了。窑洞的另一种好处就是因为它通常盖着三四十英尺的泥土，炸弹无法破坏。万一炸弹落在入口处，那末，房间后面交错的甬道可以挡住弹片，并且防止震动。

女大的住食、书和学都是免费的，不过学生们必需备好她们自己的床铺和制服。她们跟别的大学一样，在山边荒地上种植她们自己的大部食物。学校经费大部由公众捐集和爱国的海外华侨的帮助。每个月的经费，连职员(每人五元)和七十个教师的薪水在内，不到三千元。总算起来每个学生每月花费的约为七元五角，即约等于美金四角。

第七篇 红色的战略

红色预言家

我们甚至不能谈社会主义，要是我们被夺去了一个可以实行它的国家的话。

——毛泽东

在通我窑洞的一条路的底脚，车子象肺癆病似地咳嗽着，望去好象一辆护送囚人的马车。当我走近时，才看到是一辆伤兵的救护车，车门上清楚地写着字：

献给中国英勇的保卫者

纽约中国洗衣匠协会谨赠

这便是曾使我的教士朋友吃惊的毛泽东的奢侈品。有许多这种洗衣匠的礼物在延安堆积着，有时常被用以运送空袭受伤的市民，到就近的医院去。但它们多半搁置着，因为没有汽油开动它们。

摩托的救护车在游击前线很少实用；战争的流动性，没有路的田野，以及汽油和服务便利的不够，需要一种特殊方式的医药服务。假如海外华侨和外国友人拿了他们买救护车和外国药所费的钱捐给延安，投到当地的生产事业如扩充药厂和游击工业等，那就将有永久的价值。但这些人却没有注意到如果拿输入品所费的一部分作为购买机器的资本，中国人就能制造自己的必需品。把一辆救护车折成现金送给八路军，以资助军队中实际医药工作的组织和发展游击工业，确乎可以拯救了几百条生命。

许多人认为延安是中国“反资本家”的中心，但它却需要着“资本”和资本货物，除了枪之外，比什么都重要。

那伤兵救护车沿着城墙外圈颠簸了几里，转过一个山谷，然后停下来把我们放在到毛泽东住所去的一块铺砌的空场上。“我们”包括了黄华，他自愿陪伴我；他要去听毛泽东对于欧洲局势的分析。黄华是我的老朋友，我第一次遇见他正当他在北平的学生时代，那时他是燕京大学中他的一级的级长，——一个有为的富于理想的青年，有着领袖的天才。他是那离开北方美国最大教会大学的安逸园地去加入红军的第一批学生中的一个。

黄华已经大大成熟了，现在已是一个极有自信的人，富于责任心；他是一个青年救亡协会的书记和北方某校的教务主任。跟我在共产主义阵营中所遇见的受过教会教育的所有学生一样（现在已有好几十个），他使我感觉到，他在心理上比之中国别地方的基督教学生更能安定自己，因为后者很少能够使他们的宗教背景与他们所生存的一种社会相调和。也许这些基督教的

共产党员，已放弃了跟中国理性主义不能调和的对于信仰的超自然主义，而真正能够把基督教的社会教训和他们日常的政治问题相调合。也许是这个区域中根本的和禁欲的平等主义的生活，给予了他们以这样做的理想。这也许就是那吸引过莱贝神父的当地一种实际的友爱，莱贝神父是一个比利时老牧师，带了他基督教的医药队加入八路军，他说他觉得他的主义跟朱德所实行的并没有冲突，这句话曾经震惊了基督教的中国。

我看到毛泽东仍住在一个窑洞中，但却改装得现代化了，一共包括了书室、卧室、和会客室三个房间。墙壁粉刷着白石灰，地上铺着砖块，还有一些毛太太所添置的女性的装饰。如此而已。我发现毛自己仍只有两套制服和唯一缀补过的大衣。他压根儿没有个人的财富。

在我第二次访问毛泽东之后，我不能把我以前所记录的印象添增多少。几年来的战争不曾使他有什么改变。因为不再挨饿，他的体重增加了；他的头发已经剪短；他常是穿着一套普通士兵的制服。他仍是人民中的平常人，有农民和知识分子素质的奇异的搀杂，也有伟大政治目光和普通常识的非常的混合。他革命的乐观主义始终不动摇；他永远自信共产党最后必在中国胜利，他还是彻夜工作到天明。他依然是世界形势的研习者和政治的分析家；在他开始夜工作之前，他先要阅读一大堆从附近军队无线电台收集的当天电报——从山西前线，从中国各处，乃至从海外各国。

毛泽东的政治知识说明了他领导共产党的能力，但却不能说明他受军民控制的实际影响。在讲话方面，他可以把一个最复杂的问题说得未受教育的人也能懂得。他熟悉许多习语和例

子；他从不对听众说无关紧要的话，也从不驳倒他们。在他和听众之间，有着真正亲密的交流，他似乎常在接触他们的。

革命运动需要一个领袖对于未来事情有比任何人先见一着的能力；而在这方面，毛泽东是成功的，他的群众非常信任他的判断。一九三六年，毛曾对我作了一些重要的政治预言，这在许多人看来是荒谬的。当时很少人相信共产党可以存在；更少有人预见到国共会缔结抗日联合阵线。只有极少数的外国专家怀疑日本可以在几个月里压服中国。在中国人中，少数乐观主义者相信日本在战事一开始，就会遭经济的崩溃；悲观主义者则认为日本一封锁沿岸和占领重要的城市，中国就要崩溃。

不管他们对于共产党的看法怎样，以及他们所代表的是谁，大部分的中国人现在都承认毛泽东正确地分析了国内和国际的因素，并且无误地描画了未来的一般轮廓。内战果然停止了，共产党和红军不仅存在，而且在民族联合阵线中增强了。他说在战争的某一阶段，国民党的一部分将出卖中国，并且变成日本的工具，这种说法曾引起很久的愤怒；但到了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出走之后，那就无法否认他是真正了解政府的内部力量的。毛预言如果某些条件不做到，战争将是长期性的和艰苦的，而且一定是历史上稀有的例子之一，仅仅靠赖军事斗争，决不能获得迅速而容易的胜利。但这种坦白的分析更进而使那散布幻觉的败北主义缴了械。在另一方面，毛又正确估计中国自己的资源、人力、和物力，如加以革命方法的动员，必能保障巨大的持久力，而这帮助着建立了更坚定的民族自信心。

他在一九三六年七月中说：“许多人以为日本一旦攫夺了沿海某些战略点和加紧封锁，中国就无法继续抗战。这是胡

说……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国家，除非每一英寸的土地落在侵入者的刺刀下，那就不能说被征服。即使日本占领了中国的大部分，控制了一个人口一二万万的面积，我们离失败还远。那时候，我们仍有一个巨大的力量反抗日本军阀，他们仍将被迫用全部战争来对付严重的经常的后方行动。”

毛泽东又继续说明争取胜利所必需的一种战略——这种战略最后是采用了的：

“那战略必须是一种运动战的战略，在一个展延的动荡的和无限的前线上：那种战略全靠在崎岖的平原上完成高度的流动性，而以迅速的进攻和后退，迅速的集中和分散为特点。这将是一种大规模的运动战，而不仅是深壕、重垒和大军密集的阵地战。……堑壕战必须进行，但这是辅助的和次要的……日本的经济将在长期占领中国的消耗中瓦解，她军队的士气将在无数的但没有决定性的战斗的试炼下衰沉。”

但这预言还没有全部应验；因为毛曾预言中国的最后胜利，以国内的完全动员——还没有做到——和“重要的外国援助”为基础。如果毛所谓“重要”是“大”的意思，那末这条件也没有实现。

毛泽东在我再度访问延安时的论调，似乎跟他以前推测一样的可疑；但有许多已为历史所证明。我到延安时是一九三九年九月中旬；那里关于欧洲政治外交危机的消息很少。当时许多观察者相信俄国跟德国签了互不侵犯公约之后，将成为希特勒的战时同盟者。毛泽东认为这种议论可笑，同时说明苏联与德帝国主义的矛盾，正与英法帝国主义矛盾一样的尖锐。他说苏联只有当它受直接进攻时或者欧洲的革命运动起来时，才会

抛弃它的中立政策，他指出《苏德互不侵犯公约》主要是一种“战略军事上的必需”，与政治问题无关，而只是保卫苏联，击破张伯伦与希特勒缔结反苏联联盟的企图。

当时这种解释不尽与事实相合。世界都相信莫斯科的英苏谈判已有进步。没有几星期之前，英国、苏联和中国的外交官员都十分诚恳地对我保证，英苏公约确将签字。因此，在这样紧急的时期，说张伯伦还在企图绥靖柏林或甚至跟它联盟，那似乎是不可能的。我当向毛泽东要证据，毛承认他一些也没有，这只是他对于客观形势的分析。几个月之后我读到了英国的蓝皮书和亨德森爵士自己回忆录的《使德辱命记》，这才揭露了张伯伦的幻梦，曾一直坚持到最后五分钟。

那时候，毛泽东也预料日本不会加入欧战，而只企图压迫西方列强来帮它解决中国。只要在日本向英美勒索了足够的绥靖，削弱了他们自己在远东的地位时，他相信她就会进入越南、荷印乃至最后的菲律宾。毛说英国将设法“停止中国的战争”，有一次他说，在张伯伦看来，认为“牺牲中国以争取日本的联盟”是必需的。他也预见到如果英国或美国企图来一次远东慕尼黑，日苏互不侵犯条约也许就会跟着成立，——但以“不妨害苏联对华援助为条件”。

毛泽东的见解在重庆引起了反响。那是恰恰跟蒋介石的意见相反的，他在演说中曾宣称欧战不会影响英国的远东政策，它将继续维护《九国公约》和门户开放的原则。甚至有几个共产党员，也认为毛的看法太过份；他们盼望张伯伦给予中国以实质的援助，因为中国为英国自己在远东安全的堡垒。我必须声明我对毛的推测也不大同意，因为那是这么明显地违反了英国

的利益；当以后几个月中英国不大阻挠中国抗战时，我断定他是估计错误了。一九四〇年七月，英国保守党又对日本作最后绥靖的努力，封锁了中国经由缅甸的贸易通路，破坏了《九国公约》和英国在日内瓦所作的“避免采取足以削弱中国抗战力量的行动”的庄严保证。

在战争中，所有共产党的军队也象国民党士兵一样，尊奉蒋介石为最高的军事领袖。但他们并不把这种服从当作偶像的崇拜；例如，他们并不象别的部队所奉命照行的，每次一提到蒋的名字就起来立正。老蒋是作为抗日战争中的总司令和国民党领袖而被尊敬着。

蒋和毛之间有着显著的共同点和不同点。两个人都有坚强的意志力。毛在他自己的范围内也许跟蒋一样的坚忍；他是一个有力的进取的和有决断的人，他而且是一个能干的政治和军事的战略家。那以孝的传统观念为基础的伦理道德，在蒋是他的哲学的核心，这些话在毛看来也许不过是一种社会斗争双方的宣传表中的参考目录。毛主要是一个社会革命家，蒋主要是一个社会保守家。蒋是一个自是的人，他的脱离群众的性质，常在有意地强调保持中国旧有的权威人物的传统。毛却不大神秘。他决不说没有错误。我曾听到他承认错误，他是不以改变他的意见为耻的。

毛很少作长时间的谈话而没有一些熟悉的警句，他似乎以压倒一切的雄辩来维持他的领导。他是博览的，在辩论中是一个成功的辩证学者，他有着一种趣味的技术。他很少对反驳者作正面的进攻。他在这里驳击一下，在那里驳击一下，他侧面抄袭反驳者，他一个一个驳倒对方的论点，直到慢慢地把它全

部包围起来，然后用最后的滑稽语调或动人的逻辑说服了对方。他喜欢一切人们和他们的大笑，他在任何团体中是安适自在的。我记得有一次曾见他笑得哭起来，当有人对他描述在上海所看到的一个喜剧的时候。那喜剧是一张美国影片，——卓别林的《摩登时代》。

毛泽东虽然毫无问题是共产党中杰出的人物，但他绝不是一个独裁者。他是一个公认的领袖，他的一切决定，都是讨论和集体判断的结果。共产党中没有象蒋介石在国民党中所居总裁的同样地位。毛的权力主要是通过他在党的政治局和军事委员会中的地位。他在边区政府中没有职位。每个人都仍叫他主席——那还是以前江西时代他被选为苏维埃政府领袖时的一种荣誉的衔头。

中国共产党的团结以及党内磨擦的比较缺少，在中国政治运动的历史上是空前的。这一部分因为过去十年以来，中国红军太忙于对付他们敌人的围剿，以致必须团结一致的缘故。

无疑地，一个革命的政党在武装斗争的过程中所造成的深切的同志爱，决非那些不冒生命之险而只空谈革命的安乐椅上的理论家所能做到。这也许就是为什么在民主国家中享有合法权利和在知识分子中享有一定威信的共产党，不能使一个伟大的运动发展成强大基础的理由之一。我记得迪克·沃茨对我说起他曾在布龙死前不久与他作过一次谈话。布龙读了关于中国红军的记载说道：“这些人们有着我在美国左翼团体中从未见到过的特点：共同目标的人们中间一种兄弟之爱的情绪。我们的左翼分子常等你说出一种意见就嚷着‘出去，叛徒！’虽然你与他们的意见十九相同。”一同受着痛苦或分享初期命运的感

情，把人们团结在一起，而使个人意见上的小冲突减少到毫不重要，这种经验也许是人们从来所知道的最深挚的同志爱。在中国共产党中，无疑有着一种弥缝内部裂痕的来自外界的水门汀。

在毛泽东和他的信徒中，民族的感情，似乎要比进步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共产党来得显著。我们必须重复说一遍，即依照共产党的学说，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国家，她的斗争，一方面是为了完成民族的解放而不是为了直接的社会主义，在另一方面，则是为了肃清“封建残余”——以达到社会民主的目的，由于十年以来，一直遵守着这个信条，并在这个基础上建立了一个军队，中国共产党当然充分发展了自恃、自信和独立的判断。在它斗争的几年中，中国共产党常跟第三国际完全隔绝。中国红军领袖不得不从战场上来解决他们的理论问题，而战场上的决胜，常是拿同志的生命去换取的。

在它武装斗争的长期历史中，红军的发展没有苏联的物质援助，没有它自己领土的征服，也没有利用叛变势力的巨大的实际政治经验，中国共产党跟第三国际一切其他的支部都没有关系。在苏联以外的一切共产党说来，无产阶级也许是没有祖国的；但中国共产党在他们自己革命的胜利中却有一个祖国。

毛泽东的职务不是由莫斯科委任，除了他的同志和军队之外，是否有人可以叫他退休，那是大成问题的。事实上，毛以前因为违反共产国际的路线，曾两次被开除党籍；但这个命令从未执行。他是从未访问莫斯科的唯一重要的共产党领袖。他从未晤见斯大林。他从未出国一步。

中国的政论家、教士、以及其他亲华的人们，都在尽力说服世界，中国共产党“不是真正共产党”，最近蒋介石也对一个

德国通讯记者说“中国没有共产党”。英国驻华大使卡尔有一次对我说，中国共产党实际上是基尔·哈迪主义者——十九世纪的土地民主党，——因此，它们的名字尽可无须吓坏保守主义者。有些人想着，因为中国红军现在是为了民主和民族独立而战，他们便不能算是布尔什维克，而“只是一个农民改良的政党”。所有这些人究竟怎样拿这种说法来解释中国共产党对于第三国际的效忠，我可不知道。

假如我是正确了解毛泽东的话，我想他对这些加于他的马克思主义的诽谤，是不会觉得困恼的。他将冷笑着说，如果这可使那些想以亲华而反斯大林出名的自由主义者解决感情上的矛盾，那末就让他们爱怎样便怎样叫好了——只要他们能努一些力去阻止美国的武装日本，并援助中国和八路军争取胜利。

我个人对这件事的感觉，认为那些希望中国共产党是“不同的”，“不过是改良主义者”以及“已经放弃了革命的方法”等等的自由主义者，最后是注定着要幻灭的。他们是民族主义者，因为他们处于革命的民族联合阵线的阶段。他们的信仰仍是国际社会主义，如果形势变更，他们也许会采取他们认为必需的方法来“支持历史的动力”。

中国红军和苏维埃战略

在现时，要接近社会主义一步，除了实现完全的政治自由，和民主共和国……之外，没有其他的方法。

——列宁

我想中国的马克思信徒自称为共产党，正跟耶稣信徒自称

为基督教徒一样的合于逻辑。虔诚的基督教徒常承认经过了一千九百年之后，上帝的王国还没有由任何国家实现，至少在当前任何社会中，然而他觉得这并无害于他自称为基督教徒。延安的人们也正同样承认他们还不曾实施共产主义，事实上任何地方还没有实现，但他们却深信一切社会现在正进入一次社会革命，而必终之以共产主义。他们不是生存于共产社会中，他们甚至也不是主张中国马上实行共产主义，这个事实，却毫不会减低他们作为世界革命的先锋而战斗的信心。

我曾向毛泽东提出书面的问题，里面有说：“许多人以为中国共产党事实上不再是社会革命者而只是改良主义者。你怎样答复他们？你是否仍坚持中国革命是“反帝的和反封建的，在某一阶段中可能转变到社会革命，”而中国共产党的责任就在领导这个国家进行这种革命？”

毛泽东回答说：“我们永远是社会革命者，我们决非改良主义者。中国革命课题有两个主要的目标。第一个包括实现民族和民主革命的任务。另一个是社会革命。后者必须做到而且完全做到。在目前那革命是民族和民主的性质，但到了某一阶段之后，它将转变到社会革命。目前‘将成为’中国革命课题的社会革命部分必将变成‘已是’——除非我们现阶段的工作失败了，这样一来就没有提早实行社会革命的可能。”

毛泽东否认中国有转向法西斯主义的危险，因为在目前条件之下，一切反动分子只能是叛逆的和亲日的性质。任何反对民主的集团必须反对民族的利益；任何主张“攻击共产党”或压迫其他反日运动的集团，客观上必将削弱抗战的联合力量因而主张投降。毛泽东说：“一半国家已经殖民地化了，而其余的一

半也受着同样命运的威胁。中国经济仍是半封建的性质。那些作着相反的幻想而企图在中国‘创立法西斯主义’的人，是一定连他们的脖子也要折断的。”

毛泽东对于中国真正民主的需要表示很积极。他说：“在革命的现阶段中，第一重要的问题是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反封建的任务也许暂时隶属于反日的大问题。我们在这时期中反封建的纲领包括了普及全国的民主和改善人民生活的要求。”

在说明战争以来政治进步十分缓慢之后，毛泽东相信“民主运动不仅日益普及于工农之间，而且日益普及于学生、青年、知识分子、科学家、政治家、军人、作家和教师等。这种运动当前的阻碍是陈旧的政治制度。问题在于怎样改造这种政治制度(不妨害抗战)，因为除非政治制度改造了，除非民主实现了，胜利是不会有。抗战和民主是一柄刀的两面。有些人支持抗战，但却反对民主的原则。实际上他们不要运用刀的另一面。”

共产党对于民主共和国的要求，究竟有多少诚意呢？红军代言人回答道，他们打了十年内战，便为的建立这种诚意；他们的斗争是对付“反革命”的国民党，因为它反对民主而要求独裁。无论如何，正跟他们“联合阵线”的要求是赤诚的，因为这符合共产党地位的一切需要——因而他们忠诚的坚持着——一样，民主的运动也可说是诚意的，因为它也适合目前形势的客观现实。

共产党常认定只有一个民主共和国，才能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达到民族独立和清算残余的封建主义。只有一个民主共和国才能对农工保证组织的权利和实现他们的内部

要求。也只有一个民主共和国，才能使工农取得政府的领导权，而在和平的递移中——中国共产党认为有这可能——转到社会主义。

他们叫国民党是“地主、资本家和买办”的政党，他们承认它掌握全国政权的事实，不过共产党不承认它在中国革命主流中的领导作用。他们相信这是属于工农的——而且只有工农。他们又相信，当全国政权的领导与劳工阶级的领导混而为一时，那末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务才能很快的完成。这样，争取领导的斗争仍在目前联合阵线时期继续着，正如过去内战时期一样，而且还将在未来民主共和国中继续。共产党政治局的重要委员之一博古在汉口对我说：“我们必须随时随地为争取领导而斗争。我们不否认这点。一个政党如不能领导，就没有存在的理由。”

前苏区政府副主席，政治局委员王稼祥在最近党的出版物中曾经写道：“中国共产党是社会主义彻底的信仰者。他们决不放弃他们的理想和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理论……中国共产党的全部纲领包括两部分：（一）最高纲领，是要推翻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并从阶级的消灭中完成激进的解放；（二）最低纲领是民族和民主的革命。……为了实现社会主义，中国无产阶级必须首先争取中国民族的解放，……三民主义便是这个时期中民族解放和民主的纲领。

这些纲领的理论基础是极端复杂的。每一个论点都有一段多年辩论的历史。共产党不致放弃他们的“全部纲领”，虽然他们会采取广泛不同的策略和战略。但我在这里的要点是指出，他们决不象托洛茨基主义者相信革命“飞跃”的可能。因此，共

产党今天是最不相信中国在最近未来“趋向共产”的人们。他们说，中国现在只有“趋向民主”的“危险”。

从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和政策中，我们可以知道多少关于苏联在远东的战略呢？在这里对此作一个简略的叙述，似乎是适切的。首先让我们用压缩的篇幅来溯述一下最近中苏关系的历史。为方便计，这可划分为三个时期。

在俄国内战结束和协约国干涉军(主要是英法日美)被击退之后，苏联政府就废除了对华的不平等条约，并且宣布与英日所缔结的关于划分中国和蒙古“势力范围”的一切秘密协定无效。苏联“放弃了一切特权、利益和租借地，只有它在中东铁路的利益，由孙中山先生的劝告，仍在中苏的联合管理下。”中苏的新约是一个强国对现代中国所订的最平等的条约，实奠定了中苏密切关系的基础。

不久之后，国共两党联合领导的国民革命，在孙中山先生的邀请之下，得到了苏联的武装、资助和指示。这一合作的时期继续到一九二七年，那一年，国民党右派驱逐了共产党，杀戮了许多俄国的领事馆官员，并恶化了对莫斯科的关系。从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三年，内战不断进行着——中国始终与苏联相隔绝，特别是中国红区，比国民党区域隔绝得更完全。这一时期到了日本征服东三省可说是中止了，南京于一九三三年下半年恢复了对莫斯科的关系。

大约这时候，莫斯科向中国提议缔结互不侵犯公约，甚至暗示更广泛的互助公约——象苏联与外蒙所订的。这一提议由蒋介石通过当时外长汪精卫加以拒绝，汪并且授权缔结《何梅协定》，企图进行对日绥靖的政策。严重的内战继续在国民党与中

国共产党间进行着，南京与莫斯科的关系仍是冷淡的。

很明白，莫斯科欢迎中国停止内战，并恢复两党的合作，因为这样中国可以增强对苏的友谊，并且成为对日的战略堡垒。莫斯科通过共产国际支持共产党联合阵线的运动，同时称蒋介石为“民族领袖”。不过，如果没有张学良和西安事变，蒋介石是不会停止剿共的。当时莫斯科曾明白表示了很大的希望，把蒋当作能够领导复兴团结的中国去抗日的一个人。

苏联在这方面的外交政策，显然是由“建设一国社会主义”的计划决定，它主要的目标便是增强苏联的战略安全。莫斯科把西安事变当作一种政变，而不是一个革命政党可以从此夺取政权的正当的群众运动。苏联惟恐蒋介石的去职，将造成象西班牙一样的长期内战的结果，而日本（在德意帮助下）可能把南京政府造成一个东方的弗朗哥政权。这样，中国对于苏联不仅在战略上将毫无价值，而且将采取潜在的敌对态度。

我们必须指出，中国共产党在苏维埃战略方面占着很有利的地位。中国是一个毗连苏联的半殖民地的国家，不管欧洲的政治形势变化如何，中国抗战对于苏维埃战略安全是必要的。只要中国抗战一天，苏联一定继续支持她，因为那威胁中国独立的侵略者同时也威胁着苏联。

只有当重庆政府放弃了反帝的抗战，只有当侵略者或另一个殖民强国以某种让步劝诱中国政府形成了国际反苏包围线的一部分，苏联才会停止对她的援助。同样的，只有当日本放弃侵掠中国领土的完整，作为放弃反苏企图的诚意表示，苏联才能对日协调。

苏联有着三倍美国的土地，有着以国内市场发展为基础而

不是以国外市场拓展为基础的经济，它绝无理由为了扩展而去掠夺土地。苏联没有要求开拓新市场的独占资本的集团，因为她没有蓄积资本的阶级。它的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工业化还没有完成，国内购买力大过生产力，因而尽可在国家计划之下无限地扩展。

苏联扩展军备不是象法西斯列强似的为了经济的需要或作为征服新的市场的手段，而只是为了保护社会主义的市场。在法西斯国家中，军备方面巨大的投资，最后是为了挑起战争，以维持它的经济，但这些法则不适用于苏联。假如世界条件允许的话，苏联可以毁弃它的军备，而把军需工业改造为供给国内消费的有用货物的生产，而不致扰乱经济。

到头来苏联是否这样做，固然不知道，但到现在为止，无论如何，苏联却还必需扩充军备，以增强它巨大边境的安全，和阻遏侵略。只要附近国家不积极敌对苏联，或成立一个“帝国主义进攻”的根据地，苏联的战略需要就满足了。因此苏联必将支持反抗征服的任何中国政府。因此它必将支持蒋介石，只要他继续领导民族的反帝战争。

关于中国新疆的问题怎样呢？苏联是否准备并入这个区域作为缓冲国，象收回波兰、芬兰和罗马尼亚的以前帝俄部分的土地一样呢？因为这一个很大的省份是了解苏联在亚洲的现在和未来战略，以及莫斯科与中国红军关系的钥匙，这是值得留出一章篇幅来约略检讨一下的。

一个县长的教训

在政府眼中，县长代表着一万种能力；在人民眼中，一万种罪恶；而在县长自己的眼中，则是一万种困难。

中国俗语

当我最近旅行华西时，我曾遇见过许多地方官吏，都是依照常规施政的，但其中有一位某县长却与众不同，我曾在他的衙门里作了几天客人；我常跟他和他温和而勇敢的太太一同进餐。这位县长在那国民党统治的区域中负着最好地方官吏的声誉，这也许是因为他从未受过县长训练的缘故。因此我只叫他“陈先生”。

陈先生来自东部的某省，他是一个能干而博学的人。他在战争中担任一种重要的行政工作，直到日本占领了他的官署。于是他跑到中央政府交卸他的职务。不知怎的，最后他做了宁府（译音）县的县长。

现在，有百分之九十五的人民还是认为“政府”即县长，过去由天子指派而今天由党部指派的。他对于人民有着最高的权力，他对一切高级的省政府乃至中央政府负责。在大多数的农民看来，县长是最高的权威，一人的政府。在他之下，有着各种大小不同的区，有的面积不到三十英里，有的跟欧洲国家一样大，平均约等于美国的一州。

县政府的组织是全国一致的，拥有三十万人口的宁府县当然不是例外。县衙门照章包括六、七个科，在县长之下有民政、公安、财政、建设、调查、等科，战时更有兵役科。在各科科

长之上有县政府秘书长，位置等于助理县长，常为地方政治上的有力者。县划分为许多个镇，每镇有镇长。镇之下包括了許多村庄叫做乡。自从保甲制度恢复以后，所有村镇都被组成为“保”，每保包括了一百家。“保”再分为“甲”，每甲约由十家组成，所有属于每一保或甲的人民，都必须相互对各人的行动负责。

县长的许多工作，实际上都是通过各区区长的。他们的职责包括维持安全，取缔非国民党的政治组织，强迫军役，解决土地争执，拘捕负债者和“叛党”，征收捐税，以及补充和训练地方民团等。这些附属的官吏由县长指定，有时不支薪水；那职位常是世袭或荣誉的。实际上，他们可从他们所征收的捐税中沾取一分作为报酬，或者以礼物的形式从地主取得，因为他们常常替地主的利益服务。这种情形是县长所默认的，正如后者的剥削也为省政府所默认一样。一切进行得很顺利，只有不幸的孩子们，一切命令都落到他们的身上，因为整个制度只造成了一条鞭的交通，从高级的官僚政治到个别的家庭。后者没有方法可以推翻上面的意见和解除他们之上的长长锁链的任何一节。

有一天陈县长说：“我所知道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中国虽然革了三十年的命，但却还没有触及县政府。经济改变了，社会改变了，人民改变了，县政府依然老样子。”

陈县长又告诉我：“当我到任时，县里约有五十个收租员。他们没有一个支薪水。他们都由绅士指定，他们的家往往是数代的收租者！这些人对于地主关系有着自己秘密的记录，而依照绅士所提出的估计去收租。只有将他们尽量鞭打，他们才肯把

租缴送给县长。”

“对不起，请问这是什么意思？”

陈县长重复一遍说：“将这些收租者带到衙门里鞭打他们，那是惯常的事，因为只有当他们挨了打，他们才肯把钱送到县里。但即使这样，他们还常是设法克扣了大部的租税。”

陈县长不赞成这种制度，因此他把所有的收租者解了职。而对田地作了一番新的勘察。他派职员到乡村去，把改革的情形告诉地主和佃户，并且请他们自己到县衙门来缴付定额的租税。许多忠厚的农民，发觉他们曾受了多年的勒索，佃户们发觉他们曾缴付了应该由地主缴付的租税。绅士们知道了这种立法，却大为愤怒。县政府的税收开始增加了。

“这是一次巨大的变革。大多数人民都认为这种新制度好得多”，陈县长说：“他们如数照付，然后拿了一张政府的收据回去，异常满意。但绅士却常想赖付，因此我就不得不派警察把他们带到法庭。”

绅士们对陈不满的另一原因，是因为他根本禁绝了鸦片的贩卖，这大部分是在他们手中的。他们认为鸦片比金钱还好，地主们强迫佃户种植鸦片，然后囤积出售，博取厚利。县衙门也从这同一源泉替省政府抽取了一半以上的岁入。但陈却严厉执行禁烟法，取缔罂粟的种植，因此，有些“地方流氓”便不得不去工作了。

“在废除收租员之后”，陈说：“那些控制他们的绅士就联名向省政府主席控告我，说我贪污。但我早已采行现代的簿记制度，因此我尽能驳斥他们的一切诬告。相反，我还能证明这些人中有许多已几年来不曾向国家纳税。”

他对于他的记账制度非常得意，因为这把县的每天收入或支出，连一分一毫都记得很清楚。一天，他捧出一大堆的簿册给我看。我从这里得到一种深刻的印象，觉得一个县长廉洁而能平衡他个人的预算，实在是难能的。陈的薪水似乎是每月一百四十元，秘书和各科科长月薪每人只有五十六元。这不过是当时的生活费，显然不够维持享受的水准和县衙门官吏的“面子”。

据陈说，各科科长往往只签具一张月薪的收条，而薪金实际上在县长手中。为了交换这种好意，县长就让他们用各种杂税的形式，尽可能的向人民去榨取。

陈为了补救这种弊病。便请求上级允许他把科长们的月薪提高到七十元。于是他取缔了一切利用合法记账的作弊。大部分旧有的区长都辞职抗议这种“叛变”。陈为了革除陋习，乃重新指派几个能干而年轻的大学毕业生，他们的关于廉洁政府的“激进”理想，正和他相合。据陈说，由于他个人与这些新人的关系，以及由于他们的爱国思想，他们才愿意过着这样月薪的生活。虽然陈县长增加了每个人的薪水，但自己的确并未增加；虽然他摒弃了一切的宴会和革除了几个无用的衙门里的当差，但到第一年年底时，他自己还向财库欠了八十元钱。

“一旦战争结束，我就要离去，跟我一起工作的忠实同志也同样要离去，我们的战时服务将告结束。那时候，一切事情将仍照老法子进行，象他们在我们在此地来以前所进行的一样。”

“那末，你认为永久的改革不可能么？”

“这种上层的改革是没有用的。现在尽有许多忠诚的官吏，但他们对于这样的一个制度，能够做些什么？整个机构是错误

的，因为政治上的改革只能自上而下。我虽是一个国民党员，但我却不相信任何独裁制能够救中国。照我的意思，只有全体人民从村镇起一致合作实行民主政治，才能达到真正的改革。上面国民党专政的错误正如下面保甲制度的错误一样。要革除上层的错误路线，首先必须把下层的保甲和县衙门改革过。”

“什么是保甲制度？这是官吏控制人民一种很好的方法，但我们需要的却是人民控制官吏的方法。保甲起源于秦朝，当时帝国正濒于危殆。到了唐朝和宋朝，人民都能安居乐业，所以不需要保甲。等到蒙古人征服中国，为了控制臣属的人民，他们恢复了保甲制度。后来中国恢复，推翻了蒙古人，建立明朝，保甲制度又告废除了。谁恢复了它？又是异族的征服者——满洲人。我们终于在一九一一年革命后废除了它，因为这是不适用于被解放的人民的。

“可是现在它又再度出现了。起先是日本人将它在东三省恢复，以威吓人民。后来甚至南京也实行了，因为这对于反共有用处。但今天我们已不再有内战，这种制度却依然存在。难道我们的政府为了取得人民的支持，不能再找到比这种日本人在占领区所施行的制度更好的方法了吗？

“实际上，保甲是非人道的。十家中的一个犯了罪，怎能叫九家来共同负责？你怎能为了你所知道而我并不知道的事情来惩办我？保长总是由豪绅选出的人担任的。如果豪绅要拘捕某一家，可以由保长签发拘捕证，如果他们受到贿赂之后，要使某一家免除兵役，他们也可以叫保甲长来设法。”

这便是宁府的一个模范县长对于保甲的看法。现在再让我们来检讨一下另一种相反的制度——边区，即前苏区的制度。

民主政治的实验

中国共产党将是中国民主政治的温床。

——林语堂

就我看来，以前西北苏区的生活跟边区政府统治下的生活，主要只是术语上的不同。一切社会的改革依旧。群众组织换了新的名称；政府的议会以前叫做“苏维埃”，现在叫做“参议会”，主要还是一样的。鸦片彻底禁绝了；这里没有乞丐、盗匪和娼妓。土地改革继续维持着；从前分得土地的农民，仍承认其所有权。但土地的重分配是停止了，在那地主未曾完全清除的区域，除了不在地主之外，仍允许他们保持所有权。

取消苏维埃的决议，是一九三七年春天内战停止以后由苏维埃代表会议通过的，在这次会议中对于“联合阵线的需要”曾加以辩论。接着六个月是共产党和红军领导的积极宣传的时期，一切民众团体、少年先锋队、抗日团体、合作社、学校教师以至儿童突击队都参加宣传。当共同决定之前，在到处所有的地方苏维埃中也引起了讨论和辩论。

新选举法是以南京几年前所决定而从未实行的某些条文，以及国民政府有名无实的“建设纲领”为根据。这些文件中规定着，如果省政府官员发现各镇人民有统治他们自己的能力时，地方自治当即实行。可是这种发现终于没有，因为省政府的官僚政治当然不愿消灭自己。苏维埃政府却首先承认，它所统治的各村镇，已有自治的能力。

选举权有几点修改。在新立法中，合法年龄从十六岁提高

到二十岁，选举权是普遍而平等的，不问性别和阶级。许多内战时期远飏的地主，现在重回老家，他们可以象农民一样领受新地；这些人照样有平等的选举权，并有权参加政府的工作。商人和小资本家也一样可以参加政治生活。在苏区，政治动力的关键在于各村镇区的革命委员会。现在，这些委员会已为选举委员会所代替，选委会主持指导和准备选举的工作，然后举行各村全体大会——保甲制度当然取消了——以选举代表去出席各镇的推选会议。

在苏区，农民和工人可以比别人选出更多的代表，但新法律却规定着平等的选举权，选举是完全直接而普遍的。跟苏区一样，一切武装部队、正规军、民团和警察也为选民的构成部分，虽然他们为了职守的关系，事实上不能当选。依照规定，在各镇的每三十居民中，应选出一个代表。这镇参议会然后再选出县或区参议会，它有权选出自己的区执行委员会，而由一个公推的县长领导。构成县参议会的代表系从每七百居民中选出。它有权从每五千居民中选出代表一人，出席中央或边区参议会。这边区参议会又选出边区执行委员会，形成了边区政府。

依照法律规定，镇参议会每半年选举一次，县和边区参议会每年选举一次。镇和县参议会的选举第一次举行于一九三七年十月到十一月，从那时起自治执行委员会代替了苏维埃。据说这一次有百分之八十的选民去投票——这就是比之先进的民主国家也是一个很高的百分数。不久以后就选出边区参议会的代表，但由于某几县的迟延，曾有好几个月不能召集参议会。原来有一半以上选出的代表都到前线去了！于是再举行第二次选举，填补了空缺。一九三九年一月初，边区参议会在延安开

会，选出第一届执行委员会，当即接收了前政权移交的统治权。

照我旅行中所能看到的，选举的进行，绝无强迫性，虽然在选举之前，先有共产党或亲共团体所进行的几个月的宣传。第一次执行委员会正式报告^①说：“一般说来，有百分之八十到九十的人民参加选举，甚至小脚的老嫗也觉得她们必须参加，”从很辽远的地方蹒跚着去投票。有人怀疑投票权利并未真正普及于“残余的地主”，报告中对于这种怀疑加以事实的纠正。“有人说这个法律只是一种欺骗的面具，所谓民主制度实际上是工农的专政。”报告中附有选举统计的表格，以证明地主的投票占总数的百分之六，因此是完全符合他们实际的人数的。

边区执行委员会共有委员十三人，以老革命家林伯渠为主席，他是孙中山先生的老同志，又是国民党的创立者之一。他曾在国民党中担任许多重要的职位，孙先生死后，他是党的里层半打元老中的一个，到了一九二七年因反对蒋介石被逐。他于是逃到江西，加入了红军。当一九三六年我在陕西第一次见到他时，他已五十二岁，刚完毕长征。他是一个清秀的白发老人，气概轩昂而矫捷，有一对闪动的乌黑的眼睛，与其说是一个布尔什维克，倒更象一个最高法官，他是中国政治史的一部活的百科全书，除了朱德之外，他是红军中最受一致尊敬的人。最近他又被补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员，因此他现在同时是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党员了！

前政权下的四十二种杂税废除了，边区政府的主要收入，

^① 见《解放》一九三九年四月四日延安。

都取之于盐、羊毛、和皮革的输出税以及几种国有的工业。土地税已有三年不曾征收了。农民们只要缴纳一些最低限度的救国和公共粮食消费的输捐。所有政府的官吏和职员就每人每日从这领取一磅半的谷。这笔缴纳的捐，实际上只等于以前土地税的三分之一。在政府发出输捐呼吁后的一个月之内，农民就自动全部捐输完毕，在一九三九年，那捐输总额超出最低限度的要求百分之五十。

维持这么一个行政机构所需的经费，小得几乎难以相信，这是跟乡村人民很低的收入和他们简单的要求相配合的。县政府行政官吏的薪金是每月五元，加上他们谷类的补助和四分钱一天的菜金。自然，此外还有一些公共种植的食物和谷物出卖的收入。至于旅行以及其他特殊任务的经费，则由地方政府拨款应用或由边区参议会支付，当视它们的性质而定。

在全中国，战斗力和劳动力的动员，任何地方没有象第一边区这样的有效，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它究竟怎样做到呢？主要，自然是通过了自治参议会和他们群众组织的独一无二的制度，把全部人口都团结于作战的努力。无疑地，直接侵入的威胁刺激了敌忾心，因为日军已渡过了黄河。他们常常突袭陕北，这区域中的每一县城曾遭轰炸，因此，自由的农民们，现在都非常明白，如果要使他们和他们的家庭不致丧失新得的权利，就有牺牲的必要。

基本的群众组织包括了自卫军、少年先锋队和耕种队。自卫军的前身是赤卫队每一个村庄都有，由体格健壮的男女组成。所有从十一岁到十七岁的少年，都加入少年先锋队，他们由正规军的军官教以军事训练，并担任着半军事的任务。他们大部

份到十八岁就自动加入正规军，他们的许多负责人则再入学校训练，俾将来成为政治和军事的指挥员。单是在那人口只有一百多万的延安警卫区，自卫军和少年先锋队的总共人数就有二十五万人以上。

此外还有各种的运动，农民和农民的家庭都参加。千万的青年从生产部门抽调到前线军队去了，因此便必须动员一切可利用的劳动力来维持并增加生产。为了应付非常的需要，所有边区各地都组织了秋收运动和春耕运动，这多少是脱胎于以前的星期六突击队和红军耕种队。正如上面所指出，一切学生、教师、公务员、政治工作者以及卫兵，都参加这耕种和收获的工作。有些公共机关如军政学校，都种植他们的谷物，因为这样可以尽量减轻农民的劳动负担。

对于凡是遣送儿子去作战的家庭，耕种突击队特别帮助耕种它们所有的田地。在村镇参议会的指导之下，所有农民，包括妇女和小孩，都动员起来组织突击队，从事集体的耕种和收获，以补救劳力的不足。山西、河南一带的千万难民（许多都是八路军家属）进入边区之后，立刻就由耕种队的帮助，加入生产工作。边区没有凄惨的难民集中营，只有田地和工作。经过这种积极的努力，不仅以前的生产仍能维持，而且几千亩的荒地也开垦出来了，这些荒地多在山麓高处，以前从未耕种过。

边区最显著的一种成就，便是人民与战斗部队密切的联系。人民常常表示他们对于保卫者的感激，有儿子或女儿在前线的家庭往往受到许多小小的礼物，这在乡村生活中是十分珍重的。除了突击队帮助耕种之外，兵士的家庭还可以免除一切谷物的捐输，并且向合作社买物只要出最低的价格。在戏院和会场里，

他们坐在最优越的位置，在别地方，这种位置总是替绅士们保留的。残废的军人由执行委员会给他一笔小额的恤金和一块田地。

“小脚”和年轻的姑娘，都组成编织队，编制织物去慰劳前线的孩子；例如一九三九年，她们曾送了十万副手套和袜子给八路军。少年先锋队想尽各种方法捐钱给将士。有一个少妇每天爬到高山去拾柴，以换得几个铜子。在另一地方，村中一个最穷的人把他所积储的几百个铜子也拿了出来。一个煤炭夫自愿每天多工作一二小时，换取几个钱去慰劳前线的孩子。诸如此类，说也说不完。在六个最贫困的县里，一年中曾捐了八百五十多元钱来慰劳兵士和他们的家庭。

自然，这种兵士与人民合作的一切情形，在进步国家中也许不算稀奇，但在中国传统上却是新的。人民尊重武装战士，特别是前线回来的缺了一只手或足的“无用的人”的观念，到了最近才养成，但红军却早已认识尊敬革命战士的重要性了。孙夫人宋庆龄女士曾经说：“当一个人为了国家从前线受伤回来时，国家的责任是好好抚养他们。”

直到今天，这个真理还是在大部分地方被轻视着，政府本身也远没有完成这种义务。举一个例，我曾看了全国救济委员会一九三九年度的报告，觉得十分骇异，因为在一百四十八万五千元的各项总共捐款中，用于救济伤兵的只有一千八百〇七元。许多伤兵救济工作只限于地方的规模，由各种难民团体特别是红十字会来进行，得到一些政府的帮助，或者甚至没有；直到一九四〇年，孙夫人和蒋夫人才组织伤兵之友会，推进全国性的慰劳战伤英雄的运动。

边区人民为什么特别踊跃输将的另一理由，似乎是由于一种公众的信任心，相信他们的金钱一定可以忠实地用于目的。当然，他们可以不必担忧这会受贪污官吏的中饱私囊，或作买卖外汇的投机，或购买婢妾。那里跟别的各处地方不同，没有从军火买卖舞弊的百万富翁，也没有剥削难民和伤兵劳动力的豪绅。这些有组织的农民知道，他们付给地方政府多少钱，他们的代表可以向参议会核对帐目。自然，舞弊也并非没有，不过谁要是榨取忠实人民血汗的金钱，是并不光荣的。一旦揭穿之后，他们将因人民的要求，象叛国者一样丧失他们的脑袋。

第八篇 在敌后

游击工业

战争的结果，决定于经济者，较军事为多。
——白崇禧将军

美国人每年花在牛油上面的钱，会装配并维持中国全部的军队。倘使十个中国人中有一个喝咖啡喝得象平常的美国人那么多，那么单是那一样所费就可在一年战争中使中国破产。

但在这里，大炮或牛油这种二者择一的论法，意义绝少。倘使你叫通常的中国农民或工人自己选择一支枪或一百磅牛油，那他就毫不迟疑地选定枪。你也不能诱他放弃枪，用同样价值的咖啡、牛奶、乳酪、干酪、巧克力、啤酒、牛排或其他东西。这些东西在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中不值什么的，他们对它们并未养

成嗜好。而事实上，它们甚至在西洋饮食品中并不象一般人所设想那样“必要”，如我在被迫不得不几个月不吃这些东西而过活的时候所发现一般。

中国战时的经济力量在于两件事情：她消费者要求的这种简单性和国内供应这些要求的比较高的潜伏的自足自给性。保存抗战的经济基础，意思就是维持农业生产以养军民；第二，就是（当然除了充足的军火以外）维持几种被认为真正缺不了的制造品供给人民的工业。

成为边区的一个主要经济困难的，就是这第二个问题，农村市场的维持，正如在内战时期对于苏维埃一样。在落后的内地，土著工业的缺少使市场贫穷化，把它开放给日方的经济剥削，并威胁游击战士气的基础。日本的军事进攻可以击退；她的经济进攻可更阴险而难以抵敌。倘使日本继续把她的货物源源流入乡村，从它们取得原料作交换，那么，大多数游击领袖都承认，这种经济的不能动员，最后将继以军事的不能动员。

大批的原料正在从中国的后方移进日本所控制的城市市场中——如棉花、羊毛、植物油、铁和煤。从城市漏回来廉价的日本制造品。这不仅在许多军官公开做走私生意的中央军所守的各前线省份是事实，而且甚至在共产党军队所保卫的若干游击地区，也是难免，这些共产党军队发见实行对沦陷城市完全断绝贸易在实践上极端困难。他们从经验知道，一个中国农民会继续作种种牺牲，只要他能够以他劳力的生产为交换，购买必需品如布、鞋、烟、药、燃料、毛巾、肥皂、植物油和农具。但当市场上长时期毫无这些东西的时候，那他的士气毁了，他得到抗战无益的结论，他失却希望，而革命军失掉了它唯一的“根据地”了。

不久之前，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前方合作社视察员孟永诚，从山东、黄河北岸写信告诉我说：

“晋东南是全中国最紧要的战区之一，军队的大量集中于此，已使当地资源疲敝不堪。我们的职务即是减轻这种疲敝情形，并在物质方面协助抗战。倘我们能供给军队布、鞋、纸、墨水、烛、面粉、制服、毯子等日常所需，那么我们不仅能支援前线，而且也能帮助本省受日货打击的农民，他们的生活程度已受到这些商品的缺乏和物价的增涨所给与的惨重影响。

“倘抗战而不能在游击区进行，那中国失败无疑。显然的，工合会在这些区域的任务，不仅在于创立合作社，而且还须抵抗日本的经济侵入，帮助军队和游击队获致经济的自足自给。去年(一九三九)七月以来日军在山西的‘扫荡’运动，其特点之一就是：他们不论到什么地方，总是有系统地破坏每一种生产工具，甚至最原始的，如纺车。同时，他们试要倾销若干种货物，并封锁其他货物输入。他们力求从根底上倾覆抗战；他们要用经济方法来破坏我们的力量和士气。由于缺乏其他的货物来源，日本在山西的经济进攻正在显示成功的佳兆。”

共产党领袖们，指出另一个不大为国外所了解并在中国被一般人忽视的事实，就是：数目最大的难民和失业者不在后方或华西，却在沦陷区的乡村里，在日军所占的城市附近。在一九三九年，一个新现象发生了。一支继续不断的流浪者的河流，开始涌回到他们的老家所在的区域里。河北、山东和山西的大泛滥淹了几百个乡村，把包括几万个贫穷无依的男女的一个极大的负担加给了游击区当局。这局势需要在前方战区中作恢复生产的英勇的努力，以便给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准备生计，否则

这剩余劳动力就要流浪到城市去在日方工厂里找工做，或者被迫加入伪军。

同时，边区各地，有价值的天然富源搁置不用，如白煤和焦煤、铁、硫黄、盐和苏打。几百万包的棉花，被吸入日本市场，这是一种对敌方有军事价值的原料。其中一部分能够和将要被新的人民的边区政府所禁止；但是农民需要有一笔补助收入来更换所种的东西，须有军事和非军事工业来吸收所有当地的原料，并在自由乡村中维持市场。

发展农业和工业必须有资本——在游击区，正如在其他任何地方一样。而资本恰是这些游击根据地所没有的东西。当地的资本已经逃避到了那些约开商埠或到后方去，政府和银行资本已跟国民党一同撤退到西部。也许我未曾在本书其他部分充分着重指出政府战时经济计划在这一点上的根本的毫无远见。官方有不少话谈到迫近的反攻和光复沦陷区的斗争。但是在实际上，政府的经济步骤（这些步骤使我们得到那判断存心所在的可靠根据）对于游击区里生产的重行投资，简直不给援助，在游击区里，军民正在艰苦奋战，努力要使侵略者无法在经济方面控制他的占领区。

十倍于投在所有游击根据地的总数的政府款项，投在四川一省（那最落后和反动的省份，因之也是最服从官僚政治手段的省份），作为农业和工业生产的资本。军事委员会继续主张“在敌后发展新的前方。”在经济方面，他们差不多没有做过什么来使它成为可能；他们把这些区域作为失掉而划去了。一九四〇年，政府宣布增加农业贷款四万万圆的计划——其中并无百分之二给前线各区域利用！

对于在经济上军事上都是战争的焦点的那七省中游击队控制的部分，并无银行资本可供利用。所以没有地方比较在游击队领袖中更热烈欢迎工合运动了，这些游击队领袖天天目睹日本经济战的直接效果，这种经济战在遥远的四川或者仅被模糊了解，或者正如一个官吏对我所说，将“无论如何使共产党不致变得力量太大！”

最初证明了小规模合作工业在战时经济中的实行是可能的，是在苏维埃时代。在江西，苏维埃曾经营他们自己的纺织工厂、机器厂和其他小型合作工业，在中国尚属初次设立。这些合作工业生产足够的制造品来供给许多简单的需要，且是维持经济力的一个重要因素。红军主力开入西北以后，同一种类的经济被采用着。当我第一次在一九三六年访问这里的时候，区内各地都组成消费、生产、运销和信用合作社。

苏维埃撤消时，在延安召开了一个合作会议，采用了一套新的管理原则。已设的合作社都遵照国民政府所公布的《合作法规》，但“顾及边区特殊情形”而改组。信用和运销合作社都经合并。^①生产和消费合作社成为主要的两种，每种都有权在事实上经营任何种业务——生产、信用、零销、整批和购买。基本的资本由合作社社员供给，边区银行也有权为社员。合作社都有权经由边区政府建设局“自国内各大银行”商借款项。在实际上，如前所提出，后者对于在游击区里投资任何工业都不表示热忱，而供给资本的人们以北方贫穷的乡村为限。

资本虽少，边区合作社却是真正的民主制度，社员代表十

^① 欲知边区合作社详情，参照一九三九年延安出版的两本小册子：《边区合作社之发展》及《陕甘宁边区合作事业管理原则》。

万以上的家庭。单是生产合作在一九三九年就有二万八千三百二十六个社员，比当时中国全部已设工合单位的社员的合计还要多。极端低的入社费，目的不仅在于动员一切可能的自由资本和劳动生产力，而且也在于把乡村生活组织在作为一个中心经济力量的合作社的周围。生产合作社中有许多代表经动员参加生产的一个或一个以上乡村全体的储蓄和剩余劳动力。

生产合作社中，一百四十个从事纺棉花。许多乡村都穷得只能合买两三个纺车。这些纺车一家一家轮流使用，每一个有份的主人在家里纺若干小时。合作社的资本，大多都投在榨油、制盐和织布工厂，以及面粉、炭、豆腐和陶瓷器合作社。

延安向中国工业合作协会下了紧急的挑战书，后者是从开办起就承认战区生产的发展是它的主要任务。这里是几千个在合作生产方面已有组织已受教育的人，只缺资本和机器去开发当地的原料。

一九三九年初，作了一个开头，当时有一个组织人员带了宝鸡办事处一小笔开办借款，到延安去，设立了第一个“前线”工合分部。然而，对于这样扩充到北方战区去的政治的反对，在重庆发展着，使工合协会行政当局不得不把它的延安分部放弃了几个月。那里每一个单位都会瓦解了的，要不是给当地的合作社和边区政府银行“收养”了去。后者是一个可惊的机关，它的资本主要地包括学生、兵士和人民的储蓄和捐款；它借给工合会分部一笔钱(约占其全部资产的四分之一)！帮助它渡过了难关。

我到延安时，当时十五个工合工厂中最大的一个是衣服合作社，它每月出产一万三千五百套制服。有一个化学合作社造

肥皂、牙粉、粉笔、墨水、药品、酒精和苏打。其他单位制造五金货物、油灯、鞋袜、纸、农具、纱布、绷带、皮件、皮衣和绑腿。一个纺织合作社每月出产一万四千七百四十码棉布。

在这里，工业合作社可以应用边区政府设立的一个当地的自然科学院的技术援助。它包括大约八十个技术人员，主任是陈光沛博士，一个留学德国的科学家，以前是中国基金(China Foundation)的一个研究专家。八十人中，四分之一从事调查研究工作，其余都隶属边区中的学校、合作社和各种工业组织——有一些在山西河北日军后方。赵益丰——以前在全国经济委员会的，是一个工业研究工作者——给工合做技术指导。

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在延安的职员，自动同意接受跟边区政府下面其他组织中所流行者相同的生活比例。职员不论其受有何种训练，那时都每月拿最高薪水五元，比合作社工业本身的许多熟练工人要少得多。

曾经努力想劝诱重庆允准工合协会支持它所放弃的延安分部，并把工合活动扩至晋冀察边区，深入敌后。一九三九年，生产合作社在延安开会，通过取消他们自己的规程的一切特点。于是他们完全采用了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的规程，他们想要跟工合协会合并。我听说，他们希望这一个姿态会促进全国的工业合作，用以去掉重庆方面的疑虑，并表示共产党真诚欢迎任何统一战线的组织。结果是叫人失望，重庆的政客们继续反对工合协会扩张到游击区域，不管它有达到国内“经济统一”的显然的价值。

够讽刺的，最初承认在沦陷区维持中国生产的重要性的，不是在重庆，却是在爱国的华侨中间。爪哇和菲律宾的华侨募

集了国币四十万元以上，以供在延安和晋冀设立一个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的国际中心。事实上，在南方新四军所保卫、北方八路军所保卫的游击地区内，整个工合的工作，都是由华侨募集的特别捐款和资本，以及反对日本征服华东的美国人所投资的。

跟实际的军民需要比较起来，这些数目是可怜的，但它们还不是无价值的。在中国别处地方，据计算，美金七元足供一个工合生产中的工人的所需；在边区，这数目的一半就已够了。在别处，工合的资本周转率，照生产价值说起来，每年自十二至十五次不等。在陕西和山西，因为低得叫人难信的维持费和运销费以及其他特殊因素的关系，每年的生产价值平均要高过许多。^①

即使可用的资本小，陕甘宁边区却也达到某种程度的工业自足自给。一九四〇年十月，这个区域里，除了旧的生产合作社以外，已有八十多个工业合作社，这中间包括煤铁矿和一家铁厂、机器厂、制药厂、运输社、两家小油井以及一个供给学校和八路军运动者的运动器具厂。延安有成为华北许多地方的“游击工业根据地”的希望。

可惜的是，两百万美元(假定国币四千万元)投资在华北游击区内各地的机器厂和“半流动性”工业上面，就可以已经有效地破坏了日本对东部内地的经济剥削计划。那工业每年生产价值五万万元的必需品，早可以带来了经济安全，坚固了人民的生计和士气，并使守军在次要的军需品——炸弹、步枪、手榴

^① 参照中国工业合作协会一九三九年九月延安分部每月生产报告，该报告指明生产价值较投资多二五.二倍。

弹、刺刀和个人配备——方面，事实上得以自足自给。

不幸，这事的重要性，即在那少数爱国心可能已经克服了政治偏见的重要官吏、政治家和银行家中间，也没有了解工合是一个被它的领袖们所确乎了解的组织。因此他们为了竭力主张把工业扩展到游击区域去，而被加上“共产主义”的罪名，许多技术人员和组织人员被热心过度的蠢货关进了监牢。同时，重庆的那些了不起的头脑，譬如说对于把手榴弹从四川经过几百英里运到山西产铁和硫黄的地区去的办法，显然一点都不以为不对，在山西那边，那些手榴弹只消化运货的四分之一就可以在本地造出的。他们批评八路军破坏工作不行，但是不愿把高度炸弹供给他们——而当延安的技术专家们要在西安买一个硫酸工厂自造炸弹的时候，简直吓得发抖了。对边区实行定期的封锁，机器的运入边区常被禁止。袭击日军所占的城镇来获得工具和机器，常被发现为比较在国民党区域里采办麻烦少些。

终于在一九四〇年，中国工业合作协会设法获得了政府对于它把活动扩展到黄河以东去的有限制的认可，工合设立了一个专门发展北方各游击区域生产的新办事处。许多单位现在正在山西和河北经营着，几百个已计划好或组织好，只等依然被国民党所封锁的资本发放出来。

八 路 军

朱德有罗伯特的恳挚，格兰特的不屈不挠和林肯的谦逊。
——卡尔逊少校

中国其他的军队都比第八路军操练得好、吃得好、配备好

得多。奇迹只有望之于后者。别的军队可以被打败、被毁灭、而不致使公众的士气和信心受到严重的动摇。但是倘使日军真会消灭了八路军，那么无数的中国人就要失却对于最后胜利的希望。八路军已经成为一种英勇的传说，这传说在它万次战斗的纪录中，象征着每一个作战的人都必须相信它具有的那些战斗的品质：忍耐、敏捷、勇敢、指挥的天才、不屈不挠以及——也许最重要的——精神的不能战胜性。

这个独一无二的军事组织的秘密是些什么呢？

它的最重要的事情，比它的军事技术或它老于战斗的领袖们的手腕更有意义的事情，无疑地在于它极高度的革命意识。在这一点上，我觉得今日的八路军和昨日的红军之间并无根本的不同。当那些老战士作为统一战线协议的一部分，从他们的帽子上摘下红星的时候，他们并没把它丢掉。他们里面许多人把它钉在上衣上，恰在他们左胸袋的里面。

我们已经从新四军方面看到政治训练在共产党军队的训练中的任务，以及它在加强士气纪律上面的价值。领袖们说：八路军所受的一切训练，十分之四是政治性质，只有十分之六是军事性质。自下而上，每一个单位，除了一个军事领袖之外，都有一个政治领袖，后者补前者之不足。在作战中间，指挥权完全在那军事领袖手中，但是在其他事情上面，两个人共同行使职务。

从军到师，每一个单位都有它选举出来的兵士委员会，来跟那政治领袖合作，进行该单位范围广大的军事以外的活动，如识字、文化俱乐部、游戏和唱歌、民间宣传工作以及“八条纪律”的实行。这“八条纪律”除了几处措辞的改变，在八路军中

跟以前在红军中是一样的，其主要目的在于与人民建立友好关系。共产党军队行进时唱着它们：

一、跑进人家，要先得主人允许，离开之前，要留意把一切弄好；

二、房子要保持清洁；

三、对老百姓要客气要互助；

四、借来的东西，一律要归还；

五、损毁东西，一律要赔偿；

六、要诚实不欺，买东西要照市价付钱；

七、要讲卫生，上厕要跟老百姓家隔得够远；

八、不要杀死或抢劫俘虏。

在这支军队里，新兵的教育在入伍时开始，永不停止。我想世界上没有军队是这样敏于自己改进的。最下等的“苦力”，倘使表现出能力和智力，就能够成为指挥官，这也是事实。几百个都按时从兵士中选拔出来，到政治和军事学校里去受训练，这些学校每年训练出大约一万个军官。我亲身遇到过几个农民和劳动阶级出身的人，他们已从普通士兵升任到了团长和旅长。

然而升任的激励当然不是金钱的报酬，因为军官和士兵的生活是一样的，他们所真正爱戴的总司令朱德自己一个月支五元薪金。这种激励毋宁说在于要在共同的事业中求上进的心思。许多方法被采用来激励个人和团体的竞争精神，表示进步的人被用微小而重要的手段给与荣誉。“老资格”照应着新兵，努力要唤起他们的理解、自尊和责任心。

因为几个实际的原因，这种高度的政治的热情是必要的。

首先，共产党军队完全是由志愿兵组成的；新四军呢，据我所知，是国内唯一没有征兵和被强制服役者的军队。第二，它几乎完全靠老百姓的拥护而生存，这种拥护是以它所给与老百姓的待遇为条件的。第三，八路军是国内军饷最少的军队。当人们为了每月分文全无的收入而死时，他们一定坚信着一个极伟大的使命，对于他们的领袖一定有绝对的信任。

在别处，“人民动员”限于征募和其他从上面压下去的强迫办法——在这一个民主国家或是无所谓的，但是在一个老百姓新近才起来革命的专制国家，却又当别论。在北方游击区里，日方始终在想得到一个政治的立足点，所以必须在各方面唤起自动的热忱和警觉，而达到全民动员。每一个地方，农民和工人在政治队的领导之下，组成民兵；在居民的各种分子中间，抗日团体成立起来。从这些组织中，出现了当地的领袖们；得到他们的帮助，每一个乡村都成立它自己的动员委员会，它的自卫团和它的游击队，这许多外围的和半军事性的团体是那保护幕，在它的背后八路军活动着，八路军时常从它更新其力量，吸收热心和爱国的青年。

一切政治宣传对于稳重的中国农民当然会是毫无意义的，要不是八路军实行它的诺言，要不是它的到达带来了人民生活的改善。到一九四〇年，在晋冀察边区大多数乡村里，自治已经成为事实。区里已经选出了代表会议，县长由县人民会议所选举。晋冀察边区政府本身对一个选举出来的顾问会议负责，而新当选的县长，十分之八以上是无党派的本地人。

“因为老百姓只对于他们生活问题的实际解决发生兴趣，”彭德怀有一次告诉我说，“只有立刻满足他们最迫切的要求，才

可能发展游击战争。”

在经济方面，新政体对于一个几乎被过多的债务和捐税拖得破产的农民阶级，给与立时的救济。在“平均负担抗战义务”的口号下面，对于一切战前债务和利息，一律宣布延期偿还。田租减低了百分之二十五至五十。苛捐杂税都被取消，代以一种新的所得税，依照渐次提高的比例而征收，但决不超过百分之三十五。逃到了沦陷城市去的在外地主的田地，分给无田无地的农民；但是留在边区内的地主他们的财产。

合作社在农民和手工业工人中间得到鼓励。即在中国工业合作社进入边区之前，当地政府已经得八路军战时经济团的援助，发展了生产合作社。燕京大学教授林赛曾于一九三九年秋冬旅行过河北和晋东，他告诉我说：在那一个区域里设有五百五十九个生产合作社，工厂大多用手工开动的。焦土政策业已改善。当在日军进攻之下中国军队暂时退出一个地方时，现在工业跟他们一起撤退了。组织成了紧密的若干单位，移动的游击工厂都可以在几小时之内，把他们的机器和工人移到安全地方。

在日军后方的一个山西乡村里，有一所印刷厂，新近得了海外所集的借款的帮助，改组为一个工业合作社。六百个排印工人，大多都是除了排字之外还会放枪的青年。除了别的东西以外，那工厂印刷一张在八路军团体中销行的三万份的日报。近来日军在一次“扫荡”战中，侵入了这区域。整个工厂（我从孟永诚听来的，他在那边）在一夜里被工人搬走了——而下一天的报纸准时出版！

象在陕西一样，努力增加农业生产，修理灌溉工程，并实

行谷物统制，来防止日方获得棉花和其他可以卖得外汇的产品。

这样，到一九四〇年，华北乡间的无数农民都第一次被组织起来，受革命观念的教导，达到某程度的政治和经济解放。他们现在为中国抗战构成了一个比绵延的堡垒和堑壕还要机警和有伸缩性得多的活的屏障，一个巧妙地适应流动的八路军的战术需要的屏障。他们是中国动员起来抵抗法西斯恶性病侵略的康健的细胞。这是偶然当一个年轻的共产党军队指挥对我说话中用了那个隐喻的时候，我才第一次明白为什么中国人老欢喜用对日“抗战”，而不爱用“战争”。

“就中国而论”，他说，“日本帝国主义是一种传染病，我们动员中的老百姓恰象人体上的好的赤血球，遵照自然的意志，抵抗侵入的病菌。”随即他微笑着说道，“我们跟国民党中间的分别，就在于我们认为这是一种性命攸关的病，我们的赤血球必须有科学医药的帮助，而国民党呢，认为我们的医药太革命，比病还要坏！”这话，我现在想起来，几乎恰恰就是陈立夫讲给我听的说法。

无论如何，这一服药，不论科学不科学，自从八路军在一九三七年最初开入山西和河北的血流以来，总已经功效大增了。原来只有共产党军队的老战士约五万五千人渡黄河进军。今日，日军司令估计华北“共匪”有二十五万支枪，而外国观察家所举的数目最低为十万，最高为三十万。我自己根据跟八路军各司令官的谈话，个人的观察，和那几个有资格判断这件事情的观察家的估计，而作的约略估计是：在一九四〇年底，正规八路军计二十六万人枪。

不是小的成功：在战争中间，又没有政府的补充，枪力增加了百分之三百五十。这是怎样成功的呢？所增火力的来源，包括从日伪军夺获的枪，盗匪缴的械，人民捐助或从贩子买来的枪。因为获得了阎锡山撤退时遗下在太原兵工厂里的武器，八路军的实力增加了大约三万支枪。这些枪被取了出来，分给自卫团和山西青年救国会，它们后来组成山西新军，现在编入八路军指挥之下。在重行训练和收编打败仗的逃兵、散兵和残部，独立的游击队，以及地方保卫团之中，获得了大约四万支新枪。

除了步枪和身旁佩带的武器以外，八路军的配备包括机关枪和炮以及从敌人夺获的大量杂项军需品——这些以后还要提到。上面的估计并不包括作为主力军后备队的地方自卫团中差不多五十万人（和若干女子）的各式各样武器——大多是旧式步枪、手榴弹、大刀和矛（！）。它也不包括华北在军事方面以及相当地在政治方面跟八路军合作的各种“友军”的火力。它更不包括东三省义勇军的武器，这些义勇军是应了他们的最高司令，那可尊敬的李杜将军的请求，正在八路军领导之下重受训练和改编。

在它最初三年的战斗中，八路军每月只拿军事委员会六十万元，或者说，三个师的标准经费。别的军队都发给新的武器和新的配备作他们的补充；八路军只得到极少的弹药补贴。到一九三九年，每月的经费甚至不够养活战地的军队。它是无法存在的，要不是它给那些民众组织（它保卫它们的自由）成为有机地分离不开的话。重庆对于这些战士，不供给毯子、不供给冬季军服、不供给鞋袜、不供给医生、护士或药品。在严寒的零度以下的气候中，许多次的袭击都是由这些人进行的，他们

赤了脚踏过冻结的山川，在他们背后，在那些雪道上，留下了深红的点子；受伤的青年在薄薄的凝结着血的棉布短衣中发抖；许多人都因为冻伤而掉了脚指、手指和耳朵。

然而回到遥远的后方的安全之中，我有时听得某一个穿得漂漂亮亮的官儿摇着一个胖胖的头说道：“八路军么？他们是不打仗的。他们只不过白相捉迷藏。他们不去困扰日军。政府应该停发他们的经费。他们把钱全部都用来宣传，不用来打仗。”

他们方便地把一个问题置于度外。中国军队的主力既然一直退到了西部去，不打仗的八路军怎么设法把它华北各根据地守了三年呢？让我们试给它找一个答案吧。

游击队的作战效力

我们学得的最大的教训，就是一个民族可以用偶然得到的任何物资而胜利地作战。——朱德将军

经过战场上许多年的代价昂贵的经验(包括三十万以上共产党员的牺牲)，红军和后来的八路军把游击战发展而为称作全民持久抗战的一种主要的战略观念。到现在为止，它是唯一的达到了使一个全能主义的侵略者无法收获他全部胜利成果的方法，谁能说它不会是欧亚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人民(他们现在差不多占了地球上男女的一半)获得他们的自由所要经历的道路？或者，对于社会的政治改组计划，它不会终于证明为比卢登道夫将军的理论意义更大么？

关于全民战的战术，游击领袖们已在他们的军事和政治刊物上写了无数的文字，当然没有一个提要能够希望透露它丰富

的变化或它全部的可能程度。但是我在前面几章里既然已经尝试暗示这形式独特的抗战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组织，所以在这一里我要指出它武装保卫者的战术中的几个基本原理。

“全民持久抗战”是以中国人数和空间的最广大的利用为根据的。日军连巡逻他们蹂躏区域大约三十万个乡村的一半的人力都没有，巡逻的尝试者无论如何会在财政上自招灭亡。所以他们设法以占领战略的“内线”、城市、公路和铁路，并“勒迫”内地投降，而停滞抗战和巩固他们的力量。但是全民抗战的理论是以下述一事的可能性为基础的，即是把每一个乡村变为抗战根据地，使日军不敢轻举妄动，把日本战略的“内线”改变为防御的“外线”。

在实践上，共产党军队用三种主要的作战方式，并用不同的技术方法发展每一种。这三种是(一)游击战，(二)运动战和(三)机动战。第一第二两种被认为是完全攻势性质；而按照预定计划的迅疾和熟练的分散，实是对于作战逆势的唯一防御手段。只有在机动战中，共产党军队的战术才包括积极保卫点线的准备。然而即在后一场合，也把阵地看作是暂时性质，当它们已经尽了掩蔽突击行动或流动部队撤退的任务的时候，就予以放弃。共产党军队决不死守一城一地而以绝对的流动性和优势兵力火力的迅疾集中为基础的——进攻战术和积极主动的作战观念。

彭德怀将军给了我关于一切游击战术的最简明的定义。他列举他所谓打胜仗的六个最低限度的要素：“无畏，敏捷，智巧的计划，流动、移动的秘密和行动的突然和坚定。”他继续说道：“这些中间缺乏任何一项，就难叫游击队打胜仗。倘使在战

事开始，他们缺乏迅速的决断，战事就要拖长。他们非敏捷不可，否则敌人就会增援。他们必须流动而有弹性，否则他们要失掉他们机动的好处了。”

游击战与运动区的区别，主要就是少数的地方部队独立作战与多数的部队跟非正规军主力在时间上地理上配合作战的分别。有一句熟语，叫做“游击队击则歼灭敌人，游以避免歼灭。”换句话说，他们主要的保全理论，既须不时出击，又须不时移动。一个游击部队可以是以一个乡村为“根据地”，它的“后备员”包括一个自卫团；或者，它可以包括一个山谷里或一个山上或一块平原上的几个乡村。平常，它的人数不在五十以内，不出一千以上。政治教育尽那样重要任务的，就在于这些小部队的维持纪律上面；旧式军队尝试游击战的大多数失败，都是因为缺乏严格的教育和革命的领导。没有革命教育，游击队在防御中成为负债性质多于资产性质。

地方的游击队常穿便装；有时，他们白天种田，夜里当兵，倘使情形不利，他们就连着许多天不采取军事行动却用各种各样破坏行为来保持当地活跃的精神：割断敌方电话线电报线，在可能的地方开掘道路，破坏桥梁和暗沟，以及组织当地意见反对奸细。也许他们最有效的工作就是用这些方法使敌方不能在村里发动政治影响。只要地方游击队活跃，豪绅之辈是不敢跟敌人合作的。

在军事方面，地方游击队作为活动部队的触角，收集情报，肃清奸细，并以敌方部署的变更报告司令部。在有利的情形之下，当敌方巡逻兵减少或恶劣的气候阻碍援军调动时，地方游击队在分区领导之下联合起来，实行一连串的短时突袭和迅疾

攻击。

在猛攻设防的阵地时，游击队总是夜间进攻，靠了出其不意，优越的进攻精神和地方的熟悉，使他们得到胜利。在突扑移动中的敌军时，他们试用种种诱击的战术，来分散其部队。于是他们从一个事先准备妥善的地位，进攻这分散部队的最弱的一点。他们时常伏击小队的日军，俘获和缴械散兵。

装作了向导，地方游击队有时把敌军引入埋伏的地方：这样的敢死队平常总立刻就牺牲。偶然，从日方所雇的奸细那里得知敌军的行程，游击队把移动的敌军打算在那里休息的一个乡村的居民，全部都撤退。把村里所有的家庭事务都接收过来，他们一直等到那些疲备的侵略者一点都不猜疑的住下来过夜；随即，信号一举，那些和平的村人都起来，消灭这个部队。

另一个“引诱”的例子，也是常常用得很成功的例子：许多游击队员改穿了年轻女子的彩色鲜明的漂亮衣服，装作乡下人在日本军营附近的田里做工。一心想求快乐的日兵偷偷地跑出来，到田里去捉那些女人。后者开始奔跑，在前面保持着足够怂恿人追赶的距离。这样，那些未来的罗密欧们，都被引入圈套，被那些乡下姑娘的同党们缴械或消灭。

贪想肉吃也使许多日军遭殃。牛或羊引人地排列在远处山坡上，不谨慎的新来日军，去追赶它们，自找灭亡。有时，假炮架了起来，去迷惑敌军的侦察机。有时候，破坏正常的道路，造起假的迂径，于是不熟悉地势的日军走进了死路，应用了无数不同的方法。一到日军懂得了一个巧计，游击队马上就又发明了一个。

第二“运动战”包括以共产党正规军的集中火力为基础的

比较大的行动，这些正规军供给这种战争中的进攻主力从一团到整个旅都可以，用他们所有的到中型炮为止的一切来帮助，并有骑兵作伴。速率、秘密和细心的准备在运动战中最关紧要。

日军对于防卫军主力的包围战术，被游击战和运动战的巧妙配合所挫败。运动的战术常限于仔细选定的作战区域其目的受时间空间和军事目标所明白限制。一个卓越的例子，德国军事杂志称之为“运动战的经典”的，就是长城上平型关之战。在这里，八路军把皇军在被轻视的中国人手中所受的最最耻辱的失败，给与两个精锐的日师团。由于优势的机动，八路军在一次使侵略者死伤六千四百人的战事中，只损失了三百人。

第三种战术称为“机动战”，这是一种规模较大的行动。它包括两个或两个以上从敌后中国军队所守地区中不同的根据地出动的师团的配合行动，有时与主要前方的进攻行动相合作的。

在华北，八路军现在有六个主要的堡垒(晋西北、晋察边、晋东南、冀南、皖北和鲁北)，在每一区域四周，伸展着人民抗日团体的波浪，它们接近日军驻防地时，逐渐稀落下去。敌军当然不能用暴力一个一个侵入到主要的非正规根据地的中心，实行残酷的惩罚步骤。但是他们缺少军队足以同时把他们完全包围，他们缺少人、钱、供应和交通便利来维持永久的步步占领。所以当他们向一个根据地进行“歼灭”战的时候，不在包围之下的其他根据地的主力军就进攻那从事进攻的日军部队的后方和侧面，并使其不能动弹。

然而机动战对于象八路军这样没有重配备的军队是代价极大，极为危险的，而没有各主要阵地的配合的帮助，它的目的

只能部分地实现。

中国的主力军一天继续被动，不把他们所独有的重火力发挥出来，那么敌军阵地的克复和主要的敌军集中的歼灭，就一天不可能。共产党军队司令相信最后胜利只有从大规模实行机动战才能得到。但他们承认，这事能够发生，只有倘使高级司令克服其反共偏见，以求广泛的政治军事团结，把主要的帮助给与流动部队，而跟他们一同计划一个在最广大最深入的前方的配合攻势。

那么，这一新典型的中国军队的作战效力，跟大部分的军队比较起来是怎样的呢？军事委员会所发表的包括战争最初两年的统计，表明八路军新四军在中国全部军队所使敌军损失的全部配备中，一共占据了一个非常大的百分率。单是这两支军队就截获和破坏敌方损失的全部大炮的百分之六，全部机关枪的百分之十五，全部货车的百分之二十八和全部步枪的百分之三十四。全中国俘获的敌军中，三分之一以上是八路军和新四军俘获的。一边军队扩大，一边作战效力也增加；一九三九年内，他们差不多参加了全部作战次数的百分之二十五，地方游击队的战斗不在其内。在一九四〇年内，日军停止他们前线进攻，把他们一半以上的军队集中于游击区，企图完成占领区的平定；那百分率升得更高了。

一九四〇年初，八路军各司令共同发表给政府的一个公文，其中说：“在过去二年半中，八路军死伤总计约为十万人而使敌人死伤二十万人以上。”倘使这话是正确的话——观察家们不禁要相信它，因为八路军发表每日报告，在该时期内罗列了六千多次不同的交战——那么它的作战效力比其他任何前线所达到

的大约好四倍。因为在别的地方，据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将军的话，华军与日军损失的比率大约是二比一，在若干地区平均五比一。

“敌人在华四十个师团中，十七个专与八路军新四军交战，”那个公文提醒军事委员会道。“故吾人牵制全部敌军五分之二之兵力”同时，共产党军队各司令报告，说他们的经费只大约等于其他军队的五分之一，以致每个官佐或士兵每月平均只领到二元七角二分。他们提出其他严重的不平，我们必须在下一节中讲到它们——因为中国团结的这座大厦可能存在或倾坍，就在于他们所提各问题的合理解决。

团结还是毁灭？

我们要求在抗战团结和进步的旗帜下统一起来。

——毛泽东

日本征服战的战略，正如中国抗战的战略一样，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是：大进攻时期，在这时期里，日军占领中国重要的城市，并控制沿海，主要的水道和交通线，以及主要的已经发展的中国根据地；军事巩固时期，在这时期内，日军企图稳定一条占领区的边界线，使线外的中国主力军只限于一个被动的和纯粹保卫的地位；镇压时期，在这时期内，日本想要消灭流动部队和游击部队以及他们在人民中的基础，这样通过了对于它最后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奴役而达到政治的安定。

到一九四〇年，日军已经完成这个战略的第一阶段，在第

二阶段上已得相当的进展，正在把他们主要的努力专用在第三阶段。到现在，对于读者该是非常明白的了，就是：只有游击的（大部分是共产党的）军队才是使日军在华北、华东无法得到成功镇压的障碍。在“自由”中国发生的事情，既然跟增强沦陷区抗战力量并无直接的关联，就不会影响到结果。倘使日军在他们侵入各省的“扫荡”战得以成功（而且倘使战争只由日本和中国来决定的话），那么重庆将成为西藏附近的区区一个经济落后国家的首都而已。

一九三八年以来，日军已作了多次的消灭进攻，对着所有的游击根据地，首要目标是八路军和新四军，这两支军队的各种组织现在的作战次数约占沦陷区全部交战的五分之四。例如，到一九四〇年八月，单是对着晋东北和晋东南，已经先后作了十二次以上的“最后歼灭战”，同时对安徽和江苏的新四军发动了六次主要的进攻。在所有这些尝试里，日军都不能达到他们的目的，受到极重的损失，不能防止八路军新四军方面火力的继续增加。这全靠久经战争的共产党军队各司令的机敏来发展新的战术而获得胜利。

对于在最初几个月中给了他们若干次惨痛失败的共产党军队，日军已改变了他们轻视和不经心的态度。他们现在仔细研究和分析被板垣将军称为“日本敌人中最顽强最危险者”的敌人所用的一切方法。日军正在运用受过特殊训练的军队来作运动战和游击战，并已学会在小规模战斗中有效地运用毒气。晋西北的一个八路军司令把那个地区中的一个战役说明给我听，在这战役中日军只用化装农民的小队迅捷的游击兵，他们想要突击乡村前哨上的共产党部队。

日军的行动全都以他们设防的城市为中心而在四周活动的，现在正在企图把这些地区扩大成为一个封锁制度，跟蒋介石用来终于把红军赶出江西的那种一模一样的。但是蒋用了一百万以上的军队来包围仅仅一个共产党军队根据地，仍然免不了一个突破，而现在八路军新四军有着六个比江西更大更巩固的根据地。即使广泛应用伪军来负责驻屯工作，日军也还是缺乏足够的进攻兵力来同时包围所有这些广大的区域。用碉堡来包围每一处，所费浩大，而且也许结果还是无效，因为日军可能仍旧无法完成歼灭。

总之，日军在军事方面对付共产党军队似乎不大有什么进展，而愈益凭借对于平民的恐怖主义和惩罚步骤。一个新近旅行过河北和山西的教士说，在他所看见的区域里，日军在其惩罚行动中，每隔两三村就烧掉一个，并且屠杀了几千个平民。日军每次大规模的反游击战争，总随带着几百辆的空车，他们退回城里去的时候，把每一样想得到的值钱东西都装在车上运走。一群一群的水牛被驱去杀掉。据说河北和山西的农家牲畜，大约一半已被毁灭。在许多村子里，你再也买不到鸡蛋了，因为没有一只鸡保牢了性命。

一个鲁北游击区来的中国教授告诉我说，“日本人把一个市镇周围几英里内的出产品统统搜光，把乡下人弄得两手空空，这是常有的事。他们把东西带回市镇上来，留下他们自己要用的。然后他们把多下来的摆到市场上去，卖还给被他们抢劫的人们。”

当日军的车子不运农人的家具或衣服或食粮的时候，它们常常装满了中国姑娘们。有时候，男女孩子都被关起来勒索赎

金，倘使日人疑心他们的父母有一点钱藏了起来。常常整个村子都突然在夜里被包围，被用机关枪扫射，算是一种“警戒处置”。无数的住在日军大炮射程内的农民，都被迫不得不放弃他们小块的田地，这些田地虽然经过了地主和收税人的勒索之后从来没有给过他们超过仅可糊口的生活，然而他们所知道的仅有的家。

日军现在已经把握到究竟什么才是这一种全民抗战的基本事实：只有用整批的灭绝居民的方法才破坏了它。在游击根据地边上的若干地区中，这个法子已被实行，用直截消灭和迁运这两个手段。几千个农民都被征发去给军队做工，去重建被游击队所破坏的碉堡、城墙和道路。几千个壮丁和年轻女子都被用强力去为其华北的军事计划或工业计划以及东北的土地计划，从事吃饭不拿钱的劳动。不是这样直接受奴役的人，都被用一百种不同的方法强制着做支持日军占领的工作。凡是日军能够施行其命令的地方，农民都必须依照比市价低得多的价钱，把他们的米、麦、丝、棉花和羊毛，卖给日方的专利公司，交换常是分文不值的伪钞。拒绝的人被毒打或被当作“卖国贼”而杀死，等等。那卑贱的事迹已被许多可靠的观察者动人地描述过了。

但是这些极权主义的惯用手段得到这个酬报；它们足以加强人民抗日的决心，并使敌人难以在他们自己的枪支以不及的地方找到任何安身之处。中国人不是笨的。当一个市镇的一头在发生屠杀，和火烧和强奸的时候，他们中不大会有人会被另一头以贴的日本传单所感动的，这些传单痛斥“共匪”或者在“亚洲人团结起来”的口号下，表明和颜悦色的日本兵抚着小天使似

的中国小孩子的头。诸如此类的情形，例子之多，使人似乎有理由可以怀疑日人是否有着辨别可笑的心。

这种的技巧，比共产党向农民所作的宣传，更有教育他们爱国心的功效，它把组织的重要性以及跟他们自己的防军的合作的重要性教给他们。他们得知，只有这样他们才能使日军不可能在他们自己的堡垒外面存在。只有通过动员，无数的农人才能因为他们自己跟那些组织起来保卫他们的生命和他们的自由的军队成为一体，而找到保护。

然而，日军惩罚的蹂躏的破坏性是那么厉害，所以只有一种以最后胜利的革命性的希望为基础的超特的士气，才能使游击队和支持他们的人民继续斗争。我曾经指出游击区域经济的严重地位以及政府全无加强游击区域工业和农业的援助。我曾经提及八路军新四军的不充足的经费以及不发给主要的军器，尤其是有效的破坏工作以必需的高度炸弹。然而，在他们地位上虽有这些被承认的弱点，我可从来没有遇到任何游击区里的一个男人或女人，他怀疑日军巩固占领区的努力最后能够被击败。

跟豪绅之辈和关系复杂不疑的地方军人共同合作的军队，国民党和政府中的反共集团，对于游击地区及其周围的无数“事件”，应该负其责任，这在中国是大家知道的事情。在汉口的最后许多日子里，我第一次开始听到这些磨擦的暗中报告。后来它们成为人人知道的差不多日常事情了。

我曾经论及国民党右翼竭力要保持一党专政以及在未被侵入各省取缔异党活动，我曾经讲过成立一个战区党政事务委员会，来根绝共产党在敌人后方所领导的抗日运动。这些办法的

发动者在他们的发言中是够坦白的，虽然报纸上不准报道。在重庆，国防最高委员会副主席张群将军告诉我说中国游击区内由人民选举的地方行政组织是“非法”的，他说起战区委员会决心要撤消它们。在西安，蒋介石行营主任蒋鼎文将军使我确知他同具张群的见解。

中央军和国民党内的羽党——当然是政府中的要人——用了在别的地方就要被称为第五纵队主义的各种方法，来破坏八路军和新四军。象戴笠主持的蓝衣社，胡宗南将军手下的“复兴军”、宪兵、三民主义青年团，以及其他名字不经解释便毫无意义（此处没有地位来解释）的团体——象这样的秘密组织全都协力实行所谓“处置异党问题办法。”

事件迅速倍增，而在一九四〇年成为那样严重，以致无论什么地方进步的人都有些担心国民党会完全放弃对付日本的努力，而专心于似乎成为它的主要兴趣所在之处：重来一次反共内战。八路军的兵士和军官，迪有被捕，被监禁和被屠杀的事件。从绑架到延安去的学生起，到武力进攻共产党军队的驻军，什么都有在里面。中立的将军们吁请蒋介石干涉，但他似乎或者无能为力，或者并无兴趣。最后副参谋长白崇禧将军亲自去见蒋介石，请他否认包括在那秘密的“处置异党问题办法”中的训令。蒋否认知道这东西。但“事件”继续发生。

有一个长时期，共产党似乎惟恐把局势弄得更加恶化，而勉强表示他们的不平。甚至在新四军一个联络站的全体职员在江西被国民党一个军所惨杀^①之后，他们只在重庆举行一个小

^① 即平江惨案。——译者。

小的追悼会——他们邀请那个军的代表出席这个会！当中央军的部队进攻陕甘宁边区，抢去五个县的时候，他们把军队撤退，吁请蒋介石干涉。他制止了冲突，但把中央军的占领弄成为永久的了。无可奈何，八路军各师司令终于在一九四〇年初发了一个极动人的公电^①给蒋介石、政府各要员和战区全体司令，抗议对他们的继续进攻，要求终止捣乱和不公平的待遇。这电报的一部分如下：

“在冀晋绥察鲁诸省，八路军曾收复失地，建立抗日根据地，以保卫中央大平原及西北全部。但仍有人宣言八路军必须逐出。彼昨日放弃土地于日本，且因畏惧日本屠杀而窜逃之将领，今日乃令其部队进攻八路军后方，而谓此行动为‘收复失地’。……特务人员纷入陕甘宁边区，迭事骚扰，大军又遣至包围。彼等一日袭一城，一日攫一县。不幸事件接踵发生。但我坚决站在抗日阵线上之战士，决不放弃寸土。八路军实已表明对整个民族之忠诚矣。

榆咸铁路，陇海铁路，八路军必经之交通线，三民主义青年团在此拦路捕人，特务机关关卡林立，不仅八路军之青年一律阻拦，并设立招待所，谓之‘唤醒盲从八路军者’，抗大学生，有经此途者都被捕，并勒写悔过书，加入干训团，青年何辜，遭此荼毒。甚且盗窃八路军车，伪造八路军护照，物证俱在，可以复按，以此为例，其他可知矣。

特务机关横行勾引八路军与共产党人员，立有价格，高级二百元至三百元，中级一百五十元至二百元，下级四十元至一百元。造作倡言，则有百件之多；厉行破坏，则有无数万之金钱……一个‘制止异党活动办法’之不足，继之以‘对于异党处理办法’，又不足，继之以‘处理共党实施方案’，开训练班，上磨擦课，‘灭共’，‘反共’之声，甚嚣尘上，山雨欲来风满楼，是存心制造空前之惨祸也。”

① 一九四〇年二月十五日。

陈诚将军对此置之不理，但他的政治部却印出一集记事来作为答复，这些记事使人以为随处受共产党压迫的是国民党，共产党被指为自己犯着所抗议的那些罪。证据是大家知道，无从蒙蔽的，那情形已成为一件全国的丑闻，蒋介石不得不命令调查。但谈判拖延几个月，还没有多少显见的结果。直到一九四〇年六七月间，蒋介石终于答应改善。

今日，共产党员虽被排斥，不得参加各“自由省”的政治生活(重庆和别处的代表只认为八路军的联络员，共产党依然被正式禁止)，但蒋介石已承认某几个前线的区域，在那里共产党军队享有跟国民党军队在别处所享的相同的权利。军事委员会现在也多发八路军三个师和新四军两个师的经费。这一个调整(它仍然使共产党军队大约有一半未领中央政府经费)要到滇缅路被封锁使国民党政府几乎完全依靠苏联的外国援助之后才被容纳，这也许不是没有意义的。

但当我坐了欧亚机从西北飞还重庆的时候，横在我心里的大问题是：这一种临时办法，是否能够继续把全国团结在将来必然要遇到的还要大得多的艰苦的考验之下呢？一个政府正式否认一个政党的政治存在，这政党的收回其拥护随时可以使这政府受到必然的祸患；我急欲知道，这样的政府能够继续称为“国民政府”“统一政府”到什么时候呢？

第九篇 帝国或民主？

自由中国的希望

世界上任何军队，如要对抗苏醒中的中国底全部力量的，必遭挫败。

——J. 贝特兰

这个经济落后遭受着损害的国家底奋斗，能否给予我们以任何教训？能够的。因为世界人类到处都在危险中。我们必须学习他们，如果我们自己在优势方面作战的话。第一、我要提出一项报告，这报告也许要使读者惊奇：即是中国战争证明民主国家比独裁国家更能作战。中国还不是一个真正民主国，因而遭受着许多挫折。但因中国人民在战争中发展了民主主义底活力，免使国家遭遇最后的挫败。中国政府虽不民主，然而这已成为一个民族的战争。民主主义的情绪，

切实否定了失败主义者底权力。

西班牙最初表现着：真正民主国家只能被无限优越的军备所击败。我们现在知道，法国的失败，与其说是由于劣势的军备，毋宁说是由于国内出卖民主主义的结果。受着法西斯势力所挑衅的民主主义，必须具有动力，而且不断前进，否则，只有和在法国一般，崩溃而已。中国的民主主义虽然幼稚，然比较的有动力。这样，仍有胜利希望。

第二、民主国作战，以地方民众的自卫行动为基础，倘不使各阶级平均负担，则作战不能获胜。全体性战争包含全体人民。佣军不足以防卫现代的国家，金钱的利益也不能固定民气的根基。贪心和利己行为必须祛除，而代以民主主义的逻辑，并使后者扩展及于全部经济范围。单是经济的民主主义即能使一个民族，团结于共同关系之中，而此共同关系即为军队所必需，俾可在炮火下密切联络。

第三、“自力更生”、为民主国最坚强的堡垒，且为对付失败主义所必需的消毒剂。朱德说：“一个民族应该动员所有的资源作战。”每一公民必须规定担负生产工作和责任，不仅必须取得经济权利，且须获得经济责任，不仅必须取得政治权利，且须获得政治责任。失败主义起自不负责任和人格底败坏，而流归为逃避主义，以归咎外来的因素，掩饰内部的失败。

第四、人类人格的完整和历史的伟大的运动需要一种能使个人底救济与社会底革新有效地同时并进的主义。战士与平民必须绝对地相信：伟大而明确的主义正在危险之中，这主义获得胜利，则能在各方面根本改善他们和他们后裔的生活。这主义必须足以普遍感动敌人的良心，而在政治上打消敌军底力量。

中国未能准备这些胜利条件，即为未能使日本接近覆败的原因。然他们正逐渐受着感觉，或许仍能获胜。政治、经济和军事的民主主义的发展极不平均，而利用国内资源“自力更生”的动员，其结果和真实的可能度相去尚远。

法根豪森将军曾经说：“中国自己不知道自己资源的力量”。这里的“中国”如指为“中国少数人们”那是完全真实的，但或不是笼统的真实。假如一个政府发现了并从事于开发那潜藏于数百万农民群中和他们脚下的无限力量，则中国诚将如法根豪森将军所说：“不能被任何一国击败的”。

人们对这复杂的事件不能武断地讨论，但我在战争中的中国亲眼目睹，却要肯定的说：国家所呈现着的战争力量业已动员者还没有超过三分之一。这是指人力和资源而言。主要的弱点在于未能结合这二点因素，以招致最大的生产效能。在这后面，呈留着政治的和经济的矛盾，等到国家处置下的人类力量底可能性完全被认识以后，这矛盾才能解决。

许多人因中国竟能作战，大为惊奇，他们忘却中国有着很好的胜利机会。我假定我是这样主张的少数人中之一人；我预料战争爆发之年和战争多少要循着进行的趋势，都符验了（文载一九三六年六月六日《星期六晚报》）。但灾难将迫令国家实行必需的改革，使中国社会有效地改组，我对这点估计得太迅速了。现在似乎十分可能，政治的和经济的改革，在亚洲战争扩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有机部分而进入新阶段时，倘不加速进行，则机会或将完全丧失。

中国必须在最近的将来完成人力和资源底动员，否则在战争中的机动力将转入他人之手。

战争成熟了必需的改革的条件，且使条件易于实现；但现在只有革命的指导的动力能推行这些条件所包含的意义。

就军事方面说，至少有一打以上的要事，还没有做到。在中国本部农民底有组织的力量，比别处更利用得有效，惟仍远在可能度之下。原因由于缺少从主要的政府根据地而来的政治和经济的援助。据行政院秘书蒋廷黻称：在自由区内，除正规军外，尚有民团及保安队约二百万人。民团是地方上的武装卫士，由地方绅董筹饷维持。为绅董用作征收租金，盘剥重利和拘押欠款人（许多体态健全的中国人因欠款入狱）所不可少的。民主的动员如果普遍地在中国进行，则雇佣卫士所用以实施产业特权的大批来福枪（至少一百万支），和其他武器可以拨充前线士兵之用。一个民主的地动员了的民族，用市区自卫团足以维持安全。这样不仅人民可以强固，而且一百余万的游惰者可以变成生产者，例如：多数人在工业合作社为新兵制作军装，或在合作社所开垦的无地主的荒地上生活着。

陈诚将军说：大约有三百万正规军展开在广大前线之后，在两军之间且有着广阔的“中立”地带，这里各种交通路线已全被毁灭，日军倘没有大规模的准备，要在这里进展是不可能的。中国军队保持这样前线是被动的、静止的甚至是多余的。

在西北，例如在黄河以西的中央军比在黄河以东战线上者约多三倍，而十八集团军留在陕北和甘肃的后防地带，仅有二万人，大多为地方志愿兵，它靠着在日军后方的主要部队底攻击力以制止日军侵犯陕甘宁边区。日军虽有三四次越过黄河侵犯陕北，但常被迫退回，以应付山西的反攻。所以从开战以来，日军从不能越过山西。现在，中国尚不能集积作大规模反

攻的火力，除非大部分日军力量在他处被牵制着。无论何处牵制着日军，则在日军阵线之后加强华军动作，必然成为重要的任务。事实上，我似乎认为主要的反攻力量的本身必须从“牵制”中发展出来，也只有在反攻力量充分强固之时，然后借重可能的西方来的打击助成反攻的任务。

这点意义只是因为大约半数中国主力部队在自由区内“未动员”。这是一个只有靠着民主的动员才能解决的问题之一，并且引起了为加强政府所不可少的改革政治经济的问题，俾可调出国家底最大的作战力量。中国有着伟大的历史的主义，这主义并不限于获得战争的胜利。它底广义是在全亚洲的解放斗争中作领导的先锋。讲到中国本身，日本如被击败，世界上没有其他势力可能恢复在中国战前的半殖民地状态。但欲求胜利，这个关系着全世界半数人口底命运的主义，不仅必须带着改善人类生活的希望，而且必须立刻实现一个改良的民主的社会。

马基雅韦里说得很对：“独裁主义的目的是在侵略，民主主义的目的在防卫。”防卫自由的战争只有应用最广大的民主主义使大众负起重大的责任，才能胜利。因为侵略者以劫掠财物权力为动机，而防御底动力只能在人民实施力量应付危险时，才能组成。

中国急需意义最真切的民主主义，依照这主义，人们不仅具有经济和政治的权利，而且具有经济政治的责任。在这里，我所指的民主主义乃是从最小的乡村出发，而达中央政府，其所代表权力之权，出自全体人民由底层至上层，经由当选的代表实施之。推托农民和工人有些是文盲（民主主义不实行则继续为文盲）因而茫然不能担负政治责任，那完全是废话。推托中

国大众不能自治，乃是中国自己底半封建的官吏，所培植出来的神话。然而，必须奠定了民主的经济底基础，民主主义才能在中国推行。

坦白的经济问题研究者都知道，中国在战前经济呆滞的基本原因，是由于土地所有权集中于绅士阶级的准封建的农村经济，而这样农村经济底本身，因着复杂的理由，不能超越重利盘剥，囤积货物和投机的资本主义前期的轨辙。因着战争，这缺点更为显明。政府从未宣布关于土地所有权底任何 详 明 数字，但各类估计，显示半数农民竟全无土地，三分之二之多的农民成为佃户或半佃户的农夫，而百分之十至十五的人民则拥有全部土地的一半以上。就四川情形而言，在人口密集的成都平原，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土地为百分之七的人所有。通货膨胀加深了农民的痛苦。农产品价格远较制造品的涨起的成本为低。重利盘剥盛行，利息不断提高。在四川政府规定房租应保持战前的租率，但各处绅士和党部有关人员可设法规避它的限制。地主在经济效用上比从前更不生产，主要的从事于土地和汇兑的投机、囤积，在农产品和制造品上获取不正当利益，以及私运劣货。

同时，显然的，在建立了民主主义的区域内则推行着极不相同的趋势。非耕农和离开家乡移居他处的地主阶级不再能收取封建的贡税，而利益被夺的农夫正被授权认为生产者和土地的居住者。重利盘剥禁绝了。如若地主留居自己土地上，则该处地租减去百分之二十五至五十。农村借款被宣布延期偿还，囤货和投机严厉受惩。地主权力正被改为国家征税权力作为作战的主要基础。纵使有不断的战争底可怕的破坏和游击区与资

本聚积地的交通之断绝。仍可十分有效地回复生机，以保持那建筑在民主的经济基础上的防卫底表率。

蒋介石将军在一九四〇年说：“我们所要建设的乃是澈底的民主主义”。我们现在希望政府澈底调和农民的需要。放债者和地主们从沦陷区逃至通商口岸，外国租界及香港，从事于投机的扰乱行为，把囤积物变为外汇，加以通货膨胀和其他因素，都明示着土地改革的需要，以加强政府和增加税收。如若具有趋向于变迁的意志，那末这点在目前比较的易于实行：把离开了乡土移居他处的地主们底土地收归公有；由政府用债券或通货收买；出借低利息的政府贷款，使农民单独或共同购买他们所耕的土地。

我们不能说政府完全不曾注意这个问题。政府业已公布法律，规定由难民垦植公地、荒地，和在某种情形下离开了乡土的地主们底未耕的土地。陈翰笙博士曾提出三种方法，授权政府从离开了乡土的地主们收回未耕的土地：（一）以最低价格购买；（二）迫令地主售与垦植人；（三）命令地主免费租与佃户，为期三年至五年。依照前二项方法，佃户可用合理的分期付款办法购买土地。虽然，陈博士指出大约只有五十万难民（共有三千万）可从这般土地垦植团体获得利益，而其他现存的垦植计划尚不能改变业已存在的地主佃户间的关系。即使如此，这种方法确也“表明了一个最热切的发展新经济的企图”。

但很可惜，落后分子不许可这进步的改革，也不承认各地情势之急迫。相反地，他们却采取那巩固和恢复地主绅士们底半封建的权力的经济计划。我已道及在“合作”信用贷款和农业复兴计划的方式下，大宗款项流入于绅士阶级之手（在一九四

○年计有四万万元经由国家银行付出，大约三分之一拨与川省)。许多这些信用贷款(决非全部)由绅士们用重利盘剥方式贷与农民，再把盈利用作投机，这样，延长了资本主义前阶段的中国经济的堕败。

假如政府有这样决心，则能利多损少，易于应用农村经济的战时保险，作为为民主主义而建立的经济基础的方法，藉以消除目前的呆滞。显然的，现在惯受绅士阶级奴役的全体平民能易于推行进步的经济改革，其法为再贷款与农民，使他们恢复土地管理权，实行平均负担，广大地加强国民经济，以巩固政府作战的基础。

关于这点，无疑的，工业合作社业已证明农工能够完全负起经济的民主主义的责任。在这运动中，人们确实见到实现中国将来的希望的一个真实的例证。在工业合作社目前奋力保持民主性质的结果上，人们可以判断能否使封建主义演变到民主主义的全般问题。如若官吏中的落后分子能迫令工业合作社实行农村信用合作社所建立的同样的支配方式，那末那些寻求民主主义的中国底人们必须向别处寻求鼓励。

合作国家的程序以真实的农村合作运动——密切地与真实的合作的工业化相结合——为基础，与国家计划相应和，现在我似乎认为这是授与中国奠定胜利的民主主义底经济基础的唯一机会。我想这也是中国的唯一的特质，在这特质内列强可在将来发展市场。关于这点以后将略加说明。

同时，国民党容许他党加入政府，增强它的目前的机构，因而缩小官吏与人民间的鸿沟，那是急切需要的。共产党和国民党在国民主义中都代表着合法的事业，这些事业可由那拥有

全国党员的党与党间之合作暂时加以调和，等民主政治制度存立才有其他调和方策。没有这初步阶段，民主制度将如何实现呢？经过十三年的努力，“没有代表的联合”似乎不能成功。共军与共军所保卫的边区和其他军队与区域，一般只有在一个政制之下才能被联合，那政制是：容许它们在政治上的存在，和准许它们对于国家底决定有真正得发言权。

自八一三以来，共产党员除要求使共产党获得法律上地位，以及几许趋向于民主主义的步骤以外，从未有其他要求。共产党似不愿替代国民党，假如国民党竟能实行这时期的必要事件。在目前能够实行这样一个改革而没有内战——内战也许只利于日本——那是难于想象的。在内战中无论谁“胜利”，整个国家将受重大的损失。

共产党缺乏有训练的技术家和行政官，须得征集目前的许多官吏组成政府。如果他们不仅使一个旧官僚机关接受一个新名称，则他们为欲完成民主的革命起见，将被迫打破那联合绅士阶级的反动的同盟。

虽然如此，趋向于澈底的民主主义的演变，必须而且迅速实行。否则国民党或将失去权力。中国在目前的战争中必须完成一个有动力的民主国；中国必须迅速完成动员，否则或被一个有动力的封建的帝国主义沦为殖民地，暂时失却了历史的地位。现在，中国比较容易爬入新世界，那是中国从艰苦得来的报酬，如果机会被实现了，无人再会怀疑过去很值得做的工作。战争的代价是极大的，但和中国所保留的现在的及将来的财富相比较，或和久长地被圈禁在黑暗中而人民又宁愿为奴不欲奋斗毫无希望的情形相比较，则战争的代价，又显然微小了。

假若妥协的“和平”被促成，而中国底主义底全部意义不能实现，那便成为深刻的悲剧。然而，一旦在任何中国政府下实现了经济和政治的民主主义，只有最残酷的世界事变才能打消一个伟大民族底最后的胜利。

在中国，三百年历史正被缩成了三十年，缩成为一个斗争，而要斗争的胜利，必须化合法国美国甚至俄国革命底某种事绩。时光不再行进；在政治上时光是在冲进。执政的人们不能在火烧的世界继续步行，但当他们仍能安然登岸时，必须跃奔。中国摈弃民主的动员愈长久，则日本愈近于胜利——因为日本或仍可获胜。

日本的命运

战争现在进行，……当为是保全日本国家生存的企图。
——R·吉尔伯特

本书所叙述的判断错误，计算错误，和日本在中国所以易受创伤，读者谅已读及。日本军阀不能取偿这次战争的代价，而这战争对于日本人民只是拖累而已。

日本既已在“中国事变”上用去了大约十倍于日俄两年战争中所花的代价，而士兵死伤又有四五倍之多。她的内债增加了三倍。正当日本在中国东北开始努力于“文化的感化”以前，即一九三〇年以来，几已增加了百分之五百。这债款确已近乎日本全国在战前总收入的三倍。国家全部似已抵押于战争中。日本与中国沦陷区的经济关系给予日本以提早清偿巨大的侵略代价的几微希望。

低估日本所仍保留着的攻击力量，或断定日本在任何情形下不能在中国取得补偿，或认为她的战时经济不足以支持战争的再进展，那是错误的。少数专家预料日本在占领东北以后经济就要崩溃，现在他们仍能用亚当·斯密的愉快态度读他们自己用同样态度所写成的论文。返观一九三二年和三三年欧美经济学者所作关于日本在东北的希望，我觉得只有一二篇比不上纳粹德国“经济崩溃”的预言那样的无价值。

在东北，日本获得大于纳粹执政前的德国二倍的幅员，拥有极大富源，如八千万亩耕地，四亿吨铁苗，六十亿吨煤，一千五百亿立方英尺木材，而贮存黄金计值二十万万美圆。此外日本所夺得的交通机关底价值或广大的资源、工厂，和其他主要物品还不在于内。可是，现在我读完正统派经济家的分析，知道他们非常相信日本在满洲所得愈多则崩溃愈速的说法。除了一点意识（这不是经济学家的意识）以外，他们似乎决非实体论者，那意识是：侵略必不久，因日本被迫作存亡的战争——而她或当失败。

日本在东北建立了大陆根基，使能侵略中国，她在欧洲列强的绥靖外交之下，更有成功的机会。在今天，日本扩展根据地到中国内地来，以求达到征服亚洲的目的。如果她在这里失败了，那并非由经济方面的障碍，而是中国抗战底动力足以匹敌之故。

非专家而敢深入专家所迷误的范围，那是不智的。而且，无论如何，这里也没有地位容得这样难于接受的工作。但解剖日本军事法西斯帝国主义的一些特点，使我们不再低估它底对于全世界的威胁力量，似乎是重要的。

“军事法西斯帝国主义”的意义是什么呢？它和第一次欧战以后所实行的放任的帝国主义的方式有什么不同？当一个国家的出口行商和资本集团聚积了“过剩”的货物和资本，倘不竭力减低自己的利益不能在国内市场处置这些物品和资本。旧帝国主义由是发生。这般国家参加着帝国主义的战争，战争的功能，由于政府购买军火（这不但不能增进需求集团的真正收入而且促成资本独占化），产生有利益的国内市场，同时在落后的殖民地设置出口市场，使资本暂时可能榨出良好的利润。这解释，虽过份简单，亦能指出帝国主义底基本目的。当然，还有其他目的和内在的因素——社会的、政治的、地理的和观念的。

日本帝国主义也当然具有这些特性，但更适应着自己底历史的特点。在其他各国，现代帝国逐渐地自然地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底矛盾中发展起来，而武装力量乃为后者需要而产生。就日本言，过去在统治阶段方面曾有从资本集团方面来的极大程度的自觉的计划，而且十分急迫，那是由于紧抱着半封建的经济的国内市场的尖锐的紧缩，和日本在资本主义世界中的竞争势力成就得太迟的缘故。

我们知道日本现代的海陆军从半封建的统治的阀族中生长出来，当日本实行宪法时，他们只对天皇负责。真正的国家支配权操诸于军人官僚大地主和皇族之手。他们都主观地计划着使日本成为大帝国。客观地看来，只有使半封建的地主和商业资本军事化，加以帝政的帮助，作为对外征略的根基，才能开始走上这途径。

帝国计划底第一个成果，乃是一八九五年的中日战争，显示着日本开始成为资本主义国家。日本以赔款的方式向中国取

得大批“信用借款”。这些款项乃是英国银团贷给清廷的。她的统治者又获得土地上的财富，并且跨入高丽。军人和国家的阶级组织所策划的更进的自觉的计划靠着外国银行的财政帮助，使日本在一九〇五至一九〇六年击败帝俄，当时她开始成为最年青的世界霸权的竞争者。

在日俄战争中，日本花费了十倍于从前最高的预算。这些金钱是由国内举债而来，作为发展军火工厂、交通、矿务，和轻工业之用。然而颓废的土地制度却未曾改革，并且至今还保留着封建性质。日俄之战又使日本的资本从外国的领事裁判权中解放出来，使政府得有完全的关税自主和全部征税权，并使日本进入国外市场。她的信用提高了。一九一三年外国在日本和她的“新领土”所投资本增加了十倍，大部分资本由英国银行供给的，英银行家确是奠定了日本资本主义的基础。后来又藉国家底慷慨的津贴——向农民重征税收得来的——和高大关税的辅助，资本扩张了它底外国市场，并且因利用世界上的低贱的劳力，聚积了巨大的盈利，使资本本身更为膨大。

在第一次欧战中，当日本工业投资添加一百四十亿元时，后者的程序更为加速。那时日本初次成为贷款达二十亿元的债权国。重工业也适当地发达。矿务、航务、交通和电气工业显示着进展。

这些年代中，在日本底发展底背后的转动力乃是战争和帝国。这转动力在日本社会中具有压制反封建和民主势力的功能，并且具有为开拓国外市场而不断改进它自己底需要的经济功能。因为日本底扩展从未在国外被抑制，民主主义从未发生强力足以控制军人、财阀、皇族，或特别是代表地主的官僚政治。

不管国内有许多争执，而这些主要的政治力量常在危机之中合力作战，以转捩国内的民主革命。因此，当国外市场引起尖锐的矛盾和国内发生最危险的情况时，政治的社会的和经济的主动力促使日本统治的寡头政治决定趁着一九三一年在中国东北的战争，寻求出路。

一九三七年侵略中国的原因在那里？那是有许多复杂的因素。中国工业已复元，并且正在竞取自己在国内的市场，竞取日本“自己”底国外市场——这些市场也正被敌对的列强更充分地垄断着。满洲并未解决日本底独占的资本主义在国内的困难。民主主义又在议会抬起它胆小的头，阻止军费的增加。大众不息地要求“改革”。海陆空军不有重大的事变不能强迫通过他们为秘密巨大的军备程序而要求的经费。

中国东三省经济发展的性质对于日本底政策也必有决定的影响。东三省在日本底资本储蓄项内吸取了数十亿日圆，但此系投资于生产，而这些生产除充军备外，很少出口和销售于国内市场。强迫东三省占领区成为资本化，乃是奇怪反常的事情。显然的，银行资本很少汇往殖民地作为购买不动产或装备物之用。东三省发展交通实业的财产的全部——矿产和其他一切资源——已被实行没收。日本所输往的那样真实的资本大多用作开发军队所夺得的资源和维持军队所夺得的工厂，以发展军事价值的计划。

在东三省，日本攫得具有非常价值的聚积着的原料和资源，那里有低贱的劳力，只须投下管理的资本使它真实地生产。她所准备的一切资本真实地表现着国内新资产成为综合的资本化的性质。除了一件事外，发展不应不“健全”。大部分发展集中

于军队，认它为市场。发展底转动动力就是军队本身，它以东三省为军事根据地。

日本帝国主义底奇妙的形态乃是帝国金库——实际上是支配国家资本的集团——在许多资本家底事业中拥有一半股分，并在武力夺得的新资产中分得一半利益。日本底独占资本接收了其他半数利益——一部分是国家的津贴。

现在日军在大陆上取得大宗财物以后，它和私有及国家资本的关系也增加了。实际上日军支配着东三省底经济发展，它可藉此加强它自己对国内经济的发言权。它自必规划使大部分输入东三省的资本成为军事化。这些资本，无论在国外或在殖民地，大多仰托军队，认它为购买者。

日军使这市场扩展，增加自己底权力，逐渐扩大了不经济的计划，迫使日本逐渐增多负债。为欲使人民允许负担更重的捐税，以支持那对于人民毫无价值的负债，日军就需要一个“全国的非常措施”。日军必须以战争方式觅取一个出口市场，推销所有的过剩货物，以保持和增加生产。

我并不想到这个解释应使各人满意。这不过视为经济上所不可避免的侵略底主要因素中的有趣的因素而已。

这样日本在东三省似乎基本上已脱离了帝国主义底放任的型式。她成为军事上的法西斯国家，因为陆军逐渐建立了资本稳定的控制权，这权又使她规定投资的性质。这畸形现象只能使她本身继续扩展军事行动底主要企业。

当然，那只是客观的情况。在主观上，日军对华作战，推说是“使中国人民脱离共产的压迫”建立“东亚新秩序”，后来又说是“排除外国帝国主义的剥削”。为实行“神圣的使命”，又假

托大和魂中的神秘，以恢复旧时封建国家的教义。

日本终究必须在中国排除一切资本的持有人，最初为中国人，最后为外国人。

在战争之初，日军即控制着大部分担保外债的中国税收。它们从中国取得数百万元的金银，但海关报告册上却无此记载。它们逐渐获得通货底主要经济单位。完全同化货物市场，把制品换取可换黄金的中国法币。它们用这手段而聚积着的外汇的总数，贸易统计表上从未宣布。实则中国常被作为日本国内的市场。它们输入或输出大宗货物和资财，从不经由海关查核。

可能的，日军已使用了很多税收。它们底收税权力虽未深入内地，然它们已完全控制着担保外债的沦陷区内的海关、盐税，和铁路收入。中国从前在关税一项中付出百分之三十以偿外国资本，而日本则拒付海关、盐税和铁路的借款，因此她已实在没收了约共七亿五千万美元的外国投资。

日军不仅取得中国政府底大部分财产，而且没收了大小工厂，独占了分配的业务。它们又取得国家的矿藏资源和许多固定的私人投资。这些资财合计约数十万万元，比日本可能希望在多年中向华尔街和纽约城所借者为巨。除了再以投资方式花于军备和最后花在战争中外，不须再付出任何一部分。如果这些资财可能保留着，谁能说它终究可勿偿付代价呢？

同时，没收一个整个国家的最后的步骤尚待进行。就对内言，它们正用着消除中国青年商人和资本阶级底功能和财富的手段，以聚积资本；就对外言，它们必须排除外资底权利，以支配中国市场。最后日本必须接收外国在华的商业投资的资产，

以完成她底占领地底资本化。后者约共二十亿美元，并且表征一个具有极大战争价值的大陆根基地——特别是航行、矿务和实业。但日本最后必须和英美作正面冲突，也只有用这手段，才能决定保持或放弃。

问题只在于日本是否具有军事力量来尝试。因着显著的不安定的经济，立刻认定她不能尝试，那是错误的。如果我们对着平时静止的经济型式，或对着它底战前的甚至单是现在的资产，或以目前日本或中国沦陷区底大众购买力相关连的生产为基础而判断日本的经济，也许将感觉迷惑。关于日本经济的状况是这样的：自日军占据东三省以来，日本经济不时在一个体制内变动、扩大、和改造；在这体制内，军人成为主要的消费者，而人民消费只可随军用而转移。这样经济，在我们一生中，不能恢复太平的社会。它显然不可避免地依据着继续不断的扩展和战争，作为解决本身一切矛盾的方法。

大约四分之三的日本预算虽已归入海陆军，冈瑟、斯坦(他不主张对日本估计太高)说：“一半以上的日军预算费用，认为是充作对华作战的代价，大概是误解。自日军在中国达到几许自足的程度以来，其他一半日本的‘战争’费用，或许已增至三分之二，业已充作准备最后逐退亚洲的西方列强之用”。

没有人确实知道日本已储积了多少战争原料，因为自一九三七年以来，无从得见详细的输入报告。多年来，美国一国售给日本的战争原料比较日本在华所耗者为巨，并且给予日本以技术的援助和外汇，使她迅速地发展战争工业。日本购买英美底战争原料，至最近为止，超过了全英战争工业所用的原料。

日本重工业靠着外国的输入和从大陆上得来的财物而增

加。斯坦报告一九三八年增加的比率如下：机器和机械工具备百分之二十，五金工业百分之十，化学工业百分之五。同时期中在大陆上所夺得的或建设的工业尚不在内。日本工业对于空袭所能遭受的损害或较一般所假定者为小。日本的十一万二千所工厂，大多为小厂，平均每厂雇工人二十八名，而且多数工厂设在远离交通中心的乡村。此外，数千小型机器和五金厂近年已自动地或被迫地移至大陆。在大陆上，陆军已建设了很多重工业和军火工业，其所能吸收的大量的铁和其他原料，比日本现在所把持者为多。

从战争观点言，日本三岛苟非在自己的海峡中被封锁，而与满洲隔绝，则粮食可自足。她准备着的战争原料，估计足以支持对于一个大国作战二年。她底全部战争的能力仍较英国或美国为小。可是如果日本在进行战争时除了剥夺列强现在从殖民地所吸收的几种重要战争原料外，再攫取了大东亚全部资源，则她在军事经济中或可自足。日本要和英美作战，则她在耗尽她底储备以前，只有从事于攫夺殖民地的赌博。

日本侵夺满蒙，乃是在军力上一部分的大转变，她决意在亚洲从海军国变为陆军国。海军司令们或不完全承认，但多数人现在怀疑：单是一个海军国，即使能集合优势力量以打击日本的海防，也不知能否迅速克服日本。因为她已发展了大陆的根据地——根据地达到了缅甸边境，接近英殖民帝国底心脏——她更可安心对抗海上的封锁。关于这方面，她目前已在欧洲殖民帝国底东方殖民地上享受着利益，这些殖民帝国仍然靠着海权保持土地，而她们底海权又劣于日本。

日本仍有多数后备人员以备侵略亚洲东南部。她在中国底

损失重大，死伤或许达八十万人。然而因为每年有四十万体格及格的日本青年达到军役年龄，因此在华的损失不致使日本人力发生动摇。苏联的专家在战争之初估计日本能动员六百万战斗员。那是在她业已强迫征得大批中国劳力的后备以前。她底五年陆军改组和再补充程序开始于一九三六年，自后又因德国帮助而扩展，装备和效能更为增进。现下有训练的后备役约计三百万人，而常川驻防中国沦陷区或在中国前线作战者几达一百二十万人。

日本侵略计划底主要弱点，或许不是经济的也不是军事的，而在于她底政治的战术和战略。当然，在全体性战争中，这三个因素是不能分离的。但，或许我们能说，在不适当的日本政治的战略中，我们很明白地看到，显出了日本全般局势中的深刻的矛盾——在这一个要点上，日本底装甲竟薄得象一张纸。

日本在中国的政治的战略底不合时代性，从她自己底帝国主义底封建基础中生长出来，她底资源不充分，须用种种手段赶速获取资源。此外，似乎也有若干“天然的”政治的不适当，那是自然地附属于政治的无经验之中，由于军事训练底封建的方法，更加深了政治的不适当。

有些日人认为必须和绅士阶级合作，有些日人甚至对我说，他们愿意笼络农民——例如松平，他的舅父近卫公爵现已任为负责规划职团制国家的七个永久委员之一。但陆军首领们却如此短见，不分皂白地打击地主、农民、商人、银行家、学生和劳工。因此牺牲了可被利用的非完全反对日本的分子。

同样的，他们不需要在各方面反对西方列强，如果有一些融通圆到的手段，他们或已轻易地使当时睡眠中的西方列强甚

至入于更酣眠的状态。他们可借用张伯伦、哈利法克斯的绥靖外交的一切助力——受着不适当的指导的克雷吉大使曾藉此竭力寻求“谅解”的基础——全力支持他们底计划至少已能使英离美而孤立，直至他们准备着希特勒式的最后的背信。

日军在中国的行动，对于全体中国人却是有着不可思议的教育价值。她底战略不啻说明中国抗战底决心和一致。也表现着她至今尚不能在中国劈开道路以获得政治的把握。

这些弱点当然反映着日军在国内的领导趋向于复古的程度。在政治上，现在所达到的乃是七十年以前统治着日本的旧幕府的复活。在纯粹封建时期这一制度之下，幕府将军通过不同的称为“大名”的封建首领们的连环着的联盟，而统治国家。

被民主主义打破了的的各种封建的谜和迷信，现在且已成为新机构中的教育底“魂灵”基础了。因着这种原因，日军底战斗精神次第降落，而华军底战斗精神，则确已振发。即在战争之初，日军缺乏那些经过政治训练的华军底精神，而肉搏决非华军之敌。研究日军战术的外国专家觉得训练底封建特质乃是一切弱点底根源：在运动中缺少理想力，对于敌军战斗力估计误差，出战时缺少体力上的忍耐力，下级军官无机动力，攻击部队替换时浪费火力。

苏联观察家曾亲自对我指出：日军官对于他们步兵底进攻精神没有信心。他们在敌阵被轰毁以后，还是延长炮击，然后乃命令步队攻击，直至坦克车队确已占领敌阵，然后推进。有几次，日步兵和优势火力及坦克车队隔绝后，被迫攻击而大败——例如在台儿庄，最近有多次在湖南。我想任何军事观察家将承认我底叙述：日本作战胜利全凭她底庞大的技术和军备的

优势。

但日本底进展大多得力于外界的援助。新陆军幕府好比欧洲的法西斯主义。开始时，它底最坏的敌人是在国内，最好的朋友是在国外。它靠着从外国来的太多的帮助轻易地获得太多的胜利，国内的反对派因而逐渐失去了力量。这是意外的幸运。日本甚至在一九三七年举行末次选举时，结果虽无效能，而人民却用重压力量排斥了代表陆军底倾向战争的候选人——那是另一个侵略缘由。这些反军阀分子现在在那里呢？大多数应征服役于海陆军中。

百分之八的日军是从农民家庭中征募而来。开战以后，他们底生活状况渐趋恶劣，而战争尚未在日本自己底半封建的农村经济中解决任何矛盾。一百万地主门阀向百分之七十的农民收取地租，全部农产利益百分之九十归入地主，重利盘剥者，捐税，和政府。在实业界，十二家贵族支配着全国资本的百分之九十以上。日本在中国所得任何经济利益都已流入国内统治阶级之手。人们可以根据痛苦加深的证据，证明日本底民气已降落至若何程度，但不足证明帝国创造者已处于从内颠覆的急迫的危险之中。这只是进一步表明他们继续从事战争的先天的深刻的需要。我们要制止这战争，只能在后方和在战场中用优势军力并且巧妙地利用他们底政治弱点，才可成功。

但局势是变动的，虽然日本底政略至今仍无效力，虽然她控制占领区的力量确是薄弱。正如她现在所为，把军队调入欧洲列强的殖民地，局势当能变更。因为在那些殖民地中，列强底政治情况在几方面有如日本同样的落后。如果她们击败日本，则将需要一种防卫。那防卫须以政略底更高的概念为根据；而

这政略须对于日本的侵略政策给予有力的否定，且能使殖民地人民和日本大众共同负责。

上帝要毁灭谁？

社会底秩序，除了用它自己的手之外，从不会消灭，这在历史上也许是真确的。

——J·M·凯恩斯

西方底亚洲政策和我们对于世界这部分的全部观念深切地需要澈底的改变，在我们要了解这点之前，约略检讨一下过去关系中的我们底重大错误，是必要的。

东方的“问题”与西方的“问题”是不可分离地联系着的，单独解决一个问题而不及其他，那是无用的。这里的战争根源于第一次欧战的结果。那次战争未能决定帝国与民主政治的问题，或未能寻出任何方式，使帝国主义延长生命而不致有另一次巨祸。我们也许可以责备美国不加入国联，或者可以归咎《凡尔赛条约》，但基本的原因却有着深远的历史根源，并且太复杂，不能在此剖明。最重要的是帝国殖民地底全部的制度或是它对于每一脆弱的国际合作计划的基本的否定。世界现在又分裂了。那是由于各“主宰”民族为争夺臣属民族统制权而互相战争。我们将不能在世界上享受任何和平与秩序，直至被奴役的民族获得了自由。

我先要说明，我完全赞助英国人民争取自由。我认为尽力帮助防卫和革新英国底民主主义是重要的。但不列颠和民主的自治领，并非就是作为殖民帝国的不列颠。如果英国自己底民

主义得能真正保存而发展，那末欧洲和亚洲的矛盾也许可获解决。

英帝国幅员现在(或过去)是大于俄国一倍半；包含全球可居住的面积百分之二十七。和世界人口四分之一。在这五万万的人口中，连自治领在内，享受民主自治的还不到七分之一。帝国人口五分之四，约等于她的属民九分之八是亚洲人。多年以来，他们曾闹着要求自由。

我们既然拿远东做出发点，现在就让我们从《凡尔赛条约》的结果说起。这条约并未矫正了东方的殖民制度，却反而使欧洲各帝国宰制着五万万亚洲人，和地球上这部分的大块土地。正如意大利一样，帝国底重分割给予日本煽动的拓殖家，以转移大众对于国内情况不满的好机会。日本在第一次欧战中所分得的赃物，只有太平洋中一些德属的岛屿。

世界重分割结果，满足了英法(她们接管了德属非洲和亚洲底其他一百万英里)，一九二二年在华盛顿举行九国会议，签订了《九国公约》。这公约保证着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那是剩余的完整)，规定各签约国尊重门户开放原则。每一国家应有贸易、投资、和居住的均等权利。中国应继续忍受不平等权利，忍受外国领事裁判权，并仍为如孙中山先生所说，列强底次殖民地。初次打击这条约的是中国人自己。国民革命的开始以恢复中国主权，收回租界，取消不平等条约而代以平等条约为目的。正如我们所看到，这努力是无结果的。

同时，以中俄为牺牲的向大陆推进的日本帝国主义计划受挫以后，日本激起了类如德国魏玛共和国时期中的自由主义。民主势力表现着极大的力量，并且显示着完成推翻封建主义的

征象。这是一个艰苦的奋斗，而日本民主主义终于在一九三一年消灭。陆军和市民的反动者在觉醒人民的威胁下设法转移人民头脑，使倾向战争和征服作为出路，以消灭民主主义运动，有如希特勒在德国的所为。

日本在亚洲的军事法西斯主义和欧洲的法西斯及纳粹主义有这相同之点：它是反革命的，在它的势力下，那以消灭国内剥削阶级来解决它的问题的国内民主运动，被后者巧妙地镇压着，并且被遣送到国外去消灭那边的“剥削者”以寻求解决。国内的“有”的阶级，诱惑着若干“无”的阶级，使它们相信“无”的帝国主义者对抗“有”的帝国主义者的共通的目标。这样国内斗争暂时变成了帝国主义的战争。就日本说，对华战争对于日本人民在观念上自始至终被指为对付西方帝国底掠夺所必需的预先的准备。

这种诡辩，在国家政策军事化以后，对于日本多数人民，似乎是合理的理论，甚至比德、意更少神秘性。日本在过去是一个小而有势力的国家，人口七千万，平均每方哩人口密度四百七十三人，比任何列强为高。她过去又是半工业的国家，必须输入大部分原料。她底统治者过去向国外注视，见到英、法、美和苏联占有着全世界土地面积百分之六十有余，约拥世界棉产百分之八十一，铁百分之七十，煤百分之七十四，石油百分之七十六，锡和锌百分之九十二，锰百分之九十二，金百分之八十六。在这些国家内，并且还有“人口不多”，未经开发的广大区域。

在东方，日本又见到了少数欧洲“民主主义”底征象。这似乎是使白种人成为棕色人底主人的特权；在富饶的比日本本部

大三倍的东印度，数千荷兰人一直从六千万土人底劳力和资源中聚积着财富。在越南(也比日本大)亦是如此。日本又见到数千英人从俾路支斯坦到南海的所辖的广大殖民地上搜集着财富。尤其重要的，日本底统治者们注意到东方底财富已被夺去而由武力把持着——但并非可以不受一个恣肆而有力的拳头的打击。

当然，英、法、荷原可在民主的联盟范围内，用解放她们底进步的殖民地的方法来使“无”的侵略国在政治上解除武装。其他殖民土地亦“可”被放在国联的国际委任统治之下，民主权利受着保障，且能迅速地被训练成为自治和民族联邦的分子。同时，国联亦可规定各国在殖民地都有贸易投资的均等机会。这样一来，日、德、意煽动家和战争投机者便不能用“无”的国家的口号欺骗民众了。她们将同列强一样“平等”了。而世界裁军和集体安全的基础亦可奠定了。那时候各国人民也许已转移注意力于他们国内的问题上。他们鉴于不满意的消费者在他们自己国内市场的需要，或已聪明地从事于提高国内的购买力，以增加生产的财富，并且从事于发展一个经济政治的民主主义，以代替榨取殖民地财富的不切实的希望。

但是，为什么没有这么做成呢？为什么日内瓦的主人翁拒绝这样好的计划呢？小民主国中的一个无礼貌的代表有时会粗率地问到它。但你要期望某一国底资本家考虑放弃他们底奎宁、油和橡皮的独占么？或期望某一国人相信解放任何一块殖民地土地并非等于“文化文明的消灭”么？它底困难就在于这计划等于取消帝国。如果你仔细一读大殖民国家代表在日内瓦或他处所发表的演词，你就知道这确是困难的所在。解放殖民地

似乎是殖民帝国所愿做的最后的事。她们认为尚未到此时机。还有一些土地要等用比第二次世界大战不能再可怕的代价来分割它。

因此，南次郎、荒木、和本庄繁等领导下的军阀便在日本崛起，绞杀了日本的民主主义，墨索里尼制造了一种“观念”和第二罗马帝国底计划；希特勒在德国高举了卍字旗，一切小元首们又在后跟踪而起。一九三一年世界共和的火焰终于在中国东三省熄灭，而帝国圣坛上又准备着新的牺牲。

就英法说，她们底世界霸权再度的打击，大概在她们容许日本黠武主义在东三省发展时就已注定了。那次成功鼓励了墨索里尼进攻阿比西尼亚并且实际地奠定了后来纵容希特勒侵略的绥靖政策，这些大量事实基原于那次重大的错误。

我考察过满洲的战争，认为它的主要冲突与其说在于中日之间，还不如说在于那时还存在着日本民主主义与日本陆军极端派及他们底国内与党之间。假如当时用强有力的态度支持《九国公约》和《国联盟约》，则军人当已失势。我曾亲眼见到这戏剧式的表演，例如，在当时美国国务卿史汀生发出警告牒文之后，币原子爵秉承上谕，命令日军停止进攻锦州，陆军因此立刻撤退。拓展主义者显然遭了严重失败。如果那时领导国联的英法采取积极行动，局面或已改观。也许可以促成殖民地问题的国际解决。可是后来竟无其他行动。日本军人斥责史汀生为虚声恫吓者，又从打击中恢复了过来，币原内阁也就崩溃了。

一九三二年一月七日史汀生再度努力，他对中日致送牒文，声明他底“不承认”政策，宣布美国不承认在中国底国际状态中

由武力所造成的任何变动。这牒文底副本分送《九国公约》其他六签约国，希望她们赞同这声明，俾可迅速决定行动底共通基础——因为美国未加入国联，不能参加讨论。这牒文对于日军也有直接抑制的效果。然而西门爵士主持下的英外交部后来发出莫名其妙的公报，把史汀生底主张打消了，这公报认为日本已允许不违反门户开放原则，因而认为没有引起任何惊慌的理由。它好似拥护东三省的日军，并帮助军人克服在日本的反对派。

在这种外交政策之间的大空隙中，军人们找出了侵略的道路。我记得有一夜在哈尔滨与大桥(东京外交次官)共餐，大约正当史汀生从唐宁街获得缺少感应的答复之时。大桥前任哈尔滨总领事，业已参加那时势力仍然微弱的外交部底扩张领土派。他因饮酒过多，有些谈言无忌，他对我说一桩冒险旅行的很长的故事，那是在九一八以前，他带着大包钱财到黑龙江山里交给匪徒。他又用同样口气说：“日本毋须忧虑，史汀生上校不了解日本，但英国对我们更为了解，否则我们或将陷入困境。”

大桥常常充满着赤色的恐惧。第二次见到他时，他说：美国不了解日本底使命。他是一个使人惊奇的青年。在同一天，他告诉我一个有趣的回忆：他在平绥路上旅行，当时那里正在闹荒，他想挑选几个最好的中国婢女，到得绥远，所有的女子都被送往北平去了。象史汀生那样的理想家那能了解大桥那样的现实主义者呢？

但在英外部公报拒绝以后，史汀生还坚持他底主张。二月初，他向西门建议由英美向日提送共同牒文维护《九国公约》，

再由其他签约国发表宣言。据史汀生底回忆录所说，西门规避此事。史氏说：“我最后从他底态度上深信英政府对于共同提送牒文感觉犹豫”（史汀生著《远东危机》一六四页）这消息立刻传到日本；东京获得关东军幕后的充分支持，日军便迅速地占领全部满洲。

国联因循了数月，英法对日采取有效的“延宕”步骤，更为明显。许多人常认为西门替日本辩护，尤甚于替国联辩护，日本主要的辩诉人松冈当时在日内瓦恭维着西门，认为他比他自己更能阐明日本底理由。不料松冈就任外相后，却声明日、德、意要立刻分割英帝国了，那是对于西门的报答。

史汀生切实批评英法的因循态度说：“小国抱着拥护国联所力争的原则的意念，比她们底大国同伴更有生气，当然困难是不多的。……但，虽然列强如此，小国却没有畏缩的意向。至于大国方面有力的领导底重要性，她们已有着很坦白的表示，而这样领导则未曾表现。”

“领导”从未表现。国联后来采取了一种不承认主义，但为它争执数月之久。当日本几已占领全部满洲之时，李顿爵士偕同大批随从去调查已由武力解决了的“争执”。正如威尔·罗杰斯所谓“马已被窃，乃锁马厩，”已无用了。

英政府对于史汀生底回忆录从未予以任何正式答复，但近来英方显由外部核许而说明英美共同援引《九国公约》之无裨益。这些驳复更无情地暗示着史汀生是健忘病底牺牲者，它更暗示着：如果援引公约而引起制裁，甚至战争，美国也许脱逃，那是英国所感恐惧的。这是对于当时在远东的人的诡辩，因为那时日本无力对任何国挑起大战，而那时七大公约国连同

中国能于数月中共同在经济上击破日本底军事力量，更不待言——特别是日内瓦如果那时确定全部殖民问题的任何适当的解决。就任何情形而论，英国对于制裁，极少关切，它究曾向史汀生询问美国的支持这样行动与否，也毫无证据。

当然，那时中国政府自己底政策对英法底绥靖政策也有若干影响。中国底严重的错误，乃是接受英法劝告，命令张学良撤兵。在那时抵抗，虽或无效果，亦可以惊动世界，而促成中国团结。此后五年的内战或可避免，至少亦可缩短时期，而满洲命运，亦不致交给国联。

现在，我也不知道如果西门赞同援引《九国公约》，美国是否真会实行制裁；不幸英国自从忽略了答复的机会以后，一切不知。但真正使人惊奇的事情乃是史汀生这样提议之后，而英国竟会忽略任何使美国参加防卫她们的帝国利益的机会——中国现状必然构成了帝国底利益。美国在华投资不满英国所有底十分之一。实际上，如果英法失去一切自治领地和殖民地（加拿大除外）而美国投资也因之完全丧失，则对于美国，每人损失不满五美元。在东方的帝国事业中，美国只有少数经济利益。的确，一九三二年国会通过菲岛完全独立时，已承认这点。这证明美国过去的外交政策乃是一种将来不牵入于殖民地的争夺的政策。美国投资于菲岛的全部价值不料竟不及两只超级战斗舰的价格。

当然，世界上还有比投资和直接贸易更重大的事，这些将在后面讨论。但奇怪的是：当日本初次攻击英国远东的外卫时，英国竟放弃任何使美国对集体安全负责的机会。

英、法、荷三国在世界这一部分有着防卫和解放那拥有

人口五万万的帝国各民族的极大责任。人们总以为一个聪明的外交政策当已看到日本向中国扩展将使侵略者进入她们底殖民地的必然性。她们底乐观怎样解释呢？这里我不能审察那时英、法、荷外交底各种源泉，但我们却可注意那影响它底决定的二三点。

英法统治阶级中有许多人一致深信日本有合法的拓展权利，一如他们认为希特勒应有的权利，并且应该规定在“正当方向”中进展。给予日本以“生存地位”，则日本当可就范，而传统地尊重年长的殖民国家。

其次，有些最有势力的英国贵族相信：日本控制满蒙，甚至占领一部分华北，不致碍及帝国底利益。或许他们并非不知英帝国底地位与日本帝国底扩展相抵触。牺牲中国一些土地，不致严重损害他人。它当建筑一条必需的堤防，防止布尔什维克主义在北方散布，正如希特勒是制止斯大林在欧洲发展的良好工具。

第三，英国保守党统治者深信（这里没有篇幅可引证文件，但证据很多），法国统治者热忱附和：一旦日军“从它底边界上除去了布尔什维克威胁”，那它就可恢复东亚“和平、秩序、和投资安全”的统治。领土的再分割将予中国和日本以较好的投资市场。伦敦金融界和法国证券交易所断定日本没有它们的资本，不能成功，且须和它们妥协。很奇怪，这里有着若干美国政策底欧洲批评底根基，终于影响日内瓦，决定不与日本侵占满洲的行为相合作。这政策竟迫令日本极端主义者继续侵略，毫无制止的效果。但强迫着国联采取这态度的并非是美国底“不承认”，而是世界大众的意见。

政治家们的一些希望，消逝得这样缓慢，这样痛苦。许多

英国统治者直到日本最近和德、意签订了军事同盟——希特勒执政以来固有侵略底政略的一个结合——才相信她们过去的错误。我底书夹内留着日本军人领袖们在一九三一年后所发的声明、记事录、和谈话，他们在这里明白宣布他们接收全部英国利益的决心。列强也有这样文件，但显然地她们认为这些并不比希特勒底“我底奋斗”的希望和成见来得重要。

责任当然在于本国政府。或许我们会天真地想象到，例如相信可与墨索里尼底佛朗哥和好的张伯伦和他底属员们，当能在日本对华战争中见到任何引起急迫的惊慌的原因。“拉帕西奥纳里亚”喊着：“当心！你们必须援助西班牙人民！现在是我们，明天将轮到你。我们需要来福枪，飞机和大炮，以攻打法西斯党徒于你们底边界上！”但张伯伦、西门和哈利法克斯等负着帝国责任的人们深信佛朗哥会受英国黄金的诱导而归来。在中国，关于日本，是相同的。

一个焦急的议员曾辩称日本是永远损害着英国底利益。这里是张伯伦底著名的辩驳：

“这许多资本（资本）？正在这战争中被毁灭着的事实，”张伯伦显然认为并非坏事，因为他说，“我想战争过后甚至有更多资本必须投到中国去。谁将供给资本？必然的，日本不能供给资本。因此，当这荣誉的绅士似乎在默想将来日本独占中国贸易，而我们则被排斥时，我说他是在侮蔑事实。”

张伯伦错了。资本并非流往日本也非流给佛朗哥，而是流入于军备中，流往美国。

一九三七年日军侵华后，顾维钧博士屡次在日内瓦吁请有效的援助。他在一九三九年五月二十二的最后的申诉中说：“如

果中国屈服，则欧洲现下的紧张情势的结果和列强在远东的权益的遭遇毋须用智慧的头脑去想象了。”顾博士要求并不为多：对华经济援助，制止战争原料输入，救济难民，和履行国联盟约。但这显然需要比英国当时所能使用的更多智慧的头脑。英外相哈利法克斯在答复中重行表示深切的同情，末后作慷慨的保证：“英政府定将继续留意于中国人民底需要。”这样，英国忽略了发动国联集体援助她底远东防卫的最后机会。法国代表庞纳在决议中竭力赞助哈氏底主张。

同日在日内瓦，“英法否决了扩展反侵略阵线至远东的中国提案。苏联、新西兰、和玻利维亚代表则赞助顾氏底请求，然而英法外长数度反对这请求。他们底反对实际打消了这计划。迈斯基说这信念正遍及全世界，坚定抵抗侵略，乃是防止大战的战争。他又说这原则可完全应用于中国。”（一九三九年五月二十二日合众电）

历史遭逢着怎样意想不到的结果，回顾这一幕情景，那时仍然在“注定了命运的世界”寻求安全的俄国当帝国使者之前辩护着资本主义的案件，而这些使者拒绝了和平救世的最后的方法，或许在这日内瓦的最后的胜利中，他们知道，已替自己赢得了文化底败绩。

然而，在这时，当英国在日内瓦拒绝一个广泛的裁制欧亚两处的侵略的集体安全计划时，张伯伦派遣斯特朗至莫斯科对于另一协定进行“谈话”。我们不知道关于这协定的详情，也许将来的白皮书会宣布出来。

我在报纸和可利用的外交情报中密切注意那迁延数星期的莫斯科谈话的进行。俄人继续要求一个展延至远东与中国合作

为根基的两大陆公约。还有关于波罗的海和战争时向波兰进兵的权利等要求。甚至在这些谈话开始之前，苏俄或已有所决定。或许在张伯伦拒绝了李维诺夫底建议，和哈利法克斯否决了迈斯基在日内瓦的提议之后，已无任何订约的机会。我们不知道。但我依据可靠的谈话经过的根据，英国决不展延公约至远东。

六月十九日，我读了两条伦敦电讯，这些电讯底反语似乎证实了这要点。所有这些要点，难逃莫斯科底慧眼。哈利法克斯曾请日使重光葵至外交部着重说明非难的理由，因为英政府已收到天津英侨妇女受辱和其他全不需要的对于英侨脱衣搜查等不快消息。尚有一项录自《粮食业周报》的电讯。据称英国粮食购买部业与日人订定购买罐头萨门鱼六万八千箱的交易，付给日人三千万日圆的外汇，而由日人向英购回战争原料。路透电末称：报纸质问“为何不把这款用于遭受困难打击的英国渔业，而交给历史上最大的商业骗子。”

可能发生的事情

若非自己错误，我们不怕共产党。

——罗斯福夫人

日本如果攻英，而美国在亚洲援英的话，那末只有从早把日本海军完全毁灭于大规模的海战中，才能使战争迅速结束，如果如此，则在南方大陆上仍然缺少着相当根据地的日陆军，或遭侧击，或被切断主要根据地的连系，或被大陆上的中国陆军藉协约军援助而逐回。

日本冒着大规模海战而自杀，似乎是不会的，因为即使她

在大规模海战中胜利，也不能完全决定战局。她仍当在南亚洲作陆地战，并抵抗美国底侧击——且须准备应付北方苏联底压迫。更可能的，如若第一次大规模袭击，日本不能占取新加坡和爪哇，她底主要舰队当羁留于自己领水内，而在数月中海战将限于相互封锁，小规模袭击和轰炸。她或可夺取婆罗洲底油田——如果行动迅捷——再占菲岛底一部。但她除了在东南亚洲，由陆地攻马来和缅甸外，无法觅取决定点。

中缅边界具有战略的极大重要性。如若日本占领上缅甸，切断英印与中国的联系，且可到达缅甸油田，那末，印度将直接遭遇危险。现下比较弱小的印军似为雇佣性质，或嫌力量不足，而它底骨干英军六万人因欧洲在继续战争中，不能使它大量增援。欧洲轴心公约底作用在于迫使英国分散军力。

英国或当强令印度征兵和实行全部战争动员。因在殖民地缺少重工业和军火工业，印度酋长不易维持那些配备现代兵器的民军。英方未得酋长合作，很难实行征兵和动员。酋长们现正反对英国底统治者，情形日趋严重。若使英国失去印度人民（和中国人民）底政治援助，局势更为可虑。

除了在荷印和其他外国殖民引诱当地的机会主义者外，日本又用“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引起泰国的共鸣。泰国介于马来、缅甸、越南之间，在日本所计划的攻击中，占着重要的战略地位。她好象佛朗哥底西班牙。

在十九世纪中，暹罗帝国曾在欧洲强国手中，遭受很大痛苦，英国截取掸（或称泰）部和缅甸部分（一八九五年中国割让缅甸）而法人夺得暹罗底柬埔寨和交趾支那。暹罗余剩部分仍比日本本部为大，嗣在英法竞争帝国利益的均势之下，幸免完

全瓜分。英法亦宁愿保存这小国，作为两国间的缓冲地带。

暹罗王国在民族主义兴起和日本密切联系之中，采用“泰国”的正式名称，不无政治的意义。在历史上泰族是亚洲的大民族，除居住暹罗外，还散居于越南、缅甸、掸部，和中国西南部。于此可见现在泰族底恢复领土主义和准备与日合作对抗欧洲殖民国家的根据。中国交通部长张嘉璈最近给我看一地图，那是他在访问曼谷时获得的。在“恢复泰帝国”的范围内包含全部被割去的土地。日本允许助泰恢复这些土地，作为泰国助日的代价。

英国在印度的政治弱点很是显明，否则毋须仰赖美国援助她在亚洲的地位。印度约有人口四万万，而战争的潜藏力量比中日两国的总和更为丰富。假如她没有美国底帮助，不能防卫印度和新加坡及缅甸底边界，这就是一个意味深长的说明。荷人在东印度亦然。荷人到达东印度，早在日本明治维新之前，如果东印度人在他们统治下有长足的进步，他们尽足以自卫，况且那里所有资源远较日本为丰富。

回忆英帝国在印度开始时，原为东印度公司支配下的纯粹商业的投机。该公司利用腐败的封建时代，逐渐取得政权，英王加以干涉，遂建立了英国底政权（英属婆罗洲实际上至今仍由一公司管理，股东从地产物产中收取“红利”）。印度帝国在现代世界中，更成为时代的倒退者，这或许是近年英国政治生活衰微的主要原因。本书并非研究印度情况，不过藉此指出英国在亚洲的脆弱的性质。

美人或不觉得英属印度是比美国更老的一个时代的国家。受英统治已历一百八十年，而百分之九十三的印人仍是文盲。

美国统治菲律宾四十年，文盲从百分之九十八减至百分之四十五(任何殖民地中最好的纪录)，而苏维埃联邦二十年的治绩，使人民中的文盲从百分之七十八减至百分之八。在苏联一年(一九三七年)中毕业于工业农业学校者计四万五千九百人。在印度人口比苏联多二倍，而工程师毕业者仅九百六十人。

印度未能发展重工业，又未利用丰富的资源以发展现代工业国家基础，在这情况中，可以概见不合理的状态。她有很多煤储量，但出产仅及苏联产量六分之一，甚至比中国为少。她底铁储量虽占全世界第三位(仅比美国为少)，然钢产在十年中仅增至八十七万九千吨(一九三五年统计)。在同时期，苏联钢产从一百五十万吨增至一千六百万吨。日本幅员仅达印度七分之一，铁矿又少，而产钢比印度多七倍。印度水力资源仅次于美国然她只利用百分之三，而美国则已发展至百分之四十。苏联在二十年中电力生产自十万万九千万千瓦时增至三百六十五万万小时(一九三七年统计)，而印度则仅二十五万万小时。

印度不仅和中国一般有着尖锐的地主农民的土地的危机，更有五百六十三个封建王公辅助执政者把双重负担加诸于平民。王公封地占全国一百八十万方英里土地的三分之一，形成东方的荒地，“永远腐烂”的区域。王公们完全是寄生动物，对于社会毫无贡献，只能压迫人民，勒索巨额金钱，供作私人奢侈和娱乐的享受(见一九四〇年六月八日柯里尔(Collier's)杂志吉姆·马歇尔所著之文)。

英王从国会取得补助金，其数约为属民所纳税款一千六百分之一。若干印度王公竟耗用税款底半数，最少者如特拉凡哥尔的王妃须得十七分之一。卑根赫的王公乃是一个丰度翩翩的

君王，他底家庭每年所需的预算计二十二万四千卢比，比他对于全体属民所花的教育经费为巨。王族、王家婚礼、王宫和随从的用费须占卑根赫全部预算的三分之二。最富的王公、英国官吏、和商人拥有多数财富和掠夺物，而印度人民只是贫穷和堕落。两相对照，可以测知一百八十年的英国统治的不合理。

因为王公们虽享受华贵生活，显耀权能，沉溺于好莱坞的声色，然他们却客观地阻碍着印度底政治的统一。这就是说明为什么还把他们留置于以分治原则为基础的统治的机构中。

日本底行动在多方面似乎踏着最先一百年的东印度公司底覆辙。该公司把无数财物供给英国，后来英国在世界上获得工业的霸权。这比较的是最近的，自从榨取殖民地的支配权由工业家之手转入了资本家之手，而后者需要本土的小市民阶级。现在印度民族运动从这里发展出来，迄至今日，已抓住了英属印度底大部民众。

最近虽设立了准代表的印度会议，以及经由印度国民大会控制着当选的代表，而总督却忽略了印度底民意，在欧战爆发时即武断地宣布印度为交战国。国民大会初时反对这举动，后来允许全力援助英国底战争，如果英政府诚意实现“为民主主义而战”的口号，允许印度在战后享受独立和民主主义的话。英政府对这表示拒绝。国民大会现已撤回这建议，而印度会议业已解散，总督有着充分的独裁权力。数千印度政治领袖被捕入狱。假如她和日本作战，她不能和印度人民作战，她也许被迫寻求和解办法。

决定印度和其他英殖民地底命运，当然不是美国底事。但我们也该瞭解英国政治情势底困难。因为如果我们和英殖民帝

国共命运，这或许不可避免地成为我们底事。

我似乎认为有些问题美国人民现在应该密切注意。如果我们作战，我们务求胜利，而且须在前进的主义中求得胜利。这主义第一须由我们自己底人民认为满意，其次世界各民族须认为满意。美国在世界上是最有力量的国家。我们如果团结一致，合力进攻，可能击败世界上的军队，驱它们入海，保持我们底自由。我们底最后的防线不在英国或中国，而在于自己底灵魂中，在自己底土地上。除了为着自己底条件之外，我们毋须在海外作战。

那些条件应该是怎样的呢？假如我们遭遇着战争，我们是否支持帝国底非民主的概念或领导人们建立较真确的民主主义？

帝国战争底幕后，在两方面，在每一处，有着倾向于社会革命的复杂的世界运动。这次奋斗底最深刻的意义，乃是人们需要社会的和经济的进步，其结果凭着最能表现这些需要的政略，或在各处胜利，或在各处失败。历史是有动力的，它的不再容许静止的实物妨碍它底运动。

讲到放任的旧式帝国主义，很明显的，它的迅速地毁灭自己。它或可在各处获得一二次胜利，但它正为自己作清算，新的主义必将起来代替它。法西斯主义者用着帝国主义的全能的奴役的新方式企图代替旧的帝国主义。民主主义如能生存，必须表现更有力的否定法西斯主义的力量。

英国与自治领地——假如她们愿意保持团结，作为政治的力量——必须宣布殖民地解放的程序，作为民主主义的世界共和国底基础。这样一个宣言或当包含以下各点：（一）承认印度緬

甸战后独立，立刻开始强迫教育和自治，并与现政府合作，实行全部动员，进行反法西斯战争；(二)立刻开始包含一切的强迫教育的程序，俾可迅速在落后的殖民地推行自治；这程序作为战争动员的一部分。至独立时为止；(三)承认被法西斯帝国所占领的以及为求解放而奋斗的国家和一切殖民地底独立；(四)允许以财政、技术、工业、医药和其他社会的援助给予殖民地国家，以及实行以国家并行的合作经济为基础的殖民地工业化的程序；(五)立刻谈判条件，使先进的殖民地获得自由，并许她们加入世界民主国联盟。联盟底基础如下：关税同盟，共同防卫协定，国际纠纷的强迫公断，国际海陆空军的共同设置，民主方式政治的采行，或许可能的共通货币的采行，以及在集体安全机构范围内的国际裁军。宣言中或附带邀请各自由民主国加入联盟以对抗法西斯主义，并贡献智力、财力、以改造世界。

这是幻想么？这或许是唯一可能的方法，使修正了的资本主义延长生命，和保存英帝国，使成为世界民主主义的动员的中心点。据说解放印度即是打消英国底“统一”。在事实上或许只有实行解放。民主的英国底最有力的同盟者为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假如没有加拿大以南的旧殖民地（指美国）底援助，她或许不能生存。自由的印度对英国能成为有价值的资产好似自由的美国一般。以事实言，印度在全部帝国主义机构中能作最后的定局，一旦解放了，则其余英殖民地问题当易于解决。印度人口占英帝国海外人口五分之四，几占英殖民地人口十分之九。英国在殖民地投资印度占三分之二，约四万万三千八百万镑（见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伦敦《经济杂志》，但一九四〇年帕姆·杜特(R. P. Dutt)所著《今日的印度》），但在另一方

面，这数目只是英国国外投资总额的百分之十二。

殖民帝国对全体英国人民无大价值。英国投资者每年可从这里取得进益三千八百万镑，这数目只占海外投资总收益的五分之一，占英全国总收入的百分之一弱。印度对于英国贸易的重要性也估计太高。英国生产的十分之九售于国内，印度仅购得百分之二。职业呢？全帝国殖民地合计约雇英国人口的百分之二·五。

这样，假若英国完全失去了印度则在她底全国投资收入中每人约只损失四镑，而在全部市场中，约减少了百分之二。也只有英国专利的资本家的一小部分感受这损失。这些和现在及将来的战费相较，为数极微。但主张英国放弃印度底经济的联系也是无理由的。相反的，印度底改造，应该需要比从前更多的帮助(新方式的帮助)，若非英国重犯一七七六年的错误，英印合作或当实现。

美人在英殖民帝国并无任何重要的利害关系。英国对印实施全能的帝国主义——现在对于印度除推行民主主义外，也许祇有这方法。如若我们在“为解放中国而作战”的姿态中支援英国，印度可能防守的么？就美国投资资本而观，主要的困难原因似乎是这样的：世界半数人口生活于落后而未发展的殖民地中，这些殖民地处于放任的帝国主义之下，未能利用它们底资源，未能发展成为现代国家，也未能扩展世界市场。解放这般国家，如中国、印度、荷印、和非洲的大部分等，为振兴外国市场所必要。战争之后，大部分资本将在美国，若非在战时完全消耗于军备，则美国必须在她所能合作的国家中，找寻资本的市场。

尚有一事。“政治借款”底旧意义和帝国主义的借款底旧方式，都在弥留状态中。将来输出资本或许不能再给与政府范围内的私人、社团或买办集体，俾免助长法西斯主义，如果民主主义占优势，我们底借款必须直接给与在那些国家内的民主的团体。例如中国的工业合作社，它们从事于发展自己底国内市场，增强民主主义底基础，而不是利用低贱劳力和原料在国内外牟利。这似乎是使民主主义在国内外属于安定的唯一性质的借款，它包含着这些意义，如：推行密切的国际合作，和支配资本，以策划合作事业和集体生产在民主国间的发展。

我并不想像我粗略地所指出的程序——马克思主义者将立刻加以讥笑，认为这只是用美国独占的资本，并吞英帝国主义的方法，——可对资本主义“解决矛盾”。但这似乎是可能实行的方法，使能演变为新经济，并恢复人们底希望，使他们知道除了用全体性的长期的帝国主义战争以外，尚有一个真正的解决方法。

假如现在在东方宣布这样的解放，则它或许使法西斯运动完全失势，或竟使它在无希望的战争中自杀。切勿认为政治的边界真能在战争中被封闭着，而人们底头脑不会向各处取得武器，用来击败他们底压迫者。

有动力的政略是最需要的。无线电能适应人们底需要，就能具有生命。这次战争，一半是意识的战争，谁在意识上解除了武装，谁就被击败。

如果美国对日作战，美国应派飞机至日本散发大批包含解放宣言的传单和中国遭受轰炸的照片，单上并注明美机为何用传单以代炸弹的理由。经验告诉我们轰炸市民，只有增加敌人

底士气。我们无须攻击军事目标以外的任何人物。

有动力的民主主义用这般战略可能侧击欧亚两洲的敌人。民主国家穿着这般精神的盔甲，不须恐惧任何意识。民主国家脱去了伪君子的态度，在这不受任何方面攻击的时期，当已抓着制先机，以新的诺言和希望，鼓励着人们底意志。她们不仅要取得战争的胜利，而且要获致和平。这样一个程序，在政治上既能打消法西斯国家底势力，又能多半博得苏联底赞助。苏联被合作的世界围绕着，或能安心履行民主主义的诺言，特别是，如果这世界给予她们以友谊的援助，以代替无数教皇底通谕以及鼓励十字军攻击异教徒的说教。就任何情形而论，苏联不会严重地威胁有动力的民主国家。

但对于根据着资本主义以恢复世界政治领导任务的民主国家这些需要可有机会实现么？似乎是未必实现的。历史至今证明着资本主义不能实行聪明的合作，或不能在任何既进步又安全的共同国际计画中，策划或预防着变化。在这一点，东方战争所给予我们的乐观的理由，比欧战为少。

可是现在我们可能看到呈现在亚洲阵线上的某种趋向于重大意义的改革的趋势。我们或许已能提出下列试行的结论：

第一、我们所知道的放任的帝国主义的帝国正作着决死的战斗。她由于内在的矛盾，国内正在崩离，海外受着外来的全能的帝国主义和内在的殖民地革命双重打击。为在殖民地抵抗法西斯帝国主义者，则旧政制或采用敌人的许多方法，而自己开始仿效全能的帝国主义，或者必须感觉它自己底习俗的含义，而实行民主动员的程序，俾可发展属民底全部战争的势力。

第二、军事帝国主义在历史上是一个经济和政治的怪物，

我想命运决定着必早消逝。苏联在北方之谜，亚洲的殖民地解放运动的不能压抑的势力，反封建势力，以及在它自己底腐败机构内多变化而仍有势力的西方帝国主义——这三点可以决定日本军事帝国主义底命运。它对抗这些敌人中的每个人，或可得一时的胜利，或逐一与之妥协，暂图苟安。但因它底阵线太广大了——战线底地理的延长，以及它底政敌底潜势力——未能获得最后的胜利。

第三、殖民地底革命由于在帝国主义战争时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动员所促成，或在亚洲数国迅速地引起土地的社会主义前期的革命。多年战争，或当进行。苟非这改革的需要由若干新而聪明的世界新计划缓和着，则新旧帝国主义，国民革命运动，和土地的社会主义前期的革命之间的妥协只是临时的性质。

据我们所知，放任的帝国主义底命运反映着资本主义底命运。为全体性战争而动员大众的需要将在各地迫使先进的国家担负起管理生产消费和分配的责任。我们对于这些鸡蛋，似不会放弃不争。从美国底蛋糕中或生出若干种法西斯主义和参加将来世界重分划的准备，或有些类如美工程师德雷赫（Carl Dreher）（一九四〇年十月所写《希特勒因何胜利》）所说的“民主集体主义”。如果在旧民主国家的人民奋斗保持他们底必要权利——尤其是投票权和民众支配权——又如假若他们愿意担负合作的民主主义或“民主集体主义”的责任和牺牲，则不须有干涉的独裁制度，即可获得过渡。在那情形下暴动和社会革命底破坏或可减除，而经济政治的合作或可在各地合理地从早实行。

我似乎认为我们现在要看清的要事是：国家间战争底耗费

只是战前和平底耗费的悲剧化。把几千吨粮食倾入海中；或付出代价，令农民烧毁他们底收获；或供养飞行员，令他们用轰炸机完成相当任务，那有什么主要的分别？阿诺德说：“和平的社会具有和战争一般的残酷”。

把战争原料售给那以扫射平民为戏的人们，或把生产机器售给那以剥削所得供养尊贵的儿女底生命的人们，何者比较更残酷？现在花费一百万万美元的剩余劳动价值于军备上，或不花费其他百万万美元而使从事于有用的生产和消费的一千二百万人们失业，何者较为浪费？伦敦东端的贫民窟，或毁灭这化外的贫民窟的轰炸机，或贷款给纳粹党使它制造轰炸机的伦敦城，三者中何者是最恶劣？

全体性战争是可怕的、浪费的、和原始的，但客观的真理是这样的：我们要惊醒我们来争取那必需的需要——发展现在属于人类的创造力和工艺知识的较好方法——除了战争外，我们显然没有其他办法可以供献给历史。假如我们了解这点，则多方面的斗争的目的不必是“文化底终止”，而是使文化建设至较高的程度。因此，和平底恢复似乎需要在先进国家中从早接受社会底有机的观念，依据世界尺度的经济政治计划，应付野蛮（不合时宜的经济制度已死灰复燃）的紧急方策，以及能替人类打开那依据科学和真理的文化底无限的可能性的那个更广大更负责的民主主义。

第十篇 中国抗战的前景

(附文)

革命和反动

—

“中国终于走上正路了！”一九二八年我第一次来远东时在轮船上遇见的一个年轻中国学生这样感叹道。

他要我相信，“军阀统治已经结束了”。军阀是什么，我那时概念还很模糊，不过我乐于相信，推翻军阀对中国是有益的。他还说：“内战终止了。事业成功了。在国民党领导下实现了统一，建设时期开始了。现在要兴建公路、铁路、矿山、学校和现代化城市了。再过五年，中国将是东方最先进的国家！”

我答道：“好极了！我来得正是时候。”

我的朋友表示同意。他已经在新政府里谋得一个

职位。

那是在一九二八年。最近(一九三三年)我看到这个青年在上海一家外国银行里当小职员。他曾在南京的一个部里任秘书。我对他背弃事业这一点表示惊奇。

他回答我的问题说：“三个月没发薪水了。即使他们让我当部长，我在南京也呆不下去呀。”

我没有提醒这位朋友回忆他的预言，不过我心里我估算了这几年中国的收获。公路是修了几条，主要是为了军用。矿山开了一两个，在南京给孙中山新修了一座堂皇的陵墓。

但是开门的学校比以前少了，而且教员常常白教书，领不到薪金。新修的铁路不到一百英里；计划原来是十万英里。还在通车的铁路，路基已经坏得不象话。建设仍旧是王正廷博士在上海美国大学俱乐部年度宴会上的演讲题目，但是在国民党领导下，计划实现的前景比一九二八年似乎更渺茫了。

虽然发行了价值约十亿元的公债，政府仍旧缺少资金来发放官员们的薪水。发公债的收入已经用于南京政府时期特有的六七个大规模的内战。一九二七年列为“士兵”的人数约一百万，而这些人据说是解散的；十亿元政府公债的一部分据说是用来使这些人复员和援助建设的。现在军队已经超过两百五十万人，其中约六分之一在不同程度上忠于南京，此外约有十万土匪，这些是在军阀压迫下丧失土地的农民落草而成的。

毛病出在什么地方？孙中山的理想和国民党的计划跑到哪里去了？

二

孙中山在去世前不久，同苏俄政府的使者越飞达成协议，规定俄国人将给国民党财政、外交和军事方面的支援。孙中山的整个政治生涯，象孙夫人有一次对我说的，是“一个不断向左转的过程”，他经历过近四十年的革命活动，看出俄国和中国在远东的利益是一致的。他也认识到，国民党可以在俄国共产党获得胜利的同样基础上，赢得广大群众的积极支持。

孙中山在一九二五年逝世后，他的信徒们继续在这个新的联盟下进行工作。苏俄的武器、弹药、金钱和宣传品通过国民党在广州的总部，源源不断地输入。苏俄的政治顾问和军事顾问也来了。他们给国民党带来了它从来没有过的有效率的制度和协调的行动计划，这些填补了清除清帝国制度废墟后留下来的真空。他们按照共产党的样式改组了国民党，并且使国民党接受马克思主义以适应于三民主义。一个时期，在中国孙逸仙主义和共产主义几乎变成了同义词。

以加仑将军(今天苏俄远东军司令)为首的俄国人重建了孙中山的军队。他们把雇佣军转变成了革命者，因为军队吸收了很多关于共产主义的知识，还接受了第一流的训练和俄国红军的纪律。新的中国军官成了国民党里有影响的党员。他们中的许多人同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后者这时迅速从一个纯粹知识分子的组织变成一股处在国民党内外的政治力量。按照孙文越飞协议，国共要合作去推翻军阀主义和建立人民的社会主义国家。

其结果已是人所共知的。广州国民政府以一种中国前所未有的新的集体精神，在俄国人辅导下迅速取得了成功。变得年轻的国民党唤起了“广大民众”的觉醒，而这些民众是孙中山早想接近和协助，但却没有能用他自己的热情加以唤醒的。

俄国人和继承孙中山的人们所挑选的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统率下的国民党军队似乎是无敌的。他们征服和统一了中国长江以南的全境。成千的中国人志愿参军，这在历史上是第一次。北洋军阀似乎在数量上就被压垮了。他们的乌合之众在勇敢的南方人面前不打就逃跑了。老百姓到处开始关心政治；北伐进军被认为是对军阀专制的造反而受到欢迎。这一回，中国的农民、工人和千百万劳动群众看到了奋斗的目标，于是加入了斗争。

新的国家应该是属于人民的。政府应该是民有、民治、民享的。高利贷和地主压迫应予废除；应该在国家管制下开发资源和发展工业；鸦片生产应予取缔；实行义务教育制；裁减军队；组织农工，让他们派代表参加政治；资本由国家加以节制；严惩贪污腐化、贿赂和任人唯亲；旧宗族制度和封建军阀制度的陋习应予废止；外国特权和租界制度应予结束。

一九二七年，革命到了汉口就被阻止了。曾经统率革命军队的蒋介石将军背叛了，随后成了反革命势力的首领。他领导国民党极右派，发动了“清洗”党内共产党势力的运动。他反对在汉口国民政府里占支配地位的左翼领导人，后者要同共产党人合作，但是也限制他们，不让他们控制党务。

最后蒋介石胜利了。他从浙江调来一些忠于自己的军队，并得到杜月笙的青红帮的大力帮助，控制了上海，对年轻的共

产党人和工人进行了屠杀。他同哈佛大学毕业的宋子文的妹妹，有钱的基督教徒宋美龄结了婚。宋子文成了他的财政部长。通过保证同共产党和激进主义作斗争，他诱使上海的银行家们借给他三千万美元。用这笔钱，他在南京建立了一个经过清洗的国民党和一个国民政府。

这时蒋收买了华北的头号军阀，于是汉口政府垮台了。国民党同莫斯科的联合关系被切断，派驻国民党的首席政治顾问，杰出的迈克尔·鲍罗廷被押送出境。左翼领袖，包括孙夫人宋庆龄、汪精卫和陈友仁，离开了中国。但是有几支彻底共产主义的部队逃去江西，在那里成立了临时政府，打算实现革命的激进目的。

一九二九年，蒋介石的军事力量达到了顶峰。南京政府名义上已经统一全国，它还得到了列强的承认，它们对局势出其不意地向右转感到高兴。蒋介石的亲信在南京把他选做国民党的总裁，任他为军事委员会主席和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他成了中国“陆海军”的名义上的总司令。

起初外国报纸大捧蒋介石，称他为中国的“铁腕人物”，当时不少欧洲人认为中国需要一个墨索里尼。有人叫做“蒋的凯撒式的发迹”，就是这样开始的。

三

在这里听听一个美国名教授对南京政府的看法，是很有意思的。他认为，南京有这么多哈佛大学毕业生的，美国人应该为此而感到自豪。他觉得南京的成败事关哈佛的名誉。蒋介石将

军没有去哈佛读书，这大概是中国的不幸，因为从一九二八年以来，国民党和南京国民政府的历史基本上就是蒋介石的活动的历史。

矮矮瘦瘦、个子结实的蒋介石已经四十五岁，比我第一次在他初露头角时看到他时老得多了。在他统治时期，内战表现为接连不断的战事，他已经变得疲惫、神经紧张和喜怒无常了。他的敌人说他“虚荣、刚愎自用、对于即使微不足道的夺权对手都十分嫉恨。”但是他有很大的匹夫之勇和不倦的精神，这在某种程度上令人钦佩。他主要是靠自己的超人的精力，从十年前一个无名的证券经纪人的地位，爬到今天成为四亿人口国家的命运的主宰。这一场试验，对中国并不是幸事。

在蒋介石的军事控制之下，国民党不可避免地把过去靠孙中山的大体上社会主义的原则而赢得的群众的支持丧失殆尽。各级政权又回到了军界一些不怎么聪明的人手中，这些人读书很少，社会观点落后，崇拜钱财和权力，其中有些人在智力上属于低能，在政治上专玩权术。由于群众团体遭到破坏，这些军阀分子就更加无所顾忌；凡是反动派掌握实权的地方，就实行了“白色”恐怖。在大多数地区，连“有共产主义思想”也成了大罪。成千上万具有比较民主和进步思想的人遭受监禁或枪杀；这些处决完全可以称之为大规模屠杀。名义上这些打击是针对“共产党威胁”的，但是在“清洗”的浪潮中，现代自由主义思想也成了攻击的对象。孙中山的神圣教诲被严重玷污了。

以前有过一段顺利的和独立的发展的中国工会运动，遭到南京政府的血腥镇压。曾为争取政治觉醒和反对军阀和地主残酷剥削而进行斗争的农会，也被破坏了。农民和工人领袖们到

处被杀害。公民的基本权利被削减。所剩无几的法院又沦于地方军阀势力的控制之下。胡适博士和其他知识分子受到暴力的威胁，他们关于实施宪政的要求被压制。将军们假惺惺地继续崇拜孙中山，但他们把一切异己的政治哲学统统斥之为邪说，并且杀害信这些邪说的人。新军阀热衷于清除“布尔什维主义污染”，把上述迫切需要的社会和经济改善措施全都镇压掉了。

国民党同共产党的决裂恐怕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这种决裂本应该不惜代价地争取予以推迟，以便原来的革命任务得以完成。可是国民党在蒋介石的操纵下，把以前北伐的成果全都取消了，并且让地方军阀主义和外国帝国主义依然盘踞在中国。这个过程对于国民党本身也是致命的。国民党从来就是组织松懈和分派系的，现在又开除了左派和共产党人，已经丧失了革命干劲，陷于瓦解。党的纲领被扼杀了；党成了蒋介石小集团的工具。这样，国民党就丧失了精神活力和对人民的吸引力，而过去人民的拥护曾使它变得伟大。正象国民党最能干的历史学家汤良礼所说，党已经成为“没有生命、没有灵魂、没有精神的躯壳，一个军事独裁者的私人办公室”。

新军阀到处抓到权力后所采取的镇压手段，可悲地阻碍了自然的政治发展和社会改革。他们恢复封建地主和资产阶级对政府和经济的全面控制的劣迹，使国民党丧失了全国工农、学者、知识分子和爱国青年的信任。后者中间的比较激进的革命者，包括许多没有受过教育而生活日益困苦的农民，都跑到华中国共产党人一块儿去了。

蒋介石一变成了新军阀，国民党内就开始了一连串派系斗争，引起了内战，国家被地方统治者之间的角逐搞得四分五裂。

这种斗争连年频仍。在这方面以及在南京讨伐华中农民军队的战争中，花去了上十亿美元。蒋介石同冯、阎、石、韩、张、刘等将军之间的频繁内战，回顾起来就是让老百姓付出浩瀚的代价。这些是个人之间的冲突，将军之间的战争，他们之间的分歧同农民问题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其间实际并没有原则分歧，可是宣言发得满天飞，每一方谴责另一方，呼吁人民给予支持，但什么支持也得不到。

结果是生命和财产遭到巨大的无谓牺牲。正象美国记者哈莱特·艾彭德所说，“中国在苦刑架上”。社会和经济状况一片混乱，农村人民受军阀蹂躏越来越活不下去，国家债务之重使减税成为不可想象，南京政府的内政和外交都已抵押给帝国主义，它还只能勉强控制离首都最近的四个省份。

中华民国国父的未亡人孙夫人说：“南京国民党政府已经失败，因为它背弃了对人民的诺言。在新军阀主义统治下，捐税变成了掠夺，学校减少了，文盲竟比以前增多，教育荒废到了极点。国家建设还没有开始。农民被军阀剥夺了土地，还从中拉走一百万去当新兵，成了国家的负担。一百多万童工和丫环的主人们继续享受政治的保护。

“如果孙先生今天还活着，他会宣布同这个国民党脱离关系，不愿让这个封建军阀政权玷污国民党的名字……南京政权应遭全国的谴责，它根本不保证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集会自由。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农民、工人和其他劳动者没有结社的权利。司法机关受政客和军阀操纵，成了滑稽戏。六年已经过去了，连一个保障人民权利的简单法案也没有通过。”

在中国向现代化国家发展的历史上，南京政府这段时期将

被算作仅仅是军阀统治的一个阶段。蒋介石大概是主持一个被列强承认的政府的最能干的军事首领了。如果他早些出现在政治舞台上，他可能会搞一个强有力的政治组织来巩固自己的权力。但是他破坏了国民党原有的精神，从而折断了自己赖以取胜的宝剑。他发现各地的军阀势力已经太巩固了；他自己缺乏民众的支持，只好同其他军阀妥协，这使他的控制削弱，成了泡影。他不得不把职权分给一些无能之辈，例如，就有华北的张学良、华南贪钱并玩弄权术的几个军阀、湖南名誉扫地的何键，还有四川的二刘，他们在华西的暴虐统治事实上就是有组织的抢劫、掠夺、屠杀和历史上罕见的不开明行为。这些人做了南京政府的官，这个政府的所谓“革命性”就成了嘲弄，全国人民无不为之而苦笑。

这样，南京政权已经堕落到比以前那些督军政府好不了多少的地位。由于掌权的人都有亲戚关系，它被称作“宋家王朝”；中国人还有一个叫法：“清一色”，皇家的纯血统。当然，国民党里也有诚实的和有见识的人，但是他们只能起空谈的作用；他们对制定政策没有实权。

无论北方和南方的农村，都由有势力的高利贷者和地主(包括许多官员)控制着；他们也通过鸦片买卖赚钱，这种买卖在半官方的经营之下扩大到极大的规模。资本、企业和土地越来越集中到官员、军阀和银行家的手里；敲诈、贿赂、贪污和裙带之风盛行。剥削占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农民和小贩来养活地方军阀的军队；工人处在饥饿线上。

象有才华的中国幽默作家林语堂所说的，三民主义已经为“面子、人情和特权”的三要主义所代替。

四

在这种情况下，一九二七年起农村共产主义运动的不断发展是很容易理解的。主要在江西省，但也在湖南、河南、四川、福建和安徽各省的大块地区，农民武装部队赶走或杀死国民党官僚和豪绅，建立了苏维埃政府。这些地区共有农村人口五千万到七千万人，现在已经完全布尔什维化了。这基本上是一个争取经济和社会改革的群众运动。它的热心而干练的领导人主要是五位年轻的马克思主义战士：毛泽东、贺龙、叶挺、朱德和彭德怀。

一九二七年的反动之后，这些人在江西建立了苏维埃临时政府，以极大的精力动员了农民来参加他们的革命运动。正如T·A·比松所正确指出，“共产党政权所进行的土地改革是它的经济政策的核心，也是它的政治权力赖以巩固的基础。”既然在这些地区里百分之七八十的土地为人口百分之二十的人所占有，既然对农产品抽税高达百分之七十五，既然最终由佃农负担的土地税已经提前好几年征收（在四川提前了六十年），苏维埃政府的做法自然会深得人心。

红军带着政治组织者，一进入这样的地区，就连根拔掉剥削制度。地主、高利贷者和地方军阀被清除。废债务，撕地契，把土地分给了农民和士兵。寺庙、祠堂地产、公共的设施和资源归政府管理。废童工，禁鸦片，废除娼妓和娶妾的制度，对所有农民、工人和士兵给以公民权。

共产主义在中国中部的进展，是历史上最惊人的群众运动

之一。红军在一九二七年开始时只有一支在前国民党军官贺龙统率下的装备很差的一万五千人的核心力量，到了一九三三年已经发展到十二个师，共约九万人。它的壮大和势力扩展是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实现的。共产党的队伍起先只有草叉和梭标，四周被敌人包围，只得到农民的资助，现在却在华中发展成为巨大的规模。

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南京政府派了六个师去围剿江西的红军，结果被击溃和瓦解，剩下的也几乎全部被消灭。一九三一年二月，何应钦将军率领十五万政府军前往，落得同样的下场。一九三一年六月中，蒋介石将军亲自带领三十万部队大举进攻江西，也同样没有结果。

政府在进行围剿时使用了法国机关枪、德国自动步枪、新式榴弹炮、由外国人驾驶的轰炸机以及能从上海银行家们那里搞到的所有的钱。红军则在很多情况下一人分不到一支步枪，他们很少大炮，没有飞机；但是他们有极大的机动性，他们采用游击战术，从山区堡垒里突然出击，把敌人分割歼灭。

然而，共产党取得成功的真正基础，在于它的主张从根本上合乎人数众多的无地农民和贫民的愿望。红军士兵都是农民，他们的政治领导人也多是农民出身。他们每到一地，总能赢得农民的支持。连小孩也成了为他们探听国民党方面情况的侦察员。农民到处提供灵通的情报，而且向政府军士兵宣传共产党的主张。

在战斗中间，一支支的政府部队投向了共产党，因为他们也是无地农民出身。他们还带来枪支、大炮、弹药和钱。苏区人民已经高度共产主义化，以致南京政府在重新占领这种地区

后很怕在那里派驻部队。因为如果让士兵长期同赤化了的农民接触，他们就受影响而倒戈了，南京政府就落得一场空，这样的事屡次发生过。

南京的总参谋部看到这种情况，就对某些红色地区采取了极端的措施。它下令把红色村子全部烧光，把除乡绅以外的平民全部杀死，然后让复员士兵搬去居住。由于“白军”和“红军”月复一月地激烈战斗，死亡的人数迅速增加。据中央政治会议秘书唐有壬在上海对路透社记者谈话称，这些战事中已经死了九百万人。这好象太夸大了，但是更可靠的估计也认为这场斗争已造成一百五十多万人的死亡。

有几次共产党人来到了离汉口、九江和其他长江口岸的攻击距离之内。他们没有占领这些城市。共产党人说，占领城市会危及他们的供应线和交通线。因为他们相信，帝国主义一定会进行干预，封锁长江，把他们装进口袋。他们认为自己还不够强大，还不能向帝国主义势力挑战，而如果红军占领一个长江通商口岸，威胁到外国租界的安全，帝国主义就会倾全力支持国民党政府，就象十九世纪时它们一度支持清王朝镇压太平天国一样。

共产党可能永远不会变得那样强大。他们可能顶多只能推翻农村里的地主阶级。城市里的共产党势力现在还弱，因为在工业地区南京政府和外国帝国主义相联合，有力量对付他们。农民运动至今取得的成就主要是破坏性的。共产党破坏了不可计数的生命和财产，他们也破坏了彻底腐败的旧秩序的残余。然而，他们清除了纳撒尼尔·佩弗尔叫做“一个文明的崩溃”的废墟，而这也是一种建设。

地球是早就盼望着某种新的东西了。看来，在共产党活动过的地区里的人民中间，旧的价值标准是再也不能恢复了。这个运动能否创造一个取代它的好的新秩序，我们将拭目以待。还有一点也是清楚的，中国除非经过根本性的经济、土地和社会改革，就不会有和平。现在还要看一看，国民党和地方军阀会不会在共产主义潮流把他们淹没之前，幡然接受警告，停止封建内战，实行使农民能够温饱的让步性经济改革措施，从而争取到农民的支持。

（《远东前线》一九三三年版第155——169页。）

旧中国的上海和一二八抗战

一

从外表上看，上海不是东方城市。在外国人控制的范围内，上海的建筑是传统的西式的，这里那里夹杂着一些试图和东方建筑杂交而产生的奇丑怪物。

美国佬在学会说一些洋泾浜之后，在这里很过得惯，因为上海同一些其他事物一样已经美国化了。在这里，美国人可以找到家乡的许多使生活舒适的事物：歌星埃利萨·兰迪和莫里斯·薛瓦利埃，无线电和爵士乐队，鸡尾酒和函授学校，夜总会和有歌舞表演的酒吧间，口香糖和别克牌汽车，福音派教徒和救世军。这里还有水兵的情妇、男女童子军、美西战争退伍军人、检查委员会、哥伦比亚同乡俱乐部、麦饼、滑稽连环画、白昼拦路抢劫、绑票、短篇小说俱乐部、商会、霓虹灯、冷饮柜、游乐园、歌女和小型高尔夫球。

上海租界里有亚洲最高的楼房和最大的电影院，而汽车的数目超过东方任何城市，或者超过中国所有其他城市的总和。这里有中国最大的百货公司：永安、新新、先施，它们在东方的名声之大，有如英国的塞尔弗里奇公司和美国的萨克斯—沃纳梅克公司。这里有强大的金融洋行，如汇丰银行、麦加利银行以及纽约花旗银行和大通银行的巨大的分行。

美孚公司、亚细亚石油公司和苏俄石油公司相竞争，它们在黄浦江边都有大规模的设施。在租界里还有美英烟草公司的总行，它们是同传教士（他们的总部也设在这里）一起到来、扩充势力和兴旺发达的，而且看来在中国势必会呆得比传教士更久。

这里有英国“贵族血统”的公司，象安利、怡和、沙逊等洋行，它们是从臭名昭著的东印度公司那里继承了鸦片买卖而在中国发迹起来的。东印度公司是为英国赢得印度帝国的旧式罗曼蒂克的贸易机构；要是再给它三十年独占的地位，它本来可能把中国也置于英国保守党的旗帜之下。这里还有更新式的、咄咄逼人的美国公司，例如慎昌洋行，它们正逐渐排挤掉英国人。这些美国公司代表着成百家美国工厂，出售着一切东西，从铆钉到机关枪和轰炸机都有。

在苏州河北岸的虹口区，工厂烟囱喷出的烟笼罩了天空。上海是亚洲最大的工业城市。在忙碌的棉纺厂、面粉厂、丝厂和其他较小的工厂里，雇佣着二十几万中国工人。他们的平均工资一天不过二十美分。

然而还有成千上万的人在找活干；这里有世界上最丰富的合格的廉价劳动力。英国、日本、中国的资本家最大限度地利

用着这种情况，无情地镇压罢工和工会组织。他们压制工人的要求。工人本身的人数过剩和饥饿逼得他们只能以微弱的声音要求增加工资。

谁要是溯黄浦江而走向上海市区，就会经过上海发电厂，这是美商电力公司最近以三千万美元的价格买进的；这笔钱进了工部局丰裕殷实的金库。再近一些是亚美公司的蛋品厂，而在江上可以看到大来轮船公司的轮船，夹杂在飘扬着各国国旗的远洋轮船和拖船中间。

在黄浦江上还有灰色或白色的瘦削的钢轮，它们装甲的甲板上安放的大炮炮口朝西对着中国。这些是外国的警犬：美、英、法、意、日的巡洋舰、驱逐舰、潜艇和航空母舰，游弋在黄浦江、长江和中国的沿海。它们姿态优美的炮筒形成的威胁，据说还是为了上海的安全。陆上驻扎着法、美、意的海军陆战队、英国大兵和日本的蓝衣水兵；他们的刺刀构成租界周围的钢圈。他们保卫着世界上一切城市中最大宗的外国投资，总数超过三十亿美元。

这种情况是怎么造成的呢？这个处在中国而又不属于中国的神话般的城市，怎么会置于外国炮舰保护之下，由一小撮外国大班及其走狗全权管理的呢？

二

大约一百年前，第一批冒险远航的美英快速帆船驶入黄浦江，来寻求贸易和寻衅。起初他们除了麻烦之外一无所得，当他们要求进行买卖时，只遭到上海道台的白眼相看。后来清朝

的钦差大臣在广州把英国人的鸦片烟倒入海里(象早几年美国人把英国人的茶叶倒入波士顿港一样)，惹怒了英国人开战打赢了中国，这才在一八四三年把上海宣布向“番邦”的满脸胡子的野蛮人开放。

当时签约把广州和其他几个城市的一部分地区划为“concessions”(租界)让给英国政府，而在上海还只是让英国人可以在指定地区从中国人那里租地用。道台向英国领事说，中国普天之下莫非皇土，土地不能出卖。于是英国领事假惺惺地同意，英国人从中国人手里“永租”土地要向清朝政府付小笔的租金。

道台指定作为这种拓居地的土地都是低洼地，农民用来种水稻。那时来到东方的人颇有远见，他们出高价换得稻田；今天他们的子孙靠这些土地的收入过着奢侈的生活。不久，第一次土地章程范围内的所有财产都归外国人控制了。按照同道台的协议，买地都要在英国领事馆进行登记，因为最初只有英国人才准予买地和盖房。

但是，美国人也挤了进来，他们也要分一杯羹。后来随着租界范围的扩大，所有享有治外法权的外国人在租界当局的管辖下都可以购置土地了(中国人则不能)。到了一八五四年，美国在上海也设立了领事馆，同英国一起进行地方管辖。法国人则在五年前获得权利，在租界紧挨着的另一块地区居住和“永租”土地。

中国还划了另一块地区要给美国；这地区在原来租界以北，苏州河的对岸。但是在华盛顿，美国国会投票反对在中国据有“租界”，因此没有正式接受这个地区。一八六三年经过协议，这块今天通常叫虹口区的地方同原来的租界合并，成了“国际

性的”。这是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独特的城市。在上海的法国人也想同英国人和美国人合在一起，并为此采取了步骤。但是巴黎方面不同意，因此法国地区归法国人单独管辖。英国人和美国人鼻子里嗅到今天作为某些法国人主要收入来源的走私的鸦片，就说他们也乐意看到做这样一种安排。

租界繁华了，而且扩大了。在世纪末之前，界线就扩张了五次。这些扩张一般是经过友好商定的；有时则对中国施加了压力。起初外国人无权课税、颁布法令或者管辖迁到他们这块小绿洲里来居住的中国人。但是逐渐地通过惯例，后来经过条约的肯定，外国人获得了一些有限的权力。一八五四年，租地人开会选举了第一个工部局董事会，这成了外国领事们监督下的施政机关。

工部局很早就篡夺了保卫租界的权利。在十九世纪五十和六十年代，由于太平天国起义军进入长江下游，威胁吞没上海，上海成立了志愿防卫队。有时英美在黄浦江上的军舰派水兵登陆，保卫租界免受起义者和盗贼的入侵。外国人在法律上无权警卫租界，但他们诡辩说，既然清政府不能提供保护，他们只好进行自卫。

美国冒险者弗雷德里克·沃德^①后来效力于上海道台，组织“常胜军”，迫使太平军溯长江后退（从而使中国革命推迟了五十年）。这时清朝当局看到外国人制造的一个安全区对自己有好处，就暂时默许了租界防卫制度。但是到今天列强并没有权利在租界里留驻外国军队，除非是按照所谓“自卫的本能。”

① 旧译华尔。——译者

租界工部局董事们从早期就定下的另一条原则，是在中国内战时期采取“武装中立”。中国的军队，不论是政府军还是叛军，都不得进入外国人地界。这一条并没有条约规定，中国当局也从不承认它合法，但实际上是接受的。自从太平天国以来，未曾有计划地企图把中国军队开进租界去。

这种“武装中立”还有进一步的发展。上海要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城市。经协议，在发生国际冲突时，不论是中外之间的战争，或者是列强之间的战争，租界应被认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据菲瑟姆关于上海地位的官方报告，这种中立地位是“在一八八四到八五年法国和中国在东京^①战争期间第一次得到正式承认的”。后来，在一八九四到九五年中日战争期间被严格遵守。一九〇四到〇五年，日本和俄国在战争期间也始终加以尊重。在世界大战时，上海是世界上从未受到威胁的少数大城市之一；各个交战国的国民都在这里和平相处。

只有到几个月前，日本人利用租界作为基地进攻中国军队，才破坏了这项原则。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中立”在保持了半个世纪之后，不是从外部而是从内部被彻底破坏的；外国人曾经长期害怕中国人会从外部入侵，而破坏者却是原来保证维护这个原则的列强之一。

三

上海主要是经过世界大战而发展到现在这样名列世界之五

① 即越南北部。——译者

的大城市的，在战争期间，这里的外国公司既不要纳税也不服兵役，积聚了大量超额利润，它们又拿这些利润购置房地产，进行再投资。租界原先只是一小批有创业精神的商人闯路子的异乡之地，现在已发展成为东方最重要的贸易市场。尽管世界其他地方发生着经济恐慌，这里的本地人和“外来人”（现在已没有人公开叫他们“洋鬼子”了）仍然能够发大财。

随着租界的扩大，外国工部局面临的问题也增多了。过去只处理一个小村的事务，现在要管理一个巨大的都会了。工部局的权力扩大了，各国驻沪领事会议代表各国利益而对工部局行使的控制越来越变成名义上的了。今天，工部局制订自己的政策，颁布法令，建立公共设施，执行着普通市政府的职务。但是它的统治的政治影响是巨大而独特的。

名义上所有外国人在租界治理方面都有发言权，但多年来工部局主要由英国人操纵，同英国人合作的还有他们的前同盟者日本人，还有美国人。这是由于这三个国家的人占有土地而掌握表决票数最多。从居民人数来说，日本人最多，最近租界人口调查中登记为一万九千，实际数目接近三万。英国人其次，在八千以上；美国人约四千，占第三位，其中约四百为菲律宾人。

工部局董事会有九名外国董事，向来由五名英国人、两名日本人和两名美国人组成，统治着近一百万中国人。有时遇到美国人和日本人不友好（象最近在日本入侵后就是如此），就对投票进行操纵，使英国获得六席，让美国人只得到一席。

除外国董事以外，还有五名中国代表，由中国“纳税人”选出。这种中国人的代表权是不久前在民众强大要求下才让予

的，它对外国在租界里的独裁统治并不构成什么威胁。在发生国际性的政治事务分歧时，中国人常常不投票，或者关于讨论这种问题的会议通知，不知为什么不能及时送到中国人手里。例如一九三二年一月，宣布“紧急状态”，让日本军队能够利用租界作为对华作战基地时，这样重要的会议却没有中国人参加。

外国董事由享有治外法权的列强的土地所有者选出。由于租界里最值钱的地产大多数为四五十个人所占有或者控制，而这些人又通过各种关系各自操纵一部分选票，因此选出的政府成了封建性的寡头政权。一九三二年四月最近一次选举这个“模范租界”的百万居民的统治者时，合格的选举人只有一千四百七十二人！归根结蒂，大概顶多只有十二个外国大地产主、银行家、商人和企业大班，至少不超过十二个资本集团，操纵着政府机器。而这个租界城严格说来并不是外国殖民地，甚至还不是租让地；从法律上说，并无外国或国家集团能够要求占有这块领土。从理论上说它仍旧是中国青年学生常说的“中国主权”的一部分。

这种不伦不类的状况长期以来就使在租界有巨额投资的人感到不快。他们多次试图使外国人统治下的上海的地位得到澄清，使它脱离现在所依赖的治外法权而另行获得一种法律地位。许多人认为治外法权的末日已经临近，他们害怕一旦治外法权失效，对租界的控制可能会退还给中国人。为了防止这种局面，有些长期统治的家族想使租界宣布独立，但是他们离开那些洋炮舰就过不了日子。

每年有大量金钱花在宣传上，想诱使列强迫使中国承认上海为明确属于外国的领土。至今这点还未能做到。朝这方面做

的一个重要措施，是工部局聘请了南非的菲塔姆法官就上海现有地位问题提出报告，对上海未来的安全提出建议。这份三巨册的报告花了租界巨头们两万五千美元。但是报告对伦敦和华盛顿没有产生作用，也许是因为它的文体官气太足。可是，当地的富商并不就此罢休。

房地产所有者特别想使租界获得永久性的地位，并把它扩大到邻近的中国地界里去。他们在几年前就提出过一个计划，要让中国政府交出以上海为中心，二十英里为半径的一大块半圆形地区的管辖权。这里要宣布为“自由市”，是“外国保护下的永久非军事区”。英美人和日本的房地产主中有许多人支持这个方案。

然而一个时期以来，当地领袖们认识到，除非在上海发生或者制造某种危机，否则列强不大可能为租界的事采取什么决定性的行动，主要因为美国持“非侵略”政策，会加以反对。一九二七年，中国国民党打到上海附近，外国军队登陆保护租界以防万一的时候，很多人曾经希望这种局面会导致本国政府采取一致行动，提出共同要求。当地要求扩界的活动仍在继续进行。

外国人中这部分更富侵略性的人，常被中国人称为“顽固分子”。“顽固分子”策动组织了一个“上海外侨协会”。协会会员并不都是“顽固分子”，但其中确有许多人想扩大租界并使外国控制永久化。

当然，中国各地的外侨中间都可以找到恐华病患者，但是上海的“顽固分子”中包括一些势力很大的人。其中也有工部局的董事。

《曼彻斯特卫报》的著名英国记者阿瑟·兰塞姆很好地描述了这些人的特殊心理。他在《中国之谜》一书中这样谈到这些上海的“顽固分子”：

“从一九〇一年以来，他们似乎一直住在一个舒适的密封玻璃箱子里。由于英国人对中国的知识和中国人对英国的知识多数都通过上海这类地方而得来，英国人和中国人都不能清楚地看到，英国血统的上海人是属于一个不复存在的英国了，如果他们还在任何意义上属于英国的话。……他们阻碍了英国和中国之间的了解，因为我们在英国本国的人固然易于误认他们为英国人，在中国的中国人也犯同样的错误。”

可是这种错误心理还不仅限于英国人，其他国家的人也犯同样的毛病。

一九三二年一月底，日本海军将军盐泽向中国人提出专横的要求时，他指望得到上海国际“顽固分子”的支持，他的愿望没有落空。这些“顽固分子”高兴极了。这里终于出现了一个好汉。他们把盐泽看作救世主，他能永远固定外国对东方明珠上海的控制权。他们的公开同情、他们的合作，以及也许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的唆使，鼓励了这个年老性急的海军将军去犯这致命的错误，几乎使他的国家陷入一场大大超乎“严格私下的和不宣布的”对华战争。

四

身高六英尺，面孔黝黑而士气高昂，四十岁但看上去象三

十岁，虽然已经身经百战但却穿着没有勋章饰带的普通草绿色军服。厚嘴唇，大嘴，塌鼻子。他身上最富表情的东西是他的细长的大手，以及活泼而敏锐的栗色眼睛。这就是蔡廷锴将军，十九路军的军长。

一月二十九日午后我第一次见到蔡将军时，他的眼睛里闪耀着愤怒。我是绕道到达中国人地区的，经过公共租界西头，穿出英国人的防线。闸北的炮声还在响，离租界五英里的真茹，蔡将军指挥部所在的小茅屋外面，一列列穿灰军服、戴塔形草帽的部队正在开赴前线。我想问问蔡将军这场屠杀会持续多久。

他讲话毫不含糊，他对我和同行的一名中国记者说：“这个野蛮的盐泽破坏了一切国际准则，在这场强加在我们头上的战争里违反了起码的人道原则。他提出最后通牒，我们的市长无条件地接受了。可是他在昨夜十一点二十五分又提出第二个最后通牒，要求中国军队撤离中国领土，他要在半夜十二点加以占领。通知这么急，我们即使想撤也来不及。至于在家里正睡觉的成千上万的中国平民，他们得到了什么预报？”

蔡说，原来中国军队确是要在二十九号上午开始撤退的。南京已来了命令。他说：“日本人接受了市长对他们的要求的答复后，我们决定撤除防备进攻的一切街垒。昨天夜里而且已经撤退了在闸北前沿的哨兵。我们原来打算在今天上午完成撤退。十二点差十分，他们发起攻击时，首先抵抗的是闸北的宪兵而不是军队。我本人到快半夜方才知盐泽的最后通牒，而要十九路军部队抵抗入侵的命令是过了几分钟以后才发出的。”

“现在你们不打算撤退了？”

“当然不啰。我们为什么要从自己的领土上撤退？我们并没有挑起战争；我们现在也不想打仗，而日本人任何时候都可以离开中国，从而停止战争。但是我们跟东北张学良的部队不一样。我们不打算请国际联盟来拯救我们；我们要自己来打这个仗。”

我见过许多中国将领，但是没有一个能够引起人们的信心。蔡却能够。他的粗中带细的风度，直截了当的谈吐，朴素的服装，以及他在真茹的环境，都给了我很好的印象。他对我和所有外国人的友好态度，很早就使我相信，排外并不是他的天性。但是他对于想征服中国的日本人，却抱着健康的仇恨和轻蔑。

蔡廷锴说，他跟国际租界的其他外国人并无争执。他说，人家不打他，他不会开火。这个诺言，在战事期间一直遵守了。他对我说：“你可以告诉其他外国指挥官们，我们无意于侵入租界，或者伤害任何外国人。固然，所有外国军队，包括美国军队，都没有任何合法权利驻在上海的租界里。但是我们相信，他们只是想保护自己的侨民，是不会攻击我们的。”

蔡清楚地知道日军在器械方面的优越地位。那天他说：“现代战争工具日本人应有尽有。他们有坦克、装甲车、重炮、飞机和东方最好的舰队。我们却除了步枪和机关枪，几乎什么都没有。但是我们的士气很高，这在现代战争里也是很重要的。我们抗战是为了维护一个原则：各国人民都有权保卫自己，反对侵略和亡国的威胁。我的军队的士兵懂得这个道理，因此他们士气很高。”

我从中国战线后面观察了蔡廷锴这样信赖的士兵。他们虽

然一般比日本兵个子高些，但在体格、装备和训练方面都不如日本兵。他们看起来更象假日的学生，而不是开赴战场的士兵。有些只是十五六岁的孩子，身子单薄。他们的制服是最廉价的布做的。虽然时令已是仲冬，许多人还穿着短裤，而且没有大衣。士兵穿的是球鞋，这也是中国陆军的规定装备。

在闸北后面的田野里，士兵们在当地农民的帮助下在挖壕沟，并且在中国郊外到处可见的隆起的坟堆里构筑机枪阵地。有的成单行列队开赴前方。每个士兵都还保留着从南方带来的草帽，用扁担挑着自己的装备和什物。

我问一个在挖壕沟的士兵：“你愿意打日本人吗？”

他脸上中国士兵惯有的善良的微笑消失了。他绰起插有刺刀的步枪，敏捷地，也有一点滑稽地悬空一刺，说：“我用这个来对付日本兵。日本人在杀我们的人，抢我们的地。当然我要打他们。”

后来我把同样的问题问过许多士兵，得到的回答都一样。他们会说：“日本人是强盗、杀人犯。他们在东北杀了我们的人，搞掉我们的政府，抢了我们的地。现在他们又想霸占全中国，可我们不答应。”他们的爱国热情看来是真的，其基础无疑是相信日本人打算奴役中国。有两个从广东来的士兵对我说：“我们宁死也不让我们的子孙沦为倭鬼天皇的臣民！”

关于日本海军和浪人在闸北和虹口的暴行的消息迅速传播，这进一步激怒了中国部队。他们怒火万丈。这对我是一个新发现；我从未看到中国人在行动上显露过这样强烈的仇恨。这是不合乎中国人的性格的。为什么这些十九路军的士兵这样不同呢？他们是出于什么信念而这样士气高昂的呢？面对着日

军更加深入和野蛮的进攻，他们的斗志更加旺盛，甚至使中国的旁观者比外国人更加感到困惑不解，其中包括吃惊的南京政府，因为他们是违抗它的命令而进行战斗的。

十九路军的表现向持怀疑态度的外界表明，中国军队并非不能打现代战争。对于这个独特的例子，作一番解释是应该的。这支军队在上海期间领的饷和吃的伙食不错，这是重要的因素。但更为重要的是，它具有革命的传统。它恐怕是中国最老的一支现代化的军队，它的多数士兵在一九二六年参加过几乎统一了南北方的北伐。它的核心在广州时受过加仑将军（即现在在西伯利亚指挥苏俄远东军的布路彻将军）为首的俄共顾问们的训练。那是国共合作时期的事。

因此这支军队的年轻军官和士兵不仅在军事上，而且在政治上受过教育。它有一支高效率的宣传队和自己的教育部。不同于其他中国军队，它的士兵不是拉伕拉来而是志愿招募的。他们多数是具有政治信念的青年，识字的人比例相当高。它的高级指挥官，象在中国其他军队里一样，基本上是政客而不是军人。所不同者，它的低级军官和士兵似乎受到某种革命目的的熏陶而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精神。

十九路军的士兵不是到上海来送死的。他们是在前一年十一月和十二月，在跟预期的日本侵略无关的情况下调来这里的。他们到达上海之后两个多月，战事方才开始。日本人指称他们来这里的原意是要强占外国租界，看来这没有实际的根据。这支亲广州但并不反南京的军队之所以调来京沪地区，是因为广州叛逆政府提出这点作为同南京政府进行和解谈判的先决条件。最近皈依基督教而使外国传教士十分高兴的蒋介石将军有

一个坏习惯，就是绑架或者有时处决来到南京的政敌。只有当蒋表现诚意，让十九路军驻在沪宁线上，广东方面的人才肯前来南京。

日本人指称，十九路军低级军官和士兵中有许多共产党人和同情者，这是确实的。这无疑是造成这支军队革命战斗精神的因素之一。共产党在这支军队里的影响可以追溯到早先的广州时期。这一点为中国政府所否认，它指出十九路军来上海以前在江西打过共产党。事实上，在江西许多士兵接触到共区农民而受了影响。后来在上海战事结束时，这种影响有很大发展，以致有必要对这支军队进行全面改组，清除了好几百这种革命青年。

但是上海抗战的真正热情看来是从最初冲突时产生的，那时几颗瞄得很准的枪弹引起日军的溃败和混乱，这件事在心理上产生了影响。中国人永不能忘记在粉碎“皇军战争机器不可战胜”的神话时所感到的惊奇和兴奋。从此士兵们就决心以暴力对抗暴力，对敌人提出挑战，不甘心于失败。一旦开始，斗争对他们就成了一场扣人心弦的紧张竞赛，使参加的每一个人乐于迎接冒险。

我们从蔡廷锴将军的指挥所回来，沿着几个月前刚为中国市政府自豪地宣布通车的新建公路，绕道进入闸北。虽然不远处机枪在砰砰作响，街上有些店铺还在营业，手推车和人力车还在来往。火线后面，人们并不惊慌，这里每一个人似乎远比租界里的人来得镇静。中国警察在不受中国军队干预的情况下维持着秩序。这个地区只落下过少数几颗炸弹，但是我们经过的一个街区被燃烧弹引起了全面大火。闸北救火队正冒着极大

的困难从废墟底下挖出烧伤了的男女。

我们到达铁路网，离北站只有几百英尺处，只见站上是滚滚的浓烟。一列装甲车和客车给炸中了，正烧成畸形的钢架。有一颗炸弹劈开了一节军粮库用的车厢，把尸体甩得三十英尺远，分成许多块。一节运兵车旁溅满了血，车里坐的士兵已被燃烧弹和烈性炸弹烧成灰烬。

我们谨慎地绕过几个碉堡，看到很多士兵，但是没有人阻拦我们。直到我们走近车站大火的步枪射程之内，才有一个年轻的士兵用广东话喝住我的中国同伴老何。老何是苏州人，起初不懂他的话；于是这士兵立刻横下他的枪，对他的弟兄们喊道他发现一个日本人和一个“外路人”。这下可紧张了；戴着牛角边眼镜的何真象一个日本人。所幸那个士兵没有扳他的枪机，同时过来了另一个见过日本人的士兵，对我们进行了检查。何不停地骂娘，终于说清楚自己不是“倭鬼”，我们这才继续前进。

一个小女孩独自边哭边沿铁轨蹒跚走来，形成轰炸后火与烟背景上的凄惨形象。我跑过去把她抱起。我们询问了她。她说她的父亲是个铁路工人，已被炸死；铁道旁拥挤着的许多草房，他们原来住着其中的一家，现在全都被火焰吞没了。

天上有飞机在嗡响，近处有一个士兵鸣枪报警。一架大型日本轰炸机象一只凶鸟在我们头顶盘旋。我们已经看得够多了，就赶快通过后线街垒跑回，带回了这成千难民中的一个小难民。后来我给她找到一个家，交给一个中国人抚养，他的房子原在虹口，我曾帮他抢救出一些家产。

五

在现代恐怕没有其他海军司令员象盐泽将军这样在他被免去在上海的高级指挥权以前的几天里接二连三地犯这样多的错误了。这些错误全都由于他最初低估了敌方的士气和力量。他把整个战役建立在一种迷信上，似乎只要一挥动日本国旗就能使中国军队落荒而逃。

他在他的最后通牒被全盘接受之后发动战事，首先就违反了国际法。他以租界作为进攻中国人的基地，破坏了租界的传统的中立地位。他没有预先警告非战斗人员就轰炸一个人口稠密的城市，从而违背了国际惯例。而且他公开对华开战，自然是撕毁了一切国际和平条约。

虽然如此，要是盐泽自信能不战而取闸北的期望果真实现，他一切的所作所为都是能够被解释过去的。侵略者在造成既成事实以后，是能够使自己的行为自圆其说的。但是日本海陆军的威望在上海一垮台，接着出现了一个时期的混乱和屠杀，盐泽就名誉扫地了。他的狂妄吹嘘和他的许多违反国际惯例的行为，反过来害了他自己。连那些“顽固分子”后来也抛弃了他。

在随后的三天里，盐泽竭力企图进行挽救。他仍然希望用他不到五千人的兵力战胜现已三倍此数而有余的中国军队而占领闸北。但他的登陆部队一再进袭，除了伤亡一无所得，于是他越来越求助于轰炸，企图使没有空军，而且起初连高射炮也没有的中国人丧失士气。可是这种做法不但没有削弱，反而激励了中国人的抵抗。空袭的活生生的惨象使士兵们增添了仇恨，

使中国人更加团结一致地支持抗日部队。

看来不用怀疑，蒋介石将军是强烈反对在上海继续抵抗的，这种抵抗他也从来没有下令进行。十九路军军火充足，但是缺少钱，而破产了的南京一点钱也没有给。瘦长的蔡将军向上海中国人控制区和租界的中国居民呼吁捐献，反应是非常热烈的。

上海的中国商会自愿在战争期间每天提供十九路军二万五千银元。各种工商组织、人民团体、行会、俱乐部和有钱的人都捐钱支援军队。成百上千的中国学生担任救护车司机、担架队员、护士、通讯员和做各种有用的支援战争的志愿工作。

中国童子军替军队送信，闸北志愿队还设法暂时编入了军队。医生和护士自愿服务，在闸北火线后面设立了急救医院，在租界里成百上千的平民把食物、糖果、衣服和书刊捐赠给前线的士兵。有一家乐器店把它几乎全部的留声机存货都捐了出来，后来在机枪声间歇的时候，你常常可以听到留声机在放最新的爵士音乐。战事的新闻传播出去以后，世界各地的华侨纷纷打电报送来捐款，或者认捐食物和弹药。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中国的群众表现出西方所了解的爱国主义。人民大众崇拜这些敢于笑对死亡的南方青年士兵。当我看到一个我认识的本来很娇气的、喜欢唱歌的中国女孩子在中国防线后面抬担架的时候，我的结论是，中国终于被某种东西震醒了。人们忘掉了那句中国古话：“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在上海从来没有一支军队这样得到全心全意的支持。也许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为什么成千上万的中国青年会呆在壕沟里不怕被炸得粉碎——按照中国的传统礼教，这本来被看作是不足

取的行为。

第一个星期，日本人对中国人在闸北的防线进行空袭，并且用安放在租界虹口公园里的海军重炮不时进行轰击。配备轻炮、机枪和装甲车的连队沿闸北全线多次出击，但都没有得逞。

面带微笑的野村吉三郎海军少将带来了更多的军舰。他接管了失职的盐泽的指挥权，后者立刻患严重头痛而上床休息去了。在陆上，海军登陆部队的指挥官，黝黑、瘦小而圆滑的鲛岛男爵为能干的植松海军少将所接替。租界里开进了更多的日本海军陆战队，更多的装甲车和重型榴弹炮。但现在变得很明显，需要有一支全副装备的大的陆军部队，才能够把中国人从他们固守的阵地上撵走。在东京，国防部下令第九师动员，同时派出第二十四混合旅于二月六日在租界登陆。

一部分新到达的部队增援了北边闸北突出部的那一小支海军部队，但大部分则开去占领吴淞江南岸的阵地，在租界以北约十二英里处。在他们对面是吴淞镇，再过去一英里，在黄浦江和长江的会合处是吴淞炮台，日本军舰对那里猛烈开炮，但没能攻下来。在吴淞镇的中国防守部队炸断了江上的铁路桥和公路桥。日本人一再企图搭浮桥过江，都遭到猛烈的反击。他们于是停下来，等待第九香泽师的到来。

又过了一个星期。各国驻上海的领事们和在遥远的日内瓦，作了促成议和的努力。对此中国的将领们表示随时愿意停止战争和后撤，但是要求敌方同时采取相应的行动。这种试探引不起日本方面的兴趣。日本人现在很不高兴，正当人们似乎怀疑日本的军事威力时，停战是谈不上的。因此屠杀继续进行着。

日本海军部队在租界边上筑了空军基地，修建了飞机库。陆上的飞机每天增加几十架，经常有新的飞机在开箱，装配，并派出进行野蛮的空袭。我有好几次在中国阵地的后方遭到这种空袭。

有一次，在蔡廷锴将军的指挥部所在地真茹，一批炸弹投在离我不远的火车站上，那里有一列兵车停着，车头喷着蒸气。参与的那些大型轰炸机大胆地飞得很低，其中有一个驾驶员对铁道进行了低空扫射，一路拖曳着死亡之网。他的卤莽葬送了自己的生命，因为在真茹的唯一的一座高射炮击中了他的飞机，使它冒着火几乎掉落在蔡将军的门前。驾驶员和他的两名射击手在我眼前烧成了灰烬。

在这次凶残的袭击之后，真茹车站成了一堆扯断的钢筋、杂乱的砖块和十几节残破的车厢，其中有活活烧死的马匹和血肉模糊的人体，似乎插在铁叉上烧烤。好几颗二百五十磅的炸弹直接击中了车站和火车，我即使在一百码以外，也感到极大的震动。在被毁车厢中的不幸的青年，一刹那以前还在边吃着人民好心送来的米饭，边开着玩笑，突然被炸飞到半空，或者从破裂的车厢里抛了出来。肉块被猛掷到好几码以外的墙上。

车站里原来聚集着许多士兵和一些平民，他们全都被炸死了。有的连一点弹片造成的皮伤都没有，但是剧烈的冲击把他们震死，还把衣服全部刮跑了。我走近去，看到他们赤裸裸地以各种痛苦的扭曲姿态在站内和月台上躺了一地。但在有的兵士身上，绑腿还缠着，为燃烧弹溅出的硫磺引起的小火在焚烧着。这种因冲击和高温致死的景象，比直接击中致死更令人不忍目睹，因为前一种人的血凝结了，水份一下子全都烤干，身

体缩成侏儒一样，皮肉变成一种可怕的褐色。

闸北的居民区和工厂几乎每天遭到空袭，那里许多妇女和儿童害怕地蹲着。最惨的是对难民营的袭击，其中住着一万名去年秋天从长江沿岸逃来的水灾灾民。这些人是由中外救济委员会收容的，日本人完全知道这个难民营的位置，何况屋顶上飘着明显的红十字旗子。尽管这样，这里遭到三次轰炸，有时加之以机枪的扫射。救济委员会主任约翰·西蒙爵士向国际联盟提出的控诉中说，除了几十人被杀死以外，还有几个怀孕的妇女因休克而死亡。

日本飞行员的乱掷炸弹差一点给他们自己闹出乱子。有两架飞机竟把炸弹掷在公共租界美国防区里边的巨大的永安纱厂上面。一颗炸弹在绕纱车间里爆炸，炸死了几个女工。出事以后不久我就看到散在四处的尸体，还听到美国海军陆战队的理查德·霍克上校在他的士兵清理现场时站在一边气愤地大骂。他有一百五十名士兵就驻扎在这个纱厂里，差一点也被炸死。

如果日本人希望用轰炸机群摧毁中国人的士气，那他们并未得逞。十三日植田谦吉中将率领第九师到达时，中国人仍未退却，而且也无意退却。但是日本人和许多外国人认为植田的到来会使战争结束。

我问一个年轻的英国情报官员，日本陆军要多久才能击溃中国人。他答道：“哦，我想顶多不超过四十八小时吧。能干的指挥官用一天时间就够了。”

好几天以后，中国人还据守着绵延十到十二英里的前线上的每一个战略点。那时这个情报官又碰到我，只能瞠目结舌，没法答复我的问题。

六

我记得有一次我到日本战线后面去采访，在那里看到八英寸口径的榴弹炮向中国人的壕沟打出一发发炮弹。回来时在租界里碰到一个年轻的住在上海的外侨。我同他谈及这场敌对行动——到这时大家都叫它“战争”了。我说到中国人仍然在固守时，他显得很沮丧。

他叹道：“真他妈的讨厌！如果日本人赶不跑他们，我们得自己来干！自从中国人在这里真顶住以来，我的佣人全都难对付了。他们都变坏了，神气起来了。”

别的外国人对中国人生气，是因为生意停了，在赔钱。有的人向报纸写信，谴责中国人的抵抗。有的人抱怨租界里的宵禁要求所有跳舞厅在晚上十点钟都关门，妨碍了夜生活。有些人忘记了中国部队在开战前几个星期就已经来到上海的中国地界，造谣说中国部队原来就打算占领租界，破坏外国财产，杀害外国人。

但是多数有头脑的外国人强烈谴责日本人破坏租界的中立地位。成百的外国传教士、医生、护士和其他人帮助了伤员和难民，外国医院也为他们提供服务。特别使多数中立的观察家感到震惊的，是日本浪人在虹口的“恐怖行为”。有正义感的泰德·撒克里主编的《大美晚报》不断谴责日本人的军事行动无视了成文和不成文的法律。撒克里写道：

“……明摆着日本是对中国进行着战争——而且无理

地利用着公共租界的中立土地作为这场战争的基地。

“公共租界当局应该立即公开声明不赞成这种过分的行为。它应该表明，其他外国及其在上海的侨民个人，都绝不参与任何反对中国人民的进攻性战事。

“对于利用租界作战争基地并且严重滥用旁人信任的武装的日本人，现在只能说两个字：滚开！”

中国人从未威胁进攻而危及外国人的生命，他们几乎一直压低了自己的火力，仅限于回答日本人安放在虹口和其他地方的大炮。但是谁也不知道今后如何，因此美国人欢迎有名的第三十一团从马尼拉开到，它的团长是有绅士风度的洛伦佐·加塞上校，他的外表能引起人们的信任 and 安全感。

到二月中，植田将军已经把他的一万二千人的部队都部署在岸上，准备好进攻了。我连日站在码头上看着日本人从运输舰往租界里卸军火。什么都是新的，什么都有条不紊。那里有约五十辆坦克、许多装甲车、几十辆英制卡车和汽车、五六十架飞机、几十尊榴弹炮、轻型的野战炮、无数箱供飞机投掷的鱼雷和炸弹、手榴弹、几千匹阿拉伯马、几百挺英制和美制的机关枪、自动步枪以及无数炮弹和较小的弹药。这些军火的数量十分可观。它一定给了矮小黝黑的植田将军很大的信心，因为在二月十八日他向蔡廷锴将军提出了又一个最后通牒。他要求中国军队在二月二十日黎明前全部后撤二十公里。

那天夜里，我和另一个记者驱车经过黑暗的公路去打听蔡将军的答复。我们平安地通过了中国人的外层防线，绕过布了地雷的地段，进入真茹这个小的大学城。在那里蔡将军很快同意回答问题，在原是大学生宿舍楼的一个房间里接见了我们。

陈设很俭朴，只有两张铺了灰毯子的床、一张小方桌，墙上挂了地图，中间地上摆了一盆炭火。蔡将军把他又长又瘦的手伸向炭火。他的眼睛闪闪发亮。

他说：“任何独立国家都不能垂手接受植田的要求。接受了就等于承认日本对中国享有宗主权。他要我们撤出自己的土地，从一个所谓中立的外国租界的庇护所里攻击我们。只要还剩下一个中国人，我们决不会答应。”

我的同伴问道：“我可以把你的话转告植田将军吗？”

“你可以告诉他，我对他的唯一答复就是枪炮。”在远处沉重的炮声支持了他的声明。

我们，作为全上海知道蔡将军的答复的唯一的两个人，告辞并在黑暗中离去。但是我们并没有能够把蔡的口信带给植田将军。在回去的路上，我们发现桥被占领了，横跨马路挖了很宽的战壕，地下埋了地雷。我们无法说服哨兵让我们把车开过去。我们回租界步行了三个小时，被扣了又放，放了又扣，被勒令出示护照和照片；知道我们是美国人后，又给我们道了歉。最后到清晨三点钟我们才到达英国人的防地。我们发出新闻稿，然后上床休息。第二天醒来得知，战争已经扩大到一条新的战线。

七

植田的广为宣传的突破江湾的“大攻势”以失败告终。它没有象盐泽在闸北的失败那样大，但同样表明对敌方的士气和数量优势估计不足。

植田每天派出飞机进行侦察，还建立了一个效率很高的特务网，使他能充分了解中国人阵地的兵力。这个矮小而勇猛的将军不顾在闸北日军屡次冲击中国人坚强的抵抗壁垒而败阵下来的教训，仍然在新的战线发动进攻，自以为皇军的威信、现代化武器和优良训练可以弥补在数量上的劣势和对地形不熟的弱点。

植田的部队分布在从租界北界往北到吴淞口，和黄浦江相平行的十英里长的一条线上，在二月二十日当带雾的朝阳开始照射稻田的时候发起了向西的攻击。中国人的防线从闸北向北延伸到长江和吴淞，以江湾为中心。植田的策略是压迫中方的左翼和中心，使之向南弯曲，包抄闸北，迫使中国部队后退。

那天整个上午我一直和日本部队在一起，他们的每一座榴弹炮、野战炮、海军炮以及四十多辆坦克和装甲车一起参加了攻势。两个临时机场现在可容纳一百多架战斗机，从那里一队队的飞机起飞，以一分钟一架的速度在江湾、庙行和吴淞进行轰炸。

日本人无阻挡地推进到淞沪铁路线，在铁路西侧有中国部队据守着。在这里中国人以江湾为中心进行了顽强的抵抗，毫不动摇，尽管日本人发出不断的炮弹，连续派出飞机轰炸扫射，并且派出敢死队以坦克和装甲车为先导发动了一次次的进攻。中国人埋下的地雷在路中爆炸，破坏了一些坦克。中国人的机枪从建在坟堆里和护墙后面的阵地上猛烈扫射，迫使日本部队伤亡惨重而后退。江湾屹立而不屈。

同时，在几英里以北的庙行，植田师的将近一半人正同几乎整个二十四旅协同进攻这个重要的据点。它们的前进受到几

天前刚从南京调来的中国第五路军几个团的阻遏。这些部队是蔡廷锴将军呼吁增援和觉醒了的全国人民给予声援以后，蒋介石迟迟作出的反应。人民要求南京不仅空口赞扬，而且要采取行动支持这些广东人的英勇防守。

到黄昏时分，几乎整个江湾已是一片火光。周围农村里几十个小村庄也在燃烧。竹林子也被点了火，竹竿炸裂的声音加入了重炮的低音轰隆声、机枪的断续声和炸弹的雷鸣声的大合奏。

炮轰的密集度一天天增加了。我出神地观看着日本八英寸和十英寸口径的榴弹炮向江湾轰击。你可以看到炮弹离开炮口，升入空中，从后面看去就象什么怪异的、开玩笑的投掷手抛出去的无害的球一样。有时十几个炮弹同时升在空中，似乎你在观看巨人耍杂技。接着你忽然听到这些炸弹在对方阵地上炸裂，送去了死亡和仇恨的信息。

呆在日本阵线后面用不着过于担心中国人的炮火：他们的炮弹经常是够不着目标就落地了，而且多数是哑弹。中国人主要依靠的是迫击炮和机关枪，十九路军和五路军擅长于使用这些武器，使他们成了阵地战中可怕的对头。但是最致命的，最损害士气的，是隐蔽在日军防线内部的狙击手的活动。

我记得有一天在植田的野战指挥所碰到他的一名副官。他表现得很紧张。我问他出了什么事。

他大声说：“刚才我差点给打死！一个中国狙击手从这里附近一座房子里朝我放了冷枪，枪弹打穿了我的帽子！”他给我看了他的圆形帽，红色帽带往上一点有一个枪眼。“在我们前线后面一英里的地方，居然还会吃冷枪！”他恼火极了。

他说：“中国人在打仗时不讲信义。文明国家是不准放冷枪的。”日本人是死守步兵操典的，那上面他从未读到过指挥部会被人放冷枪。这是前所未有的，非正规的，冒犯了遵守传统的良好精神。

国民党军队最初从俄国顾问那里学来的放冷枪的战术很成功。中国(南方)人口稠密，农村房屋很密集，到处都有地物可以掩护这种活动，造成的破坏性很大。日本人在闸北战线和江湾吴淞战线的相当大的一部分伤亡是这种狙击活动的结果。我有好几次差一点也陪他们送了死。有一次我在江湾跑马场附近的一座坟后面躺了将近一小时，以躲避头顶飞过的枪弹。我爬着逃走的时候，自己的帽子上也有一个窟窿。

“便衣队”并不都是士兵化装的。有些狙击手是上海平民中的志愿人员，许多是法租界流氓集团头子杜月笙的人。杜月笙起初是卖白薯小贩，后来当上法租界捕房督察长，在那期间敲诈鸦片商人而发迹，现在已是法租界工部局堂而皇之的董事。他在十年期间成了控制长江流域大部分非法鸦片买卖的青红帮首领之一。据说青红帮一年要给法租界当局缴二千万美元，以换取允许在租界设立总部指挥它们的各种活动。杜自己现在是个绅士了，穿绸袍，坐高级轿车，对国民党官员称名道姓。但由于他搞敲诈勒索名声不好，因此急于讨好他的同胞们。日本人进入上海时，他就派了几十名流氓携带机枪、步枪到闸北，后来到江湾侵略者的后方进行骚扰。他给每人每天发五块钱，死了还给丧葬费。

日本军队对冷枪造成的伤亡寻求报复。他们在后方的几百个农村小屋里抓人，很少给予释免。士兵们进入民房拖出哭叫

着的妇女，有些勇敢的妇女顽强地反抗。有的被押到江湾跑马场等地的刑场。胆小的日本新兵奉命用刺刀捅她们，借以训练成冷酷的老兵。

日本战线后面的田地上到处横陈着被害农民的尸体，听任野狗撕咬。我曾亲眼看见农民被枪杀或刺刀捅死。记得有一天我在日军进占后不久走进一个小村庄。一些中国平民，包括一两名妇女，被驱赶进一个小竹林。然后日军放火烧这竹林。惊慌地从火丛中跑出的农民又被枪弹射死。

在战争中，日方和中方都没有抓到多少俘虏。我只看到过日本人拘留的一名俘虏。他是一个可怜相的男孩，我想不过十五岁。二十四旅岛本少将的副官，一个能讲英语的上尉，把他看作自己个人的战利品。他把这孩子锁在一个铁车厢里，拿来向外宾展览，我便是其中之一。他还问道：“你看，我们对俘虏很照顾，不是吗？”

这小家伙的棉布制服已经破烂，沾满泥土。他的眼神象一只困兽，等待着死亡。他腿上、肚子上和头上的刺刀伤口流着血，但上尉象没有瞧见似的。我望着于心不忍，要求让我把这孩子带到租界去释放。上尉狞笑着，从金牙缝里吸口气，说：“你真幽默。”后来有一天我去日军指挥部，看到那青年已死在铁车厢里。不知道是谁发善心又捅了他最后一刺刀，还是他自己死于失血和冻饿。

随着战事的延长，我开始唤这个上尉叫胡子先生。他听了觉着有趣。他来到中国时已经长了一个星期的胡子没剃，后来有一天对我说，不打败中国人他不剃了。他很想看看上海。但是不剃胡子不能去看上海，而不打败中国人又不能剃胡子。日

子越来越长，胡子先生粗犷的脸上毛发丛生了。

他有一本关于战争的德国书，里面有许多讲作战英勇的故事。外国新闻记者时常怀疑，他对去他的小办公室的记者讲的故事是从这本书里挑出来的。这也没有什么害处，不过他的有些故事无疑是真事。我相信，关于庙行工程兵三勇士的故事最初是他讲出去的。根据这一故事，日本各地造了塑像；在东京编了剧本上演了好几个星期；为这三人编过几支歌；以他们为模型做成玩具给儿童玩；还为据称是他们的血衣建造了一个纪念堂。

胡子先生的故事如下：在岛本旅和第九师向庙行长途进军期间，日本人受到两道坚强的防线的阻遏，并受到中国第五路军在江湾和吴淞口之间筑起来的带刺铁丝网的包围。日本人的坦克没有能突破这些防线，几次企图用手榴弹炸毁也告失败。这时三名年轻的工程兵自告奋勇去扫清道路。他们每人拿了几枝炸药棒，绑在自己腰间，扑到铁丝网中间，用人弹的形式为步兵的进攻开了头阵，导致庙行的占领。最初传说，这些工程兵已炸得粉碎。后来却拿出三件据说是他们身上穿着的干净和完整的制服，作为教育爱国青少年的展览品，因此故事不得不加以修改。

这事也可能是真的，因为日本人在战争中是疯狂的。但是上尉已经加油添酱。据外国武官们调查的结果，原来是十二名工程兵受令炸开庙行附近的带刺铁丝网。他们有的中弹身死或受重伤。有的设法到达路障，安放炸药，点着引线，安全返回了。炸药有效地炸开了一节中国人的防御工事。

上尉多次讲过的另一个他喜爱的故事，是“嘴里叼烟的上

尉”的故事。这说的是一个不畏敌人火力的日本上尉，站在壕沟岸上做士兵的表率。周围飞过密集的枪弹，但他不怕。他点着一支烟，站在那里鼓励士兵，向他们招手。但是他的命毕竟没有被神保住。他的心脏被射穿了。上尉讲到这里嗓音就会降低，最后结尾说：“这位勇士微笑着，嘴里还叼着烟，倒下了。”

日本人打了一个星期，也没有明显的进展。江湾的废墟仍然为几个英勇的中国机枪手据守着。日本人付出惨重代价打下庙行，占了一天，又被第五路军八十八师的一个团用高昂的代价夺回了。虽然日本人从未承认这一失败，我去过中国战线的后方，在庙行的废墟中发现了日本的太阳旗。

闸北江湾地段几乎没发生什么变化。吴淞和吴淞炮台，虽然被日本军舰和飞机炸了成千的炮弹和炸弹，仍旧在中国人手里。到处着了火，又有几千座住家、学校、工厂和大学的房子被燃烧弹烧毁了。从闸北和周围地区逃出的五十万难民进入了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每一所医院都挤满了受伤的军人和平民。

二月二十七日白川义则将军来到租界，接管了植田的最高指挥权。他带来了十一师的一部分，这是江湾很窄的阵地现在急需的增援部队。他们的到来使日军增加到三万人。中国方面的部队未变，分布在从长江边的防御工事到闸北的全线，比日方的战线要长一倍。他们包括十九路军的三个师，原来每师一万人；五路军的两个师，原来共二万三千人；以及在吴淞的一个旅二千五百人。到那时，伤亡已使日方减员约百分之十五，中方几乎百分之三十。

这种僵局又继续了三天，但到二十九日下午日本人在全线展开了猛烈的炮轰。每座炮都开火了，而且黄浦江上的日舰也

参加了袭击。日方的右翼由于新增部队而大为加强，于是日本人以坦克为先导再次试图占领庙行。日方中央的纵队业已绕过还在焚烧着的江湾（那里几百名处于绝境的中国人还在用机枪回答一切进攻），然后又向西朝大场进击。战斗整夜和第二天上午一直在继续，还进行了肉搏，在六英里长的前线战壕里都填满了尸体。防守庙行段的中國连队几乎全部牺牲，便从江防队伍中抽人赶来填补空缺。他们在猛烈的攻击下守住了。双方都有很多伤亡，表现了勇敢精神。

蒋介石将军带着南京政府人员逃到洛阳去了，讽刺性地令人回想起一九〇〇年八国联军进逼北京时咸丰皇帝的出亡热河。要是他派出需要的炮兵和步兵增援，中国本来可能长期守住防线；但是蒋介石想结束这场战争。他大概害怕日本陆军参谋部所作的威胁：如果继续抵抗，就要摧毁他在华中的统治。也许他害怕，如果长久刺激已被激怒的日本人，他们会派舰队沿江而上，破坏南京。他们已经炮轰过南京一次，威胁着还要再来。蒋介石不再增援任何部队、飞机和辅助人员了。

三月一日和二日，日本又派出两个新的师登陆，这就使它达到接近相等的人数，而在装备方面占极大的优势。一个整师是在长江岸上成功登陆的，并且开始从中方左翼的后方进击。在敌人大大加强了纵队从正面进攻，又有新部队插向他暴露的左翼的情况下，蔡廷锴将军明智地下令撤退到上海吴淞地区后面二十英里的第二道防线。

出乎许多人意料之外，这次撤退并不是溃败。租界里懂军事的人几天来一直预言，中国的防线最后被日军突破时，就会发生恐慌和狂乱的败退；有人害怕中国败兵会进入外国人管辖

的地区进行抢劫。这种担忧没有实现。

和我谈过话的外国军事观察家全都称赞蔡将军指挥这一有秩序的战略撤退很能干，在战术上也很正确。在所有能移动的大炮都撤走以后，部队才撤出前线。几乎没有发生抢劫和混乱。撤退进行得这样安静，掩护得这样巧妙，闸北的日本海军到天亮才发现敌人已经离开，他们整夜炮轰的已是空的战壕和工事。

八

第二天我在日军进占大约五百平方英里的中国领土之后不久去参观了旧的战场。

已经连续打了三十四天仗而疲惫的日本海军陆战队现在完全占领了闸北。跟他们一起来的是日本浪人，这些年轻的亡命之徒着手系统地破坏这个原来人口五十万的城市中剩余的房屋。他们在战事停止后很久还放火烧了许多工厂、办公楼和民房。出于报复的心理，他们驾着汽车出巡，绕着燃烧的街区兜圈子，有时停下来从携带的油箱里倒出汽油，重新点火。

海军陆战队所到之处，大街小巷上狼藉躺卧着平民的尸体。我看到一个母亲带着孩子，两人似乎是由刺刀一次穿透了的。我来到一家敞开店面的旧米铺，突然发现这里已变成一所临时的火葬场。店里已经堆了四层中国平民的尸体，日本浪人还在拖更多的尸体到门前，准备点火烧着。他们看到我就露出威胁的眼光。三名海军陆战队队员走了过来，用刺刀指着我命令我走开。

头上是晴朗的蓝天，象早春的天气。我离开残破的 闸北，经过一带农田，有农民在耕地。上次我来这里时附近轰鸣着大炮，现在已无声息。我觉得很难相信，在这些田地上不久前有两支军队互相残杀过：一支是头戴草帽，身穿又脏又旧的灰布制服的军队，它在进行英勇防卫之后正在撤退，但未溃败；另一支是头戴钢盔，身穿草绿呢大衣的军队，它在用许多杀人机器开路的情况下闯入别国的领土。

远处浓烟模糊了地平线。我走近一些，见公路上有许多炸毁了的卡车、装甲车和红十字会救护车：前面出现了劫后的大场。公路拐弯处躺着炸翻了的公共汽车。我过了那里，进入这个镇子，烧焦了的木头和人肉的刺鼻的气味迎面扑来。

听得见竹子在烧裂。日本平民带着汽油箱，在有计划地放火烧镇子边上幸免于炮弹的几座房子。公路中央出现了一个大弹坑，我的司机猛然拐了一个弯绕过它：地上散着破烂的衣服，有些带着血迹。一群苦力和农民在为他们的新的主人做着杂役。旁边日本哨兵横端着上刺刀的枪在监工。干得慢的人腰上被杵一下才麻利一些，就象笼子里呆滞的白鼠被人戳了一下一样。

到处是一派惨象。劫余的什物都在焚烧。一条小河边上堆着二三十英尺高的废墟，河上一座古雅的曲拱桥奇迹般地安然无恙。但是河面布满了烧焦的木头、损坏的家什、破衣服和泡肿了的尸体，在很慢地漂动或者滞留在岸边，似乎不愿离开它们被劫掠的土地。

在残砖破瓦和支棱着的檩柱底下，压着男人、妇女和儿童。这里那里，我看见破烂堆里伸出一条腿或一只胳膊；更不

忍睹的是撕裂了的，或者被野狗咬嚼着的肢体。在废墟中间还有活人在走动。他们吃力地爬在二百五十磅炸弹遗留下的巨大坑穴的边缘。这些是不再会笑的人，在进行着紧张的搜索。他们是镇上的居民，想找到一点什么东西能够认出自己失去的亲人，或者也许想找到自己的家原来所在的地方。

我沿公路驶去，经过一批批难民。有些是穿着棉衣的少女，脸上沾了烟灰，眼睛被烟熏红了。野外地上铺了草席，这就是几十个无家可归的人的营地，昨夜他们就是在这里度过的。他们还会继续呆下去，除非有人把他们赶走。

田地上到处有弹坑。公路边乱丢着手榴弹。有些被日本炮弹击毁了的汽车翻在沟里。路旁的农舍残破了；没有几家能逃脱炮弹的破坏。有的废墟里躺着一动不动的穿蓝布衣裳的农民。我们突然面临一个可怕景象，那是一具炸成两半的尸体。

我们继续驱车前进，此后不再细看那些残缺的茅屋了。拐离浏河公路以后，来到吴淞郊区。我们经过两三条挖得很好的壕沟，这些壕沟中国人在开始匆忙撤退以后就没再试图防守。地上的弹坑更多了。我看到一个德士古加油站，被炸成了两半。那里曾停着中国人的车辆：新的福特轿车和四辆欧洲造的车。这些车都烧毁了，它们的钢架被炸得弯弯曲曲。

附近就是中方指挥部驻过几天的小农舍。它巧妙地隐藏在一个竹丛后面，从公路上不大看得见。几个星期以前，在吴淞及其周围地区受日本军舰的炮和飞机围攻期间，我曾在这里一座茅屋底下的防空洞里采访过谭启秀中将。谭以英勇防守吴淞炮台而出名，在其余部队都撤退以后，他带了少数士兵在炮台

守了二十个小时。

在公路上遇到一个大弹坑，汽车无法前进了。这坑足有四十英尺的直径，深得灌满了从长江渗透进来的水。我下车，步行到淞沪铁路。一路上有许多炮弹片、没有爆炸的中国炮弹、迫击炮弹、手榴弹和其他战利品。

一过铁路，破坏的景象比以前看到的规模更大了。没有一座房屋是幸免的。外国人的房子也一样被破坏了。镇子里火苗还贪婪地窜着。街道上满地是砖瓦和檩木。罐子、椅子、褥子、断裂的水管、纠缠的电灯电话线和破瓦残垣混杂在一起。庙宇的屋顶掀走了，被打得遍体鳞伤的菩萨眼望着外面城市的废墟。每一所学校都被毁坏了，有些还在燃烧。

我冒险沿着一条街走去，两旁是火和摇摇欲坠的电线和梁木，其间有许多尸体或者尸体的碎块。奇怪的是，我看到的死者都是平民。在沿河的路上，我经过一家破坏了的旅馆和两三座别墅。一眼望去，无处不是混乱和死亡的痕迹。房子没一座是完好的。在一个月不断轰击期间，在这个镇子上倾泻了成百吨炸药和成千颗炮弹和炸弹。

公路边，朝向黄浦江和吴淞口，是炸坍了的中方壕沟。壕沟中躺着几个穿灰军服的青年的尸体。附近丢着一些棉衣，其中有的已被枪子或弹片所穿透。还有子弹打碎了的南方宽沿草帽；迷信的广东士兵保存着这些草帽，因为他们希望能活着回到广东的稻田间去。壕沟里的每一顶草帽大概表明死了一个人。广东士兵只有知道自己不中用了，才会抛弃他的草帽。

这个情景使人在想象中重演在这里英勇固守过的那个旅所经受过的考验。那支部队坚持下来，不怕牺牲在这个阵地上，

每天受到敌机的轰炸和低空扫射，受到泊在一箭之远的敌舰的炮轰，受到敌人优越的新式重炮的扫掠。他们所受的折磨比死亡还痛苦许多倍，因为他们日日夜夜都生活在威胁之下。这些部队只能靠迫击炮、步枪和少数机枪抵御拥有优越得多的重武器的入侵者，要有多么大的战斗精神啊！这是一种我原来不知道中国人所具有的坚韧不拔的战斗精神。

这个镇子我几乎绕了一圈，快走遍了。这镇子从来不很富。居民不到一万五千，住在大约一千家房子里。但这些不起眼的住房、商店，工厂、学校以及几星期前晚上还有渔民和小市民在这里聚集的茶馆，现在剩下的只有烧焦了的木头堆了。镇上的人被害的大概有五分之一。战斗中死亡的士兵有多少难于知道。有人说差不多整个旅都牺牲了。

废墟中间还有几个活人在走动。这里你看到一个妇女抱着孩子，站在原是她家的还在焚烧的灰烬之中。一个半疯的可怜人跑了出来，指着他的毁灭的家，声嘶力竭地问道：“谁赔我这个烂摊子？”还有人呆呆地望着我，指着附近的尸首，或者一动不动地站着，满脸黑灰，衣服撕破了，眼神里充满了战争的悲剧。

我看到一个农妇的尸体，脸朝下倒着，背后一片黑迹，一定是刺刀捅过的地方。附近有个女孩子，也是脸朝下倒着，一手拿着把茶壶。一个又一个尸体，有的上面盖了块毯子。我突然听见一个孩子的哭声，就站住了。在一个瓦砾堆旁边有床棉被在抖动。我掀起一角，发现一个十五岁开外的女孩。她还没死，用微弱的声音讨水喝。我捡起一只破碗，从河里舀些水灌在她干枯的喉咙里。她的一条腿似乎从膝盖以下已炸掉了；她

一抬手，我发现缺了三个指头。她居然还没死，真是奇迹。

我回到汽车旁，见司机在同一个唠叨的老人谈话。老人经历了这一切，并且为自己的存活显得颇为得意。他说邻居们都遭难了，他准备讲讲他们都是怎样死的。但说着说着，他走神而哭泣起来，想起了自己的家，妻子养过五个孩子，全都丧命了。

我看够了。我的脑海里印了一片恐怖和残杀的景象——在吴淞、江湾、闸北、虹口、大场和十几个小些的镇子。我想到成百个无辜百姓的苦痛、损失和死亡，无端被屠杀了，事先连个警告都不给。日本陆军参谋部声明它并不是在作战，这个声明似乎减少不了这些痛苦。

（《远东前线》一九三三年版第176—186、220—252页。）

一九三九年同毛泽东的谈话

斯诺问：国民党对抗日战争的政治基础的说法，同共产党的说法似乎有些矛盾。共产党一再强调，统一战线是这个战争的政治基础（见毛泽东《论持久战》、《论新阶段》等），但是这个词在国民党的文件和谈话里却没有地位。在国民党看来，战争的政治基础是共产党和所有其他党派服从于国民党的独裁。

例如，在重庆我采访了张群将军，问过他对这一点的意见。他说，谈不到什么统一战线，中国只有一个合法政党，一个合法政府，这就是国民党。“边区政府”是完全非法的，最终会被消灭。蒋鼎文将军在西安对我说了同样的话。他说，在中国除国民党外没有旁的合法政党。共产党在同委员长达成协议后，就“不复存在了”。因此谈不上什么统一战线。共产党在中国没有任何合法地位，虽然前共产党人，作为国民党军队的一部分，有权维持一些办事处和仓库。去年陈立夫讲的也是差不多一样的话。

蒋介石委员长最近对一个德国记者说，“中国一个共产党

也不剩了”，这显然否认了共产党的合法存在，因此也否定了统一战线的概念。

你对这些说法有何答复？统一战线的合法基础在哪里？共产党的合法基础在哪里？一个党否认另一个党的存在，还可能存在这两个党之间的名义上的统一战线吗？

毛泽东答：统一战线已经存在一个时候了。在人民的心中，在他们的谈话里，他们承认不仅存在名义上的统一战线，而且存在实际上的统一战线。但是有那么一小撮人，他们事实上不得不承认统一战线，而在口头上企图否认统一战线。我们叫这些人阿Q主义者，他们的手段是阿Q主义。

在鲁迅著名的《阿Q正传》里，阿Q总是做错事，却自命为一贯正确。你不相信，就去读读这部小说。有一派人企图无视事实，象阿Q，也象希特勒。你知道，不久前希特勒说，苏联只是一个名字，他认为世界上其实没有这样一个国家。可是过了一会，希特勒受了一点教育，有了一点进步。在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三日，希特勒不仅发现了名义上存在的苏联，而且发现了现实存在的苏联。（他和苏联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

——斯诺注）

中国的阿Q主义者中间，有许多人也会进步的。如果今天他们还否认统一战线的存在，今后他们很可能会承认这个现实。

最近我碰到一个老国民党党员张继（他作为赴各战线慰问团的团员访问了延安）。他并不否认存在统一战线，也不否认存在共产党。可能有些国民党党员只是在面前没有共产党人时否认存在共产党。也许他们以为，只要面前没有站着共产党人，

就不存在统一战线，至少是那个时候不存在。

至于我们服从国民党的独裁的问题，也许有些国民党相信这是事实。他们有这样想的自由，正象他们有吃饭和睡觉的自由。我个人支持孙中山的民权原则，我不妨碍他们爱想什么想什么，事实上，我现在很忙，没有时间去管这个闲事。

我不很清楚另外几派人怎么想，但是我知道，共产党从一开始就是完全独立的，没有一天、一小时、甚至半分钟牺牲过自己的独立。共产党从没有屈服于任何党派、任何个人。要让我们屈服是天下最难的事。

你说蒋委员长据说否认在中国存在共产党，但是我不相信这是真的。蒋介石先生是个政治家，他不仅有政治常识，还有更多的东西。其次，既然蒋先生是抗日的领袖，他不应该讲这样的话。第三，要是他真的这样讲了，那不跟他以前的话矛盾了？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蒋先生发表过声明，完全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因此我认为蒋先生不可能讲这样的话，因为这既缺乏政治常识，又和他以前的话相矛盾。

不过，共产党的合法地位的确实实现得很不完全。中国政府从来没有实现一九三七年它答应给共产党充分的合法地位的诺言。国民党以外的其他党派同样也没有合法地位。这只是证明，中国不是一个有宪法可循的、民主的、团结的国家，而且缺乏法治。无怪中国全体人民和各党派都要求结束“训政时期”。

从西安事变起，特别是从一九三七年中，行政院正式批准给予陕甘宁边区政府合法地位的法案时起，蒋介石先生就承认了边区政府。如果不合法，为什么通过这样一个法案，为什么中央政府同意边区政府官员的任命？高级官员表态这样混乱，

只能表明他们的效率实在太低。应该要提高效率。

斯诺问：中国在外交政策上强调，中国的斗争是站在民主一边反对法西斯主义，中国属于民主国家的行列。那么，有没有根据可以说中国是民主国家呢？从战争开始以来，中国有没有朝民主方向取得进步呢？人民有没有得到什么政治权利呢？这里我指的不是边区或者游击区的情况，而是指中央政府直接管辖下的自由中国的情况。

毛泽东答：唯一的根据在于我们国家的正式名称，叫做中华民国——人民的共和国。但是究其实际，显然是缺乏根据。孙中山先生的民权原则存在几十年了，但是至今没有兑现。几亿中国人民盼望看到它实现，大概有一天是会实现的。那一天到来的时候，我们才有一些其他的根据可以提出民主的口号。我希望这一天快些到来。

我们需要民主，不仅是作为外交上的词藻，更为重要的是，必须有民主，才能赢得抗日的胜利。

斯诺问：如果在战时中国没有取得朝向民主的进步，中央政府的性质实际上起了什么变化？它是否仍旧是国民党包办的独裁政府？

毛泽东答：如果政府本身没有变化，政府的政策起了一些变化。最重要的是，政府确乎负责发动了抗日战争。可是至于其他政策，特别是有关实现民生和民权原则的政策，却没有任何变化。

我们不能说政府的性质起了什么变化。它还是一党专政的政府。这引起了全国人民的不满，这种情况必须改变。最近在重庆召开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期间，据报道蒋委员长支持一项建

议，要动员不论党派的所有人才为国效力。会议本身建议结束“训政时期”，建立按宪法选举产生的政府。全国都要求在內政方面实行这些改革，如果不实行这些改革，中国将会遭到肢解。

（在另一次谈话时，我问毛泽东，如果提出给共产党內阁的职位，共产党会不会真的参加联合政府。我说我听说，一九三八年政府在汉口时，曾提出给共产党一两个次要的部长职位，而共产党拒绝了。据说共产党不愿参加联合政府，因为他们怕列强不赞成这种做法，还会把中国动摇分子吓得加入妥协和失败主义的阵营，再则共产党也不愿在一个他们不能控制政策的政府里承担任何责任。毛泽东否认在什么时候曾有人提出给共产党任何內阁的职位。他说，如果有人提出这种建议，共产党是会乐于参加的。）

斯诺问：由于战争的结果，中国政府的阶级基础是否发生了任何变化？

毛泽东答：是的，有一些变化。沿海一带和长江沿岸城市里最有钱的人已经成了汉奸和准汉奸。这些人的代表是汪精卫。已不能再依靠这个阶级的人拥护政府了。今天的抗日政府的基础应该主要依靠中产阶级和广大的农民。支持抗战的是这两大阶级。

斯诺问：你的意思是，政府今天比过去更代表中产阶级和农民了吗？

毛泽东答：还不是这样——不过政府应该是这样。政府如果不让这些阶级有更多代表参加决策，它必然仍旧是软弱无能的。只有在它的战争政策上，政府才代表比地主和资产阶级更

广的阶层，但是在它的国内政策即关于民生和民权的政策上，政府所代表的阶级利益依然和战前一样。

斯诺问：由于共产党已经放弃强调阶级斗争的宣传，废除苏维埃制度，服从国民党和国民党政府的领导，承认三民主义，停止没收地主和资本家的财产，停止在国统区的组织活动和宣传工作，许多人现在说，中国共产党事实上已不再是社会革命家，而只是改良主义者了，目的和手段都是资产阶级的了。你对这种说法怎样回答？你是不是依旧坚持，中国革命是反帝反封建革命，而且可能在某个阶段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而共产党的责任就在于领导全国走向那个革命？

毛泽东答：我们始终是社会革命家，我们从来不是改良主义者。中国革命有两大目标。第一个目标是实现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务。另一个目标是社会主义革命。后者必须实现，而且要彻底实现。目前革命的目标是民族民主性质的，但是在一个阶段以后，它将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中国革命纲领中社会主义革命部分现在的“准备”将变成它的“现实”——除非我们在现阶段的工作失败了，如果失败，社会主义革命就不可能早日到来。

斯诺问：中国是不是也有可能，在反帝反封建革命完成之前或之后，发展为法西斯专政？中国的法西斯势力是在增强还是削弱？

毛泽东答：在中国不可能有法西斯专政。国家的一半已经沦为殖民地。另一半面临着同样的危险。中国的经济还是半封建性质的。由于这些缘故，我们的法西斯梦想家是没有前途的。如果我们过去把某些中国政治组织称为法西斯的，如果我

们现在指的是这种势力，我们可以看到，它是在削弱而不是增强。但把这种势力称之为“法西斯的”是会引起误解的，因为中国(从经济发展来说)根本太弱，无法支持一个法西斯运动。那些想法与此不同，而企图在中国制造“法西斯主义”的人，注定了最后会折断自己的颈骨。

斯诺问：共产党自称领导着中国的工农。除了在边区对农民的领导以外，除了对含有一些无产阶级成份的部队的领导以外，共产党在实践上怎么能对中国的工业无产阶级(其中百分之八九十是住在日占区)实行领导权呢？共产党用什么方式既教育农民，又教育无产阶级，使他们懂得当前革命的反封建目的呢？

毛泽东答：是的，我们是自称对工农实行着这种领导，这两方面，政治上和组织上的领导。在陕甘宁边区，在八路军管辖下的游击区，我们不仅有政治上的领导权，还有组织上的领导权。在旁的地方，共产党的领导比较间接，但只要农民和工人是按共产党的主要方针组织起来的地方，他们实际上是在我们的领导下。

(按照这种逻辑，显然共产党人认为参加抗日战争的所有军队都在他们的影响之下，因为抗日是共产党在革命现阶段的中心要求。旁的人立刻会否认这点，说这是主观愿望；但就是这个逻辑使共产党人能够忍受对他们的活动的其他限制。只要抗战在继续，他们就认为革命斗争在继续，因此“转变”的时期正在一天天临近。——斯诺注)

你问到(在非共产党地区)共产党是怎样教育工农抗日和反封建的。宣传能起作用，而且也确实起了一定的作用。通过组

织抗日活动，取得不少成就，而且也能使人民认识到推翻封建主义的必要性。

斯诺问：你认为到现在为止，战争是加强了还是削弱了中国的封建势力？在共产党目前的纲领中，什么地方反映了革命的反封建目的？在边区以外的地方，在实现这种反封建的目的吗？要是反封建的革命纲领不能同时在全国实现，战争有可能赢得胜利吗？

毛泽东答：在革命的现阶段，首要问题是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反封建的任务可能暂时不得不退居抗日的主要任务之后。在这个时期我们的反封建纲领包括要求实现全国的民主以及通过减租减息等措施改善人民的生活。

不仅在工农中间，而且在青年学生、知识分子、进步作家、科学家、政治家、军人等等中间，正广泛开展着民主运动。这个运动面临的阻力就是过了时的政治制度。问题在于如何改变这个政治制度（而不危及抗战），因为若不改变，若不实现民主，抗日战争就不能胜利。

抗战和民主是同一把剑的两个刃。有的人假装支持抗战，但却拒绝民主的方针。他们实际上对剑的两个刃都不愿意使用。他们在把反帝斗争拖向失败。

一九三九年九月二十五日于延安

一九四三年从重庆 看中国之命运

中日战争可分三个时期：日本侵占华北，一九三七到三九年；日本占领区的巩固和绥靖，一九三九到四二年；西南占领区边界的稳定和华北中国游击战的强化，一九四二年。

同英美一般人所得的印象相反，欧战爆发以后日本人在中国打仗的目的并不是真的要侵占西南部的大片土地。一九三九年九月以后日本的军事行动主要为了稳定侵占区的边缘，同时也是为了练兵、侦察和掠夺财物。日本达到它在中国的主要目的——控制海岸，保护侧翼，占有经济发达地区——之后，就集中力量为即将来临的太平洋战争进行准备，并力图把在中国的负担减少到限于警察行动的程度。但它无法完全实现这个计划，因为华北前线的后方游击战不断发展了。到一九四三年底，出现了另一个因素使日本丧失五年来在中国侧翼上它所享有的安全。这个因素就是陈纳德少将的有名的第十四航空队为首的美

国空军力量在中国天空取得了优势。

我在一九四二年初重访重庆时，发现在这个战时首都有一个有意思的心理上的变化。对于战争负担的减轻，自然有一种巨大的宽释的感觉。现在是轮到我们美国人来负担了。国民党知道我们接过了打败日本的主要任务。还存在着一种可以早日取胜的幻想。珍珠港事件以后，重庆政府已不可能同日本取得汉奸合作式的和平，虽然那些反对“先击败希特勒战略”的人在华盛顿散布着相反的看法。

在失败仍然是地区性的情况下，这种“胜利心理”加速了两种在美国参战以前早已在重庆政权下开始出现的发展趋势。第一，早先酝酿对国民党一党独裁的制度作一些调整，现在停下了。何必要有“人民代议政府”呢？美国不是会给重庆送来建立庞大军队所需的一切飞机、坦克和大炮吗？还有什么内部反对派能够向国民党的统治挑战呢？

第二，由于美国无条件地给了重庆五千万美元的贷款，加上许诺无限制的租借法案援助，开发中国自己的资源以进行抗战的努力开始减弱了。保守的统治集团似乎不但在政治上，而且在经济上也对中国未被占领区和游击区三亿人民的潜在力量失去了兴趣。中国工业合作社早期惊人的成功曾经证明，人民的生产能力，如果用民主方式进行动员，可以满足中国大部分的民用需要和许多军用需要。但是现在重庆不再需要依靠这样的努力了——而且无论如何，人民中间新的经济力量的兴起有着令人不愉快的含义。国民党的银行家们在用他们的时间起草战后借助美国资本使华东各省工业化的庞大计划。有的人梦想用美国机器和中国苦力劳动制造廉价商品以夺取日本行将丧失

的市场。

一九四三年中当我从俄国再次回到中国的时候，我发现中国的经济已陷于混乱，政治生活比一九三六年以来的任何时候更为反动，军事效率降到战争开始以来的最低水平。地主、当铺老板、商人和本国银行的主要活动在于囤积商品和以粮食和土地做投机买卖。许多实业家已失去对生产的兴趣；囤积原料和等待涨价(平均每月一成以上)可以赚更大的钱。物价比战前已涨了约两百倍。应该运进枪炮或机器的飞机装满了在美国印就的钞票，一月要运进值几亿美金的钞票。

中国通货无限膨胀的主要原因，不在于缺乏资金，而在于不能贯彻执行应付战时经济困难的措施。由于政府坚持维护地主和高利贷者剥削农民的半封建经济，它根本无法动员“资金”。国民党的权力的政治基础，就在于代表上述经济的地主豪绅阶级。

在战争初期，日本确实就攫取了中国现代工业的百分之九十以上。但是六年来中国政府继续控制着比日本本土为多的天然财富，以及无限的劳动力。它没有能组织这些资源以补足失去了的生产，也从未制订出合理的分配制度。对于资本、原料、商品和粮食，国民党没有实行有效的控制，囤积和投机分子主宰了市场，而主要的奸商正是最高级的官员和他们的子弟。政府越来越求助于印刷机而不是生产来解决问题。

为了支撑这种经济，需要从外国进口，而到了一九四二年封锁完全堵绝了进口。结果是恶性通货膨胀，而对国家主要的生产者，即种地而无地的负债的农民，则极大地加重了负担。大

规模的饥荒往往不是由于整个国统区真的缺粮，而是由于投机性的囤积。到一九四四年，自由中国因饥荒而死亡的人数大概同在印度一样多。连军队也严重缺少食物；在减员总数中，患营养缺乏症者约占百分之七十，而伤员却只占百分之三十。

正是在这种需要得力的领导和具体的措施来防止进一步瓦解的情况下，蒋介石大元帅发表了《中国之命运》。起初曾打算把这本书作为中国所有学校的教科书，但后来外国的反应不利，在卖了二百五十万本之后蒋就停止将它发行了。外国使馆被要求防止原来的版本在海外出版，以待“修订和改进”。但这本书依然是国民党的圣经。

蒋的这本书使重庆的有些外国传教士感到震惊，因为他们长期以来以为他是信奉基督教改良主义并致力于用民主方式解决中国的经济和政治问题的。比较现实的外交和军事观察家感到失望，则主要由于书里并没有提出认真的建议，以动员中国的资源，全力以赴地争取赢得战争，避免经济崩溃。

事实上，《中国之命运》只用了十几页的篇幅谈战争。其余二百页谈的都是这位高贵领袖在战后建设强大中国的计划。这书的一大部分似乎是无可反对的常识。谁也不应反对其中关于使中国实现大规模工业化的计划，甚至也不能反对委员长坚持的全国青年的所谓“军事化”。但是在这方面许多人似乎理应感到不安的是，蒋表示打算“收回”“一百年前”受中国文化“深刻影响”的一切地区。

《中国之命运》里透露了一些有意思的东西。它对中国历史作了一番不很准确的解释，以支持一种大汉族主义的理论。有

些批评家认为这同希特勒的泛亚利安族主义没有多少区别。蒋公然把百年来中国的大部分麻烦事都归罪于外国人，而他举的事实并不总是准确的。他在另外的地方强调，中国只能有一个领袖、一个政党——这对希望有两党民主政治的人显然是一个打击。蒋说，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应参加这“一个政党”，而他把反对这种清一色国家的意见斥之为“新军阀主义”。委员长还赞美了在满族征服者手下(清朝)所保留的统治哲学。有些中国评论家认为，蒋的这种留恋封建制度的奇怪心理，包含着令人担心的法西斯因素。

评论家认为，蒋提倡的“大汉族主义”使藏、蒙、回和新疆各族人民很有理由感到疑虑。蒋在一个地方写道：“如果满族人取消汉、满、蒙、回、藏各族之间的界限，并承认五族事实上为一体，那就难于责怪他们了。”这种说法同蒙古人想成立独立国家和掌握自己“蒙族命运”的愿望是直接冲突的。

在国外人们有时认为委员长是“居于党争之上”的个人，或者以为重庆政府不是国民党一党的工具——事实上政府成员全是国民党指定的。但是在这本权威性的著作里，委员长清除了关于他认为自己首先是国民党总裁的怀疑。他说：“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国民党的失败，将意味着整个中华民族的失败。简言之，中国之命运全赖于国民党。”他一方面主张只能有一个党、一个领袖；另一方面则要求共产党(他称之为“新军阀”)交出一切军队。

实际上，委员长的意思就是不惜一切代价地维护现有的政治制度。而这个政府曾被美国观察家描写为一个“警察国家”，因

为四大自由^①中有三个这里并不存在。它是一个由国民党党员组成的一个小集团的专政，而委员长则是这个小集团的中心和头面人物。

在形式上，国民党的方法和统治在很多方面类似俄国的共产党；在内容上，它们是根本不相同的。国民党在一九二四年借用了俄共的组织形式，而且在采用了反共纲领之后还保留了这种形式。不过在这里党就是政府，而且没有选举出来的委员会或者苏维埃这样的机关。这个党即政府的特殊组织主要代表了大地主阶级和新资本家中的买办集团，他们在华东和美国有着巨额的银行投资和工业投资。委员长自己现在正式列在中国银行家之首。他同他的阔佬连襟孔祥熙夫妇和他们的孩子们、有钱的夫人宋美龄和她的兄弟们今天掌握了一切公私财团的关键部位。顺便提一下，据公开材料，蒋孔宋家族中没有一个人曾经提出过个人所得税的报告。

这里只须指出，从一九三九年以来，所有的政治变革逐步加深了官僚阶层和基本上民主的中国人民中的进步社会势力之间的鸿沟。其中一个发展就是秘密警察和军统特务镇压权力的急剧增加。

另一方面，也不能认为重庆政府已经成为彻底法西斯化的专政。半殖民地经济的松弛组织使得这个国家不可能真正法西斯化。中国一党独裁的发展中还存在着许多“空隙”——最明显的事实就是在国家的一部分地区居然继续存在着反对党共产党领导下的庞大军队。在这两大势力的夹缝中间也还有可能继续

^① 一九四一年美国总统罗斯福提出的四大自由：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译者

存在着几个小党，它们的党员是重要的自由主义分子，有时这些小党还能表达自己的见解，虽然它们既无合法地位，也没有权力。它们是国社党、民社(或“第三”)党、救国会和乡建派，共同组成了一个民主政团同盟。

在抗战初期，作为对民主舆论的让步，国民党曾同意召开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以反映民意。这个会议一年开几天，讨论国家大事。它并没有立法或参政的权力——事实上没有任何政治权力——但至少各党派的代表可以在这里作短期的聚会，以进行有限的讨论。

一九四三年，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又通过决议，许诺在战争结束后召开国大，成立按宪法选举的政府。但是除了委员长的这本书以外，有两件事使这个诺言的价值成为可疑的。第一，过去十年中关于召开国大作过多次诺言，但总是找到理由加以推迟，未得实现。第二，国民党为组织国大规定的办法使它的绝大多数代表无疑会是国民党的党员或者它所指定的人。因此，即使一旦国大开会，它将仅仅是使现存的政权取得“合乎宪法”的地位。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不久，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发表十条宣言，要求政府结束一党统治，停止强迫教员和学生加入国民党的做法，废除集中营，取消对国家军队的一党控制，限制发国难财，并为动员人民抗日而容许某种程度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结社自由。可是这些要求遭到镇压，参加呼吁的有些人逃往广西避难。民主政团同盟有一段时间消声匿迹了，直到一九四三年九月，它的主席张澜(字表方)发表一封以他自己的名义的告全国同胞书，尖锐批评了独裁者和他的政党，并要求立即结束国

民党一九二七年上台后就强迫规定的所谓“训政时期”。

张澜是杰出的学者，七十二岁了，以前是四川省长，曾任过去的成都大学校长。他早年反对满清，曾长期为国家服务，由于德高望重，才免于公开批评政府而遭受报复。即使这样，他关于中国争取民主的历史的学术性著作还不得不秘密地刊印。他在最后几段里写道：

“若非立即结束一党独裁，放弃一党统治，停止‘党化’，民主便无从谈起。……多年来，政府官员公开贪污，上行下效。法令形同废纸。政局如是。

“经济方面，专卖与赋税机关蔓生，重叠臃肿。政府多方遭怨，人民受扰，收益辄被中饱。人民无粮，仍须纳粮。应建立真正的民主，使人民有权监督政府，限制官吏，共管国事。……”

“自一党独裁建立以来，党外人材废弃，其他政党均受镇压。公开活动被禁止。尤须指出，共产党之数十万军队，地处七八省，随时受到内战的威胁。……”

今天国共似乎已象十年以前那样互相对立了。为重新建立“统一战线”的每一项建议都失败了。中国人民耐心努力的最后结局，难道会是兄弟之间再次拚命争夺已为数十年战争沦为焦土的地域，而不能团结抗日赢得光荣的胜利吗？为什么委员长如此地不能容忍游击队在他的卧榻之旁存在呢？如果内战重开，对我们美国的抗日战略又会产生什么影响呢？

为了解答这些问题，请读者在地图上把眼光从重庆北移五百英里，看一看延安这个小城。这里是十八集团军的总部。这里是外界很少知道的战斗中国的门户，从这里出发，游击队到

敌后抗击着日本人。

* * *

希特勒是个撒谎专家，但连他也不能避免偶尔讲一句真话。他在《我的奋斗》里某处写道：“人民的记忆力之差，令人难以置信。”我想起这句话，是由于最近听到美国和英国有人批评中国，责备中国抗战不力。他们多快就忘记了，正是中国在那些英雄的年代里曾经单独进行抗战，可以说是在这次大战中独一无二地那样孤立无援地作战！从一九三七到一九四〇年底，中国不但得不到联合国家的援助，而且它的敌人还能从美国、大英帝国和轴心盟国得到它能够用钱买来的一切援助。

要是中国那时接受日本诱人的和平合作建议，转而反对我们的话，谁能责备它呢？而如果中国那样做了，远东的局面今天会是多么不同呀！美国人和英国人现在不论对中国军队的处境和缺乏效率抱什么看法，都不应该忘记我们对中国人民欠了多少债。我说对“中国人民”，因为正是他们的战斗意志，而不是哪一个党的领袖个人，在那些孤军奋战的黯淡年代里决定了中国拒绝投降的政策。

因此，当中国的一部分在七年之后仍然在坚持抗战的时候，我们对它欠的债更要多多少少呢？何况这部分中国的条件直到今天比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①以前全中国的条件还要艰苦呢。我指的是中国的解放区，那里现在还处在封锁之下，得不到联合国家的援助，连援助的诺言也得不到。解放区不但得不到提供给中国的美国租借法案的援助和军事装备，还遭到重庆政府

^① 珍珠港事件发生的日期。——译者

本身的封锁。这是中国内部问题的一部分，但是我们理应注意到这个问题，而且对于处于日本战线后方的英勇的中国游击队领导人始终忠于民主事业而不降敌一点深为感激。事实上，主要正是由于中国存在着这些力量，才防止了重庆政府向法西斯主义投降。

中国国内的情况在有些方面同南斯拉夫相似。朱德和毛泽东将军领导的游击队相当于铁托元帅的部下，而重庆对他们的政策跟米海伊洛维奇和彼得国王对南斯拉夫游击队的政策大体相同。在南斯拉夫，我们美国人和英国人、俄国人现在积极援助铁托，其原因只是因为他的部队努力对轴心国作战；可是在亚洲，直到一九四四年春末，我们还没有正式承认唯一在武装抗日的华北游击队。实际上，中国的游击队是世界上最大的游击组织，比在旁的国家里大得多。它对我们美国有特殊的利害关系，因为美国海空力量的迅速西进意味着太平洋战争的战略形势的改变。

一九四四年二月，尼米兹海军上将透露，海军打算在中国沿海占据若干基地，以便从那里进攻台湾和日本。最先收复的中国港口可能是香港和广州，但从那里去轰炸东京和大阪航程还太远。最近日本的地方在北边山东沿海；因此在那里的中国游击队对我们很重要。然而到我写这本书时，我们美国在他们占领的广大地区里连一个情报官员都没有派驻。

从长江流域到蒙古草原，到南满的白山黑水之间，成千上万的村庄是这个“人民战争”的活动场所。战争的组织者都是有为的青年，主要是八路军和新四军联合改编的十八集团军所鼓舞和训练出来的。领导这些军队的是中国的老红军将士，他们

是在十七年连续内战和卫国战争中成长起来的，具有惊人的艰苦经历。

一九四三年访问过游击区的外国观察家估计，在敌后他们组织起来并给予了简单训练的民兵约有七百万人。这些民兵是主力军的后备队。此外，据说各种抗日群众团体有会员一千二百万，都是军队的耳目，为军队提供衣食住、装备和运输力量。官方资料表明，华北游击区遍及四百五十五个县，有村庄五二，八〇〇个，人口六千多万。据说所谓的“敌占区”的五分之三到三分之二大部分时间都在游击队手中。

日本人在近七年来一直企图消灭这些不懈的敌人。一九三七年八路军正规部队不足五万人，只牵制了少数几师日本军队。但是那支先锋部队朝各方面扩展起来。到一九四四年，日本在中国本部（东北除外）的三十五万军队中的大半和约二十万伪军都在忙于防守设防地区和企图清剿十八集团军。日本人的军事报告估计十八集团军有五六十万人。外国军事情报比较保守地估计它共有枪支约二十万条。

肯定的是，在日本人占领的约有三个法国那么大的地区里，各地都有游击队建立起来的村政权和县委会。游击队建立了四个“边区”政府，各自代表着几个邻省之间的解放区，这些解放区也就是根据地，整个战争期间基本上都为他们所据守。在可行的地方，就举行直接的、秘密投票的选举，差不多所有村政府和县委会都是这样选出来的。

这些敌后政权行使了通常政府的几乎所有职权。它们有自己的邮政和电讯事业，出版书报杂志。它们设有广泛的学校网，实行着承认男女平等和成人普选权的革新的法律制度。它们调

整地租，收税，控制商业，发行纸币，开办工厂，经营试验农场，发放农贷，实行粮食定额分配制度，在有些地方还进行相当大规模的造林。

如果全世界最近很少听到关于这些成就的消息，这不能全怪外国报界。除了军事和经济上的封锁以外，在重庆还有严格和高效率的新闻封锁。一九三九年以来，垄断中国对外宣传的国民党宣传部禁止了几乎一切关于十八集团军的活动的消息。

虽然如此，上述那些事实为成百万中国人所熟知，而且谁只要不怕冒点风险就可以探听得到。在曾经去游击区进行调查的一小批人中间，得到印象最深，而且的确了解事实最多的，无过于一个美国海军陆战队军官了。我碰到他是在我第一次访问延安回来后不久，在发生战事的上海；当他表示对游击区有兴趣并想前往访问的时候，我尽我所知向他作了介绍。后来他从上司哈里·亚内尔海军少将那里得到准许去调查游击队。他几次穿过日本封锁线，到八路军部队那里前后呆了好几个月，最后出来写了一本关于八路军的很有价值的书。

不久之后，美国参了战，他得到机会应用了他所学到的东西。他奉命组织和训练几营经过挑选的美国青年，以备执行特种战术任务，就采用了许多据他说是从中国游击队那里借鉴来的想法。这个康涅狄格州牧师的儿子所领导的海军陆战队突击营，现在正把中国人的“工合”呼声带回到太平洋的彼岸去。他就是埃文斯·福代斯·卡尔森上校。

自从卡尔森去过以后，委员长就再没批准过任何外国军事观察员去访问我们的游击队盟友了。但是有少数外国人从日本占领的北京逃出来，得到了游击队的帮助，非自愿地观察到了

这个国中之国的生活情况。我采访过这些曾和游击队同路跋涉的外国人中的多数人——其中一人自称是“留学生”——发现他们得到的印象在主要方面是和我的印象一致的。除卡尔森外，这些人中有一个英国陆军军官、一个美国银行经理、一个美国医生、几个美国和英国的教授、一个比利时商人、少数传教士和六个新闻记者。他们的政见彼此相差很远，但奇怪的是他们一致同意下列这些关键的事实：

中国的游击区开展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群众动员和群众教育。领导这种运动的游击区政权之所以能够存在和壮大，是因为它们赢得了农民，特别是青年农民的衷心拥护，成万的青年农民已经为这个很少为外界所知的斗争献出了生命。这个战斗地区具有中国前所未有的政治上、经济上和社会上最民主的制度。它的政府很廉洁，可以说有效地驳斥了“老中国通”中间一种普遍的说法，即认为中国人做了官是一定要贪污腐化的。

这一切是怎么开始的呢？这是一个很长的故事，可以一直追溯到中国内战的年代。我和其他一些人曾经详尽地叙述过那段历史，但那个时期情况太复杂了，这里不能细说。不过有必要很快地回顾一下那段中国历史，补补课，使我们能够了解当前——美国即将打到日本本土去的时候。

* * *

日军一九四四年在中国占领区的前线，是在一九三九年底以前就稳定下来的。当初日本人进占这些地区时，国民党政府的官吏，象它的军队一样，向西和向南撤退了。在他们后面，原有的行政官僚机构崩溃了。城市里由日本人和汉奸取而代之，

但是在农村和偏僻的镇子，在敌人设防点之间，存在着政治上的真空地带。中国红军就进入了这个暂时真空的地带——带着他们的武器，带着教师，带着对人民力量的信任。

这种行动开始时得到委员长的默许。这首先是由于先前一九三六年少帅张学良在西安“扣留”了委员长，劝说他停止打共产党而要联合他们抗日。停战实现了；在日本入侵华北后，国共达成协议，结束了十年内战，北方的红军被承认为国军的一部分。他们不再用红旗和红星，接受了“八路军”的番号。上海西南的其他红军残部，于一九三八年合编为“新四军”。

但是共产党继续指挥改编后的红色部队，正象蒋介石的国民党继续控制其他中国军队一样，共产党要求国民党政府在法律上承认其他政党存在的权利，并说如若不然就不能保证没有人再次企图消灭他们。他们许诺，一旦国民党实践它在这方面对人民的诺言，就向一个按照宪法选出的代议政府交出全部兵权。

这里“共产党”这个词可能引起对中国缺乏背景知识的美国人的误解。事实上，在中国从没有实行过真正的“共产主义制度”，即使在以前的苏维埃地区也没有，而且中国共产党人也没有自称那样做过。在江西早期曾有很短一段时间，年轻的红军曾试图实行集体化和废除一切生产资料私有制；但是经历带来了许多修正。中共一直申明，他们的纲领是领导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实践中，他们赢得拥护是靠了实行一个两点的当前纲领：一方面进行反封建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改革，另一方面领导反对外国控制的民族解放斗争。社会主义始终是最终的目标，但他们承认那是遥远的目标。

共产国际在解散以前很久，早就不再同中国共产党发生多少直接联系了，虽然有时它的指示还对中共产生影响。中共早就确立了相对的独立性。毛泽东脱离了以前的领导，在一九二七年因违背党的“路线”而被开除出领导。随后在纯属中国的环境中进行的斗争中，他战胜了陈独秀，又战胜了李立三——这两人都一度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今天毛已是所有中国共产党人公认的导师，他通过武装斗争证明了自己的路线的正确性。莫斯科后来承认了他的正确，但是在十年内战期间俄国和共产国际给他的物质援助是微不足道的。实际上，中共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带有中国特色的产物，牢牢地扎根于中国“半殖民地”革命的民族问题之中。

今天，国民党和共产党都自命为民国缔造者孙逸仙博士的合法继承人。两党在革命初期都支持过他。孙自己倡导了国共合作；只是在一九二五年他逝世以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反革命势力才力图“消灭”共产党。即使在一九三六年停战以后，就具体实施孙逸仙的“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也没有能达成协议。

共产党认为孙是一位社会革命家，要求对他的政纲作激进的解释。简言之，他们说他们要进行“彻底的民主革命”，平均土地所有权，实行普选制，建立按宪法选举的人民政权，以及在其他地区推翻封建主义的类似改革。国民党对三民主义的解释要保守得多。由于它在国内主要靠地主阶级的支持，它自然反对激进的土地改革。总的说来，它要保持现有的经济和政治关系不变，把自己的独裁制度建立在中国旧的半封建制度的基础之上。如果它承认其他政党的合法性和它们的不同的解释，

特别是如果它承认了成人的普选权，这个基础几乎肯定会崩溃。

虽然有关民主和民生的这些问题仍未解决，国共两党至少在日本入侵时就“民族主义”的原则达成了协议。共产党于是接受了委员长的军令。一九三七年他把他们派往华北前线，许多国民党领导人深信他们到了那里就会被日本人吞吃了。然而，他们并没有象有些华北军阀的军队那样被击溃。他们迎击了进攻，在城市里吃了败仗，但他们并没有败退或投降，而是转移到乡下和山上去继续战斗。

他们派有经验的游击队领导人和政治组织者深入到北方各省，很快从越来越多的城市难民中吸收了很有用的生力军：学生、工人、自由职业者，包括一些属于非共产党党派的知识分子，他们都是长期来受中国政府和日本政权压制的。整师的被击败了的的中国军队，同后方割断了联系，也来归于他们的领导之下。他们的枪支火力增加了。到一九三九年，他们的根据地已大为加强，以致日本人不得不对他们展开大扫荡。那时以来，这种扫荡每半年进行一次。

完全受敌占区包围的第一个游击政权是在黄河以东山西东北部山区建立的，现在包括了北到热河和内蒙古的地区。另一个政权，首府在晋东南，指挥着河北南部和山东直到黄海之滨三百英里长的解放区里的作战行动。第三个边区在上海以北，以苏北为中心，由兵力近十万的新四军控制着。第四个地方政府建立在汉口以上长江北岸的山区，地处皖、鄂和河南南端的交界部分：

用来组织人民的政治方法和军事方法，大部分是从国统区

内共产党现在所据有的唯一根据地里积累的经验学来的。那就是华北的老苏区，地处黄河西岸，与日军的碉堡相对，它包括陕北以及甘肃和宁夏的小部分。一九三七年撤销了旧的苏维埃政府。成立了陕甘宁边区政府。这个政府放弃了阶级斗争，停止了重分土地，宣布了一切抗日党派和团体为合法。十八岁以上的公民都有选举权。鼓励私营企业，并坦率地把经济制度叫做“国家资本主义”。

“中国游击队之母”延安城是陕甘宁边区政府的首府。在旧政权和新政权之下的延安，我都参观过。我第二次访问延安是在一九三九年，现政府成立以后。到目前为止，那仍是外国新闻记者对那个地区的最后一次访问，因为不久那个地区就被军事封锁隔绝了。

延安地区原来是最穷、最落后的地区之一，但边区政府经过几年切实的努力，在这里建设了有文化和繁荣的社会生活。实行了免费义务的小学教育，建立了中学、中专和高等院校，包括一所女子大学。成千上万的青年经过敌占区徒步几百英里来到延安求学。建立了公共卫生系统和几家医院。那里有许多工业合作社，也有一些国营工业，但是私营工商业也很兴旺。陕甘宁边区的农民开垦了六十万英亩的生荒地；在政府的帮助下，有几万名敌占区的难民在那里安了家。鸦片根绝了。在我参观过的地区里，有效地禁止了卖淫和对儿童的奴役，而且也没有乞丐。闲散的人都组织起来劳动。每一个村子和县都有选举成立的行政委员会。边区政府是由普选出来的代表选举产生的，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

在黄河对岸的敌后，组织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自然要比

在延安困难，但努力的目标大致相同，不过成功的程度不一定一样。虽然新闻记者没有能够去调查山西和河北的地区，有些外国人从日本占领的北京逃出来，向南通过游击区，相当详细地报道了那里的制度。这些观察者中间有有名的美国教会学校燕京大学的威廉·班德教授，他是我在那个大学里讲课时认识的。还有一个也是燕京的教授林迈可(迈克尔·林赛)，他的报道最近登载在《美亚杂志》上。这是一个时期以来传到外界的关于游击区的最全面的材料，是由他的父亲，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院长亚·邓·林赛提供发表的。

据林迈可教授说，晋察冀边区政府是从人民和群众团体直接提名的候选人中选举产生的。几乎到处都有村和县的行政委员会。若干村组成一个选区参加县的委员会的选举，选举前开会进行讨论。投票是无记名的，选民有复决权和召回权。凡属可能的地方，边区政府和敌后游击区政府也是直接选举产生的。

虽然在国统区非国民党党员不能任官职，在游击区所有抗日民主党派都得到承认。国民党党员也有被选举任职的。陕甘宁边区政府的主席和副主席都是国民党党员。

中共要在游击区建立各党派的统一战线，因此它把自己党员在任何选举产生的机构里的席位限制到三分之一。据林迈可说，这个特别的方针受到严格的贯彻。其目的是吸收土地所有者(甚至地主)和商人参加政府，尤其是为了从贫农和工人中间训练政治领导人。按游击区领导人的话来说，这叫做“通过实践学习民主主义”。

然而在群众团体里对共产党员参加领导并没有人数的限制，而这些团体是游击区的主要支柱。它们包括农会、工会、

青年组织、妇女组织、儿童组织，而且会员都有几百万。最重要的团体是自卫队、民兵和青年先锋队。这些是粗放的但是基本的军事组织，它们在当地支援十八集团军的主力部队。

中共党员和游击区领导人对所有这些团体的牢固的领导权，以及部队的十分高昂的士气，主要产生于这些人的纪律性和民主作风，而不是由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宣传。如果我这个话使持怀疑态度的“老中国通”，特别是新来到中国西部的美国陆军军官感到惊奇，我不责备他们。因为他们从没有看到过我谈到的这些人。

北京大通银行前经理马特尔·霍尔是经过游击区从日本人手中逃出来的最后一个美国人。他最近对我说，对于游击区领导人受农民热烈拥护一事，他能作的唯一解释就是“这些人本身廉洁和正直，有强烈的爱国心，致力于切实的民主政治，信任普通老百姓，并且不断努力唤起民众的责任感，动员他们采取行动。”

以毛泽东为例。他现在五十岁，担任红军领袖已经二十年了。从财政的观点看，似乎无利可图。毛仍然身无分文。是军队给了他衣食，也养活着所有的游击战士。卡尔森上校描写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将军是这样一个人，他“仁慈有如罗伯特·李，坚韧有如格兰特，谦逊有如林肯。”朱德是孙逸仙早年信徒之一，曾经很有钱。但他把全部钱财捐给了军队，今天已经六十多了，除了自己背上扛得动的行李以外别无长物。许多中国游击队领导人都是这样的人，我认识他们，曾经好几天和他们一起吃饭，和他们挨着身子睡觉。

我上次看到毛泽东时，他一个月领的工资还不到三块美金。

十八集团军里的人谁也不通过战争赚钱。军官和士兵每月只领几块钱饷，以解决个人的需要。他们吃、穿、住全都一样，而且和农民共甘苦。这不是甘地式的禁欲主义；他们都希望有更富裕的生活。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充分利用每一块钱和每一碗饭，争取实现自给。

人民对日本人同仇敌忾的情绪使这些热心家易于动员群众的爱国心，但是在政治改革的同时还发生着经济和社会的变化。实行一夫一妻制，成年后婚姻自由，免费教育和十八岁普选权——这些在妇女中间引起惊人的反响。林迈可说，解放区妇救会有三百多万会员。许多妇女被选举为村、镇委员，大批年轻妇女担负着严肃的政治和军事工作。

在“稳定的”据根地里，广泛实行着免费的义务小学教育。有的地方，高达百分之八十的学龄儿童都已识字。我没有篇幅和时间在这里详细描写维持这些地区的经济制度；基本的改革是大幅度减低地租。逃亡地主的地由集体耕种；目的是把一切可耕地耕种起来。农业税主要征收粮食，税率保持在日本人所收的一成左右。普遍建立了消费合作社、供销合作社和工业合作社。林迈可的报告说，山西有四千多合作社，光河北中部就有五千。

建设游击区的每一步都遇到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对于战争期间这种发展中的痛苦，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的有强烈感染力的书《中国战歌》提供了目击者的极为生动的描述。日本人诚然没有能够消灭游击队或者制止游击队的成长，但是他们确是进行了几千次大大小小的扫荡战。他们在几千个村子里实行抢光、烧光，奸淫妇女，杀害了无数平民，企图用恐怖手段吓得中国

人连抵抗的念头也不敢有。游击队总是能找到方法来克服这种使士气低落的手段的影响，但是也要付出象俄国游击队所付出的那样惨重的牺牲。现在日本人固然已不能控制华北离他们设防的铁路和公路较远的任何村子，但同时他们的据点也大大增多和加强了，想拔掉一个据点得付出很大的代价。

有人贬低游击队的领导人，说他们为什么不更频繁地攻击敌人的大据点。这种批评往往是由于对情况不了解。缺乏军火工业是一个根本的弱点，即使想出巧妙的办法也无法完全克服。八路军和新四军的主力军大概有二十个师，他们有机枪、步枪和一些迫击炮，装备还不错，然而一向缺乏大炮、弹药、高级炸药和运输工具。因此，他们不得不选择打速决的、得过于失的战斗。

鉴于他们动员了几百万人，似乎他们的战斗效率很低；但是同中国政府那些接受盟国重要援助而却躲在安全的基地里无所作为的军队对比起来，他们的战绩是很可观的。游击队的领导人这样反问批评者：要是盟国对蒋介石封锁五年，象他封锁解放区不给一点援助一样，蒋介石能够维持抗日多久？

游击队并没有国统区军队所享受的有利条件，然而却增加了他们出击的次数，在一九四二和四三年达到全年平均每天对日军战斗三十三次的数目。十八集团军战地司令彭德怀将军有一次对我说：“我们是鱼，人民是水，我们在人民之中如鱼得水。”他的军队只有通过巧妙利用他们的两个有利条件：人多和地广，才发挥出他们的力量。作为他们后盾的千百万人民只须提高他们的机动性，就可以产生无穷的力量。

（《人民在我们一边》一九四四年版第277—297页。）

封面
书名
前言
目录
正文